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思想方法論

解放社出版

思想方法論

思 想 方 法 論

著 者

馬 克 思
列 寧
恩 格 斯
大 林 斯

出 版 者

東 北 書 店
住 木 斯
齊 齊 哈 爾
哈 爾 濱
牡 丹 江
東 安
北 安

印 刷 者
東 北 印 刷 廠

延 吉 富 錦 勃 利 鶴 立
綏 化 湯 原 依 蘭 樺 川
肇 東 安 遠 集 賢 拜 泉
克 山 海 倫 望 奎

每 冊 定 價 七 角 五 分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五 月 翻 版 東 安 五 〇〇

例言

(一) 本書是在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反黨八股的號召之下編纂起來的，目的是要幫助同志們掌握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科學共產主義的思想方法，來整頓我黨的學風、黨風和文風，爲中國革命的勝利而戰鬥。爲要說明本書編纂的動機及其精神，我們把毛澤東同志『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作爲代序。

(二) 本書章節與內容的編列，在各部份之間並沒有絕對的界限；放在某一章與某一節的東西，有的也可以放在另一章與另一節。問題是需要讀者善於領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每段思想的實質。

(三)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文獻，在中國還是不足，本書所搜集到的東西，當然也還是很不完全的，我們希望此後能繼續補充。致於譯文方面，有些不完善之處，我們也希望將來得有機會重新校勘的機會。

本書編輯委員會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改造我們的學習（代序）

毛澤東

這是一九四一年五月我在延安幹部會上的一个講演，現按當時講演提綱整理發表，以供同志們討論。

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與學習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

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互相結合的二十年。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黨在幼年時期，我們對於馬列主義的認識與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是何等膚淺，何等貧乏，則現在我們是深刻得多，豐富得多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與組織者。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抗戰以來，我黨根據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戰的具體實踐，研究今天的中國與世界，是進一步了，研究昨天的與前天的中國也有某些開始。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現象。

但是我們還是有缺點的，而且還有很大的缺點。在我看來，如果不糾正這類缺點，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更進一步，就無法使我們在將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的偉大事業中更進一步。

首先來說研究現狀。像我黨這樣一個大政黨，雖則對於國內國際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對於國內國際的各方面，對於國內國際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來，一般地說，我們並沒有對於上述各方面作過收集材料與着重研究的系統的周密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客觀實際狀況的濃厚空氣。『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誇誇其談，滿足於一知半解。這種極壞的作風，這種完全違反馬列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還在我黨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着。馬·恩·列·斯教導我們認真的研究情況，從客觀的真實的情況出發，而不是從主觀願望出發，我們的許多同志却直接違反這一真理。

其次來說研究歷史。雖則有少數黨員與少數同情者曾經進行了這一工作，但一般是不會有組織地進行過。不論是近百年的（昨天的）與古代的（前天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列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只會記誦馬·恩·列·斯的成語，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

其次說到學習國際革命經驗，說到學習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許多同志似乎是爲了馬·恩·列·斯，而去學馬·恩·列·斯，並不是爲了中國革命的實踐。所以學的雖多，消化不了，引證

馬、恩、列、斯的成語是很會的，運用馬、恩、列、斯的立場與方法，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與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則是不會的。這種對待馬列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於中級以上幹部及青年學生，害處很大。

上面我說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列主義的應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這種作風傳播出去，害了我們許多同志。

確實的，現在我們隊伍中確有許多同志被這種作風帶壞了，他們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具體情況，不願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裏發號施令，這種主觀主義的作風，不是還在許多同志中間存在着嗎？

對於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爲恥，反以爲榮。特別重要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有些人對於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剩下了希臘及外國故事（限於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抽象地搬來的。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搬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作用，忘記了自己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了共產黨。

我們學的是馬、恩、列、斯，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恩、列、斯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恩、列、斯的。這就是說，他們違背了馬、恩、列、斯所諄諄告誡人們的一條基本原則：理論與實際統一。他們既然違背了馬、恩、列、斯的這條原則，於是他們自己就造出了一條相反的原則：理論與實際分離。在學校教育中，在在職幹部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

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軍事特點，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子弟。在延安學了，到酈縣就不能應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法幣，當然學生也不能解釋，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啃『資本論』，啃『反杜林論』。這樣一來，就在許多學生中造成了一種反常心理，對中國問題反而無興趣，對黨的指示反而不重視，他們一心嚮往的，就是他們從先生那裏學來的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

當然，上面我所說的是極壞的典型，不是說普遍如此，但是確實存在這種典型，而且是相當的多，害人相當的大，不可等閑視之的。

二

爲了反覆說明這個意思，我想將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對照地講一下。

第一種：主觀主義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不作系統的周密的研究，單憑主觀熱情去工作，對於中國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對於中國昨天明天的面目漆黑一團。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恩、列、斯的理論，不問它與中國革命有什麼聯系，不是爲着要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恩、列、斯那裏找立場找方法，而是爲理論而理論，爲馬、列而馬、列。不是有的放矢，而是無的放矢。馬、恩、列、斯教導我們說：從客觀存在着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爲我們行動的基礎。爲此目的，就要詳細佔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及綜合的研究。我們許多人却相反，不去這樣做。其中許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

但他們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與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興趣，只把興趣放在現成的書本上。許多人是做實際工作的，他們也不注意客觀情況的研究，往往單憑熱情，把感想當政策。這兩種人都憑主觀，忽視客觀。或作講演，則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誇誇其談的一大篇。無實事求是之意，有譁衆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爲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這就是我們隊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風。這種作風，拿了律已，則害了自己。拿人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總之，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論是共產黨的大敵，是無產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之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真理才會抬頭，革命才會勝利，黨性才會鞏固。沒有科學態度或沒有完全的科學態度，即是說，沒有或不完全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統一的态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

有一首對子，是替這種人畫像的。那對子說：

「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柢淺；
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對於沒有科學態度的人，對於只知背誦教條的人，對於徒有虛名並無實學的人，對於向馬列主義開玩笑的人，你們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診治自己毛病的話，我勸他把這首對子記下來，或再勇敢一點，把它貼在自己房子裏的牆壁上。馬列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跳皮都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罷！

第二種：馬列主義的態度，即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不是單憑熱情去工作，而是把革命熱

情與實際精神結合起來。在這種態度下，就是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而且要懂得中國，不但是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今天，還要懂得昨天與前天。在這種態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列主義，要使它與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爲着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與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列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找這根『矢』，不是爲了別的，是專門爲了要射中國革命與東方革命這個『的』的，否則這『矢』就不過是一個徒供玩好的古董，一點什麼用處也沒有。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爲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熱情，不憑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佔有材料』，從這些事實中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排列，也不是誇誇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譁衆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就是理論與實際統一的馬列主義作風，就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如果有了這種態度，那就既不是『頭重腳輕根柢淺』，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據上述意見，我有下列提議：

(一) 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依據歷史唯物論的方法，對敵友我三方的

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工作，然後引出應有的與必要的結論。爲此目的，就要引導同志們的眼光向着這種實際事物的調查研究上去。就要使同志們懂得，共產黨員及其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後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誇誇其談的亂說一頓與一三三四的現象羅列，都是無用的。例如關於宣傳工作，如果不了解敵友我三方的宣傳狀況，我們就無法正確地決定我們的宣傳政策。任何一個部門的工作，都必須先有情況了解，然後才有好的處理。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政策，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二) 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廢除無組織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研究，然後才有可能作綜合研究。

(三) 對於在職幹部教育與學校幹部教育，應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爲中心，由此出發去研究馬列主義，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列主義的方法。研究馬列主義，又應以聯共黨史爲中心材料，其他一切爲輔助材料。聯共黨史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與總結，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上還只有這個完全的典型。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工作的了。

我們走過許多錯路，但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在如此生動豐富的中國革命環境與世界革命環境中，我們這一學習問題上的造改，相信一定會有好結果的。

目 錄

例言

改造我們的學習（代序）……………毛澤東

第一章 緒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特點……………一六

一 列寧論馬克思主義與舊唯物主義舊社會主義的分歧……………一

二 列寧論科學精神與革命精神相結合……………二

三 列寧。斯大林論「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四

四 斯大林論兩派馬克思主義者……………一四

第二章 理論與實際……………一七——二二三

一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事實是共產主義的出發點。

實踐是真理的標準……………一七

二 馬克思、列寧、斯大林論理論與實際的關係，理論對於實際的重要性……………二六

三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研究、分析具體環境、條件及歷史特點，是決定無產階級政策的基礎……………	三八
四	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論無產階級政黨的政策需要最大的靈活性……………	四八
五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論主觀主義、革命空談與革命的實際背道而馳……………	六二
六	列寧論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與怯懦的改良主義……………	七六
七	馬克思、列寧、斯大林論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與客觀主義及自發論、自流論……………	八〇
八	列寧、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論兩條戰綫的鬭爭……………	九〇
九	列寧、斯大林論政治的明確性和肯定性。反對調和派……………	一〇六
一〇	列寧、斯大林論共產黨員要成爲有頭腦的政治家……………	一一三
一一	列寧、季米特洛夫論必需終結書本與生活的脫離……………	一六
一二	恩格斯論單純的理論家不是現實理論家，而是反動的辯護者……………	一八
一三	斯大林論理論與實際一致的典型——列寧……………	一九
一四	斯大林論黨的布爾塞維克化……………	二一

第三章 歷史科學的創造……………

一	馬克思、列寧、斯大林論唯物辯證法……………	二四
---	-----------------------	----

二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法則是從自然和歷史中找尋出來。

法則以合乎自然及歷史爲依歸……………一四三

三 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論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內容……………一五六

四 列寧論歷史唯物論早已由假設變成科學上被證明了的原理

——唯一的科學歷史觀……………一七四

五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歷史唯物論的應用……………一七七

(一) 馬克思論由結論變成方法

(二)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歷史唯物論的應用不是依靠固執的教義和抽象的

格式，不是從「一般」的概念出發

(三) 馬克思論解剖高級形態是解剖低級形態的關鍵

(四)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典型的研究

(五) 馬克思、列寧論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材料，把握事實的總和

(六) 恩格斯、列寧論考察基本的歷史的聯系

(七) 恩格斯論歷史的方法與論理的方法的一致

(八)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細胞的分析。從最單純的、最大量的、最直接的

「存在」開始

(九) 馬克思論分析的方法——從單純到複雜的思維過程與歷史的真實過程相適應

(一〇) 恩格斯、列寧論分析與綜合

- (一一) 恩格斯論從不同的觀點觀察同一的對象
- (一二) 恩格斯論術語的革命
- (一三) 馬克思論從事物的表現形式到本質關係的發現
- (一四) 恩格斯論由假設到純粹法則的建立
- (一五) 恩格斯論馬克思的抄引法
- (一六) 馬克思、恩格斯論科學上沒有平坦的道路
- 六 列寧論辯證法與折衷主義……………一七九
- 七 恩格斯論歷史唯物論與庸俗唯物論……………二〇九
- 八 恩格斯對於口頭「唯物論」者的指斥……………二一五
- 九 馬克思對若干錯誤學說的批判——把外國現實之理論的表現變成若干教義的集成，拋開事物內部的聯系，抽出事物之一定的歷史內容，咀嚼早已過時的見解，主觀主義的幻想，是庸俗經濟學及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特徵……………二一七
- 一〇 列寧論共產主義思想是人類知識積累的總匯。一定的思想聯盟之必要。……………二二二
- 應該用唯物論的觀點研究黑格爾的辯證法……………二二二
- 一一 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論最偉大的科學家反對偏見……………二二八
- 打破傳統的創造家……………二二八

第四章 國際經驗·民族特點·革命傳統……………二三四——二四五

附錄

- 一 列寧論革命科學的兩個要求……………二三四
 - 二 列寧論用批判的態度採取別國經驗……………二三四
 - 三 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論考察、研究民族的特點……………二三五
 - 四 列寧論在一定條件下利用革命傳統……………二四四
- ### 附錄
- 一 論寫歷史……………二四六
 - 二 聯共中央關於因「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出版而應如何進行黨的宣傳工作的決議……………二六二
 - 三 法、英、美、德、意五國共產黨論共產國際各支部內「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底傳佈與研究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底宣傳……………二八四
 - 四 蘇聯紅色教授學院支部局關於反德波林派的決議……………三〇一
 - 五 德波林的自我批評……………三一七
 - 六 中共六中全會論學習……………三二三
 - 七 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三三六

第一章 緒論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特點

一 列寧論馬克思主義與舊唯物主義 舊社會主義的分歧

馬克思還在一八四四到一八四五年的時候就已經說明：舊的唯物主義底一個基本缺點，就在於它不會了解革命實際行動底條件和不會估計革命實際行動底意義。馬克思底一生，除了理論工作之外，同時對於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策略問題，也曾加以很大的注意。在這一點上，馬克思底一切著作，和一九一三年出版的他和恩格斯的四卷「通信集」，給了極豐富的材料。這一種材料，現在還沒有收集完全，還沒有總括起來，還沒有加以研究和整理。因此我們這裏只能作一個最廣泛的最簡單的說明，而着重地指出：舊的唯物主義因為沒有唯物主義的這一方面，所以馬克思曾經認為它是不徹底的、片面的。死板的唯物主義，這是很公道的。馬克思在決定無產階級策略底基本任務時，曾嚴格地使它適合於他的唯物辯證的世界觀。只有以客觀態度估計某社會各階級——無例外——相互關係底一切總和，也就是估計這社會發展的客觀階段，估計這個社會和其他社會間的相互關係，只有這種估計，才能成爲先進階級正確策略底基礎。同時觀察各階級和各國家的時候，不是根據靜的形式，而是根據運動的形式，就是說：不是根據靜止的狀態，而是根據運動的狀態（運動的規律是由各階級生存底經濟條

件裏面產生出來的)。而觀察運動的時候，也不僅是從過去出發，而且是從將來出發，同時不能根據「進化主義者」庸俗的了解法，只看見緩慢的變化，而應根據辯證法。(列寧：「無產階級階級鬭爭底策略」，「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四四——四五頁)

馬克思萬分肯定確切地規定了他自己那些與從前社會主義者比較起來是「新東西」的觀點。新東西就在於從前那些社會主義者認為：爲要論證自己的觀點，只須指明群眾在現代制度下受壓迫的事實，只須指明那使每個人都能領取自己所作出的東西的制度底優越性，只須指明這個理想制度適合於「人類天性」，適合於理性道德生活概念等等，就算足夠了。馬克思認為不能以這種社會主義爲滿足，他不以描寫現代制度，不以估計和斥責這個制度爲限，他同時還給了對於這個制度的科學說明，把這在各歐洲國家和各非歐洲國家內表現得不同的現代制度歸結爲一個共同基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並給了對於這社會形態底動作法和發展法則的客觀分析(他指明了在這個制度下剝削的「必然性」)。同樣，他沒有認爲可以滿足於偉大空想家及其渺小後裔——主觀社會學家——所謂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適合於人類天性的斷語。他又以這個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客觀」分析來證明了資本主義制度變成爲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性」。(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中譯本，蘇聯版，第三四頁)

二、列寧論科學精神與革命精神相結合

這個學說(指馬克思主義——編者)把一切國度的社會主義者都吸引得來，其不能抵禦的吸引力，就在於：它把嚴格的最高的科學精神(它代表着社會科學中的權威)與革命精神結合起來。把它

們結合，並非出於偶然，不只是因為這個學說底創立者他自身就是學者與革命者這兩種品性底結合，而且是因為這學說本身之內就內在地與不可分離地結合着這兩種精神。的確，學說底效用，科學底目的，直接定下在這裏是：幫助被壓迫階級進行其實在的經濟鬥爭。

「我們並不對世界說：停止鬥爭吧，——你們底鬥爭全是沒有價值的。我們只是供給它一個真正的鬥爭口號。」

所以，依照着馬克思的意見，科學底直接目的，是供給被壓迫階級一個真正的鬥爭口號，這即是說，要能够客觀地表示出這個鬥爭是一定的生產關係底體系底產物，要能够理解這個鬥爭底必然性，其意義、發展方向與發展條件。它除非對於每一個鬥爭形態作仔細底研究，除非對於從某一個鬥爭形態推移到另一個鬥爭形態之每一步驟都很注視，使得它能够明瞭任何一刻的狀態，而又沒有忘却鬥爭底總性質及其總目的，即一切剝削與一切壓迫底完全的和最後的廢除，——它除非是這樣，就沒有可能供給一個「鬥爭口號」。(列寧：「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和它底曲解」，「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八五——八七頁)

馬克思主義與一切其他社會主義的學說不同，就在於：馬克思主義對於客觀的情勢與客觀的進化途徑之分析，既具有完全的科學的正確性，而對於群眾底革命的能力，革命的創造天才，與革命的獨創性之重要，又加以最明確的承認——個人、集團、團體和政黨，它能發見並實行與階級發生某種聯系，其革命的能力，革命的創造天才，與革命的獨創性之重要，當然也加以承認——而且把這兩者配合得很好。從馬克思底整個歷史觀點，對於人類底發展中的革命時期，給以極高的估價：在所謂和平發展時期中所逐漸積累下來的無數矛盾，是要在革命時期中去解決。在革命時期中，各階級對決定社

會生活底形態起了最大力量的直接作用，並為政治的「上層建築」創造基礎。在新的生產關係的基礎之上，這個政治的上層建築可以繼續存在一個長時期。馬克思與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理論家不同，並不把這些革命時期視為脫離了「常」軌，並不把這些革命時期視為「社會病」底表徵，並不把這些革命時期視為過激和錯誤底可悲的結果，而是把這些革命時期視為人類社會史中的最關緊要的、重大的、必須的和決定的契機。（列寧：「反對抵制」，見「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二〇六——二〇七）

三 列寧、斯大林論「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編者按：關於此節，可並參看第二章第四節：「無產階級政黨的政策需要最大的靈活」，以及第四章第三節：「考察、研究民族特點」，特別是其中恩格斯的幾封信和列寧關於馬克思學說的一段名言。

我們的學說——恩格斯說，他是指他自己與他著名的朋友——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馬克思主義底這一方面，總被人忽視；這句古典的話，著重了那被忽視的一方面，著重得很有力而且明顯。我們如果把這方面忽視了，就會把馬克思主義轉變成為片面的、畸形的無生命的東西；我們把它底活靈魂剝奪掉；我們毀滅了它底基本的理論的基礎——辯證法（辯證法是一種學說，所謂歷史的發展是無所不包而且是充滿矛盾），我們把它與時代底一定的實踐的任務（歷史每有一次新的轉變，實

踐的任務也就變更)之聯系切斷了。

在我們的時代，的確時常可以碰到一些對於俄國馬克思主義底命運很注意的人，他們恰恰是把馬克思主義底這一方面忽視了。可是，人人都一定知道俄國近年來發生了極突然的變化，把情況變更得非常迅速而且非常有力——社會的和政治的情況，這些情況最直接地立即決定行動底條件，因而也決定行動底目標。我當然不是指根本總目標而言。在各階級間的關係沒有變更時，根本總目標並跟歷史底轉變而變更。很顯明地，俄國經濟的(而且不只是經濟的)進行底總趨勢，和俄國社會底各階級間的關係一樣，在最近的六年來，並沒有變更。

可是，直接的，當前的行動底目標，在這個時期中，變更得極明顯，正如社會的和政治的具體情況已發生變更一樣，——而馬克思主義既是活的學說，故在馬克思主義中，不能不把它的不同方面湧現到前面來。(列寧：『馬克思主義歷史的發展底某些特色』，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一解放社一版，第一一八——一一九頁)

馬克思與恩格斯說過多次，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針，而我想：我們首先而且最應當記着這句話。

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學說不是我們背誦的教條，必須把它當作行動的指針，這，我們從來就說過了。而我想：適應時機地行動，無論何時也不會墮落為機會主義，而是變更策略。然而，這却決不是背叛學說，也決不能稱為機會主義。(列寧：『在莫斯科黨的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說』，列寧全集，二十三卷，二三四頁)

馬克思主義中的俄國機會主義(即現時孟塞維主義)底特點，就在於它把馬克思主義加以學究式

的簡單化，庸俗化，曲解其字句，背叛其精神（工人事務派和司徒魯威主義都是這樣）。（列寧：

「給斯切涅諾夫的信」，「列寧選集」第七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二五四頁）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自己既無經驗，既認為不能臆造出一個資產階級的運動，所以在革命之前，當然不能提出一個正確的土地綱領。但是，他們也犯了一個錯誤，就是當革命已經開始以後，他們沒有把馬克思的理論適當應用到俄國新奇的條件之下來（而馬克思與恩格斯是時常教訓別人說：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導），却反而把馬克思理論在別時代條件之下的應用，機械地搬到另一時代來。（列寧：「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中的土地農民問題」，「列寧選集」第五卷，第二九九頁）

馬克思主義是非常深刻的各方面的學說。所以脫離馬克思主義的人，常可摘引馬克思書籍中的斷章片義（特別是無頭無腦地摘引它），作為自己的理由。（列寧：「致同志書」，「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中譯本，第二〇六頁）

馬克思、恩格斯說，我們的理論並非信條，而是行動的指南；考茨基、奧托·鮑威爾等等這一類的「專利」馬克思主義者的最大錯誤，最大罪惡，便在於他們不懂這個真理，不會在無產階級革命最重要的關頭上應用這個真理。馬克思主義時代以前俄國偉大的社會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就已說過：「政治的活動，並不是聶瓦街的康莊大道」。自車爾尼雪夫斯基以來，俄國革命家因輕視或忘記這個真理之故，受了無數的犧牲。（列寧：「左派幼稚病」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六七頁）

列寧的偉大處正是在於他不是書獃子，他知道吸取馬克思主義的精髓，由這精髓中，再去向前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見。（斯大林：「論反對派」，「播種社」版，第四四頁）

應該把馬克思主義的字句與本質分開，個別的論斷與方法分開。列寧能够發明一國社會主義勝利可能這個真理，正是因為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他不是字句底奴隸，而能够取得馬克思主義中主要的和基本的東西。（同上，第七七頁）

你們可以看見：季諾維也夫好像一個小學生，口頭上引用馬克思的話，玩味這些話，却忘掉了馬克思的觀點；同時他應用這幾段話的時候，所採取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而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態度。

修正派引證馬克思的話時所抱的態度，是怎樣的呢？修正派引證馬克思的話時，他就是不顧某時代的具體條件，從馬克思在單個問題上所說的話中引證一些來（旁圈是斯大林自己加的，下同——編者註）用以代替馬克思的觀點。

季諾維也夫引證馬克思的話時，所持的態度是怎樣的呢？季諾維也夫在引證馬克思的話時，就是用馬克思的某一段話，或某一個字來代替馬克思的觀點，不顧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具體的發展條件，把馬克思當時所說的話變為教條。

……把恩格斯這種適合於資本主義舊時代的意見（編者按：這裏是指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所寫的「共產主義原理」一書中，關於社會主義不能在單個國內建設勝利的命題），機械式的應用到資本主義新的時期，應用到帝國主義時期中來——這是不顧斷斷以前資本主義時期的具體條件，而根據某一個字、某一段話，去曲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我在聯共十五次代表會議上報告中，已經說過，在那時候，恩格斯這種公式，是唯一正確的公式。可是，應該了解，不能把前一世紀四十年代（當時還完全說不上衰亡的資本主義），來與現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時期，與帝國主義時代，與整個底資本主義是

走向衰亡的時期放在一起。從前認為不能夠的，現在，在資本主義新的條件中，已經成爲可能而必需了，難道這還難明白嗎？（同上——一六六——一六七頁）

在講到引證把戲時，我記起一樁很有趣味的故事。在有個時期，這個故事會在革命的工團主義者中間非常流行，這是瑞士一位革命的工團主義者，在斯托哥爾姆講出來的。還是一九〇六年我黨斯托哥爾姆大會時的故事。這位瑞士同志，把社會民主黨引證馬克思恩格斯所玩的把戲，描寫得非常有趣，我們（大會各代表）聽了他的故事後，簡直笑倒了。故事的內容如下：當克里米亞發生海陸軍暴動時，海軍與步兵的代表去見社會民主黨，向他們說：近年以來，你們號召我們起來暴動，反對沙皇制度；我們感覺得你們的號召是正確的，我們——海陸軍——現在準備暴動，請你們給以指示。社會民主黨人癡坐了半晌，才回答說，他們非召集非常會議，是不能解決暴動問題的。海軍說：不能再遲延了，事情已準備好了；如果他們得不着社會民主黨人明白的答覆，而社會民主黨人不來領導這個暴動，那麼事情就會失敗。海軍和步兵隨便辭別出來，在門外等候命令；社會民主黨人果然召集了非常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拿着一資本論第一卷，拿第二卷，結果一資本論第三卷也拿來了。大家都找馬克思關於克里米亞，斯瓦士堡的指示，都在找關於在克里米亞暴動的指示。在三本一資本論內，關於斯瓦士堡，克里米亞及海軍步兵暴動等，沒有找着一個字（笑聲）。把馬克思及恩格斯的文集也搬來了，大家都找指示，結果，還是一點指示也沒有找到（笑聲）。怎樣辦呢？海軍已經來了，正在等答覆。怎樣呢？社會民主黨員只好承認，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們不能給海軍與兵士以任何的指示。瑞士同志末了說：『海軍與步兵的暴動就這樣地失敗了。』（笑聲）

毫無疑義地，這個故事有些過於誇大，但是，同樣很明顯的，這個故事和季諾維也夫引證馬克思

恩格斯時所犯的主要毛病，正是如出一轍。(同上，第一六八——一六九頁)

不可向那距現時四十五年和五十五年以前逝世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提出要求，要他們預見到在遠
遠的將來，在每一個別國家裏所發生的一切和任何的歷史曲折。如果要求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給我們規
定出對於那些能在五十年至一百年以後，在每一個別國家裏發生的一切和任何理論問題的現成答案以
便使我們——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底後代子孫——可以安然躺在火炕上咀嚼現成答案，那就可笑了。

(全場大笑)可是，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向現代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主義者提出要求，要他們不只是
限於讀熟馬克思主義底個別一般原理，而要他們領會馬克思主義底實質，要他們學會估計到社會主義
國家已在我國存在二十年來的經驗，最後要他們學會依據於這個經驗和根據馬克思主義底實質來把馬
克思主義底個別一般原理具體化，使其更加確切更加完善。(斯大林：「在聯共黨十八次代表大會報
告」)

黨史教訓我們說：工人階級底黨，如果它沒有精通工人運動底先進理論，如果它沒有精通馬克思
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那它就不能實現其為本階級領導者的作用，就不能實現其為無產階級革命底
組織者和領導者底作用。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底力量，就在於它給黨以可能來在任何環境中確定方針，來瞭解周
圍事變底內部聯系，來預見事變底進程，來不僅知道事變在目前是如何發展和向那裏發展，而且知道
事變在將來應當如何發展和向那裏發展。

只有已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底黨，才能够有信心地向前進展和引導工人階級前進。
反之，那沒有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底黨，却不得不徘徊摸索，失去在自己行動中的

信心，沒有能力領導工人階級前進。

有人也許覺得：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這就是誠心來讀熟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中所有的個別結論和個別原理，學會按時引證這些結論和原理而以此自慰，並希望已讀熟的結論和原理將能適宜於任何環境，將能適宜於一切實際情形。然而，這樣對待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是完全不正確的。不可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看成是教條集錄，看成是教義問答，看成是信仰象徵，而把馬克思主義者本身看成是咬文嚼字者和讀死書者。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乃是關於社會發展的科學，關於工人運動的科學，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關於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科學。它既然是科學，就不是固定而且不能固定在一個地點，它是發展着和完善的。不言而喻的，它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不能不以新經驗和新知識來豐富自己，而它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則不能不因時局變遷而變更，不能不由那些適合於新的歷史條件的新結論和新原理來代替。

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這完全不是說要讀熟它的一切公式和結論，並拘守這些公式和結論底每一字句。爲要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首先就必須學會區別它的字句和實質。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這就是說要領會這個理論底實質，並學會在無產階級鬥爭各種條件下，在解決革命運動底實際問題時，來運用這個理論。

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這就是說要善於以革命運動底新經驗來豐富這個理論，要善於以新原理和新結論來豐富它，要善於發展它和推進它，要不怕根據這個理論底實質而以適合於新的歷史環境的新原理和新結論來代替其某些已經過時的原理和結論。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在第二次俄國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前，各國馬克思主義者都是由以下一點出發，就是認為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乃是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中最適宜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固然，馬克思在七十年代曾指出：不是國會制的共和國，而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組織，乃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最適宜的形式。然而，很可惜的，馬克思這個指示，並沒有在馬克思底著作裏得到繼續的發展，因而便付諸遺忘了。此外，恩格斯在其對愛爾福特綱領草案的批評中（在一八九一年）所作的有威信的聲明——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特殊的形式——也是無容置疑地說明：馬克思主義者正是繼續認為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政治形式。恩格斯底這個原理，後來就成為對於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其中也是對於列寧——的準則。然而，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特別是一九一七年二月間的革命，却提出了新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工農代表蘇維埃。根據對於俄國兩次革命底經驗的研究，列寧從馬克思底理論出發而得出結論說：無產階級專政最好的政治形式，並不是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而是蘇維埃共和國。根據這一點，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是說在由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中，就提出組織蘇維埃共和國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最好政治形式的口號。各國機會主義者就起來拚命拘守國會制的共和國，而責備列寧為脫離馬克思主義，為破壞民主。然而，精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是列寧，而不是機會主義者，因為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推向前進，用新的經驗把它豐富起來，而機會主義者則把它拉向後退，把它的各原理中的一個原理變成教條。

如果列寧會屈服於馬克思主義底字句而不敢用適合於新的歷史環境的關於蘇維埃共和國的新原理，來代替馬克思主義各舊有原理中的一個由恩格斯所規定的原理，那麼，黨，我們底革命，馬克思

主義，就會陷於什麼情況呢？那麼，黨就會陷於黑夜徘徊的地位，蘇維埃就會陷於瓦解，我們就不會有蘇維埃政權，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會遭到嚴重的損傷。無產階級就會遭受失敗，而無產階級的敵人就會獲得勝利。

恩格斯和馬克思研究帝國主義前期的資本主義時，曾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在單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所有的一切或大多數文明國家裏同時舉行進擊的條件下才能獲得勝利。這是在十九世紀中葉說的。這個結論，以後就成爲對於一切馬克思主義者的準則。但是，到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前期的資本主義已轉變爲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向上的資本主義已變成垂死的資本主義。根據對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之研究，列寧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而得出結論說：恩格斯和馬克思底舊公式已經不適合於新的歷史環境；社會主義革命完全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各國機會主義者就起來拚命拘守恩格斯和馬克思底舊公式，責備列寧爲脫離馬克思主義。然而，精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是列寧，而不是機會主義者，因爲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推向前進，用新經驗把它豐富起來，而機會主義者則把它拉向後退，把它變成殭屍。

如果列寧會屈服於馬克思主義底字句，如果它沒有充分的理論上的勇氣去拋棄馬克思主義各舊有結論中的一個結論，而代之以適合於新的歷史環境的，關於社會主義有在單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可能的新結論，那麼，黨，我們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就會陷於什麼情況呢？那麼，黨就會陷於黑夜徘徊的地位，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失去領導，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會開始衰頹起來。無產階級就會遭受失敗，而無產階級底敵人就會獲得勝利。

機會主義並不時時都是直接否認馬克思主義理論或這個理論底個別原理和結論的。機會主義有時

還表現於企圖拘守馬克思主義底個別已經過時的原理，並把它們變成教條，以便這樣來阻止馬克思主義底向前發展，因此也就是來阻止無產階級底革命運動之發展。

可以毫不誇大地來說：在恩格斯死後，最偉大的理論家——列寧，而在列寧死後，斯大林以及其他列寧門生——乃是唯一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有他們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並在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的新條件下用新經驗來豐富了它。

正因為列寧和列寧主義者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以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底向前的發展，是在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的新條件下的馬克思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已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獲得勝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如果布爾塞維克黨底先進幹部，沒有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如果他們沒有學會把這個理論看作是行動指南，如果他們沒有學會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並以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的新經驗來豐富它，那麼，布爾塞維克黨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就會不能獲得勝利了。

恩格斯在批評那些住在美洲並以領導美洲工人運動為己任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者時，曾寫道：

「德國人沒有善於把自己的理論變成能把美洲群眾發動起來的槓桿。他們在大多情形下是連自己都不懂得這個理論，却把它看作是教義和教條，他們認為必須把這個理論背得爛熟——而這樣就足以應付一切實際情形了。在他們看來，這是教條，而不是行動指南。」（『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六〇六頁）

列寧在批評加米涅夫以及某些老布爾塞維克時——這些人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會拘守着無產階級與農民革命民主專政的舊公式，而當時，革命運動却已向前進展而要求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列寧

在批評這些人時寫道：

「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馬克思和恩格斯總是這樣說，他們會很公平地譏笑那些背誦和簡單重複「公式」的行為，因為這種「公式」最多只能提出一般的任務，而這些任務是必須依歷史進程中每個特殊時期底具體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環境而改變其形態的……。必須領會那不容置辯的真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應當估計到活的生活，估計到實際中的確定的事實，而不是繼續拘守着昨天的理論……。」（『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〇〇——一〇二頁）。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第四二——四二五頁）

四 斯大林論兩派馬克思主義者

現有兩派馬克思主義者。兩派都是在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下面做工作，都是把自己當作「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派。可是，這兩派人究竟還是大不相同的。而且，在兩派中間，還橫着一條鴻溝，因為，兩派人底工作方法，是完全相反的。

第一派人，照例只是在表面上承認馬克思主義，照例只是在口頭上得意地宣揚馬克思主義，他們不會或者不願意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不會或者不願意實行馬克思主義，他們總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活潑的革命的原理變成毫無意思的死板的公式。他們不拿經驗，不拿實際工作的計算來做工作的根據，却拿那些從馬克思主義著作中摘錄下來的語句來做工作的根據。他們不在分析實際生活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針，却在相同的事情和歷史上相像的事情裏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針。言行不符——這就是這一派人的基本弊病。因此，他們總是灰心失望，始終都是不滿意於那個常常欺騙他們的「厄運」。這一

派人的名字，便是孟塞維主義（在俄國），就是機會主義（在歐洲）。梯什科（約西里斯）同志在倫敦代表大會上給了這派人一個很中肯的估計，他說：這一派人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上。

第二派人却正是相反，第二派人把問題的重心，由表面上承認馬克思主義而移到實行馬克思主義，移到將馬克思主義化爲實際。規定適合於環境的方法和手段來實現馬克思主義，因環境發生變更而變更這些方法和手段，這就是這一派人所最注意的事情，這一派人不是在歷史上相同的事情和相像的事情裏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針，而是由研究周圍的情形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針。在工作時，他們不是拿引證和成語來做根據，而是拿實際經驗來做根據，拿經驗來審查自己的每一步的工作，在自己的錯誤中來學習和教訓別人去建設新生活。所以，在這一派人的工作中，言行總是一致的，馬克思的學說，完全保證着自己的活潑的，革命的力量。馬克思說過，我們不應當僅限於說明世界，而且應當更進一步去改造世界。馬克思主義者是應該遵守這幾句話的。馬克思的這幾句話，完全和這一派人相符合。這一派人的名字，就是布爾塞維主義，共產主義。

這一派人的組織者和領袖，便是列寧。（斯大林：「列寧是俄國共產黨（布）底組織者和領袖」，「論馬恩列斯」，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五五——一五六頁）

第二章 理論與實際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來說明世界，但問題是在改變世界。

——馬克思

一 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事實是

共產主義的出發點。實踐是真理的標準

(17)

共產主義並不是空論 (Doctrine)，而是一個運動：它不是從原則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共產主義者並不是以某種哲學作為他們的公衡 (Postulate)，而是以整個過去的歷史，尤其是在各文明國度中的整個過去歷史底今天的實際的結果，作為他們的公衡。共產主義從大規模工業及其結果，從世界市場之建立及其所包含的無限制的競爭，從日益猛烈的和日益普遍的貿易恐慌——這貿易恐慌已變成整個世界市場的恐慌——從無產階級之興起與資本之集中，從勞資間階級鬥爭，生長出來的。共產主義，在它是理論的場合，它是無產階級在階級鬥爭中的地位之理論的表現，是無產階級解放之條件之理論的概括。(恩格斯：『共產主義者與海村』)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物象的真實性，這個問題，並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

在實踐中證明他的思惟的真實性即現實性、威力，各方面性。關於離開實踐的思惟是真實還是不真實的論爭，乃是純粹經濟學派的問題。

……教育者本人也須受教育。（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費爾巴哈論』，『生活』版，第八四頁）

一般講來，一個政黨底正式綱領，要比它的實際做的，不很重要些。（恩格斯：『恩格斯給倍倍爾的信』，『哥達綱領批判』，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五六頁）

真正的運動底每個步驟，是比打綱領更重要的。（同上，第六七頁）

正如在私人底生活中，我們把一個人關於他自己想些什麼，和說些什麼，與他實際是個怎樣的人和做什麼事，區別開來。同樣的，我們在歷史的鬭爭中，更加要把各個黨派的空話和幻想，與其真實的組織及其真實的利益，區別開來，把它們關於自己的表象與它們底真實的本性，區別開來。（馬克思：『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五六頁）

因為有識之士判斷個人，當然不是看他底聲明，而是看他底行動，不是看他假裝作怎樣一個人。（恩格斯：『普魯士的勝利』，『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二一頁）

我們曾察見，在一八四五年馬克思，在一八八八年和一八九一年恩格斯，採用實踐的標準做唯物論的認識的基礎。馬克思在『費爾巴哈』這個著作的第二論綱上說道，『客觀的真理是否與人類的思惟一致』這個問題，如果離開實踐的範圍提出它來，那麼，這便是煩瑣哲學。恩格斯也重言道，康德和休謨的不可知論及其他哲學的幻想之最剝切的駁難就是實踐。他對不可知論者答道，『我們的行為之成功，證明我們的知覺與所知覺的物事之客觀的性質一致。』（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中譯本，『神州國光社』版，第一四五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人類的實踐，證明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的正確；他們主張，關於解決根本的認識論的問題忽視實踐的一切企圖，是『煩瑣哲學的』和哲學的狂想。（同上，第一四七頁）

從生活的觀點說，實踐應是認識論的第一和基礎的標準。實踐必然地到達唯物論，掃除教授的煩瑣哲學之無限的妄想。固然，我們不應忘記，實踐的標準，在事物的性質上，也不完全確證，也不完全否認，任何人類的表象。這個標準，關於防止人類的知識變成『絕對的』，是充分不定的；同時，關於與各種各樣的唯心論和不可知論實行劇烈的鬭爭，是充分確定的。如果我們的實踐所確證的，是唯一的最後的和客觀的真理；那麼，以此，到達這個真理的唯一途徑，就是固持唯物論的見解的科學之途徑。（同上，第一五二頁）

依恩格斯，生動的人類的實踐，滲透到認識論內部來，而給與真理的客觀的規準。當我們沒有認識在我們的意識外存在着並作用着的自然法則時，我們是『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隸。我們很難在自然法則還未為我們的意志和意識所把握時，我們便支配自然。對自然的支配，在人類實踐上表現出來的，是人類的頭腦中自然現象之客觀的正確『反映』的一種結果。並證明着在實踐範圍內，這個『反映』表現出客觀的、絕對的、永久的真理。（同上，第二一三——二一四頁）

理論的認識，必須在必然性上，在全面的關係上，在充滿矛盾的運動上，來指示出客觀的自己本身。但人類的概念，是只有當着這概念成爲實踐意味上的『對自的存在』時，才能够最後地將這認識的客觀真理把握着，捕捉着，領有着。就是說，人類和人類一般的實踐，是認識的客觀性的檢證和規準。（列寧：『關於黑格爾論理學的筆記』）

實踐是比（理論的）認識更高度的，因為實踐不但有普遍性的真價值，而且有直接的現實性的真價值。（同上）

認識是面向着真正存在的東西，這東西是對主觀的意見獨立地現存着的現實性。人類的意志以及他的實踐之所以不能達到目的，是因為它把認識和自己分開，把外的現實性不當做真正存在的東西來看待。認識和實踐的合一，是必要的。（同上）

社會民主黨人不會忘記，不僅要從書本上去領受教育，並且從書本上所得的教育還不如從革命進程中所得的教育那樣多——革命展開了群眾底眼界，給群眾一種政治訓練。（列寧：『社會民主黨與臨時革命政府』，『列寧選集』，第五卷，『解放社』版，第五〇頁）

先生們！關於我們同你們，或這種政府和那種政府實現了資產階級革命的何種任務；這種事情，且讓將來的歷史家在將來的『俄國舊事報』上去判斷吧，這種事情，再過三十年都還可以來得及作的。而現在呢，我們對於為共和國體而鬭爭，對於無產階級努力參加這個鬭爭的問題，要馬上提出口號，且給以實際的指示。（列寧：『兩個策略』，『列寧選集』，『解放社』版，第五卷第八六頁）

新火星派發揮自己的思想時所採取的方法，很與馬克思所批評的（見馬氏著名的『論費爾巴哈的提綱』）那種仇視辯證法的舊唯物論相同。馬克思說：哲學家只是這樣或那樣來說明世界，而問題却是在怎樣去改變這個世界。新火星派也是一樣，他們儘可能敘述和解釋正在他們眼前所經過的鬭爭過程，但不能够在這個鬭爭中提出一個正確的口號。他們跟着跑得很辛苦，但是很不會指導；對於已覺悟到革命底物質條件，且已站在先進階級前頭的政黨，在歷史上能够而且應當擔負的指導作用，他們置之不理，這樣，他們就輕視了對歷史的唯物論的認識。（同上，第八七頁）

關於黨的實際政綱一聲不響，不識時務地在決議案中開始就講起歷史來——是否證明這是一種書獃子底清談與革命黨人的懦弱呢？（同上，第一一五頁）

一切明理的人都知道，如果爲着某個對象而發生熱烈的鬭爭，那末要找出真理，就必須不限於爭論者雙方底申明，而是自己要去審查事實和憑據，自己要去研究，有無證明人底供辭，這些供辭是否確實。

不消說，這不是時常容易做到的事。把湊巧碰到的，偶然聽到的，人們「公開」叫喊的東西信以爲真，這自然要「容易」得多。但是，以此爲滿足的人，就叫做「輕率的」，輕佻的人，誰也不會認真去顧及他。誰要是不花費相當的獨立的功夫，他就存任何嚴重問題中都找不出真理來；誰要是怕費力，他就使自己失掉找到真理的可能性。

因此，我們所要告訴的工人，只是那些不怕費力的工人，有決心去獨立研究和努力找到事實。憑據，證人口供的工人。（列寧：『幾個爭論問題』，『列寧選集』，第七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四二頁。）

凡自己沒有得到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內部實況的正確消息的人，難以辨別是非。但是，如果他根據文件去找真理，審查這些文件底內容而不相信口頭上的話，那末他也可以辨別是非。（列寧：『一論「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現狀』，『列寧選集』，第七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九二頁）

我不能不承認，只拿一種人的壞心和另一種人底好心，去解釋政治現象，這種問題底提法，總使我回想到那些外觀上盡善盡美的相貌，一見這種相貌，使人無意中就生出一種念頭來：『這莫非是騙子吧』。（列寧：『論調和派或好心人底新政派』，同上，第一一二頁）

審查工作，掘出本質，認真地訓練，教育，尋根到底，研究人們，發現熟練的工作人員。現在，本質就在這裏；沒有這一點，一切命令和決議都是髒污的紙頭。（「列寧全集」，二十七卷，一六一頁）

至於講到第二國際政黨的政治口號和政治決議，那麼只要想起「以戰爭對付戰爭」這口號的歷史，就足以了解這些政黨的政治實際是何等虛偽和腐敗了，它們以漂亮的革命口號和決議來掩蔽它們的反革命的工作。大家都還記得，第二國際在巴塞爾大會上作過盛大的示威，曾威嚇帝國主義者說，要是帝國主義者們敢於開始戰爭，那就免不了要遇到暴動的一切慘狀，並且提出了「以戰爭對付戰爭」的嚇人的口號。可是誰不記得，不久以後，在戰爭正要開始的時候，巴塞爾的決議却已拋在腦後，而向工人們提出了新的口號——爲資本主義祖國的光榮而互相殘殺。革命的口號和決議，假如不加以實行，那就一個錢也不值，這難道還不明顯嗎？（斯大林：「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斯大林選集」，第一卷，中譯本，「解放社」版，一六頁）

領導，這還不是說書寫決議和發出指示。領導，這就是說審查指示的執行。而且不僅審查指示底執行，還審查指示本身，它們的正確性，它們的錯誤性。如果設想我們的指示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確，那是很可笑的，這是從來沒有過的，而且也不能有的。同志們，執行程度底審查正是在於：使我們的工作人員，在實際經驗底火焰中，不僅審查我們指示底執行，而且審查指示本身底正確性。因此，在這一方面，就是全部我們領導上的缺點。（斯大林：「關於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全體會議的工作」）

斯魯茨基認爲現有的黨文件是不足夠的。爲什麼？有什麼理由？難道盡人皆知的關於第二國際以

及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裏面黨內鬭爭的文件，還不足以十分明確表明列寧和布爾塞維克在其反對機會主義者和反對中派主義者鬭爭中的革命的不調和的精神麼？斯魯茨基到底是否看過這些文件呢？他還需要什麼文件呢？

假定除了已經知道的文件以外，又將找到一大堆其他的文件，例如布爾塞維克再三說到必須消滅中派主義的決議案。這是不是說，只要有了紙上文件，就表明布爾塞維克對中派主義採取了真正的革命精神和真正的不調和態度呢？除了無可救藥的官僚以外，還有誰能只憑紙上文件呢？除了書獃子以外，還有誰不懂得爲要審查黨和黨的首領，首先就要根據他們的行動而不是根據他們的宣言呢？歷史上有過不少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樂意贊同任何的革命決議，以便搪塞厭煩的批評。但這還不是說他們實行了這些決議。再則，歷史上還有過不少的社會主義者，他們聲嘶力竭地要求其他各國工人政黨採取最革命的行動，但這還不是說他們在自己本黨內或自己本國內並沒有屈服於自己的機會主義者和自己的資產階級。列寧教訓我們說，審查革命政黨、政派、首領時，不要根據他們的宣言和決議，而要根據他們的行動來審查，豈不就是因爲這個緣故麼？

要是斯魯茨基真想審查列寧和布爾塞維克對中派主義的不調和態度，那麼在他做文章時，他就不能以個別文件和兩三封私信做基礎，而是要根據布爾塞維克之事業，根據布爾塞維克之歷史，根據布爾塞維克之行動，來審查布爾塞維克，——這一點難道還不明白麼？難道在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裏未曾有過機會主義者，中派主義者麼？難道布爾塞維克未曾進行堅決而不調和的鬭爭以反對這一切派別麼？難道這些派別沒有在思想上和組織上與西歐機會主義者及中派主義者發生聯系麼？難道布爾塞維克之打擊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沒有打擊到世界上任何左派集團所不能達到的程度麼？既然這

樣，那麼怎麼可以說列寧和布爾塞維克曾經輕視中派主義之危險呢？爲什麼斯魯茨基竟忽視了這些在估計布爾塞維克時具有決斷意義的事實呢？爲什麼他沒有應用最可靠的審查方法，即根據列寧和布爾塞維克之工作，根據列寧和布爾塞維克之行動，來審查列寧和布爾塞維克呢？爲什麼他寧願應用比較不可靠的審查方法，即在偶然拾得的紙堆中翻來翻去呢？

這是因爲如果應用比較可靠的審查方法，即如果根據布爾塞維克之行動來審查布爾塞維克，那馬上就會把斯魯茨基底整個立場完全推翻。

這是因爲如果根據布爾塞維克之行動來審查布爾塞維克，那就會證明布爾塞維克乃是世界上唯一的革命組織，這個組織徹底撲滅了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並把他們逐出黨外。

這是因爲如果去考察布爾塞維克之實際行動和實際歷史，那就會證明斯魯茨基底老師——托洛茨基份子會這樣一個主要和基本的集團，這個集團在俄國培植了中派主義，並爲此而建立了八月聯盟這個特別組織，作爲中派主義之老巢穴。

這是因爲如果根據布爾塞維克之行動來審查布爾塞維克，那就會徹底揭露斯魯茨基乃是曲解吾黨歷史的人，他企圖用誣蔑列寧和布爾塞維克輕視中派主義危險的方法，來掩飾戰前托洛茨基主義之中派主義。（斯大林：『關於布爾塞維克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什麼是列寧主義』，『解放社』版，第五二——五三頁）

以前有人根據『科學』，來反對建設五萬公畝和十萬公畝的大的五穀工廠，以爲這是不可能而且不適宜的。現在，這些『科學』底反駁，已經完全破產和煙消雲散了。實際，已經把『科學』底反駁推翻了。已經再一次地證明：不僅實際是要求『科學』來指教指教，就是『科學』也是不妨向實際去

學習學習的。(斯大林：『大轉變的一年』，『斯大林選集』第四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八四頁)

有些人在那裏談論科學。他們說，科學的原理、技術指南和規則底規定，不容許有斯大哈諾夫式的工作者關於實行新的更高的生產定額的要求。可是，試問他們所說的科學，究竟是什麼科學呢？科學底原理，向來都是由實際經驗來考驗的。如果科學和實際經驗斷絕了關係，那還算是什麼科學呢？如果科學就是像我們的某些保守主義的同志所形容的那樣的東西，那麼，它對於人類就會沒有絲毫益處，早已壽終正寢了。科學之所以叫科學，正是因為它不承認偶像，不怕推翻陳腐思想，却很仔細地注意實際的經驗。如果不是這樣，那麼，我們就會根本沒有什麼科學。舉例來說，我們就不會有現代的天文學，而直到如今，都會信奉着陳舊不堪的托勒密的地球居中說；我們就不會有現代的生物學，而直到如今，都會迷信着上帝造物的神話；我們就不會有現代的化學，而直到如今，都會相信着鍊金術的奇談。(斯大林：『斯大哈諾夫運動的歷史意義及其今後任務』，『斯大林選集』，第五卷，二〇六——二〇七頁)

比方，就拿鐵路交通人民委員部做例。不久以前，在這個人民委員部的中央機關裏，還有過這樣一些教授、工程師以及其他的專家——其中並且還有共產黨員——，他們奉勸所有的人，要大家相信，鐵道駛行的營業速率每一點鐘絕對不能超過十三至十四個公里，如果超過這一個界限，就會違背所謂『營業學』。這一部份人，在當時還很有威信，他們在口頭上，在書面上，鼓吹了自己的觀點，而且給鐵路交通人民委員部底所屬機關頒發了自己的訓令；總而言之，他們曾經是鐵路營業人員中間的『思想上的權威』。我們雖然不是鐵路交通事業的專家，可是我們根據鐵路工作方面許多實際工作

人員底建議，也奉勸了這些有威信的教授，要他們相信十三個至十四個公里的速率並不是極限的速率，只要組織的工作有了相當的改善，就可以提高這一個速率。這些人沒有採納我們的意見，他們不僅沒有注意到實際的經驗以改變自己的工作態度，反而起來與鐵路事業方面的進步份子作鬭爭，並越發加緊宣傳他們自己的保守主義的觀點。當然，我們當時不得不給這些尊敬的人物一個輕輕的打擊，並客客氣氣地請他們離開鐵道交通人民委員部的中央機關。（鼓掌）結果怎樣呢？結果是這樣，就是我們的鐵路每小時所駛行的營業速率已經達到了十八個至十九個公里。（鼓掌）（斯大林：「斯大林哈諾夫運動的歷史意義及其今後任務」，『斯大林選集』，第五卷，第二一〇——二一一頁）

二 馬克思、列寧、斯大林論理論與實際的

關係、理論對於實際的重要性、

批判底武器，無論如何，不能代替武器底批判。物質的力必須由物質的力來打倒。然而，理論一旦把握着大眾，就要變成物質的力。理論只要它大眾化地表現，就能夠把握大眾。而理論只要一澈底化，就能夠大眾化地表現。澈底，就是要抓住事物底根蒂。然而對於人，根蒂就是人自身。（馬克思：『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

哲學在無產階級之中，找到它的物質的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在哲學之中，找到他底精神的武器。而且思想之閃光，一旦根本地貫徹到這個質樸的國民之基地時，德意志人之解放為人，就會被成就。（同上）

德意志人底解放，是人底解決。這個解放底頭腦是哲學，其心臟是無產階級。哲學若不揚棄無產

階級，就不能被實現。無產階級，若不實現哲學，就不能揚棄自己。

蜘蛛的作業，類似織工的作業，蜜蜂建築蜂巢，使得許多人類的建築師感到慚愧。但是最拙劣的建築師最初即優於最巧妙的蜜蜂的地方，就在於人類的建築師在用蜂蠟建築蜂巢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築成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郭、王譯本，第一二七——一二八頁）（編者：馬克思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理論為實際的嚮導）

理論與實驗。牛頓在理論上確定了地球是扁圓的。又過了很多年之後，卡辛尼及其他幾個法國人，才根據他們的實驗的測量而確定地球是橢圓體的，並且以極軸為最長。（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中譯本，三、六頁）

社會主義的知識界，只有當他們已經拋棄幻想，已經在俄國現實的發展過程，而不是在心願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在現實的社會經濟關係中，而不是在可能的社會經濟關係中，尋找靠山的時候，才可指望來進行有效的工作。同時，這知識界的理論工作，應當指向於具體研究俄國經濟對抗底一切形式，研究這些形式底聯系及其一貫發展情形；這理論工作，應當凡是這個對抗被那政治歷史、被法制特點、被舊有理論成見所掩蓋的一切地方都加以揭露。這理論工作，應當把我國實況，當作一定生產關係體系，來整個描寫出來，指明勞動者在這個體系下受遭剝削和剝奪的必然性，指明那由經濟發展過程所指點的逃出這個制度的道路。

這個以詳細周密研究俄國歷史和實況為基礎的理論，應當給無產階級底需求以回答，——而這個理論將能滿足科學要求，那麼無產階級反抗思想底任何喚醒，都必然會把這個思想引入社會民主主義底軌道。擬製這個理論的工作，愈是往前推進，則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也會愈加迅速增長。因為就

連最狡猾的現代制度保護者，也都不能阻止無產階級思想底喚醒。其所以不能，是因為這個制度本身，將必然而不可避免地使對於生產者的剝奪日益更加厲害，使無產階級及其後備軍日益更加增長，——而這是伴着社會財富增進，生產力宏偉增長，勞動被資本主義所社會化的過程進行的。無論還要做成多少工作才可製成這樣一個理論，但是定能擔保社會主義者完成這個工作的，是唯一科學方法的唯物主義——它要求任何綱領都是現實過程底確切表述——在社會主義者中間的散佈；定能擔保社會主義者完成這個工作的，是接受這些思想的社會民主派底成功，這個成功已把我國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驚動到如此地步，以至於使他們那些厚本雜誌——如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所指出那樣——已不復是枯燥無味了。

我所以這樣着重指出社會民主派理論工作的必要、重要和浩大，完全不想說要把這個工作放在實際工作前面的第一位上去（恰巧相反。實際的宣傳鼓動工作，是時刻都一定要放在第一位的，因為：第一，理論工作僅僅回答實際宣傳鼓動工作所提出的問題。而第二，社會民主派被那些不依他們為轉移的情況所迫，不能時常只限於理論工作，所以他們一定要很重視每一個可以進行實際工作的機會）。——更不是想說要把第二種工作推延到在第一種工作已經完結以後去作。能如此作結論的，只有「社會學主觀方法」底崇拜者或空想社會主義底信徒。當然，如果認為社會主義者底任務是尋找該國「另一種——除實在道路而外——發展道路」，那麼，實際工作就自然只有在英明哲學家已發現和指明這「另一種道路」時才有可能進行。反轉來說，這些道路一經發現和指明——則理論工作就告終結，而那些應當引導「祖國」走着這條「新發現的」——另一種道路——的人們底工作就從此開始。而當社會主義者底任務是歸結於要成為無產階級底思想領導者，領導無產階級進行實在鬭爭，以反對那些橫在該社

會經濟發展過程底實在道路上的實在真正敵人的時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這個條件下，理論工作和實際工作就溶合爲一個工作，這個工作會由德國社會民主黨底老戰士李卜克內西很中肯地估計爲如下三字：研究，宣傳，組織。

除非有上述理論工作，就不能成爲思想領導者。同樣，除非按事業需求來進行這個工作，除非在工人中間宣傳這個理論底結果並幫助他們組織起來，也一樣不能成爲思想領導者。

這樣提出問題，就可保障社會民主派免除那些社會主義者集團所如此時常患着的缺點，——免除教條主義和教派主義。

既然以學說適合於實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作爲學說的最高的和唯一的尺度，那就不會有教條主義；既然任務是歸結於促進無產階級底組織，因而也就是說——既然「知識界」底作用是歸結於使特別的知識份子的領導者成爲不必要，那就不會有教派主義。（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中譯本，蘇聯版，第一六五——一六七頁）

……誰要是稍稍知道我們運動底實際情況，誰就不能不看到：在我們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範圍是擴大了，但理論水平却跟着降落。許多理論知識很淺薄的人，或者甚至完全沒有理論知識的人，爲着運動之實際意義和實際成績，都加入了運動。由此可見「工人事務報」之得意洋洋地引用馬克思底一句格言：「一步實際運動重要於一打綱領」，是引用得如何沒有道理呵。在理論上紊亂不堪的時代而要來重複這些話，這就等於遇見人家出殯時，高喊「恭喜恭喜」一樣。而且這句話是從「馬克思論哥達綱領」的一封信上摘下來的。但在這封信上，馬克思却嚴厲責備在確定原則時所犯的折衷主義。馬克思當時向那些黨底首領說：假如必定要聯合起來的話，那麼爲着運動的實際目的計，你們可

以締結條約，但決不要拿原則來做交易，決不要作理論上的「讓步」。馬克思底意思便是這樣，而我們中間，竟有人企圖假馬克思底名義來降低理論底意義！

沒有革命理論，就不會有革命運動。當人們風行一時地鼓吹機會主義和醉心於最狹隘的實際活動的時候，是必須努力堅持這種思想的。而對於俄國的社會民主黨，理論底意義，由於下面三種情形（人們常常忘掉這三種情形）而更加重大：

第一，我們黨還剛在形成，剛在確定自己的面目，還還沒有同其他的，有使運動離開正確道路的危險的各種革命思想派別完全脫離關係。反之，正是在最近以來，非社會民主主義的革命思潮，却活躍起來了（如阿克雪洛德早已向經濟主義者說過這一點）。在這些條件之下，看來似乎「不關重要的錯誤，實可以引起最可痛心的結果。因此只有淺見的人，才以為黨內政派間的爭論和嚴格區別各種色彩，是一種不合時宜的或者是多餘的事情。這種「色彩」或那種「色彩」之鞏固，這在很多年內可以決定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前途。

第二，社會民主黨的運動，按其實質講來，是國際的運動。這不僅就是說，我們應當與民族沙文主義作鬭爭；而且也就是說，在新起國家內開始着的運動，只有實現別國的經驗，才能順利進行。但要真能實現別國的經驗，則單單認識這種經驗或單單把最近的決議抄寫一遍，是不夠的。要實現別國的經驗，就必須善於用批評態度考察這種經驗，而且要獨立的考驗它。誰只要想一想，現代工人運動是何等偉大的增長了，是何等廣泛的散佈了，誰就會懂得，為要履行這個任務，就需要多少富有理論修養的人材和政治的（及革命的）經驗呵。

第三，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民族任務，是為世界上各社會黨所沒有過的。這個把全體人民從專制壓

迫之下解放出來的任務，就使我們負有各種政治上和組織上的責任，關於這點我們以後再說。現在我們只想指出一點，就是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盡先進戰士的使命。為要稍微具體知道這句話底意思，只要請讀者回憶起俄國社會民主黨的老前輩，如蓋爾村、伯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七十年代的許多光榮革命家；只要請讀者考慮一下俄國著作現時所具有的全世界的意義，只要請……好吧，以上所說的也就够了！（列寧：『做什麼』——『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七九——三八一頁。見『什麼是列寧主義』，『解放社』版，第七七——七九頁）

……恩格斯認為社會民主黨不止有兩種偉大鬭爭（政治鬭爭和經濟鬭爭），像俄國許多人所想的那樣，而是有三種，認為除這兩種鬭爭之外，還有理論鬭爭。從現時各種問題和爭論的觀點上看來，恩格斯對於實際工作上和政治上已經強固的德國工人運動的指示，是很可以借鏡的；因此我們要從『德國農民戰爭』一書（它早已成為非常珍奇的一本書了）序言上摘引一大段話，希望讀者不要責備我們摘引得太長：『德國的工人，與歐洲其他各國工人比較起來，具有兩大優點。第一，他們屬於歐洲最有理論修養的民族，他們保存了德國所謂「受過教育的」階級所差不多完全失掉了的理論見解。如果預先沒有德國哲學，尤其是黑格爾底哲學，那德國的科學社會主義——自古迄今唯一的科學社會主義，就決不會創立起來。如果工人沒有理論見解，那麼這種科學社會主義就永遠不會像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那樣能夠深入工人的意識。一方面、英國工人運動，雖然個別職業有很好的組織，但進展却很緩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對於一切理論的漠視。另一方面，法國人和比利時人因原始形式的蒲魯東主義之傳播而發生模糊與動搖；西班牙人與意大利人，因巴古寧所曲解了的普魯東主義之傳播而發生模糊與動搖。這些都可以證明，德國工人底這一種優點是無限偉大了。』

第二個優點就是，德國人之參加工人運動，差不多比各國都要遲些。德國理論的社會主義永遠不會忘記，它是以三大思想家——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為依據的；這三大思想家，雖然其學說是含有許多玄想和空想，但他們終究歸在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之列，他們以英明的眼光預先見到了無數的真理，而我們現在正用科學的方面來證明這些真理是正確的。同樣的，德國實際的工人運動也永遠不應忘記，它是依靠英國和法國的運動而發展起來的。它曾經可以現成利用英法運動以很高的代價得來的經驗；而現在可以避免當時這種運動多半所不能避免的錯誤。如果沒有英國工聯運動和法國工人政治鬥爭底榜樣，尤其是如果沒有巴黎公社所給的那種偉大的推動，那我們現在會處在什麼地步呢？

我們應該替德國工人說一句公平話：如德國工人這樣善於利用自己的優越地位，真是罕見的。自有工人運動以來，這三方面的鬥爭——理論的、政治的和實際經濟的（反抗資本家）——都能有計劃的進行，而且能互相一致，彼此有聯系，這要算是第一次了。這可以說是一種集中的襲擊，而德國工人運動之所以強而有力和必勝不敗，其原因即在於此。

一方面因為德國工人有這樣的優越地位，另一方面因為英國工人運動帶有島國的特徵，而法國工人運動又受到暴力的鎮壓，所以德國工人現在是處在無產階級鬥爭的領導地位。究竟事變容許他們多麼長久佔居這種榮譽地位，這是不能預言的。可是當他們佔居這個地位的時候，他們定會得當的履行（應當這樣希望）他們所擔負的責任。要做到這點，就必須在鬥爭和鼓動的各方面，加倍努力。特別是領袖們應當使自己日益認識各種理論問題，日益擺脫屬於舊世界觀的傳統詞句底影響，而始終要注意到：自社會主義成為科學以來，它要求也用對待科學的態度來對待它，就是說，要研究它。必須把

這樣得來的而日益明確的意識，日益努力傳佈到工人群眾中間去，必須日益緊密的把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團結起來。……

……假使德國工人將來也是這樣前進，那麼，他們——雖然不一定當運動的領導者（一定要某國工人當運動的領導者，這並不是利於運動的）——將在戰士的行伍間佔居光榮的地位，而且如果意外的患難或偉大的事變要求他們有更大的勇氣，更大的決心和毅力時，他們定能整裝以待，起而應付的。

恩格斯底話果然預料中了。過了幾年之後，德國工人果然遇到了意外的患難，即遇到取締社會黨人的非常法律。德國工人當時果然是整裝以待而應付了患難，並順利地逃出了患難。

俄國無產階級將要遭遇不知厲害多少倍的患難，將要與一個大怪物作鬪爭！立憲國家內的非常法，與這個大怪物比較起來，不過是一個區區小醜而已。歷史現在向我們提出了一個迫近的任務，這個任務與其他任何那一國無產階級一切迫近任務比較起來都是最革命的任務。實現這個任務，就是說，打破不僅是歐洲的，而且也是（我們現在可以這樣說）亞洲的最強大的反動支柱，這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爲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我們敢相信，如果我們也像我們的前輩，七十年代的革命家那樣，以奮不顧身的決心與毅力，來鼓勵我們現在比過去廣泛深入千百倍的運動，那麼，我們也定能得到他們所早已得到的這種榮譽稱號的。（列寧：『做什麼』，『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七九——三八一頁，見『什麼是列寧主義』，『解放社』版，第七九——八二頁）

這種理論（指革命理論——編者）只有與真正群眾的和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際，密切聯繫起來，才能完全形成。

布爾塞維主義之所以能够養成最嚴格的、集中的與鐵的紀律，並且能够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異常困難的條件之下順利實現這種紀律，其原因只是在於俄國歷史上的許多特徵。

一方面，布爾塞維主義於一九〇三年是在最堅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產生的。而這個——只有這個——革命理論的正確，不但是由整個十九世紀全世界的經驗所證明，而且特別是由俄國革命思想界的迷惑、遊移、錯誤和失望底經驗所證明。大約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這五十年內，俄國進步的思想界曾處在空前野蠻與反動的俄皇專制壓迫之下，尋求正確的革命理論如渴思飲，它用了驚人的奮勉精神與縝密態度，來探索歐美關於這方面的每一種新發明。俄國在半世紀裏，受到了空前的痛苦與犧牲，表現了空前的革命勇氣，它表現難以設想的努力，它專心致志從事探究，它在半世紀裏經過訓練、實驗、失望、審查、參照歐洲經驗等等折磨，它真正受盡了千辛萬苦之後，才獲得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革命者不堪俄皇政府底迫害而不得不僑居國外，所以革命的俄國，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其國際聯絡之頻繁及其對於各國革命運動底形式與理論之熟悉，為世界任何國家所不及。

另一方面，在這個堅固的理論基礎上所產生出來的布爾塞維主義，有了十五年（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七年）的實際歷史，這種歷史經驗底豐富，世界上沒有倫比。因為在這十五年內，任何國家都沒有這樣多的革命經驗；革命運動的各種形式——合法的與非法的、和平的與激烈的、祕密的與公開的、小組的與群眾的、國會主義的與恐怖主義的種種形式——彼此交替，都沒有這樣迅速和複雜。任何一國都沒有在這樣短促的時期內，積聚這樣多的現社會一切階級鬭爭的形式。方法以及鬭爭所帶的色彩。而且因為俄國底落後與俄皇政府的殘暴壓迫，這種鬭爭特別快的成熟起來了，特別迫切和順利地

領會和採用了相當的歐美政治經驗底「新發明」。(列寧：「左派幼稚病」，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九——十頁)

有些人認爲，列寧主義是實際重於理論，就是說，在列寧主義裏，主要的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化爲事實，就是執行。這些原理。至於說到理論，那麼，他們認爲列寧主義是不關心的。大家都知道，普列哈諾夫曾經屢次嘲笑列寧對於理論，特別是對於哲學的「不關心」。同樣，大家亦知道，現在許多列寧主義的實際工作者不很注意理論，特別是因爲他們由於環境的關係不得不一天到晚忙於實際工作。我應該申言，對列寧及列寧主義的這種非常奇怪的見解，是完全不正確的，而且是絕對不合於事實的。實際工作者忽視理論的傾向，是違反整個列寧主義底精神的，而且對於工作是包含着大的危險的。

理論是世界各國工人運動的綜合歸納起來的經驗。當然，理論假使不和革命的實際聯系起來，就要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際如果不受革命理論底指示，就要變成盲目的實際。但是假如理論是在和革命的實際密切聯系中形成的，那麼，它就能够變成工人運動底極偉大的力量。因爲理論，而且只有理論，才能够給運動以確信力，給運動以確定方針的力量和對於四周事變底內部關係的了解。因爲理論，而且只有理論，才能够幫助實際不但去了解目前各階級行動底道路和方向，而且去了解在最近的將來這些階級行動底道路和方向。不是別人，而恰好是列寧，說過和幾十次重複說過，一個著名的原理，就是：

「沒有革命理論，就不會有革命運動。」(請參看「列寧選集」第四卷，第三八〇頁)

列寧比誰都更是了解理論底重要意義，特別是對於我們這個黨，因爲這個黨是擔負着國際無產階

級先鋒戰士底作用。而又處於四圍這種極複雜的國內和國外環境之內。還在一九〇二年，他就預先看到了我們黨底這種特殊的作用，在那時候他就已經認為必須指出：

只有爲先進理論所指導的黨，才能執行先進戰士底作用。

現在當列寧關於我們黨的作用的預言已經化爲事實的時候，列寧底這個原理是有特別的力量和特別的意義，這是無需證明的。

在唯物主義的哲學方面，把從恩格斯到列寧這時代中科學上最重大的發明綜合起來，並從各方面去批評馬克思主義者隊伍裏的反唯物主義的派別，這是一個最重大的任務，執行這個任務的不是別人，而是列寧；這件事實，也許可以算做列寧異常重視理論底最明顯的表現。恩格斯說：「每一個偉大的新發明出現後，唯物主義便要採取新的形式。」大家知道，不是別人，而恰好是列寧，在他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這本出色書籍裏面，替當時執行了這個任務。大家知道，普列哈諾夫是喜歡嘲笑列寧「不關心」哲學的，而這個普列哈諾夫，却甚至於沒有敢於認真着手去執行這個任務。（斯大林：「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斯大林選集「第一卷，中譯本，解放社一版，第一九——二一頁」）

如果我們有根據來誇揚社會主義建設底實際上的進步，那麼論到一般經濟方面，尤其是農村經濟方面，我們理論上的工作的進步，就不能這樣講了。而且應該承認，我們的理論上的思想，沒有趕上實際的進步，實際的進步與理論的發展，兩者之間有些隔離。但是理論工作不但需要趕上實際，而且要超過它，武裝我們的實行家爲社會主義底勝利而奮鬥。

關於理論的意義，你們都很知道，這裏不必多講。大家都知道，理論如果是真正好的理論，它會

給實行家指示方針，指明前途，使他們在工作中有把握，使他們相信我們事業底勝利。所有這些，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上都有——而且不能不有——重大的意義。我們的缺陷，就在於我們恰恰在這方面，在經濟問題底理論的研究方面，表現得不健全。如果不然，怎樣來解釋在我們的社會政治生活上，關於經濟問題，何以還流行着各種資產階級的與小資產階級的理論呢？這些理論與理論家，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受到應有的打擊呢？馬克思與列寧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底許多基本論據，都是反對資產階級的與反對小資產階級的理論的極好的防毒劑，何以會被人遺棄，而不在刊物上通俗化起來，爲什麼不把它擺在第一位上去呢？不站在馬克思、列寧的理論基礎上來與資產階級的理論作不調和的鬥爭，就不能完全戰勝階級的敵人，這一點難道還不容易了解嗎？

新的實際情形，產生了新的看法，來分析過渡時代的經濟問題。新經濟政策問題、階級問題、建設的速度問題、工農聯合問題、黨的政策問題等等，現在都與前不同了。如要不落在實際之後，現在就要馬上用新環境的觀點，來把這一切問題加一番研究。不如此，就不能征服那些淆亂實行家頭腦的資產階級的理論。不如此，就不能剷除這些偏見很深的理論。因爲只有在理論上與資產階級的偏見作鬥爭，才能鞏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地位。（斯大林：『論蘇聯的土地政策』，『斯大林選集』，第四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九一——九三頁）

三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研究、分析 具體環境、條件及歷史特點，是決定無產階 級政策的基礎

……在理論上，他們（共產黨——編者），比無產階級底其餘群眾，長於了解無產階級運動底條件、進程與一般結果。（『共產黨宣言』，第二三頁）

……共產主義的意思，現在不再是以幻想來計劃一種儘可能完善的社會理想，而是洞察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鬭爭的性質、條件、及共由此產生的一般目的。（恩格斯：『共產主義同盟史』，德國的
革命與反革命，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八八頁）

……這一政黨（指共產黨——編者）從未幻想它能夠隨時隨意製造實行它底理想的革命。它研究產生了一八四八年革命運動的諸因素，也研究使它們失敗的因素。（恩格斯：『最近的科倫審判共產黨案』，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解放社』版，第一五〇頁）

……這些原則底實際運用，是隨時隨地依靠於當時存在的情況的。……關於共產黨人對那種種反對黨派的態度的話，縱然在基本原則上就是到今天還是正確的，可是在它的實行上，今天已經過時的，因為政治形勢已經完全改變，而且歷史的發展已經把那兒所說到的各黨派底大多數，從世界上掃去了。（『共產黨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第四頁）

要就事論事，即是要用適合於環境變遷的方法來擁護革命底利益。（摘錄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三
日馬克思給顧格曼的信）

總務委員會將成爲本聯合會所屬的各國的和各地的團體之間的國際媒介，繼續不斷地將別國的工人階級底運動的消息向各國的工人報告，在共同的指導之下，同時進行調查歐洲各國的社會狀況。
……（國際工人聯合會（即第一國際）臨時規約第六條）

在這運動第一幕已完，第二幕未開的中間，我們有一個也許很短的休息時間，可以做一件很緊要的工作：研究這次革命必然爆發和失敗的原因。這些原因，我們不應在幾個領袖之偶然的努力、才幹、過失、錯誤或叛變中去尋找，而應求之於每個經過了革命騷動的國家之一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一八四八年二月和三月突起的革命運動，不是少數個人活動的結果，而是全國民底要求和需要之自發的不能遏抑的表現（每個國家的許多階級，對於這種要求和需要，都已很明確地感覺到，雖然在清楚認識方面有程度的不同），這是到處公認的事實。但當你詢問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時，你却到處聽到一種現成的回答：因爲某甲或某乙「出賣」了人民。這種回答也許正確，也許錯誤，視具體情形而定，但在任何情形下，它都不能解釋半點東西——甚至連人民怎樣會讓自己這樣被人出賣也解釋不了。而且，如果一個政黨底全部政治資本，只在於認識某人不可靠這種孤單的事實，它底勝算該有多少麼渺茫可憐呀！（恩格斯：『革命爆發前的德國』，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解放社出版，第五頁）

如果我們能找出根據確鑿事實的合理的原因，來說明這運動的主要事變和重要推移，使我們對於下次——也許就在不遠的將來——革命爆發所將昭示德國人民的方向，能稍得端倪，那我們也就滿足

了。(同上，第七頁)

(40) 對於情況底這種冷靜的理解，在當時却被許多人視爲邪說，在那時候，雷都樓林……(中略)——(編者)都詳集在倫敦，他們不但爲自己的各個祖國，而且要爲全歐洲組織將來的臨時政府。在他們看來，只要以革命公債從美國弄來必要的錢，那麼便即刻可以實現歐洲的革命，並且可以即刻實現自然與之同來的各個共和國。(恩格斯：『共產主義同盟史』，『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解放社』版，第二〇〇——二〇一頁)

由於古代的階級鬭爭與近代的階級鬭爭底物質的經濟的條件完全不同，所以這種鬭爭所產生的政治人物，就不能有比較坎特布里大主教與祭司長撒母爾之間所有的更多的共通點。(馬克思：『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八六九年第二版著者序言，第一〇——一一頁)

現在我們在這裏從事鼓動普選權的問題，這個問題在這裏與在普魯士有完全不同的意義。(馬克思：『致顧格曼的信』，『馬恩通信選集』，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四頁)

因爲在同一國內，各工人支部底發展階段，以及各國工人階級底發展階段，必然地極不相同，因此，現實的運動，必然是表現於相差很大的理論形態中。(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馬恩通信選集』，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二二頁)

這部通信集(指『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編者)，使讀者可以看到全世界工人運動史底極生動的圖畫——通信集所論到的，都是最重要的時期與最重要的特點。價值更大的，是工人階級底政策史。在極不相同的場合上，在新舊世界的不同的國度中，和在極不相同的歷史時機上，馬克思和恩格斯討論着工人階級底政治的任務底提出之最重要原則。(列寧：『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中譯

本，『解放社』版，第六四頁）

要想製定藥方，裝好總規律，（『不作任何妥協』）適用一切，療治百病，那就是荒謬的事情。

（列寧：『左派幼稚病』，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六四頁）

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把革命底客觀過程之估計，當作論斷策略的基礎。（列寧：『孟塞維主義底危

機』，『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一七八頁）

馬克思主義，是根據日常生活底千百萬件事實上所表現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鬭爭，來判斷『利益』

的。（列寧：『第二國際破產』，『列寧選集』，第九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〇五頁）

馬克思主義底根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底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列寧：

『共產黨人』，『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九二頁）

馬克思底方法首先就在於：要在特定的具體情況下，在規定的具體環境中，去估計歷史過程底客

觀內容，要去先懂得什麼階級的運動乃是這個具體環境中的可能的過程之主要原動力。（列寧：『在

別的旗幟之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一〇七頁）

馬克思主義者，不應離開階級關係分析之確切立場。……馬克思主義者在估計時局時，不應從可

能出發，而應從實情出發。……不顧事實而只講『各種可能性』，那簡直是滑稽之至。（列寧：『論

策略書』，『列寧選集』，第十卷，第五九——六〇頁）

馬克思主義是站在事實底基礎之上，而不是站在可能的基礎之上。

馬克思主義應當只把真正的和無可爭辯的被證實了的事實，作為自己政策的前提。

而我們（黨的）決議就是這樣作出的。（列寧：『給Z·O啓克那則的信』，『列寧全集』，第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竭力企圖，以科學方法，研究作爲我們政策基礎的那些事實。（列寧：『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第一一三頁）

實在的政治形勢，就是如此。我們首先應該竭力以最客觀的最真確的態度，去斷定這個形勢，以便把馬克思主義的策略，建立在唯一穩固的基礎，在它所應當作爲根據的基礎，即事實的基礎上。（列寧：『遠方來信』，『列寧選集』，第十卷，第二〇頁）

這一決議中，我們在理由的申明上，首先從經濟危機及群眾的經濟狀況的問題開始。這一問題，是一切馬克思主義者所認爲基本的問題。（『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三九二頁）

我們不能『憑空想出一種特別的改良計劃』。我們必須研究資本主義正在發展的俄國底農民土地革命底客觀條件，根據這個客觀分析，來把這些或那些階級底錯誤思想與經濟變遷底真實內容，分別清楚，這樣才可以決定，根據這些經濟變遷，生產力發展的利益及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利益，到底是要些什麼。（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一七年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列寧選集』，第五卷，第二〇九頁）

……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要在其發展中去觀察一切現象，而不要滿足於一種表面的外形。不要相信美麗的招牌，要去研究各政黨底經濟的階級的基礎，研究那個決定它們政治活動之意義及結果的客觀政治環境。（列寧：『社會民主黨的勝利與工人政黨底任務』，『列寧全集』，第九卷，第九九頁）

革命的社會民主派，應當作另一種論斷，代替太一般的和太輕易向資產階級的曲解作讓步的關於

「全民資產階級性革命」的詞句，我們應當分析在革命的各種情勢中確切地被規定的各階級與政黨底具體狀況。（列寧：『在革命隊伍中的庸人』，『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一〇六頁）

隨着革命的進步以及革命任務的增長，階級的組成及人民的成份，能够參加實現這些任務的鬭爭之階級及人民，也要改變。我們應當在革命的各個時機，分析確切規定的各階級與政黨的具體情況。

（『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一〇六頁）

俄國革命（即俄國革命最初三年的估計）是放在議事日程上了。不闡明我國各政黨的階級本質，不估計我們革命中各階級的利益及其相互關係，那麼，在決定無產階級最近任務及策略的事情上，就一步也不能前進。（『列寧全集』，第十二卷）

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即首先估計到各個「時代」區別之主要點（而不是個別國度歷史上之個別插話），我們才能够製定自己的策略。也只有該時代之主要點的知識，才能成爲估計這國或那國更詳細的特點的基礎。（列寧：『在別的旗幟之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一〇七——一〇八頁）

可是爲要「不至於過於遲緩」，爲要不使政策成爲「馬後炮」，——從事變中學習是不夠的，必須懂得事變的過程，了解決定各政黨與全杜馬底政策的、各階級間基本的相互關係。（列寧：『貧血的杜馬與貧血的小資產階級』，『列寧全集』，第十一卷，第一五六——一五七頁）

政治不能不順應着經濟，但不是立即的與平滑的，不是簡單的，也不是直接的。（列寧：『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二四四頁）

說階級鬭爭是反對侵犯的最好手段，尤尼烏斯只是應用了一半馬克思的辯證法，他沿着正確道路前進了一步之後，就離開了它。馬克思辯證法要求具體分析每一個特殊的歷史情況。階級鬭爭是反對

侵犯的最好手段，這無論對於推翻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無論對於推翻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都是正確的。正因為對於一切階級壓迫都是正確的，所以就過於一般，並因而對於這一定的特別的場合就不充分。（列寧：『關於尤尼烏斯小冊子』，『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一八七頁）

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若在民主革命時，把民主主義底各種程度及其各種形式底各種性質間的區別輕視了，而只是憑着自己的『聰明才學』，說橫直這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橫直這是『資產階級革命』底結果——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明瞭實際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兩個策略』，『列寧選集』，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五卷，第九七頁）

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無論如何不應該像現在許多革命民主主義者一樣（如加邦那一流人），拿『革命』或『俄國大革命』等口頭禪以自欺。（同上，第一〇〇頁）

脫離了階級基礎的民主派，專愛講漂亮話，喜歡提出賤價的流行的（特別在農民問題方面）口號，我們絕不願與這些革命性競賽。我們，剛剛相反，對於這些革命的話，永遠是取一種批評態度，揭露每一個字的真義，指出被理想化了的偉大事件的真正內容。同時，還要在革命最緊張的關頭，正確的估計各階級以及各階級中的各種派別。（列寧：『社會民主黨與臨時革命政府』，『列寧選集』，第五卷，『解放社』版，第五四頁）

但是，一部份馬克思主義者，恰巧就是右派，向來就是持着關於資產階級革命的普遍、抽象、依樣葫蘆的概念，而不能了解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是農民革命的這種特質。（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一七年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列寧選集』，第五卷，『解放社』版，第二七八頁）

我們並不冀圖說，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者能夠知道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的一切具體情形。這是

胡說。我們只知道這條道路的方向，知道沿着這條道路前進的，是那些階級的力量。至於具體的實際情形，那麼，只有在千百萬群眾起來鬪爭時，他們的經驗方能指示出來。（列寧：『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第一二二頁）

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的困難，應當刺激無產階級的擁護者，去更注意地更具體地研究執行這些任務的方法。（『列寧選集』第十一卷上冊，中譯本，第一六九頁）

在七月事變（即一九一七年的七月三日事變——編者）以後，因克倫斯基政府所惠賜給我的特別關心的注意，我就不得不轉入祕密狀況中。自然，工人，隱藏了我們工人的弟兄。在彼得格勒的遼遠的工人區裏，在小的工人住屋裏吃中飯。主婦拿來了麵包。主人就說：『看啊，怎樣的麵包，哈，「他們」現在不敢給我們以壞的麵包。我們可沒有想到，在彼得格勒，能夠得到這樣好的麵包。』

這個對於七月事變之階級估計，使我吃驚。我的思想，就迴轉於七月事變的政治意義上，較量它在事變一般進程中的作用，分析這個歷史的波折，是從何種形勢中產生出來的，並且它將造成何種形勢，我們應當怎樣變更我們的口號和我們黨的機關，使之能夠適應已經變更了的情勢。我，沒有經過窮困境遇的人，沒有想到過麵包。在我看來，麵包好像是不求而得，好像是文字工作的副產品。思想，非常複雜地混亂地經過政治的分析，轉到萬事的基礎，轉到爭取麵包的階級鬪爭上。（『列寧選集』，第十一卷上冊，中譯本，第一九一——一九二頁）

革命策略，不能僅僅建築在革命情緒之上。策略的規定，須根據本國（以及鄰國和世界上一切其他國家）一切階級力量之清醒的、極客觀的估計以及革命運動經驗的估計。僅僅咒罵國會的機會主義，僅僅排斥參加國會，來標榜自己的「革命精神」，這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正因為這是很容易不

過的事情，所以這不能解決困難的任務，更不能解決最困難的任務。（列寧：『左派幼稚病』，中譯本，第五七頁）

戰鬪的政黨，革命的政黨，這個政黨要有充分的勇敢，足以引導無產階級作奪取政權的鬪爭；要有充分的經驗，足以認清革命環境底複雜條件；要有充分的敏捷，足以繞過一切橫在達到目標的道路上的暗礁。（斯大林：『列寧主義概論』，中譯本，第九四頁）

無論那個人民革命，如果它是真正的人民革命，都是創造性的革命，因為它打破舊制度和創造建立新制度。當然，例如在阿爾巴尼亞，有時發生這些部落反對別些部落的兒戲的『暴動』，在這樣的所謂『革命』裏，是不能有絲毫創造性的。可是這樣的兒戲的『暴動』，從來沒有被馬克思主義者認作革命。這裏所說的，顯然不是關於這樣的暴動，而是關於發動着被壓迫階級去反對壓迫階級的那種群眾的人民革命。而這樣的革命，却不能不是創造性的。馬克思和列寧所主張的正是這樣的革命。——而且僅只是這樣的革命。而且很明顯的，這樣的革命，不是在任何條件下面都能發生的，它只是在一定的順利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下面才能發生的。（斯大林：『一九二七年九月與第一次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斯大林選集』第三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四七——四八頁）

有人在那裏爭論，什麼傾向是主要的危險，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傾向，還是地方民族主義傾向呢？在現時條件之下，這是形式上的爭論，因此也就是空洞的爭論。如果想關於主要危險與非主要危險這種事定出一個對於一切時候和一切條件都適應的現存的藥方，那麼，這是愚蠢的事情。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這樣的藥方。……關於那一個危險是民族問題上主要危險這個問題，決不能由空洞的形式上的爭論來解決的，而是只有在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分析了當時的實際情形，研究了在這一方面所犯的錯

誤以後，才能解決的。（斯大林：『聯共（布）中央在十七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一九三四年一月，斯大林選集，第五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六六——一六七頁）

在我們反對法西斯專政的鬭爭當中，特別危險的就是把希望當做實際。我們應當從具體事實出發，從具體實際環境出發。（『季米特洛夫文選』，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五〇頁）

要順利解決這個任務，第一，我們所需要的，就是共產黨員應當善於利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分析問題的武器，仔細研究具體環境和各階級力量分佈情形底發展。應當根據這種具體環境和階級力量分佈情形，來規定自己的行動和鬭爭計劃。我們應當毫不留情地根本剷除那種往往籠罩着我們同志的傾向，這種傾向就是迷信杜撰的公式，無生氣的定義，死板的模型。我們應當消除下面這樣一種情形：就是共產黨員，因為不夠馬克思列寧主義分析底學說和能力，就用籠統的口號和籠統的辭句，例如『用革命手段擺脫危機』等等，來代替這種分析，而絲毫也不想認真解釋一下：究竟在什麼條件之下，在怎樣的階級力量對比之下，在無產階級以及勞動群眾底革命準備達到什麼程度的時候，在共產黨底影響達到什麼程度的時候，才可以用革命手段擺脫危機。如果沒有這種分析，那麼，所有這一類的口號，一概都會化為空談，變成廢話，而只足以模糊我們目前的任務。如果，沒有具體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那麼，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提出和解決任何問題：如關於法西斯主義問題，關於無產階級統一戰綫和全民統一戰綫問題。關於對資產階級民主的態度問題，關於統一戰綫政府問題，關於在工人階級內部以及特別是在社會民主黨工人中間所發生的過程問題，以及其他許多新穎而複雜的問題；而實際生活本身，階級鬭爭底發展，正在我們面前提出而且將來也要提出這些問題的。（同上，

我預先告訴同志們，請不要在這個問題上做出任何簡化主義和公式主義的錯誤，實際生活比任何公式都要複雜些。（同上，第一二一——一二二頁）

某幾個同志，不會具體地觀察生活的事實，不肯深思熟慮，不肯仔細精密地研究具體環境和階級力量對比，却一味玩弄籠統的空洞的辭句。他們並不像百發百中的射手，只是在那裏「耍花槍」，總是擊不中目標，或者太高，或者太低，或者太遠，或者太近。同志們，我們是工人運動底共產主義的行動家，是工人階級底革命先鋒隊，我們要成爲真正百發百中的射手。（同上，第一一三頁）

代表大會極堅決地要求各國的黨，凡決定一切策略步驟時，必須明確分析具體的實際情況，估量階級勢力底對比關係和廣大群眾底政治程度，以此作爲定策的基礎。（同上，第一六〇頁）

四 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論

無產階級政黨的政策需要最大的靈活性

德國人（指當時移居於美國的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編者）不知道如何運用他們的理論作爲一根能推動美國群眾之槓桿（Lever），他們自己對理論大部份不理解，而以空論（Doctrinaire）和教條視之，以爲把它死記，用不着再費力就可應付一切需要。他們以爲它是教條而不是行動之指南。除此之外，他們在原則上又都不學習英語。因此，美國的群眾須自己找自己的道路，而在目前則把勞動騎士團（Knights of Labor）當爲共出路；勞動騎士團之紛亂的原則與可笑的組織，是與工人群眾的思想混亂相適應的，但就我所聽到的，勞動騎士團是一個真實的力量，尤其是在新英格蘭與西部，而且，由

於資本家之兇暴的反對，使其日益成爲一個真實的力量。我認爲必須在其裏面工作，在這個還很富可掬性的群眾裏面，把懂得工人運動及其目的之人物組織成爲一個核心，當現制度之不可避免的崩潰時期到來時，就擔負起領導的責任來，最少成爲其一部分的領導者。勞動騎士團之最壞的一面，就是他們的政治上的中立，結果成爲 *powdery* 等的純粹欺騙。但群眾在十一月選舉的行動，尤其是在紐約，已將其鋒削去了。每個新進入工人運動的國度，最重大的一步，是把工人組織成爲一個分明的工人政黨。既已跑了這一步，而且比我們所想的還要決得多，這是最主要的事情。這個政黨底第一個綱領，還是很混亂的，而且極不夠，而且樹起了亨利·喬治 (*Henry George*) 底旗幟。——這些壞處是避免不了的，但也只是暫時的。群眾須有時間和機會可讓其發展，而只有當他們有其自己的運動——不論其形態如何，只要是他們自己的運動就得——時，他們才有這樣的機會；在他們的自己的運動中，他們的自己的錯誤促使他們繼續前進，他們吃了虧就學到了乖。美國的運動，是和我們在一八四八年以前的運動，處於同樣的情形；那裏真正明達的人，首先要擔負一八四八年以前共產主義者聯盟在工人團體中所擔負的同樣的任務。所不同的，是美國現在進行得更快，無限地快；因爲在成立還不到八個月就已得到這樣的選舉成功，是絕對空前的。……如果那裏有幾個理論清楚的人，能夠事先把他們自己的錯誤底結果告訴他們，使他們明瞭每一個運動，如果這個運動沒有始終把毀滅工資制度作爲其最終的目的，就一定要跑入歧路和失敗，——那麼，許多的謬誤就可以避免，而過程也就大大縮短了。但一定要是在英國式的方法中實現的，德國的特別性格一定要切去。『社會主義者』(在美國的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所辦的週刊——編者)沒有資格來完成此一工作，而『人民報』(在美國的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所辦的日報——編者)也只在事業上 (*Business*) 是比較聰明一點。(恩格斯：

「致左爾格信」，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於倫敦）

……運動之應擴大，和協地進行，包括整個的美國無產階級，越多越好，在他們之間生起根來；這比運動之一開始就從理論完全正確的路綫發出，是更重要得多。除了「做錯學乖」之外，再也沒有更好的路可達到理論的明確認識。而且，對於一個整個的大階級，尤其是像美國人這樣的特別實際的民族，再沒有別的道路。主要的是使工人階級成爲一個階級而運動。既已如此運動起來，他們不久就會找到正確的方向，一切阻擋的人，不論是亨利·喬治或 Powhelly 將被見棄，只剩下他們自己的小宗派跟着他們。所以，我也認爲勞動騎士團是運動中的一個最主要的因素，不是從外面排棄它，而是要從裏面來把它革命化，我認爲德國人（指當時在美國的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編者）有許多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他們在一個非他們所創造的強大的和偉大的運動當前，他們想要把他們所輸入的但並不常懂的理论，作爲得救的必要教條。對於任何運動，它如不接受那教條，他們就袖手旁觀。我們的理論不是一個教條，而是一個進化過程底說明，而那個過程裏包含着若干連續的階段。期望美國人開始運動時就充分瞭悟那在較老的工業國所作成的學說，是期望不可能的事。德國人所應該做的，是遵行他們自己的理論——如果他們理解它，如同我們在一八四五年所會理解——參加任何真正的普遍的工人階級運動，接受其事實的出發點爲出發點，而指出所犯的每一個錯誤，所遭受的每一個失敗，如何是在原來的綱領中的錯誤的理論見解底必然的結果，逐漸地把它提高到理論的高度。他們應該，如共產黨宣言中所說，在現在的運動中代表着未來底運動。但首先要使運動有時間可以鞏固起來，不要把他們現在所不能正確理解但不久就會學到的東西，強塞進他們的喉嚨，使得他們在開頭時所避免不了的混亂，更加混亂起來。明年十一月，真正的工人政黨獲得一百萬或二百萬的工人投票

比起現在有十萬人投票贊成一個理論完善的政綱，是價值更大得無限。……（恩格斯：「致 Weydemeyer 夫人信」，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我們的理論是一進化的理論，而並不是一死記的機械的背誦的教條。越不是從外面注入於美國人，他們越是以他們自己的經驗來考驗——由德國人幫助他們——我們的理論就越深入於他們的血肉。當我們在一八四八年春天回德國時，我們參加民主黨，這是使工人階級聽到我們的話之唯一可能的手段，我們是那個政黨的最前進的一翼，但依然是其一翼。當馬克思創立第一國際時，他把會規制定得當時一切的工人階級社會主義者都能夠參加——蒲魯東派、勒盧（Pierre Leouzon）派，甚至英國職工會的最進步的部份。只有由於這樣廣大範圍，第一國際才成爲那樣的國際，是逐漸的溶化和吸收一切這些小派別——除無政府主義者之外——之手段。無政府主義者之驟然出現於各國，是巴黎公社之後兇暴的資產階級的反動的結果，所以我們可以很安心的不要去理他，聽其自滅，他們是消滅了。如果我們從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七三年，就固持只與那些公開接受我們的政綱的人們一起工作，我們現在會成爲怎樣的呢？（恩格斯：「致 Weydemeyer 夫人信」，一八八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社會民主黨不用一種預先想好的政治鬭爭計劃或方法來束縛自己的手足，來縮小自己的活動範圍；它承認所有的鬭爭方法，只要這些方法適合於黨的實力和能夠達到在現有條件下可以實現的最大結果。（列寧：「我們的運動底迫切任務」，「列寧選集」，第三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二六頁）

在目前新的條件下，要有新的鬭爭方式，利用國會的講壇，是絕對必要的。訓練和組織無產階級群眾的長期工作，被推到首位。祕密組織與公開組織之配合，在黨的前面提出種種特殊的任務。被自

由派和取消派，知識份子所污辱的，革命之經驗，無論在理論的或實際行動的目的上，都必須加以通俗化的解釋，但是黨的策略路線，應當善於估計鬭爭手段與鬭爭方法之新條件的，策略路線，現在仍舊沒有變更。（列寧：『走上軌道』，『列寧選集』，第七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五頁）

愛爾維底草案——用罷工和暴動去『回答』任何戰爭，表現他們完全不懂得這種或那種鬭爭方式的運用，不是依賴於革命家的預先決定，而是依賴於：戰爭所將引起的經濟的政治的危機底客觀條件。

盧森堡與俄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列寧與馬爾托夫在這裏是一致的）共同提議修改倍爾底決議案，而在這些修正案內特別提出：必須在青年中作鼓動工作；必須利用戰爭所產生的危機，來加速資產階級底顛覆；必須注意到，鬭爭的方法與手段必然要隨着階級鬭爭底緊張及政治局面底改變而改變的。這麼一來，倍爾底決議案，本是教條式的，片面的，死的，容許福爾馬式的論調的，結果，却完全變成另外一個決議了。一切理論上的真理，都在這個決議案中反復說明，教訓愛爾維派——善於爲了反軍國主義而忘記社會主義的愛爾維派。可是這些真理，不是拿來袒護議會主義的癡病的，不是拿來單單推崇一種和平手段的，不是拿來崇拜已有的比較平靜的局面的，——而是要來承認一切鬭爭手段，來估計俄國革命底經驗，來發展運動底有作用的，創造的方面。（列寧：『國際社會黨人底斯都加爾大會』，『列寧選集』，第七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三六五——三六六頁）

舊的方案不適合於這件事實，要善於使方案適應實情，而不要背誦已失其意義的……一般的辭句。（列寧：『論策略書』，『列寧選集』，第十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五九頁）

我們革命中非常出色的特點，就在於它造成了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這種事實，首先就要認清，因爲不先了解它，就不能前進。對於舊公式，例如，對於布爾塞維主義的舊「公式」，要善於加以補

充和修改；因爲這些公式，一般地講來是對的，可是具體的實現，却已不同了。關於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的問題，以前誰都沒有想到，並且也不能想到。（列寧：『論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列寧選集』，第十卷，第四九頁）

當歷史發生急劇的轉變之時，甚至先進的政黨，也在或多或少的長久時期中，不能領會新的情況，而重複昨天曾是正確的但今天已經失去意義的口號（這些口號之『突然』失去了意義，正如急劇的轉變『突然』發生一樣）；這樣情形，曾是很多的。（列寧：『論口號』，『列寧選集』，第十一卷上冊，中譯本，第五頁）

革命的政黨需要學習到底。它們學習了怎樣進攻。現在需要懂得，除了學習進攻的科學之外，還須補習善於退守的科學。它們需要懂得——而革命的階級在自身痛苦的經驗中學習懂得——如果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守，就不能得到勝利。在一切被擊破的反政府黨和革命黨中間，布爾塞維克黨退却得最有秩序，它的『軍隊』損失最小，它的幹部保存最多，分裂最微（就其分裂的深度與是否可以挽救的程度而言），頹喪最輕。它最有能力用最廣大的規模、最正確的辦法、最強大的毅力去恢復工作。布爾塞維克之所以能夠如此，只是因爲他們無情地揭破了並驅逐了講大話的革命家。這些講大話的革命家，不願了解必須退守，必須善於退守。他們不願了解，一定要學會在最反動的國會、最反動的職工會、協作社以及保險處等等組織中公開進行工作。（列寧：『左派幼稚病』，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十三頁）

社會民主黨始終警戒着冒險主義，而無情地揭露那些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失望的幻想。我們應當了解，革命黨只有當它在實際上領導着革命階級的運動之時，才配得上自己的名字。我們應當了解，任

何人民的運動都是採取着無限複雜的形式。經常地製定新形式，拋棄舊形式，創造各種變形，或新形式與舊形式的混合物。而我們的責任，就在於積極地參加到這個製定鬭爭的方法與手段的過程。（列寧：『革命的冒險主義』，全集五，一五一頁）

他們（指第二國際的領袖們——編者）破產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對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只『呆呆注視』一個固定的形式，忘記了這個形式是片面不全的。他們害怕看見那些因客觀條件之故而必然發生的急遽轉變，却依然口口聲聲，說那種簡單的、背熟的、第一眼看去是很明顯的真理：三大於二。然而政治雖然也像算術，却更加像代數，雖然也像初等數學，却更加像高等數學。實際上，一切社會主義運動底舊形式，已充實了新內容，因此數學前面，出現了一個新符號：出現了一個『負號』。可是我們的學究却固執成見，他們過去和現在依然在那裏勸說自己並說服別人，硬說『負三』大於『負二』。（列寧：『左派幼稚病』，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〇五——一〇六頁）

『左的一』教條主義固執成見，無條件地否認一定的舊形式。它看不見，新內容經過一切和各種形式而開闢自己的道路。它不知道，我們共產主義者底責任，就是要善於學會使用一切形式，學會以最快的速度用一個形式去補充別個形式，用一個形式去代替別個形式，使我們的策略適應各種不是我們的階級或者不是我們的努力所引起的變化。（列寧：『左派幼稚病』，中譯本，『解放社』版，一〇七頁）

一九〇五年布爾塞維克抵制『國會』，使革命無產階級增加了一個很有價值的經驗。這次抵制指明，在公開的與秘密的、國會內的與國會外的鬭爭形式互相配合之下，善於拋却國會內的鬭爭，有時

是有益處的，甚至於必要的。但是把這種經驗盲目地、機械地、輕率地搬到別種條件和別種情況中去，這是極大的錯誤。一九〇六年布爾塞維克黨底抵制國會，已經是一個錯誤。雖然，這個錯誤是不大的，容易改正的。（註：凡論及個人者——稍加修改——，亦可適用於政治和政黨。聰明的人並不犯錯誤的人。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而且是不會有的。聰明的人所犯的錯誤是不很重大的，同時，他能夠迅速地、敏捷地糾正這種錯誤。）至於一九〇七年、一九〇八年以及以後幾年的抵制，却是極嚴重而很難糾正的錯誤。因為當時，一方面，既不能期待革命浪潮很快的高漲，更無急轉為武裝起義的希望。另一方面，正在維新的資產階級帝制之整個歷史環境，使公開與秘密工作有互相配合之必要。現在，試一回顧已經結束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與以後各個時期之聯絡，已完全表現出來），就特別明顯。假使布爾塞維克當時不在最激烈的鬭爭中，堅持一定要把公開鬭爭與秘密鬭爭配合起來，並堅持一定要參加最反動的國會以及參加受反動法律所限制的各种組織（如保險儲金會等），那麼，他們在一九〇八到一九一四年間，就決不能保持（自然更說不到鞏固、發展和加強）無產階級革命黨底中堅幹部。（列寧：『左派幼稚病』，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二二——二三頁）

現在，當我聽到人們，例如「社會革命黨人」，攻擊我們簽定布列斯特和約所採取的策略的時候，或者當蘭斯白雷和我談話，講到「我們英國職工會底領袖們說，如果布爾塞維克可以和別人妥協，那他們也可以和別人妥協」這一段話的時候，我總是首先使用一個簡明「通俗的」比喻來回答：假如你底汽車被武裝強盜攔住了，你交出了你的錢、護照、手槍、汽車，你因此才得幸免，這當然是個妥協，Do it!（我給「你錢、手槍、汽車，以便你給「我一個機會，使我可以安全脫身）。但是很難找到一個頭腦健全的人，會說這種妥協是「原則上不可容許的」，或者說，這個權行

妥協的人是同強盜打夥（雖然強盜坐上汽車之後，可以利用汽車和手槍去搶劫別人）。我們和德國帝國主義強盜的妥協，正和這樣的妥協類似。（同上，第二三頁）

有各種不同的妥協，應當善於分析每個妥協或每個變相妥協底環境和具體條件。應當學習怎樣把兩種人分別開來，一種人把金錢和武器交給強盜，以便減少強盜的遺害，以便後來易於拘捕和槍斃強盜；另一種人，把金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爲的是要入夥分贓。在政治上，這一點，決不時常都像孩稚氣的簡單的例子中那樣容易分析。如果有人異想天開，要替工人想出一個包醫百病的藥方，或者說在革命無產階級的政治上不會有任何困難和複雜情形，他便只是一個騙子。（同上，第二四——二五頁）

從出版於弗朗克福爾特地方的那本小冊子底引證中，我們看到「左派」何等堅決地抬出這個不作任何妥協的口號。可憐，無疑義地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並願意成爲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們，怎樣忘記了馬克思主義底基本真理。試看一八七四年恩格斯（他同馬克思一樣，都是那一種稀有的和極稀有的著作家，這種著作家底每部大著作中的每句話，都含着極深遠的意思）反對那三十三個勃朗基派的公社社員底宣言時，是怎樣寫的：

勃朗基派的公社社員在自己的宣言中寫道：

「我們之所以成爲共產主義者，就由於我們求達我們的目的時，並不停頓於各種過渡階段，並不去妥協，因爲，妥協只是延緩勝利之時日，延長奴隸制度之期間……。」

恩格斯接着寫道：

「德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成爲共產黨人，就是因爲他們並不跳過而是經過一切爲歷史進程所形

成而不是由他們造成的各種過渡階段和妥協，清楚看到並且始終追逐他們的最後目的：即消滅階級，並建立沒有土地私有制，沒有生產工具私有制的社會。這三十三個勃朗基主義者之所以成爲共產主義者，就是因爲他們以爲：他們既然願意跳過各種過渡階段和妥協，那麼，這件事情便算辦妥了，如果（這是他們確信的）日內「動手」，政權到了手中，那麼，後天一共產主義就會實現」。因此，如果這件事情不能立刻就辦到，那麼，他們也就不成其爲共產主義者。

這是何等幼稚氣，把自己的急躁，當作理論的根據！（見恩格斯著：「勃朗基派的公社社員底綱領」，載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Sozialist*）（註：「國民報」）上，一八七四年出版。第七十三期。引自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五年文集，俄文版一九一九年彼得堡出版，第五二——五三頁）（列寧：「左派幼稚病」，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六一——六二頁）

爲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鬭爭，較之通常國家與國家間所進行的最持久的戰爭，要困難百倍，複雜百倍，而且時間也要延長百倍。要進行這種戰爭，而事先就拒絕迂迴，拒絕利用敵人中間的屬害衝突（即令是暫時的衝突），拒絕與可能的（即令是暫時的、不可靠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難道這不是大笑話麼？崎嶇峻峭、來逼人跡的高山，如果我們不避艱險要攀登這座高山，但事先却就拒絕有時候要迂迴前進，有時候要退轉回來，有時候要放棄已選定的方向而試走各種方向，一左派「底意見，同這件事情比較起來，難道不相像嗎？沒有經驗、缺乏覺悟、到了這種地步的人（如果真是因爲他們年青，那還好；上帝「本來就讓青年人在相當歲月內說這一類蠢話」，居然能夠得到荷蘭共產黨底一些黨員底擁護（不管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公開的或隱蔽的、完全的或部份的擁護）！

在無產階級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後，在一個國家內推翻了資產階級以後，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很長時期內，依然比較資產階級要軟弱些。第一，很簡單的，就因為資產階級有很廣泛的國際聯系。其次，又因為在這個推翻了資產階級的國家裏，小的商品生產者，使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發地，不斷地重新恢復和重新產生出來。要想戰勝更強大的敵人，只有用最大的努力，同時必須最精細地，最留心地，最謹慎地，最巧妙地，一面利用敵人中間的各種嫌隙（即令是最小的嫌隙也要利用），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中間以及每一個國家內各種資產階級中間的各種利害衝突，他方面利用各種可能（即令是極小的可能也好），以獲得人數衆多的同盟者，儘管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同盟者。誰不懂得這一層，誰就對於馬克思主義。對於一般的現代科學的社會主義，絲毫也不懂。誰要是在比較長久的時期中，在比較複雜的各種政治情況中，不會在實際上證明他會實際應用這個真理，那麼，他就還沒有學會怎樣在革命階級的鬭爭中幫助革命階級，去把全體勞動的人類從剝削者手中解放出來。以上所說的，對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及以後的時期，都一樣適用。（列寧：『左派幼稚病』，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六五——六七頁）

如果害怕同『獨立民主黨』底這個左派『妥協』，那真是可笑。相反的，共產黨人必須尋找而且找得同他們妥協的適當形式。這種妥協，一方面，可以贊助並加速與此派完全融合起來，而這種融合是必要的。他方面，絲毫不拘束共產黨人進行思想上與政治上的鬭爭，去反對『獨立黨人』中間的機會主義右派。要定出這樣一個適當的妥協形式，大概是不容易的，然而只有騙子，才能對德國工人和德國共產黨人說：有『容易的』致勝的道路。（同上，第七〇頁）

（一）在製定共產國際對各國工人運動的指示時，必須估計到各個國家的民族特殊情形。

(二) 在每個國家裏共產黨必須利用最小的可能性，以保障無產階級的群眾同盟者，那怕這些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鞏固的和不可靠的。(三) 必須估計到，只靠宣傳和鼓動還不能夠教育成百萬的群眾，爲了對幾百萬群眾實行政治的教育，還必須群眾有本身的政治經驗。(斯大林：「時事問題札記」)

要與迷途的社會民主黨的弟兄們找到共同的語言，幫助他們走出社會民主主義的迷途，轉到共產主義的方面來。(斯大林：「在共產國際擴大會議德國問題委員會上的演說詞」，「共產國際」雜誌，一九二六年，第三期，第一〇五頁)

集體農莊中主要的錯誤是什麼呢？……(中略一大段)

破壞了列寧主義的原則：就是應當估計蘇聯各區各種不同條件，應用到集體農場的建設上去。忘記了在蘇聯有各種各樣最不相同的區域，各種各樣的經濟制度和文化程度；忘記了在這些區域裏有先進的中等和落後的區域；忘記了在這些大不相同的地方，集體農場運動的速度和建設集體農場的方法是不能夠到處一樣的。

列寧說：

倘若同志們，簡單的按着死板板的格式，來爲全俄國各地方寫出一樣的法令，倘若烏克蘭和頓河布爾塞維克共產黨員，蘇維埃工作人員不考察情形，籠籠統統的把這些法令傳佈到其他地方，那就錯誤了……因爲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守着死板板的老格式，我們不能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不能說我們的經驗，俄羅斯中部的經驗是可以完全搬到一切邊陲地方去的。——(「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一〇六頁)

列寧接下去說：

『把俄羅斯中部、烏克蘭、西伯利亞，拿來按着一定的呆板的格式來處理，這是最蠢的行爲。』（『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上冊，第一四三頁）

最後，列寧委託高加索的共產黨員，叫他們必須：

『了解他們的共和國與蘇俄，情形和條件的不同特點，了解必須不抄襲我們的策略，要深思熟慮的按着具體條件的發展，來變化這種策略的外形。』（『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上冊，第二〇〇頁，見斯大林：『給集體農場工作的同志們的答覆』，『斯大林選集』，第四卷，第一三六——一三七頁）

有些同志，在邊疆蘇維埃化上所表現的那種急燥情形——這種急燥往往轉為粗暴的笨拙——也是實現蘇維埃自治的一個嚴重的障礙。當這些同志在比中央俄羅斯落後一個整個歷史時代的區域內，在尚未完全消滅中世紀機構的區域內，竟然決心為實行『純粹的共產主義』而作『英勇的努力』的時候，可以自信的說，這種騎兵式的襲擊，這種『共產主義』，是不會有好處的。……簡言之：使落後人民的群眾『馬上共產主義化』的騎兵式的襲擊，必須放棄，而改取周密而深思的逐漸吸引這些群眾加入蘇維埃發展的總軌道的政策。（斯大林：『論民族問題』，中譯本，『抗戰書店』出版，第一四四——一四五頁）

列寧曾再三預告我們，叫我們切記不要『依樣畫葫蘆地應用鬭爭的策略的規則，機械式地劃一這些規則，籠統地把這些規則混為一談』。這些指示，在現時特別正確。因為現時我們所反對的敵人，非常巧妙地、非常狡猾地利用群眾底民族觀念和成見以及他們反資本主義的心理，來替大資本家謀利

益。應當絲毫不差地和從四面八方來認識這種敵人。必須毫不遲延地應付它的各種手腕，發現它的隱藏的步驟，在任何場所，在任何時候，都要準備給他們以迎頭痛擊。甚至於不要怕向敵人學習學習，如果這種學習可以使我們更加迅速地和更加確實地折斷敵人喉頸的話。

如果要給一切國家和一切民族劃定一個關於法西斯主義發展過程的一般公式，那就是大錯特錯。這一種公式，並不能幫助而只能阻礙我們進行真正的鬭爭。這種公式，除了其餘種種弊端而外，還會有這樣的惡果，就是會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一部份人民推到法西斯主義營壘裏去，而這一部份人民，只要我們對他們的態度是正確的話，在某種發展階段上，是可以被我們吸收來進行反法西斯主義的鬭爭，或者至少是可以保持中立的。（季米特洛夫：『爲工人階級底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鬭爭』，季米特洛夫文選，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〇九——一一〇頁）

應當學會與群眾說話，說話時所用的語言，不是書本上的公式，而是爲群眾事業而鬭爭的戰士底語言。這種戰士底每一句話，每一息思想，都要反映出成千百萬群眾底思想和情緒。（季米特洛夫：『爲工人階級底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鬭爭』，季米特洛夫文選，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〇七——一〇八頁）

五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季米特洛夫 論主觀主義、革命空談與革命的實際背道而馳

『能感覺的鋼絲琴，常有這樣的一個神經錯亂的瞬間：以爲牠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鋼絲琴；而宇宙的全諧調，都是在自己內部進行的。』

編者按：這是列寧著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譯本第二一頁）從笛德羅的著作引來的一段話，說明主觀主義是常常會出現的，因爲人們（用鋼絲琴作喻）常常會有這樣的神經錯亂的瞬間，以爲自己就是一切，而一切都全包含在自己主觀裏。

像從來那樣，弱者總是以信仰奇蹟來逃避自己。他們以爲，在想像中把敵人驅除，就已經把敵人征服。他們對於未來，對於他們所打算做而現在還沒有實行的行爲，空洞地讚美着，因而他們就喪失了一切對於現在的理解。（馬克思：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中譯本，解放社一版，第二三頁）

山岳黨大吹大擂地宣告他們將出陣應戰，宣傳比這還要喧鬧的事情，是很少有的。事先就大吹特吹民主主義必然獲得勝利，吹得比這還要有把握和更早的事件，也是很少見的。無疑的，民主黨人相信大喇叭底力量，以爲大喇叭一吹，耶利哥（Jericho）底城牆就會被吹倒了。（同上，第六一頁）

民主黨人承認，有一個特權階級與他們對立，但他們却與國民底其餘一切的人一起構成爲人民。他們所代表的是人民底權利；他們所關心的是人民底利益。因此之故，當鬭爭迫近之際，他們用不着

研究各個不同階級底利益與態度；他們用不着過分仔細考察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只要發出信號，民衆就會以其所有的、無窮的力量，向壓迫者進攻。可是如果實際上顯示出他們底利益別人並不關心，他們的力量，是沒有力量。（同上，第六三頁）

……（民主黨）以為不是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黨必須放棄舊的立場；而是相反地，情勢必須依照他的方向成熟起來。（同上，第六三頁）

自一八〇八年以來，在全歐洲大陸上流行了一種特殊的病，即議會的白癡症。染了這種病的人，迷於想像的世界，失却了一切意識。一切記憶。一切對於外間粗陋世界的理解。（同上，第一〇六頁）

……雖然公社是由勃朗基主義者與蒲魯東主義者組成，但它的行動却常常是完全正確的。……像經常所發生的，當政權落到信條主義者手內時，他們的某些行動却正會同他們學派的信條上所寫的完全相反，這真是歷史的諷刺。（恩格斯：『法蘭西內戰』「引言」，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十三頁）

他們想按自己的理想來改造他們所沒有了解的這些社會關係的企圖和努力，是會不能不遭到失敗的。（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中譯本，蘇聯版，第六四——六五頁）

現時，已經積累了更多的，關於俄國工人運動中各種傾向之力量的客觀材料，必須用全力來蒐集。審查和研究這些不是關於個人或個別集團底而是關於群眾底行動與情緒的客觀材料，從各種各樣敵對的報章上得到的材料，能够使一切有常識的人審查的材料。

只有根據這樣的材料，才能够探討和研究自己階級的運動。無論民粹派，取消派，無論各種知識

份子集團，「前進派」，普列哈諾夫派，托洛茨基派，主要的缺點之一（如果不是唯一主要的話），就是他們的主觀主義。他們把自己的願望，自己的「意見」，自己的估計，自己的「見解」，在每一步上都當作工人底「意志」，工人運動底要求。（列寧：「關於工人運動中各種傾向的客觀條件」，「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五二一——五二三頁）

光耀奪目的不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說話雖然有很多光彩和聲浪，可是沒有絲毫內容。（列寧：「論高喊統一而實則破壞統一的行爲」，「列寧選集」，第七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二二一頁）

把無產階級的策略建築在主觀的願望上，這無異於葬送策略。（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俄四月代表會議上關於時局的報告」，「列寧選集」，第十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四四頁）

如果以抽象的辭句，來代替具體的分析，那麼，這是革命中最主要的罪過之一，最危險的罪過之一。（列寧：「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第一一一頁）

德國「左派」，……他們以爲用幾篇宣言和怒氣沖沖的驚嘆詞句把「反動的」「反革命的」「職工會大罵一頓，便足以「證明」革命家，共產黨人，不僅不需要，而且不容許在黃色的、社會沙文主義的、妥協的、連金派的、反革命的職工會內進行工作。德國「左派」，無論怎樣相信這種策略是革命的，但是實在它是根本錯誤的。其中除空話外，別無內容。（列寧：「左派幼稚病」，中譯本，第三五頁）

……德國「左派」，硬把自己的願望，自己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態度當做是客觀事實。這對於革命家是最危險的錯誤。在俄國，俄皇帝制底壓迫異常野蠻和殘暴。在這種壓迫之下，經過特別長久的

時間，並且在特別複雜的形式之中，產生了各種派別的革命家，而且是非常忠實、熱烈、英勇、堅強的革命家。在俄國，革命家的這類錯誤，我們特別親近觀察過，特別注意研究過，特別知道得清楚。所以別人犯了這種錯誤，我們也看得特別明白。國會主義，在德國共產黨人看起來，自然是「政治上過了時」的，可是問題正在於不要把我們所認為過時的，當作階級也認為過時，當作群眾也認為過時。由此，我們又看出「左派」不會判斷事理，不會以階級底政黨、以群眾底政黨自處。（同上，第五〇——五一頁）

據荷蘭人與「左派」在這裏的議論看起來，他們好像革命底教條主義者，從來不曾參加過真正的革命，或者，從來不曾深刻探究過革命史，或者一味表現幼稚態度，以為主觀上「否認」某個反動機關，便算實際上用許多客觀因素底共同力量，把它破壞了一般。糟踏和陷害一種新的政治的（不僅是政治的）思想之最準確方法，便是為着擁護這種思想而把這種思想弄成荒謬絕倫。因為任何真理，如果說得「過火」（如老狄慈根所說的一樣），大吹特吹，超出了它實際應用的限度以外，便弄成荒謬絕倫，而且在上述情形之下，非弄到荒謬絕倫不可。（同上，第五五——五六頁）

共產主義者要用全副力量，去使工人運動以及一般社會的發展，走上最直接的、最輕便的道路，以便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上得到勝利。這是無可爭辯的真理。然而只要向前多走一小步——似乎這一步依然是照原來的方向的——真理便變成錯誤。只要像德國的和英國的「左的」共產主義者一樣，說：我們只承認一條道路，一條筆直的路，我們不准迂迴、通融和妥協。這便是錯誤，這種錯誤，足以使共產主義受到極嚴重的害處。（同上，第一〇七頁）

「拒絕」參加國會之所以幼稚，就是因為他們想用這樣「簡單的」、「輕易的」、似乎是革命的

方法，去「解決」與工人運動內部的資產階級民主影響作鬪爭這一種困難任務。而事實上，他們只是掩耳盜鈴，只是閉起眼睛不看困難。只是用空話來迴避這種困難。（同上，第一二〇頁）

當我在一次黨的會議上說過，關於革命戰爭的革命詞句，可以危害我們的革命時，人們會責備我爭辯激烈。但是，可有這樣的時機，當着黨與革命均有發生不可挽救的害處的威脅時，便義無反顧直捷了當的提出問題，和就事論事，直言不諱。

當着革命的政黨直接或間接實現着無產階級份子與小資產階級份子的聯系。聯合。交錯時，當着革命事變的行程表現出偉大急速的破壞時——在這些場合下，革命的詞句，往往成爲革命政黨的病態。革命的詞句，是革命口號的重複，而不估計客觀的情況，無視事變之現時的破綻，無視現有事物的現狀。口號是漂亮的，誘人的，醉心的，……却沒有其立足的餘地——這便是革命詞句的實質。（列寧：『論革命的詞句』，『列寧全集』，二十二卷，第二六一頁）

何謂「革命公社」？這個概念與「臨時革命政府」一概念有分別沒有？若是有分別，則分別何在？這是臨時大會派自己所不知道的。他們革命概念的糊塗，如常有的事實一樣，使得他們愛說革命的空調。在社會民主主義代表的決議案中，運用「革命公社」這種名詞，除唱一種革命的空調外，別無他意。這類空調，是無異拿已成過去的「動心奪目的」名詞，以遮蓋未來的任務，會爲馬克思歷次非難的。在歷史上有過作用的漂亮名詞，在現時却成了空洞而有害的瞎說，小孩玩的衝天炮。（列寧：『兩個策略』，『列寧選集』，第五卷，第一一四頁）

你們說：德人不能進攻。根據你們的策略，會應該可以宣佈戰爭已經停止。而歷史却教訓了你們。歷史推翻了這個幻想。不錯，德國革命有發展，可是它的發展情況，並不如我們的願望一般，並不具

有使俄國知識份子們高興的那樣迅速，並不具有俄國歷史在十月時所已經造成的那般速度，——當時，我們無論走到那個城市，宣佈蘇維埃政權，幾天之內，十分之九的工人都到我們方面來了。德國革命，不幸沒有這種速度。而誰應該顧及誰呢？我們顧及它，還是它顧及我們呢？你們會希望它顧及你們，可是歷史却教訓了你們。（列寧：『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報告』，『列寧選集』，十三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四六頁）

我們不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也許社會主義革命，在幾個星期以後，甚或幾天以後，就會勝利，——這是完全可能的，——可是我們終不能拿這一點來冒險賭博。我們應該準備好，應付非常的困難，應付不可避免的非常嚴重的失敗。其所以不可避免，是因為歐洲革命那怕明天就可以開始，可是終於還沒有開始。（同上，第四七頁）

現在也是一樣，如果告訴民衆，說德國國內戰爭會到來，同時你擔保，說會有全盤的世界革命，而不是與帝國主義衝突；那麼，民衆會說你欺騙他們。這樣，你只是在自己的了解中，在自己的願望中，去跳過歷史已造成的那些困難。如果德國無產階級能發動起來，這就好了。你們是否測量過，你們是否已經找得一種儀器來測定，德國革命會在那一天發生？不，你們不知道，我們也不知道。你們把一切事情都拿去冒險賭博。如果革命發生，則一切都得挽救。這是當然的。可是如果革命並不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發生，明天革命還不會勝利，——那時怎樣？那時群眾會向你們說：你們的行動和利己主義者一樣，——你們把一切事情都冒險放在對於事變底幸運進程的希望上，而這個進程沒有到來，結果竟是你們不能適應於那代替世界革命而已經到來的那種境遇的人，這個世界革命會必然到來，可是目前它還沒有完全成熟。（同上，第五〇——五一頁）

親愛的！我講給你們聽，爲什麼你們會弄出這個不幸的事體，這是因爲你們對於革命口號多是背誦死記，而少加思索。因此，你們將「防護社會主義祖國」這句話，放在括弧內。這個括弧大概是要表示你們試作譏諷。可是這個括弧，事實上正表示你們思想糊塗。你們習慣了認爲「護國主義」是醜陋的和可鄙的東西，你們背誦了死記了這一點，你們把這一點記得如此爛熟，以致你們中間有些人弄得這樣荒謬，以爲防護祖國在帝國主義時代是不可容許的（實際上，正只是在資產階級所舉行的帝國主義的。反動的戰爭中，防護祖國才是不可容許的）。你們沒有仔細想到：「護國主義」爲什麼並且在什麼時候才是醜陋的。（列寧：「論「左」稚病和小資產階級性」，「列寧選集」，第十三卷，第一二八頁）

親愛的「左派共產主義者」，他們底堅決性怎麼多……而思考力怎麼少！……可是關鍵也就在於：要由國有化與沒收過渡到社會化，那怕有世界最大的「堅決性」，都是不夠的。（同上，第一三〇頁）

據現時的勞動條件看來，這個任務（指國家經濟的內部組織任務——編者），絕對不能用「烏拉！」來解決，如我們過去解決了國內戰爭的任務一樣。（列寧：「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報告」，「列寧選集」，第十三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三七頁）

這裏我們絕對不能（由於客觀情勢之故）只限於揚着旗幟的勝利遊行，和我們過去反對加列金的辦法一樣。（同上，第三八頁）

我們當時要由勝利遊行的時期，轉入情形非常困難非常艱苦的時期，而這種情形，當然不能用空話和漂亮的口號來搪塞——雖然這樣做法是很快意的。……（同上，第四一頁）

我們喊一聲「烏拉」，是不能打敗德國強盜的，不能如我們對付克倫斯基和郭尼洛夫一樣。（同上，第四八頁）

我們不需要瘋狂般的一陣熱潮。我們需要無產階級鐵軍底整齊的步伐。（列寧：「蘇維埃政權底迫切任務」，「列寧選集」，第十三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一七頁）

共產主義的誇大狂，這就是這樣的一種人，這種人加入了共產黨而沒有被清洗出去，在那裏設想，以爲他用共產黨的名義來發號施令，就可以解決他自己的一切任務。（「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五〇——五一頁）

一般的講來：「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我們國家內，藉它的幫助實現一階級的政權，即無產階級的政權，是一種異常複雜的制度。我知道，有些同志不喜歡這樣的複雜情況，不合他們的口味。我知道在他們中間有很多同志抱着「少費力主義」，願意在簡而又易的制度下過生活。有什麼辦法呢？第一，列寧主義，須應用真正的列寧主義（絕不能簡單庸俗化）；第二，歷史告訴我們，凡是最簡單的最容易的「理論」，不一定是最正確的理論。（斯大林：「關於工農政府問題」，「斯大林選集」，第三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七頁）

（69）……有一種船夫，船划的非常努力，弄得汗流滿臉，可是他們不知道波濤會把他們沖到什麼地方去；這樣的船夫你們看到過麼？我在葉尼賽河會看到過這樣的船夫。這是一種忍苦耐勞的船夫。可是他們最不幸的地方，就是他們看不到而且不願意看到驚濤駭浪會把他們沖到海礁上去，會使他們觸礁而死。我們黨內有些同志也是這樣。他們只知道不息手地工作，盲目地隨波逐流，可是潮流會把他們沖到什麼地方去，他們不但不知道，而且簡直不願意知道。沒有舵，沒有帆，沒有遠景，只是順水漂

浮，——這就是我們有些同志的願望。結果會怎樣呢？結果是很明顯的：起初，他們身上漸漸生起了銹，後來，就一點點變成灰色的人，然後，就漸漸向庸人的泥沼中墮落下去，然後，他們就完完全全變成了庸人。這就是真正墮落的道路。（斯大林：「聯共中央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同上，第二二二——二三三頁）

爲什麼反對派在整個黨內，在整個工人階級中間，竟能陷於這一種孤立的地位呢？要知道反對派的首領都是那些鼎鼎大名的善於宣揚自己的人物，（會場上的叫聲：「對呵！」）都是些不怕難爲情的、（拍掌）善於自傲的吹牛大家。爲什麼他們這樣孤立呢？因爲反對派的領袖人物，都是些離開了實際、離開了革命、離開了黨、離開了工人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拍掌）（同上，第二二五頁）

新反對派底領導人，在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聯席會議上說話的時候，完全避開了關於我們國內的階級變動問題，一句話也沒有說到關於階級鬥爭底尖銳化，絲毫也沒有暗示說到我們的意見分歧正是與這種階級鬥爭底尖銳化有聯系的，——同志們，你們是不是感覺到了這一點呢？他們講到了所有的事情，也講了哲學，也講了理論，但是，却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到那些在現時決定着我們黨底方針和實際工作的階級變動。爲什麼會有這樣的怪事情呢？也許是因爲他們有健忘病罷。當然不是的！政治家是不會忘記主要的東西的。這是因爲，他們看不見和不了解現在我們國內以及資本主義各國所發生的新的革命過程。這是因爲他們忽略過去了主要的東西，忽略過去了政治家所不應忽略過去的階級變動。本來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新反對派一遇到我們黨底新任務，就表示張皇失措和空拳無力的樣子。（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斯大林選集」，第四卷，中譯本，「解

放社一版，第二頁)

尤其是像我們黨這樣的政黨，因為它的力量和威信，差不多大得無法估量了。這裏很可以發生共產主義的誇大狂。這種誇大狂，列寧會無情的反對過的。這裏很可以發生相信命令、決議、吩咐的萬能的情形。實際上，在我們這樣廣大的國家裏，在某個小地方上，很可以發生一種危險，就是把黨的革命的措施變為黨代表們的、空洞的、官僚式的命令。我所說的不僅是地方上的工作人，而且連各州的工作人甚至於中央的某幾個委員也在內。(斯大林：『給集體農場工作的同志們的答覆』，『斯大林選集』，第四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四〇頁)

他們(按指全盤集體化時期的『左』傾性急者——編者)大喊進攻，但是進攻那個階級，聯合那個階級呢？我們聯合中農，進攻鄉村中資本主義份子，因為只有這樣的進攻，才能得到勝利。但是，倘若在黨的各別隊伍興高采烈、一味進攻的時候，進攻開始離開了正確的道路，把火力轉向了我們底同盟者中農，那時候怎樣辦呢？難道我們是什麼進攻都要的，而不是要聯合一定的階級向另外一定的階級進攻嗎？

董·吉訶德(小說裏的一個人物)和風磨比武，自己也說他這是進攻敵人。但是大家都知道，他這種進攻的結果倒把自己的腦袋碰破了。

大概，董·吉訶德的榜樣，使我們的『左』傾份子羨慕得覺都睡不成了。(同上，第一四四頁)

人們在辦公室內坐着，自鳴得意地寫東西，殊不知集體農場是在官僚主義底辦公室以外發展着。

(斯大林：『論農村中的工作』，『斯大林選集』，第五卷，第六二頁)

……有這樣的危險，就是我們的有些同志中間，有些人會因勝利而神魂顛倒，完全自驕自傲起

來。並會用吹牛皮的論調來催眠自己，說什麼『我們現在覺得大海也不過深到膝腿』，說什麼『我們現在已經所向無敵了』等等。同志們，這種危險並不是絕對沒有的。再沒有比這種心理更危險的了。因為這類心理，可以解除黨的武裝和解散黨的隊伍。（斯大林：『聯共中央在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斯大林選集』，第五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七九——一八〇頁）

撤銷那些破壞黨和政府決議的人、求名不求實的人以及說空話的人底職位，提拔新的人，——會辦事的人，能夠對所負責的工作保證有具體領導的人來代替他們；加強黨和蘇維埃的紀律。（斯大林：『聯共（布）中央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與大會決議』，『斯大林選集』，第五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七三頁）

我所指的，是一種說空話的人，我可以說，這些誠懇的說空話的人。（笑聲）是誠懇的。是忠於蘇維埃政權的人，但是沒有能力來領導，沒有能力來組織什麼事情。去年，我曾經和這樣一個同志談過話，這個同志是很可尊敬的一個同志，但是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說空話的人，他能夠把任何一件活潑潑的事情沉沒在空談中去。請看這篇談話：

我問：你們那裏的播種事情，辦得怎樣呢？

他答：關於播種事情麼？斯大林同志！我們已經動員起來了。（笑聲）

我問：那麼，又怎麼樣呢？

他答：我們曾經直接了當地提出問題。（笑聲）

我問：那麼，後來又怎樣呢？

他答：我們的工作有轉變，斯大林同志，很快就要有轉變。（笑聲）

我問：究竟怎樣呢？

他答：在我們那裏有着進步。（笑聲）

我問：究竟怎樣，你們那裏的播種事情辦得怎樣？

他答：我們那裏的播種事情，暫時還毫無頭緒哩，斯大林同志。（全場大笑）

這就是說空話的人底面目。他們動員起來了，直截了當的提出了問題，他們既有轉變又有進步，而事情終究它還是停頓着。

不久以前，一個烏克蘭的工人所說過的那個組織底狀況，也與上面的情形一模一樣。有人問這個工人在這個組織中是否有路綫，他回答說：「怎辦，路綫……路綫當然是有的，只是工作看不見」。

（全場大笑）很明顯的，這個組織也有自己的、誠懇的、說空話的人。

當撤換這種說空話的人底職位，派他們遠遠離開行動工作的時候，他們便擺開兩手而帶着驚奇的神氣說道：「爲什麼撤銷我們？難道我們沒有做了對於事情所必需的一切事情，難道我們沒有召集突擊隊員底集會，難道我們在突擊隊員底代表會議上沒有宣佈黨和政府底口號，難道我們沒有選舉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爲名譽主席團，（全場大笑）難道我們沒有向斯大林同志送祝詞，——你們還要我們做什麼事情呢？」（全場大笑）

（ 73 ）

怎樣對付這些不可救藥的說空話的人呢？如果把他們留在行動工作上面，他們能够把任何一件活潑潑的事情沉沒在滔滔不絕底說話底洪水裏面，很明顯的，應當把他們從領導的地位上撤銷，叫他們去做其他的、不是行動的工作。說空話的人是沒有做行動工作的資格的。（喊聲：「對呀！」鼓掌）

（同上，第一七四——一七六頁）

在目前的環境中，關門主義，或如決議草案上所稱呼的自滿自足的關門主義，首先是妨礙我們爲實現統戰綫的鬭爭。——這種關門主義，用信條主義的狹隘觀點以脫離群眾底實際生活，而自滿自足。它根據千篇一律的格式，用簡單化的方法，來解決工人運動裏的極複雜的問題，而自滿自足。自己以爲全智全能而不必向群眾學習，不必研究工人運動底教訓。總而言之，這種關門主義，以爲他自己可以一手撐天。自滿自足的關門主義，不願意而且也不能夠了解，共產黨對於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是不可以自然而然的得來的。共產黨在工人階級鬭爭裏的領導作用，是要努力爭得的。要做到這點，就不要空談什麼共產黨人底領導作用，而要用自己日常的群眾工作和正確的政策，博得工人群眾底信仰。而爲要作到這一層，那麼，我們共產黨員就一定要在我們的政治工作中認真顧到群眾階級意識底實在的水平，顧到他們革命底程度，就一定要拿冷靜的態度，不是根據我們的願望而是根據實在狀況，來估量具體環境。我們應當一步一步地耐心地幫助廣大群眾走到共產主義立場上來。我們絕對不要忘記掉列寧底嚴厲的警告。他說：

『一切不要把由我們看來已經是失去作用的東西，當作由階級看來也已經是失去作用的東西，當作由群眾看來已經是失去作用的東西。問題底中心，即在於此。』（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見『列寧全集』，第二五卷，第二〇二頁）

同志們！現在我們隊伍當中，還有許多到處都把統一戰綫政策看作只是危險的信條主義者哩。在這些同志看來，整個統一戰綫，都不過是一團危險。而其實，這種關門主義者底原則精神，不過是證明，他們害怕直接領導群眾鬭爭的困難，而絲毫沒有克服困難的政治本領。

關門主義特別是表現在誇大群眾革命化的程度，誇大群眾離開改良主義立場底速度，企圖跳過運

動的困難階段和複雜任務。在實際工作中，往往用領導狹隘黨組的方法來代替領導群眾的方法。群眾與自己的組織及其領導機關是有傳統的聯系；而我們的關門主義者却輕視了這種傳統聯系的力量，在群眾還沒有一下子就打斷這種聯系的時候，却很激烈地對待這些群眾，也好像對待他們的反動領袖一樣。在各國都應用千篇一律的策略和口號，而沒有顧到每個國家裏的具體環境底特點。忽視在群眾當中進行耐心鬭爭以爭得群眾信仰的必要，藐視爭取工人局部要求的鬭爭和在改良工會和法西斯蒂群眾組織裏的工作。往往用空洞的號召和抽象的宣傳來代替統一戰綫政策。

同時關門主義的立場還妨礙了正確挑選人材。教育培養幹部的工作，妨礙我們教育與培養這樣一種幹部，這種幹部與群眾有密切聯系，得到群眾的信仰，富有革命的堅定性，在階級鬭爭中間受過審查，善於將群眾工作底實際經驗與布爾塞維克底原則堅定性配合起來。

這樣一來，關門主義就非常阻礙了共產黨底增長，妨害了真正群眾政策底進行，阻礙了我們利用階級敵人底困難以鞏固革命運動底陣地，阻礙了爭取無產階級廣大群眾到共產主義方面來的事業。

我們應進行最堅決的鬭爭來剷除和消滅自滿自足的關門主義底餘毒。同時我們應當盡量加緊防備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它的一切具體表現。因為我們知道，在統一戰綫廣泛發展的過程中，右傾機會主義會跟着增長起來的。而且現在就已經有這樣一種傾向，就是降低共產黨在統一戰綫隊伍中的作用，以及與社會民主黨的思想表示調和。切不要忘記：統一戰綫策略乃是用具體例子來說服社會民主黨工人，使他們相信共產黨政策是正確的和改良派政策是不正確的一種方法，而並不是與社會民主黨思想和實踐的調和。為要使建立統一戰綫的鬭爭得到成效，就一定要在我們的隊伍裏經常反對降低

共產黨作用的傾向，反對合法主義的幻想，反對那些以為法西斯主義會自動消滅和統一戰綫會自行實現的自發論和自動論，反對決定勝負時的任何動搖。（季米特洛夫：『爲工人階級底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鬪爭』，『季米特洛夫文選』，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九二——九五頁）

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有些人往往寧願用一些只是會寫漂亮文章，說漂亮話，不能做事情，不能作鬪爭的人；却不願意提拔真正的優秀同志。這些優秀同志，也許寫得沒有那樣好，說得沒有那樣漂亮；可是，却有堅定的意志。創作的精神，與群眾有密切的聯繫，善於進行戰鬪而且還善於引導別人去鬪爭。（鼓掌）關門主義者，信條主義者，清談主義者，把忠實的群眾首領真正工人的領袖排擠掉的事實，難道還少麼？（同上，第一三八頁）

六 列寧論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與怯懦的改良主義

我最近瀏覽了蘇哈諾夫所寫的『革命隨筆』。特別觸目的，是我們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全體以及第二國際底英雄們全體所有的迂腐。他們非常怯懦，如果與德國的模型稍微不同時，連他們當中最傑出的人物，也提出一些瑣瑣屑屑的保留，以保衛自己；——這種特性，是一切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所共有的，在整個革命過程中，他們隨時隨地都表現出這種特性。除了這種特性之外，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他們對於過去之卑劣的模仿。

他們都自稱爲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之見解，是極度迂腐。馬克思主義中最主要的東西，即其革命的辯證法，他們是完全不能理解的。馬克思所說得很明白的話，即，在革命時候是

需要最高度的機動性※，他們沒有理解，甚至連注意也沒有注意到。例如，馬克思在他所寫的一封信中——我想是在一八五六年寫的——表示希望德國的農民戰爭——它會造出一個革命的局面向來，——與工人階級運動結合起來；連這句直截的話，他們也逃避着，好像一隻貓在一碟熱粥四周逡巡而不敢接近一樣。

他們的全部行爲，顯出他們是怯懦的改良主義者，他們害怕離開資產階級，更不要說與資產階級決絕。他們同時又濫用修辭與誇張，以掩蓋他們的怯懦。但，即使是從純粹理論的立場來看，他們全體有一點最惹人注意的，就是他們完全不能把握下面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要點：他們已看到了西歐的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底發展之一定途徑；但他們所完全不能把握的，就是，只有加以某些修改（從世界歷史底立場看來，這些修改是完全無關重要的），才能把這一途徑當做一個模範。

第一——與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相關的革命。這樣的一個革命，必定有新的特色或變更，這些新特色或變更是戰爭本身所產生的。因為世界從沒有看到這樣的戰爭，也從沒有處於這樣的局面。我們看到：最富的國度底資產階級，在戰爭之後，一直到今日，還不能建立「常態」的資產階級的關係。可是，我們的改良主義者，冒稱爲革命家之小資產階級者，却曾把常態的資產階級關係，視爲不能超

※ 馬克思於一八七一年「法蘭西內戰」一書上有過這樣的話：「公社會有過政治的形態最高度的機動性」。同樣馬克思致顧格曼論巴黎公社的信上也說：「這些巴黎人，是有何等的機動能力，何等的歷史的創造力，何等的自我犧牲的能力呵！」

越的界限，現在還是這樣看。而且，連他們對於「常態」之見解，也是極陳腐的和狹隘的。

第二——世界歷史的發展，就整個來說，是遵照一般的法則，但這並不是說，發展的某些時期，其發展形態或發展秩序，不能有特色，恰恰相反，是假定各時期各有其特色，——他們對於這個思想，是完全不懂得。例如，他們甚至沒有看到：俄國是站於文明國與那些由這次戰爭才把他們確帶上文明軌道的國度——即，一切的東方的、非歐洲的國度——之界綫上，所以，俄國可以而且也是必定顯出某些特色，俄國雖然是必定遵循着世界發展底總路綫，但它的革命與西歐各國以前的一切革命不同，在到東方各國的路途中輸入了一些些新奇的部份的特色。

他們以毫無根據的語調，就是在西歐社會民主主義底發展時期所死記的議論，說我們還沒有到實行社會主義的成熟期，或者，如他們的某些「博學的」人物所說，實行社會主義之客觀的經濟的前提，我國還不具備；——這個議論是陳腐極了。他們從沒有任何人在腦袋中發生這樣的問題：有一國人民，處於像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那樣的革命局面，因感到處境之絕望，而起來奮鬥，這個鬥爭至少給他們有一些機會可以取得使文明往前發展之條件（就使那些條件與通常的條件是不很相同）。

「俄國底生產力發展水準，還沒有達到使社會主義可能實行之程度。」——第二國際底英雄，蘇哈諾夫當然包括在內，都以這個命題自傲，像孔雀那樣的驕傲。他們用許許多多不同的語調，重複申說這個毫無爭辯餘地的命題，他們以為這就是對於我們的革命作估價時的決定的要點。

但如果特殊情況，把俄國首先捲入世界帝國主義戰爭——這次戰爭把西歐的稍微重要的國度都捲進去了——那就怎樣呢？如果特殊情況使俄國底發展——其發展與東方才開始的及已部份開始的革命

極接近——置於這樣的局面，我們能够完成一農民戰爭，與工人階級運動之聯盟（而這正是馬克思自己這位「馬克思主義者」在一八五六年論及普魯士時所寫的，把它作為可能的前途之一），那就怎樣呢？

如果局面底完全絕望，把工人和農民底力量加強十倍，因而使我們有可能進行創造文明底基本必要條件，而進行創造之方法，則與西歐各國不同，那就怎樣呢？有沒有變更了世界歷史底發展底總路綫呢？有沒有變更了各國——這些國度正被或已被拉上世界歷史底總過程——底各國基本階級之間的基本關係呢？

如果要建立社會主義，是需要一定的文化水準（雖然沒有一個人能說出那個一定的文化水準是什麼），為什麼我們不能先開始以革命的方法，完成那個一定的文化水準所需的必要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而趕上別國呢？

你們說要建立社會主義須有文明，很對。但為什麼我們不能先開始在我國中創造這些文明必要前提，如驅逐地主與驅逐俄國資本家，隨後出發向社會主義前進呢？在什麼地方，在那一本書，你們讀到了說事件底向來的先後秩序，這樣變更，是不許可的，或不可能的呢？

（ 79 ）
我們記得拿破崙曾寫過這樣的一句話：「先從事戰鬥，然後看看發生什麼事情。」是的，我們在
一九一七年十月先專心從事戰鬥，然後才注意發展底細節（從世界歷史底立場看來，它們却是些細節），如「布列斯特和約」、新經濟政策等等。現在，我們在大體上已得到勝利，這是不能有什麼疑問的了。

我們的蘇哈諾夫，更右傾的社會民主黨用不着說，連夢想都沒有夢想到不這樣就完全不能進行革

命。我們的小資產階級，連夢想都沒有夢想到東方的國度，有更多的人口，有更多種的社會狀態，其革命也一定有比俄國革命更大的特色。

考茨基式的教科書，在它那個時代，是很有用；這是不着說的。但如以為這本教科書預見到後來的世界歷史底發展底一切形態，把這樣的一個觀念拋棄的時候是確已到來了。現在已該宣佈：那些作如此想的簡直是笨伯！（列寧：『我們的革命』，見『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三七三——三七七頁）

七 馬克思、列寧、斯大林論革命的馬克思

主義與客觀主義及自發論、自流論

蘇俄只限於對政變底負責的發動人（原文爲出版者）加以辛辣而銳敏的個人的攻擊。事件本身，在他的著作中，描寫成宛如晴天霹靂。他把這事件只看作是一個個人方面底暴行。他沒有注意到，他對這個個人加以全世界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個人發動力，並沒有使這個個人渺小，反使這個個人偉大起來了。蒲魯東呢，他又力謀把政變敘述成爲以前的歷史發展底結果。可是，他本人却不知不覺將政變底歷史的描寫，轉化成爲對於政變主人翁底歷史的辯護。這樣，他就陷入於我們的所謂客觀的歷史家之錯誤裏面了。相反地，我證明：法國的階級鬥爭會怎樣的造成了種種情況和關係，這些情況和關係，遂使一個平凡而且可笑的人物得以扮演英雄的角色了。（馬克思：『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九頁）

馬克思底學說，把階級鬭爭底理論與實踐融合起來，成爲一個不能分開的整體。這個學說，對客觀情況作冷靜的陳述，如果有人把他曲解成爲對現存制度之辯護，而且他每遇革命暫時低落，就想趕快適應環境，立即拋棄「革命的幻想」，而轉向於「現實的」修補工作，那他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列寧：「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二九——一三〇頁)

我們對於○·司徒魯威反對○·米海洛夫斯基的一個責難，是不能不提出異議的。他說：「按他的觀點，不可克服的歷史趨勢是不存在的，這種歷史趨勢，如其爲歷史趨勢，一方面，應該成爲個人和各社會集團底合目的的活動之出發點，別一方面，亦應成爲個人和各社會集團底合目的的活動之當然的界限。」

這是客觀主義者底語言，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唯物論者)底語言。在這兩個概念(兩個觀點體系)之間是有差別的，對於這一差別，應當說一說，因爲在司徒魯威底多數議論中，對於這一差別底沒有充分的說明，這是他的著作之基本缺點。

客觀主義者是說一定的歷史過程之必然性；唯物論者則是確切地說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及其所產生的各種對抗關係。客觀主義者在證明特定的一列事實之必然性時，總是甘冒墮入這些事實辯護者觀點之危險；唯物論者則是揭開各種階級的矛盾，而以此來決定自己的觀點。客觀主義者是說「不可克服的種種歷史趨勢」；唯物論者則是說那「管理、特定的經濟秩序而造成其、他諸階級之某種反對作用形態的階級。這樣，唯物論者，一方面是比较客觀主義者更澈底些，而更深刻，更完全地貫徹自己的客觀主義。他不限於指出過程之必然性一點，而是究明，正是怎樣的社會經濟結構給這一階級以內容，正是那一階級決定這一必然性。在該場合之下，譬如，唯物論者是不以指出「不可克服的種種歷史趨

勢」爲滿足的，而要指出那些特定階級之存在，這些特定的階級決定特定秩序之內容，並排斥越出生產者自身行動以外之可能性，別一方面，唯物論本身則包含有所謂黨性，在對事件作任何估計時務須要正面而公開地站在一定的社會集團之觀點上面。（列寧：『民粹派之經濟內容與司徒魯威』書中對它的批評），『列寧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五——二七六頁）

非黨派性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黨派性是社會主義的思想。這命題，是可以照樣適用到資產階級社會全體去的。對於個別部份的問題及部份的場合，也不消說是應該把這一般的真理適用進去。『列寧：『社會主義的黨和非黨派的革命』，錄自中譯本『新哲學大綱』，第一六二——一六三頁）

我們已經講過，我們必須用以前七十年代那樣奮不顧身的決心與毅力，來鼓舞我們現時比七十年代時廣泛深入得多的運動。真的，直到現在，大概還沒有一個人否認現代的運動底力量乃是群眾。主要的是工業無產階級之覺醒，而其弱點却是領導者——革命家覺悟性與主動性之不够。

但是最近以來，却有人作了一個『天翻地覆』的發明，使從來在這個問題上佔優勢的一切觀點，都有被顛倒的危險。這就是『工人事務報』底新發明。『工人事務報』在同『火星報』和『曙光雜誌』作論戰的時候，並不只作局部的反駁，而是想把『一般的分歧』歸結到比較有更深刻根源的分歧，即是說，『對於自發成份和覺悟「計劃」成份之對比意義有不同的估計』。『工人事務報』的控訴狀是：『發展過程序中客觀成份的意義或者說是自發成份的意義被減輕了』。我們對這個控訴狀的答覆是：假使『火星報』及『曙光雜誌』對『工人事務報』的論戰，除了激起『工人事務報』想到這種『一般的分歧』之外，竟完全沒有得到任何其他的结果，那麼，單是這一個結果也已經使我們很滿意了：『工人事務報』底這一個控訴狀底意義是何等的重大，它把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的現時理論

和政治分歧底全部實質說得何等明顯啊。

正因為如此，關於覺悟性與自發性的關係問題就有一般的重大意義，而我們就應當十分詳細來說說這個問題。

我們在前章中已經講過：在九十年代中葉，俄國受過教育的青年都風行一時地傾心於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大約就在那時候，在一八九六年有名的彼得堡工業戰爭以後，工人的罷工，也同樣是風行一時，這些罷工普及於全俄，這很清楚地證明重新高漲起來的民衆運動是多麼深刻。假使真的要說什麼「自發的成份」，那麼，首先自然就應把這種工人運動認爲自發的運動。但須知自發性也有各種各樣的。在七十年代以及六十年代（甚至在十九世紀前半期），俄國都有過罷工，罷工的時候，工人「自發地」起來毀壞機器等等。九十年代時的罷工與這些「騷動」比較起來，甚至可以稱爲「覺悟的」罷工，由此可見在這時期內，工人運動已有如何長足的進步。這表明給我們看：「自發的成份」實際上無非就是覺悟性的雛形。而且原始的騷動也已經表現了一些覺悟性的激發：工人已經不復相信壓迫他們的那個制度是牢不可破的，他們已開始覺得……（我不說他們已經開始明瞭）必須共同起來反抗，因此他們就堅決拒絕向上司作奴隸式的服從。但這種情形與其說是鬭爭，不如說是掙扎與報仇底表現。九十年代的罷工，其覺悟性的色彩就明顯得多了：工人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事先計算便於鬭爭的時機，討論別處發生的事情和實例等等。騷動不過是一般被壓迫者的奮起，而有系統的罷工就已經是階級鬭爭底萌芽了，但只不過是一種萌芽而已。這些罷工，就其本身講來，還是工聯主義的鬭爭，還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鬭爭，這些罷工還只是勞資對抗底表現，但是工人那時還沒有（而且也不能）覺悟到他們的利益是與現代整個社會政治制度勢不兩立的形勢：就是說，他們那時還沒有而且也不能有

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在這一個意義上講，九十年代的罷工，雖然比較過去的「騷動」要進步得多，但終究還是一種純粹自發的運動。

我們已經講過，工人那時還不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當時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歷史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如果單靠自己的力量，就只能培養出工聯主義的意識，就是說只能培養出一種信念，即認為必需要組織工會，必須與業主作鬥爭，必須要求政府頒佈某些人所需要的法律等等。社會主義學說，則是從有產階級中受過教育的人——知識界所創造出的哲學的、歷史的、經濟學的理论中產生出來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底創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其社會地位來講，也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界。俄國也是如此，俄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學說底產生，完全是與工人運動之自發增長無關的，它的產生，乃是革命社會主義知識界底思想發展之自然的和必然的結果。在我們所講的這個時期底前夜，即是說在九十年代中葉底前夜，這個學說不僅成了勞動解放社已經完全形成的綱領，而且已經獲得俄國大多數革命青年底擁護。

這樣看來，當時一方面既有工人群眾底自發的覺醒，趨於覺悟生活和覺悟鬥爭的覺醒，另一方面又有以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做武裝並力謀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同時，特別應當指出一件往往被人忘記的（而且比較不大著名的）事實：這一個時期的第一批社會民主黨人，雖曾熱心從事經濟鼓動（在這一點上，他們會完全注意到當時還沒有付印的「論鼓動」這本小冊子中許多真正有益的指示），但他們不僅沒有把經濟鼓動當作自己唯一的任務，而且相反，他們一開始就提出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一般的最重大的歷史任務，特別是推翻專制制度的任務。譬如，在彼得堡創立了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社的那些社會民主黨人，還在一八九五年末就編好了第一期「工人事業報」。但是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

夜裏，當這期報紙已經準備付印的時候，却被憲兵從工人階級解放鬪爭社社員瓦涅夫手上奪去了。因此初次創辦的「工人事業報」就沒有能够出版問世。該報底社論（也許再過三十年之後，會有什麼俄國古董研究雜誌，要從警局檔案庫中找出它的原稿來），說明了俄國工人階級底歷史任務，而且把奪取政治自由的任務當作這些任務中的首要任務。其次還有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我國總長們所想到的是什麼，是敘述警察如何摧殘識字運動委員會的，此外又有許多彼得堡和別地的通訊（如「雅羅斯拉夫省工人流血記」）。這樣看來，九十年代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第一次嘗試」（要是我們沒有記錯的話），並不是狹隘地方性的，更不是「經濟主義」性的報紙，而是一種想把罷工鬪爭同反專制的革命運動聯絡起來，想吸收一切被黑暗反動政治所壓迫的人們來援助社會民主黨人的報紙。誰要是稍微知道當時運動底實況，他就會相信，這種報紙當時定會得到首都工人和革命知識份子底同情，定會有極廣泛的傳播。這件事情之受到挫折，只是證明，當時社會民主黨人因爲缺乏革命經驗和實際準備的緣故，未能滿足當時迫切的需要。聖彼得堡工人小報，尤其是工人報和一八九八年春季成立的俄國社會民主黨所發表的宣言，也是如此。當然，我們絕不是想把這種經驗不夠的現象歸咎於當時的活動人物。但是爲要利用運動的經驗和從這個經驗中得到實際的教訓，我們就必須澈底了解各種缺點底原因和意義。因此絕對應當指出，在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八年活動的一部份（也許甚至是大多數）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在「自發」運動一開始時，就已認爲可以提出極廣泛的綱領和鬪爭的策略，這是完全正確的。

當時大多數革命者之缺乏經驗，乃是極自然的現象，並未能引起我們任何特別的顧慮。既然任務是提得正確的，既然有毅力能再三企圖實現這些任務，那麼暫時的挫折只是小小的不幸。革命的經驗

和組織方法的靈巧，是可以學會的東西。只要有替自己造就應有品質的熱心就是了！只要一覺悟到自己的缺乏，這在革命事業中就等於改正一大半！

可是當這一覺悟性削弱下去的時候（而這一種覺悟性在上述各集團的活動者中間會很活躍地存在着），當一部份人（甚至社會民主黨人的機關報）想把缺點推崇為美德，甚至想給自己的盲從與崇拜自發性的行為打下理論基礎的時候，這個小小的不幸，就變為真正的大不幸了。現在已經是給這個傾向（人們用「經濟主義」這個概念來表示這傾向的內容，是很不切當的，因為這個概念太狹隘了）作一總結的時候。（『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三——三八七頁，摘錄『做什麼？』一九〇二年）

……自發論——是機會主義的理論，是崇拜工人運動自發性的理論，是實際上否認工人階級先鋒隊——工人階級政黨——領導作用的理論。

這種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工人運動底革命性質，反對使工人運動向着反對資本主義基礎的方向進行。它主張工人運動完全只向着那些為資本主義所『可以履行』，『可以接受』的要求那方面進行；它完全主張採取『阻力最小的路線』。自發論是工聯主義底思想。

這種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使自發運動帶着覺悟的和有計劃的性質。它反對黨走在工人階級前面，反對黨把群眾提高到覺悟的程度，反對黨領導運動。它主張運動中的覺悟份子不要妨礙運動按照自己的道路前進，它主張黨只聽從自發運動，做這種運動底尾巴。自發論是減低覺悟份子在運動中的作用理論，是『尾巴主義』底思想，是一切機會主義底邏輯的基礎。

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以前，這個理論就已經出現於舞台了，這個理論，其實際結果，就使它的信徒，所謂『經濟派』，否認在俄國有獨立的工人政黨底必要，反對工人階級為推翻專制制度而進行的

革命鬭爭，鼓吹運動中的工聯主義的政策，總而言之，把工人運動交給自由資產階級去領導。

舊「火星報」的鬭爭和列寧在「做什麼？」一書上對「尾巴主義」理論所作的精彩的批評，不僅打倒了所謂「經濟主義」，而且還創造了俄國工人階級底真正革命運動底理論基礎。

假如沒有這種鬭爭，當時就莫要想在俄國來創造獨立工人政黨，就莫要想由這個政黨在革命中起領導作用了。

但是這種崇拜自發性的理論不僅是俄國的現象。它在第二國際所有一切政黨裏都是廣泛流行的，雖然表現的形式是稍微有些不同。我所指的是第二國際首領們所慣用的所謂「生產力」論。

這個理論辯護一切，調和一切，它當某些事實早已為大家聽得討厭以後，才把它們指出來並加以解釋，指出以後，它就安心下去了。馬克思說：唯物主義的理論不能只限於解釋世界，它還應該改造世界。但是，考茨基和他的伙伴們却不管這一點，他們寧願停留在馬克思公式底前半段上。請看他們實際應用這個理論中的許多例子之一吧。他們說，在帝國主義戰爭前夜，第二國際底政黨曾經發表恐嚇的言論，說假如帝國主義者開始戰爭，他們便宣佈「以戰爭對付戰爭」。他們說，在戰爭正要開始的時候，這些政黨就把「以戰爭對付戰爭」這個口號拋在腦後，而實行了一個相反的口號——「為帝國主義的祖國而戰爭」。他們說，因為這樣變更口號的結果，使幾百萬工人犧牲了性命，但是如果以為這裏有什麼人犯了罪過，某人叛變了或出賣了工人階級，那都想錯了。絕對沒有過這樣的事情！所有這些已經發生的事情，都是必然要這樣發生的。第一，因為第二國際是「和平底工具」，而不是戰爭底工具。第二，因為在當時所有的那種「生產力底程度」之下，再沒有別的辦法可想。這是一「生產力」底「罪過」。考茨基先生底「生產力論」正是這樣向我們解釋。而誰不相信這種「理論」，誰就

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黨底作用呢？黨在運動中的意義呢？但是，黨對於像「生產力底程度」這樣的決定因素，能有什麼辦法呢？……

這種假冒馬克思主義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大堆來。

顯然用不着證明，這種以掩飾機會主義底面目為使命的假冒的「馬克思主義」，只是這樣一種「尾巴主義」理論在歐洲方面的變形表現，而列寧還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以前就已經向這種理論作過鬥爭了。

顯然用不着證明，打破這種理論上的假冒，乃是在西歐創立真正革命政黨的先決條件。（斯大林：「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列寧主義問題」，第一四——一五頁）

現在再來講，政治經濟學上的第二種成見，第二種資產階級式的理論。這就是社會主義建設上的「自流」論。這個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但是它却被右派營壘中的同志們所熱心提倡着。這個理論的發明家大概是這樣說法：我們曾經有過資本主義，工業曾經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而鄉村曾經跟在資本主義的城市後面自然地，自動地行走，依照資本主義城市底模型而自行改造。在資本主義之下既是這樣，在蘇維埃經濟之下又何嘗不可這樣呢？鄉村小農經濟又何嘗不可以用自動的辦法跟着社會主義的城市跑，依照社會主義城市底模型而自然改造呢？這個理論底發明家根據這一點，就斷定鄉村可以用自流的辦法而跟着社會主義的城市行走。這裏就要發生問題：假使鄉村本來就可以跟着社會主義的城市跑，那麼我們是否還值得為組織集體農場和國立農場而操心費力，我們是否值得來斷干折戈呢？

這個理論底客觀上的目的，又是把新的武器交給鄉村資本主義份子來反對集體農場。這個理論底

反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是毫無疑義的。我們底理論家居然沒有工夫來擊破這種謬論，讓它淆亂我們實行家底頭腦，你想奇怪不奇怪？

社會主義城市對於小農經濟的領導作用是偉大而不可限量的，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工業改造農村經濟的作用也就在這裏。但是，這個要素是否足以使小農的鄉村在社會主義建設上跟着城市跑呢？不，這是不夠的。在資本主義之下，鄉村所以自然地跟着城市跑，是因為城市底資本主義經濟與農民底小商品經濟在基本上是同類的經濟。固然，小農商品經濟還不是資本主義的經濟，但是在基本上它與資本主義經濟是同類的，因為它是以生產工具的私有權為基礎的。當列寧評論布哈林所著的「過渡時代底經濟」一書時，列寧會說到「農民底商品資本主義傾向」與「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傾向」對立，列寧底這些話是萬分正確的。正因此，所以「小生產經常地，每日每時自然而然地而且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列寧）。是否可以說小商品的農民經濟基本上是與城市中社會主義的生產同類呢？如果你不脫離馬克思主義，顯然是不能這樣說的。要不然，列寧就不會說：「我們還是生活在小農的國家內，在俄國的資本主義，比共產主義有更鞏固的經濟基礎。」因此，社會主義建設上的「自流論」，是反列寧主義的。因此，要使小農鄉村跟着社會主義的城市跑，其他一切都除外，還必需在鄉村中建立如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那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底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底基礎，這種基礎能够在社會主義的城市底領導之下率領農民的基本群眾前進。

問題非常顯明。社會主義建設內的「自流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城市應該率領小農的鄉村，在鄉村中建立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把鄉村改造成社會主義的形式。

社會主義建設上的「自流論」——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直到現在還沒有從我們的農學理論

家方面受到應有的打擊，這是很奇怪的事情。（斯大林：「論蘇聯的土地政策」，見「斯大林選集」第四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九五——九七頁）

八 列寧、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論兩條戰綫的鬭爭

現代歐美工人運動中的主要策略上的分歧，即可歸結於反對兩大派別之鬭爭，這兩大派別，背離了在這運動中已在事實上成爲統治理論的馬克思主義。這兩個派別，就是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改良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無政府社會主義）。這兩個派別背離了工人運動中佔統治地位之馬克思主義的學說，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策略，在一切文明國度的五六十年來的工人群眾運動底歷史中，可以看到它們底各種不同的形態和各種不同的色彩。

單是這一個事實，就已證明這些背離，不能歸因於偶然，或歸咎於某個人或某群人底錯誤，甚至也不能歸因於民族特點或傳統。在經濟制度與一切資本主義國度底發展底特性中，一定是有一些根本的原因，不斷地引起這些背離之發生。荷蘭馬克思主義者邦納戈克，去年出版一本小冊子（工人運動中的策略上的分歧，一九〇九年漢堡的杜伯書局印行），企圖對這些根本原因作一番科學的研究。邦納戈克底結論，都完全正確，這是不能否認的；在我們的論述中，將把這些結論介紹給讀者。

定期地引起分歧之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工人運動本身之發展。如果不用什麼幻想的理想爲尺度，以量度工人運動，而是把它視爲普通人的實際運動，那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新加入的份子底人數天天增多，勞苦群眾底新階層投效於工人運動，就避免不了要跟着發生這類的事情：理論上和策略上

的動搖，重蹈舊有的錯誤，暫時回復於陳腐的觀點與陳腐的方法等等。每一國底工人運動，定期地耗費多少精力、注意和時間，以「訓練」新加入的份子。

其次，在各國和各種不同的國民經濟部門中，資本主義底發展的速度，各不相同。大工業最發展的地方，那裏的工人階級及其理論家之同化馬克思主義，最爲容易。最爲迅速。最爲完全和最爲鞏固。落後的——或發展得遲滯的——經濟關係，經常的釀成了這種現象，即，工人運動的贊成者，他們只了解馬克思主義的幾點，只接受新宇宙觀的某些部份，或接受個別的口號和要求，但不能與一般資產階級世界觀——尤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世界觀——底一切傳統思想堅決分離。

再則，社會發展底辯證法的性質——社會發展是在矛盾中進行，而且是通過矛盾而發展的——也是分歧的一個經常來源。資本主義是進步的，因爲它毀滅了舊的生產方法，發展了生產力，可是同時它在發展的某一階段，又阻礙了生產力底發展。它發展了工人，組織了工人，並使工人紀律化，——然而它也剝削了工人，壓迫了工人，使他們陷於墮落、貧困等等。資本主義自己造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它自己創造了新制度的要素，可是同時如果沒有一個「跳躍」，這些個別的要素就毫不變動整個制度，也不損及資本的統治。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學說，能够把實際生活的這些矛盾，把資本主義的實際歷史與工人運動的這些矛盾，都包括進去。然而很明顯的，群眾是從生活學習，而不是從書本學習，所以，某些個人或集團，經常地誇大資本主義發展底某一特點，時而誇大這一特點，時而誇大另一特點；誇大資本主義發展底某一教訓，時而誇大這一教訓，時而誇大另一教訓；把它抬高成爲片面的學說，抬高成爲片面的策略體系。

資產階級的理論家，自由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他們不懂得馬克思主義，不懂得現代工人運動，

他們經常不斷地由一個無意義的極端，跳到另一個無意義的極端。有時，他們說是壞人「教唆」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以此解釋一切事情。有時又說，工黨是「和平的改良黨」，以此安慰自己。我們對於無政府工團主義與改良主義，一定要把他們都當做是這種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及其影響底直接產物。他們都只抓到工人運動底一方面，而將片面性提高成爲一個學說；它們宣稱這運動的此類傾向或特色，構成某一時期的特徵，構成工人階級活動一定條件底特徵，而且這些傾向或特色，是互不相容的。可是，實際的生活，實際的歷史，却包括這些不同的傾向，正如自然界中的生活與發展，包含有徐緩的進化，急速的跳躍，漸進之間斷。

一切說及「跳躍」之議論，一切說及工人運動與整個社會之間的根本對立之議論，都被修正派視爲只是空談。他們把「改良」認爲是社會主義底局部的實現。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拒絕「微小的工作」尤其是拒絕利用國會講壇。在事實上，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策略，是等於不能把那些創造事業的力量結合起來，而空等「偉大的日子」之來臨。修正主義與無政府工團主義妨礙了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工作，即，把工人集合成爲巨大的，有力的，作用得當的組織，能够在一切狀態中都起適當的作用，充滿着階級鬭爭的精神，對他們的目的有明確的理解，而且受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之訓練。在這裏，我們稍離本題，來說幾句閒話，並作一附註，以避免可能發生的誤解。邦納戈克僅用西歐歷史中的例子，尤其是德、法兩國的歷史中的例子，來說明他的分析，完全沒有說到俄國。如果有時他也提及俄國，那只是因爲俄國與西歐雖然在文化上、習俗上、歷史上和經濟上，有莫大的差別，但引起與馬克思主義的策略相背離的一定派別發生之根本傾向，我們俄國也是有的。

最後，工人運動參加者當中的分歧，產生這種分歧之一個極重要原因，就是，一般統治階級——

尤其是資產階級——所採取的策略發生了變更。如果資產階級的策略永遠是一樣的，或至少是同性質的，那麼，工人階級很快就可學會以同樣的或同性質的策略來對付他們。但在事實上，各國資產階級不能不應用兩種統治制度，兩種鬭爭方法，以保衛其利益，維持其統治。這兩種統治制度，兩種鬭爭方法，有時彼此更替，有時彼此混合，滲成各式各樣的形態。第一種方法是暴力方法，拒絕對工人運動作任何讓步，擁護一切舊的垂死的制度，堅決拒絕改良。這就是保守黨的政策的本質。這種政策，在西歐已日益變成不只是地主階級的政策，而且是一般資產階級政策底一種。第二種方法，就是「自由主義」底方法，採取發展政治權利之步驟，採取改良，讓步等等之步驟。

資產階級從採取這種方法變到採取另一種方法，並非由於某些個人的惡意的計劃，也並非出於偶然，而是歸因於資產階級本身地位底根本的矛盾。常態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如果沒有堅固的代議制度，人民沒有享受到相當的政治權利，就不能順利的發展。常態資本主義的社會，一定有比較高度的「文化的」要求，而成爲它的特色。造出這個要求——要求有一定最低限度的文化——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本身底條件，它的高度的技術、複雜性、伸縮性、能動性、世界競爭發展底迅速等等。所以，資產階級底策略上的動搖，由暴力的制度過渡到表面好像是讓步的制度，成爲在最近五十年的歐洲各國度歷史底特色。而且，在一定的時期，各國大體都發展某一種方法底採用。例如，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英國，是「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政策底標準國度，而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德國却採取暴力的方法等等。

當德國採取這種暴力方法時，這種制度——資產階級的政府制度之一種——底片面的反響，就是無政府工團主義——當時稱爲無政府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發展（九十年代初的「青年派」，八十

年代初的莫斯特派) • 在一八九〇年，當轉向於「讓步」的轉變已實現時，判明了這種讓步政策對工人運動總是比暴力政策還更危險，它引起了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機會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底片面的反響。

資產階級在某些時候，用「自由主義的」政策，以完成其目的；這並不是稀罕的事。這種自由主義的政策，邦納科說得對，只是「更狡猾的政策」。一部份的工人，一部份的工人代表，有時被假讓步所欺騙。修正派宣稱階級鬭爭底學說是一陳腐了，或者，他們已開始採行一種政策。那種政策在事實上是等於拋棄階級鬭爭。資產階級的策略底曲折，加強了工人運動中的修正主義底力量，並且屢使工人運動內部的分歧更加劇烈，而至於公開分裂。

這裏所指出這一類的一切原因，就是工人運動當中和在無產階級隊伍當中引起分歧之原因。然而，在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階層——小資產階級是與無產階級相接近的，包括農民階級在內——之間，並沒有萬里長城，也不能有萬里長城，把他們隔開。小資產階級的某些個人集團和階層，轉入無產階級隊伍，結果，定引起無產階級底策略上的動搖。

各國工人運動的經驗，幫助我們由具體的實際問題去理解馬克思主義底策略底本質；幫助比較年青的國家能够更清楚的認明這些與馬克思主義相違離的派別底真正的階級意義，而與他們鬭爭得更成功。(列寧：「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歐洲工人運動中的分歧」，「解放社」版，第一一一至一一七頁)。

楊諾夫歸答「舊政派的領導者」說：他們正竭盡全力來妨礙統一的實現，他們在全體會議上的舉動也是這樣，「從他們那裏取得每一步時，都會要進行鬭爭」，同時楊諾夫又寫道：

「列寧同志曾不願意用『擴大和加深社會民主黨工作』底方法去『克服各種危險的傾向』。他曾十分努力地想把『兩條戰綫上的鬭爭』理論當作黨的一切發端底中心。他甚至沒有想到要消滅黨內『關於嚴密防範的條例（第二十二頁，第一條）』。」

這是指關於黨內實況的決議案第四條第二項而言的。這個決議案底草案曾經由我提到中央去，而這一條是在委員會工作之後，由全體會議自己更改的，這個更改是根據托洛茨基底提議的，我雖然反對了這個提議，却沒有成效。在這一條上面我雖不是寫了『兩條戰綫上的鬭爭』這幾個字，那麼至少是寫了表示這樣意思的話。『用擴大和加深底方法去克服』這些字樣是根據托洛茨基底提議而加進去的。楊諾夫同志提起我反對這個提議的鬭爭，給我適當的機會來解釋這些『更正』底意義，這是使我高興的一回事。

在全體會議上再沒有別的東西能如『兩條戰綫上的鬭爭』這個觀念，使人發生這樣厲害的（往往是滑稽的）怨恨。只要提起這一件事，就使前進派和孟塞維克非常難堪。這種怨恨是完全可以由歷史觀點來說明的。因為布爾塞維克從一九〇八年八月至一九一〇年正月，事實上進行了兩條戰綫上的鬭爭——與取消派和召回派的鬭爭。這種怨恨之所以滑稽，是因為曾經怨恨布爾塞維克的人們，這樣一來只是證明了他們自己的過失，只是證明了：對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的一切指斥仍在連累他們。真是所謂做賊心虛。

托洛茨基提議以『用擴大和加深底方法去克服』這些字樣來代替兩條戰綫上的鬭爭，他的提議會得了孟塞維克和前進派熱烈的擁護。

因為有這種『勝利』，所以現在無論楊諾夫，無論『真理報』，無論維也納的決議案，無論『社

會民主黨人的呼聲」，都高興起來。但是試問，從這一條上刪去了關於兩條戰綫上的鬭爭的字樣以後，是否就從這個決議案刪去了承認這個鬭爭的必要呢？絕對不是的，因為，既經承認「這些傾向」，既經承認它們的「危險」，既經承認有「解釋」這種危險之必要，既經承認此等傾向就是「資產階級影響無產階級表現」，那麼按實質講來，這正是承認兩條戰綫上的鬭爭！在一個地方更改了「難聽的」（對於某個朋友）名詞，但是保留了基本意思！結果，只是把這一條底這一部份弄得糊塗混雜一些，用一種空話來使它變壞些罷了。

事實上，如果在這一條內說到「用擴大和加深工作的方法來克服」等等的話，那麼這恰恰就是空話和無辦法的遁辭。此地毫無明白的意思。擴大和加深工作，無論何時都是絕對必要的；這一點在決議案整個第三節內說得很詳細了，在未講到特殊的（這不是任何時候都絕對必需的，而是由特別時期的條件所產生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任務」以前就說到了。第四條所發揮的就只是特殊的任務，而在該條所包括的三項底引言中直捷了當的說道：這些思想的和政治的任務「已提到日程上來了」。

結果怎樣呢？結果得出無意思的議論：似乎擴大和加深工作底任務也提到日程上來了！似乎可以有這樣的歷史「日程」，此時這個任務沒有了，而其實這任務是永遠存在的！

試問怎樣可以用擴大和加深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底方法去克服各種傾向呢？在任何的擴大中，在任何的加深中，必不可免的要發生如何去擴大和如何去加深這一個問題；如果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不是一種偶然現象，而是由社會條件所產生出來的思潮，那麼，它們可以鑽進工作底任何的擴大和任何的加深中去。可以本着取消主義底精神去擴大和加深工作，例如「我們的曙光」和「復興」所做的那樣；這也可以本着召回主義的精神去做。另一方面，對於各種傾向的克服，真正的「克服」，不可免

地要把用在正確的社會民主黨工作之直接擴大和加深中的相當力量、時間和精神剝奪去。例如楊諾夫在自己論文同一頁內寫道：

「全體會議已經開完了。參加會議的人們也走盡了。現在中央要在整理工作的時候去克服非常的困難，在這些困難中，所謂的（楊諾夫同志！祇是所謂的，而不是真正的，不是實在的嗎？）取消派的行動不是佔着最後的一個位置，而取消派的存在又是爲馬爾托夫同志所這樣堅決否認的。」

你們看吧，這種材料（小小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材料）就足以說明托洛茨基和楊諾夫底說話是如何的空洞！克服米哈爾·玉里及其同伴的取消派步驟，這會使我們不得不把用以直接擴大和加深真正社會民主黨的工作的力量和時間剝奪去。假如沒有米哈爾·玉里及其同伴的行爲，假如在我們繼續誤認爲自己同志的那些人們中間沒有取消主義的話，那麼擴大和加深社會民主黨的工作也就進行得更順利了，因爲內部的鬭爭就不致於把黨的力量剝奪去了。這就是說，如果把擴大和加深社會民主黨的工作解釋爲本着真正社會民主黨的精神去直接發展鼓動、宣傳、經濟鬭爭等等，那麼，克服社會民主黨人脫離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對於這個工作是一種短處，可以說是「積極活動中」一個折扣，因此關於用擴大等等的方法去克服各種傾向的話，就沒有意思了。

這種話其實就是表現模糊的希望、善良的、幼稚的希望，希望社會民主黨人中間少作些內部的鬭爭！在這種話中間，除了幼稚的希望之外，便沒有表現任何的意思；這就是所謂調和派底歎息：噯，如果和取消主義及召回主義少作些鬭爭的話！

此種一歎息一底政治意義即等於零，劣於零。如果黨內有人認爲「堅決否認」取消派（和召回

派)底存在於他有利，那麼這些人就是利用「調和派」底「歎息」去掩蔽害處。「社會民主黨人底呼聲」就是這樣做的。因此祇有所謂的「調和派」才擁護決議案中好意的空洞的辭句。而實際上，他們是幫助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實際上，他們不是加深社會民主黨的工作，而正是加深離開社會民主黨工作的傾向，正是鞏固害處，因為他們暫時把害處隱藏起來，使人難以消弭這個害處。(列寧：「政論家的時評」，「列寧選集」第七卷，中譯本，四五—五〇頁)。

……我們說：有右的傾向的地方，就必有「左傾」。「左傾」是右傾的影子。列寧會指着召回派說過，「左派」也同樣是孟塞維克，不過是它的背面。這句話是完全對的。現在的「左派」也是這樣。傾向於托洛茨基主義的，事實上也是右派的，右派只是用「左派」的話來掩蔽自己的本相而已。

所以要使兩條戰綫的鬭爭，反對右傾與反對「左」傾。

有人要說：若「左」傾實際上是右派機會主義的傾向，那麼它們中間有什麼區別呢，所謂兩條戰綫到底在什麼地方呢？事實上，若右派得到勝利，便是增加資本主義復辟的良機，而「左派」的勝利也是得同樣的結果；那麼在它們中間還有什麼區別，為什麼一個叫做右派，一個又叫做左派呢。若左派與右派中果有區別的話，那麼究竟區別在什麼地方呢？這兩個傾向的社會基礎一樣，它們同是小資產階級傾向，難道不對嗎？這個傾向得到勝利以後，終歸是一個同樣的結果，這難道不對麼？它們中間的區別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不同的地方在於：綱領不同，要求不同，出發點與方法不同。譬如，右派說：「不應當建設第聶泊爾水電站，而「左派」却恰恰相反，他們說，「怎麼我們只一個第聶泊爾水電站，要一年給我們一個第聶泊爾水電站。」(笑聲)因此我們要承認，其中顯然是有分別的。如果右派說：「不要侵犯富農，

讓他去自由地發展。」「左派」恰恰相反，說：「我們不僅要打擊富農，並且還要同樣打擊中農，因為中農亦同富農一樣地是私有者。」這亦是我們要承認的，其中顯然是有分別的。如果右派說：「困難來了，還不是逃避的時候嗎？」而「左派」相反的說：「什麼是我們的困難，還有什麼難，飛向前去啊！」（笑聲）這亦是我們要承認的，其中顯然是有分別的。

你們看，這就是「左派」特別的政綱及其手段底一幅畫圖。因此，「左派」才常能用那種左傾而動人的言詞，欺騙了一部份工人，表明自己是右傾底最堅決的敵人；可是誰都知道，左派與右派的社會根源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他們時常走向妥協的道路，與右派聯合起來，作反對列寧主義路線的鬭爭。

所以我們列寧主義者，必須要在兩條戰線上作鬭爭：一方面反對右傾，一方面又反對「左傾」。可是，如果托洛茨基主義的傾向是代表「左」傾，那麼，是不是說，這個「左傾」比列寧主義更左呢？不是的，列寧主義在全世界工人運動中，是最左的（這個左字沒有括弧）一派了。我們列寧主義者，在帝國主義戰爭開始以前的時期，加入到第二國際中去，是社會民主黨中最左的一派。我們未留在第二國際中，我們在第二國際中宣傳分裂，因為我們是最左的一派，不願意與馬克思主義底小資產階級的叛徒及社會和平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共居一黨。這個策略與這個思想，結果做了全世界布爾塞維克底基礎。我們列寧主義者在自己的黨內是唯一的沒有括弧的左派。因此，我們列寧主義者，在自己的黨中，既無所謂「左」，亦無所謂右。我們的黨是馬克思主義者與列寧主義者的黨。在本黨內，我們不僅同那些已被我們公開的稱為機會主義者的人鬭爭，並且同那些企圖做比馬克思主義「更左」、比列寧主義「更左」的人，用左而動人的言詞去掩飾右傾機會主義本質的人鬭爭。誰都懂得，

稱那些還沒有從托洛茨基主義傾向解放出來的人爲「左派」，這是諷刺的意思。列寧稱那些「左派共產主義者」爲左派，有時把它放在括弧內，有時不用括弧。但是誰都知道，列寧之稱他們爲左派，即是譏諷的意思，要藉之以說明他們僅僅是在口頭上。表面上是左派，而在實際上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右傾。那些托洛茨基派的份子，昨天還與公開的機會主義份子結成了反列寧主義的聯盟，並且與國內反蘇維埃的份子直接勾結，他們怎麼可以稱爲左派（沒有括弧）呢？不久還有一個受資產階級份子贊助的反列寧黨底「左」右派公開的聯盟，難道這不是事實嗎？難道這不是說，如果「左派」與右派沒有一個共同的社會根源，如果它們沒有一個共同的機會主義的天性，它們絕不能結合成一個統一聯盟嗎？托洛茨基派場台已有一年了。右傾的一部份，例如夏杜洛夫斯基，離開了這個聯盟。因此，右派今後將以右派的資格出台，而「左傾的」就用左傾的話去掩飾自己的右傾。但是我們怎樣保證這個「左傾的」與右傾的彼此不能再碰見呢？（笑聲）很明白的，簡直一點保證也沒有，也不會有。

如果我們擁護在兩條戰綫上鬭爭的口號，那麼，是不是說，我們這就宣佈了我們黨內必須有中派呢？究竟在兩條戰綫上鬭爭是什麼意思呢？不是中派的意思嗎？你們都知道，托洛茨基主義者正是這樣說：有所謂「左派」，這就是「我們」——托洛茨基派，「真正的列寧主義者」；有所謂「右派的」，這是其餘的一切人；末了，有所謂「中派」，即動搖於「左」右之間的。用這樣的觀點來觀察我們的黨，能不能認爲是正確的呢？很明顯，這是不能的。只有那些糊塗的早與馬克思主義脫離了關係的人才能這樣說。只有那些看不見與不了解大戰時期以前的社會民主黨——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利益聯盟底黨與共產黨——革命無產階級獨有的黨中間原則上的分別的人，才會這樣講。中派這個名詞，不是地位的觀念：例如我們說，在一邊坐着的是右派，在另一邊的是「左派」，在中部的——

便是中派。中派是政治的觀念。它的思想是隨波逐流的思想，是在一個共同的黨內將無產階級的利益服從於小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思想。這是反列寧主義的思想。中派是大戰以前的第二國際內底天然產物。那裏曾經有右派（佔大多數），有左派（沒有括弧的），亦有中派。中派的一切政策，是用左派的言詞來粉飾右派的機會主義，並使左派服從右派。那時，以布爾塞維克爲中堅的左派底政策如何呢？即是堅決的與中派鬭爭，與右派作分裂的鬭爭（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戰爭開始以後），而從真正的左派中與真正的無產階級份子中，組織新的革命的國際。

爲什麼那時在第二國際內能發生這樣力量的分配。與布爾塞維克的這樣政策呢？因爲第二國際那時是一個無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利益聯盟的政黨，這個黨是對於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和平主義者及社會愛國主義者的。因爲那時布爾塞維克不能不集中火力來反對企圖使無產階級份子服從小資產階級利益的中央派。因爲那時布爾塞維克的責任是宣傳分裂的思想，不然，無產階級就不能組織自己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政黨。

能否斷定在本黨內也有同樣的力量分配及在本黨內應重演戰前布爾塞維克在第二國際內部所運用的政策呢？很明顯地，不可以。因爲，這是不懂得無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黨同革命的無產階級獨有的政黨間原則上的分別。社會民主黨的階級基礎與共產黨完全不同。那裏（社會民主黨）中央派是一種自然的現象，因爲各種利益聯盟的政黨，免不了要有中派，而布爾塞維克的責任，正是在採用分裂的路綫。而此地（共產黨）呢，中派是沒有根據的。而且是與列寧的黨不相容的，因爲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獨有的政黨，而不是各種階級成份聯盟的政黨。並因爲本黨的統治力量是世界工人運動中的最左派（列寧主義者），所以從列寧主義的觀點看來，在我們黨內採用分裂政策是沒有任何理由，

而且也不能有任何理由去說這種政策是對的。

(座中人問：——本黨有分裂的可能沒有？)

問題不是關於分裂是否可能，而是關於分裂政策在我們獨有的列寧的黨中，用列寧主義的觀點來看，是沒有理由說它是對的。誰不懂得這種原則上的分別，那就是離開了列寧主義，毀壞了列寧主義。因此，我想只有瘋癲的和一點馬克思主義氣味都沒有的人，才能够斷言說本黨在兩條戰綫上鬭爭的政策，是中派的政策。

列寧在本黨內不斷地在兩條戰綫上進行鬭爭，反對「左傾」，反對明顯的孟塞維主義的傾向。你們去看一看列寧著的「共產主義中左派幼稚病」這本書吧，看一看本黨的歷史吧，你們將懂得本黨是在與這兩種傾向——右派及「左派」——鬭爭中生長及鞏固起來的。一方面同召回派及「左派」共產主義者鬭爭，另一方面，在十月革命前，十月革命時，十月革命後，同公開的機會主義傾向鬭爭，這就是本黨在它自己發展中所經過的階段。大家都知道列寧關於這問題的話：我們既要同機會主義鬭爭，又要同「左派」的信條主義者鬭爭。

這是不是說列寧就是一個中央主義者，他採用了中央主義的政策呢？當然不是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的「左」右傾是什麼呢？所謂右傾，這當然不是戰前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傾向於機會主義，還不就是機會主義。我們知道，列寧當時會解釋過「傾向」的意思。傾向，是一種還未完全形成機會主義的東西，它還是可以糾正的。因此，不能拿右傾及已完成的機會主義來等量齊觀。說到「左」傾，它簡直是一種同戰前第二國際內部極左派——即布爾塞維克——完全相反的東西。它們不僅不是沒有括弧的左派，按其實質，而且和右傾份子是一個東西；不過還有一個差別，

就是，他們不自覺地將自己的真性用左傾的詞句掩蔽起來。看不到在本黨內「左」傾份子及真正的列寧主義者——唯一的沒有括弧的左派——間的一切差別，這對於黨簡直是一種罪惡。

（座中人問：那麼把傾向合法化就對嗎？）

假如和傾向公開的鬭爭是把傾向合法化，那麼，就要承認列寧好久以前就把它們「合法化」了。他們，這些傾向份子，左派，右派都在內，是從各式各樣非無產階級的階層中產生出來的。這些份子反映着小資產階級勢力對黨的影響，以及黨的某部份組織的腐化。一部份由別的政黨退出來的人。一部份帶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的人，過去黨內小組織的殘餘，在國家的、經濟的、合作社的及職工會的機關中正在開始官僚化（及已經官僚化的）的黨員，他們與這些機關內的資產階級份子很明顯的勾結起來；在我們鄉村組織中的富裕黨員（他們是與富農同生並長的）等等——這就是脫離列寧主義路線的傾向之滋養料。很明顯地，這些成份不能接受什麼真正的左派及列寧主義。他們只有培養公開的機會主義的傾向，或者是用左傾的詞句來掩飾自己機會主義的「左傾」。

因此在兩條戰綫上鬭爭，是本黨唯一的正確的政策。（斯大林：「論反對傾向及調和派的鬭爭」，「斯大林選集」，卷三，中譯本，「解放社」版，三六一——三六七頁）

我們不能不進行兩條戰綫上的鬭爭，因為只有在兩條戰綫鬭爭——一面與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它是我們建設工作中的基本危險）作鬭爭，一面與當地的排外愛國主義作鬭爭——的條件下面，才可以獲得勝利，因為沒有這兩面的鬭爭，俄羅斯與他民族工農的任何團結是談不到的。在相反的情形之下，反而要弄成對當地排外愛國主義的鼓勵，弄成獎勵當地排外愛國主義的政策，這是我們不能允許的。

這裏，讓我引列寧同志的幾句話作證。我本來不如此作的，但是在我們的大會上，既有好多同志引證列寧同志的話，加以歪曲，那麼也讓我把我列寧同志一篇有名的論文中的幾句話讀一下吧：

「無產階級應當要求被「他」的民族所壓迫的殖民地與民族的政治分離的自由。在相反的情形之下，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要成爲空談的東西，被壓迫與壓迫民族工人間的任何信任、任何階級的聯帶關係，都是不可能的。」

這便是支配民族或從前被支配民族的無產者的義務。其次，列寧則是述說從前被壓迫民族無產者與共產黨員的義務：

「別一方面，被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應當特別堅持與實行被壓迫民族工人與壓迫民族工人十足的和無條件的以及組織上的統一。否則，在資產階級一切詭計、背叛及欺騙下，要貫徹無產階級的獨立政策及其與別國無產階級的階級的連帶關係，那是不可能的，因爲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經常地要把民族解放的口號變爲對工人的欺騙。」

瞧吧，要是跟着列寧的足跡前進，——這裏有些同志是用他的名字來賭咒——那就必須把兩個提綱——既須與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作鬭爭，又須與當地排外愛國主義作鬭爭——都留在議決案中，作爲一個現象的兩方面，作爲與一般排外愛國主義作鬭爭的提綱。（斯大林：『黨的建設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因素』，『論民族問題』，中譯本，『抗戰書店』版，二八二——二八三頁）

應當鞭策右派，迫使他們，教他們去學習與民族主義作鬭爭，以便從當地人當中鍛鍊真正共產主義幹部。同樣，應當鞭策「左派」，教他們去學習靈活性，善於運用手腕，以便把握廣大的民衆。需要如此幹者，因爲正如霍占諾夫同志所正確指出的一樣，真理是「適中」，是在右與「左」之間。

(斯大林：「在俄國共產黨(布)中央與各民族共和國和民族區負責工作人員第四次會議上的演說」
「論民族問題」，中譯本，「抗戰書店」版，二九八頁)

代表大會即決心實行這一策略路線，而且確信這條路線必能使我們的黨獲得巨大的成功。同時也估計到，將來在實行這條布爾塞維克路線時，也許會遇到一些障礙，也許會發生錯誤，也許會發生右傾或「左」傾——或者偏在一味遷就的尾巴主義方面，或者偏在甘自孤立的關門主義方面。在這兩種危險之中，「一般說來」，就是在這時候，在這地方，最妨礙此次代表大會路線之實行，最妨礙共產黨正確群眾政策之擴展的那個危險。

共產主義事業所需要的，並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反對傾向的鬭爭；當某個有害的傾向一開始產生時，就必須及時和堅決給以打擊，一有錯誤，就必須及時糾正。如果不是進行必要的具體的反傾向的鬭爭，而去「捉迷藏」，專門尋求莫須有的傾向或傾向份子——這就是非常有害的吹毛求疵。在我們黨的實際工作上，必須盡量鼓勵同志們自動提出問題的自動性，贊助同志們從各方面來討論黨底工作問題，凡黨員對於革命的實際任務有什麼懷疑或批評，不要趕快斷定他有什麼傾向。務必給犯錯誤的同志以在事實上改正錯誤的機會，而只是對於堅持錯誤及破壞黨的組織的份子給以無情的打擊。

(季米特洛夫：「爲工人階級底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鬭爭」，季米特洛夫文選，一六〇——一六一頁)

九 列寧、斯大林論政治的明確性和肯定性。反對調和派

托洛茨基，在其決議案開始一段中，就表示出最惡劣的調和主義的全部精神，這種「調和主義」是包括弧內的，小組式的，庸人的，只顧「某些個人」，而不顧某條路綫，不顧某種精神，不顧黨工作底某種思想的和政治的內容。

須知這裏就是托洛茨基及其同伴底「調和主義」與主張清除黨內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的真正黨性之間的天淵之別；托洛茨基底「調和主義」，在事實上，最忠順地替取消主義者和召回主義者服務，因此，它越狡猾，越精巧，越好聽，越是用彷彿黨的，彷彿反政派的漂亮話做幌子，則它對於黨便更有危害。

事實上，黨的任務是什麼呢？

是否就是要把「某些個人。團體和機關」，——不顧他們的路綫，不顧他們的工作內容，不顧我們對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的態度——「調和」起來呢？

抑或就是黨的路綫，是我們一切工作之思想的和政治的方向與內容，是清洗這種工作中的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的一個任務——不管那些不同意這條路綫或不實行這條路綫的一個人，團體和機關——底反抗而應當實現的那個任務呢？

對於任何的黨的統一的意義和條件，可有兩種見解。認識這兩種見解底區別，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我們底「統一的危機」發展過程中，這兩種見解彼此混合着和錯綜着，如不把一種見解與別種見

解分清界綫，則不能了解這個危機。

對於統一的一種見解，可以把「某些個人、團體和機關」間的「調和」放在第一位。依照這種見解說來，他們對黨的工作，對這個工作路綫的意見底一致，是次要的事情。應當極力把各種意見分歧隱瞞起來，而不應當弄清它們的根源，它們的意義，它們的客觀條件。把個人和團體「調和起來」，這是主要的事情。假如他們在總路綫底實行中不能有一致的意見時，那就要把這條路綫解釋得使它能夠為大家所採納。請你過活和使他人也能過活罷。這就是庸夫俗子的「調和主義」，它必然引起小組式的外交手腕。這個「調和主義」之主要視綫，集中於「素佳」意見分歧底來源，隱瞞這些來源，無論如何要把「衝突」「調停下去」，使對敵的方向中和化。很明顯的，在祕密黨底活動根據地是在國外的條件之下，這種小組式的外交手腕，就是大開門戶，讓那些在實行「調和」和「中和」的各種企圖時充當「誠實的中間人」的「個人、團體和機關」，都一齊進來。

請看馬爾托夫在「呼聲」第十九至二十期上怎樣敘述全體會議上的這種企圖：

「孟塞維克，「真理派」(編者按：所謂「真理派」就是集合在托洛茨基於維也納出版的真理報周圍的那夥人。至於布爾塞維克底真理報，在當時還沒有出版)和猶太工人同盟派，曾經提議要這樣一些人來擔負中央機關報的工作，就是要他們能夠保證黨內兩個對抗的思潮底「中和化」，不讓這兩個思潮中任何一派佔多數，這樣來逼迫黨的機關報對於每個重要的問題採取居中的路綫，以便能夠聯合大多數黨內的工作人員。」

大家都知道，孟塞維克底提議沒有通過。托洛茨基曾提出自己到中央機關報編輯部中去作為一個中和者，他也遭受了失敗。提出來擔任同種職務的一個猶太工人同盟派的候選人(孟塞維克在其發言

中提出了這個候選人)，甚至沒有拿來付表決。

這就是惡劣的「調和派」底實際作用，他們曾經寫過維也納的決議案，他們的見解就在我剛才所得到的猶太工人同盟底「回聲」第四期上楊諾夫論文中發表出來了。孟塞維克曾不敢提出以他們的派別佔多數的中央機關編輯員名單來——但同時他們却承認（從我們上面所引的馬爾托夫底議論中可以明白看出）黨內有兩個互相對抗的思潮。孟塞維克甚至並沒有想到要提出以他們的派別佔多數的中央機關編輯部底名單來。孟塞維克甚至沒有打算要求中央機關報有一定的方針（非常明顯地，在全體會議上孟塞維克沒有方針，人們才剛剛要求孟塞維克，才剛剛希望孟塞維克能够誠懇地和澈底放棄取消主義）。孟塞維克曾經企圖使中央機關報「中和化」，並提出了猶太工人同盟派或托洛茨基作爲中和者。猶太工人同盟派和托洛茨基會應當盡媒介人底作用，使「某些個人、團體和機關」（不顧某一方面是否已經放棄取消主義）「結成佳偶良緣」。

媒介人底這種觀點，就構成楊諾夫和托洛茨基底調和主義之一切「思想基礎」。當他們看見統一沒有成功，便嘆息流淚時，那麼，了解這一點的時候應當 *Cum grano salis*（編者按：拉丁語，原意爲——用鹽屑，借喻爲——有一些附帶條件，有相當的限制）這應當解作爲結婚沒有成功。托洛茨基和楊諾夫對於統一底希望，對於與「某些個人、團體和機關」（不顧他們對取消主義所抱的態度如何）統一的希望之「遭受挫折」，只是媒介人之遭受挫折，只是媒介人之觀點不對，不可靠，可憐，而並不是黨的統一之遭受挫折。

對於這個統一，還有另外一種見解。這種見解就是：許多深刻的客觀的原因（這些原因不是以「某些（給全體會議的和全體會議上所有的）個人、團體和機關」之某種成份爲轉移的），在俄國社

會民主黨人兩個舊有主要政派中老早已開始引起了而且還在引起這樣的變遷：這些變遷造成（有時違背着）某些個人、團體和機關「中一部份人底意志和甚至意識」統一底思想的和組織的基礎。此等客觀條件，基於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的特性中，這是俄國資產階級式的發展時代，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時代，專制制度企圖按資產階級君主制度方式而改造自己的時代。這些客觀條件在同一時期和彼此不可分離地造成工人運動性質底改變，造成工人社會民主黨先鋒隊之成份、方式、外貌底改變，以及造成社會民主運動之思想的和政治的任務底改變。因此，造成取消主義（等於半自由主義，它希望把自己歸入社會民主黨）和召回主義（等於半無政府主義，它希望把自己歸入社會民主黨）的那種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影響，並不是一種偶然現象，不是某種個人的惡意、蠢笨或錯誤，而是此等客觀原因發生作用的必然結果，而是現時建築在俄國全部工人運動上的，與「基礎」不可分離的上層建築。因為認識這兩種傾向對於工人運動的危險，害處和非社會民主黨的性質，所以各政派內的份子日益接近起來和「經過一切障礙」而替黨的統一開闢一條道路。

從這個觀點看來，統一可以進行得很慢，很困難，有動搖、擺動、反覆，但它不能不進行。從這個觀點看來，統一底進行並不是不需要在「某些個人、團體和機關」之間，而是不以某些個人為轉移，使某些個人屈服於統一，把那些不認識和不願認識客觀發展要求的人拋棄於「某些人」以外，而提拔和吸引新的不屬於「某些人」的個人去補充「某些人」，使舊的政派、思潮、集團底內部發生變化，再行更改和重新分合。從這個觀點看來，統一是一與它的思想基礎不可分離的，統一只有根據思想之接近才生長起來，統一又與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這些傾向之出現、發展、增長有聯系，這種聯系不是某些論戰的言論，某種文字上的鬭爭之偶然的聯系，而是內部的不可分離的聯系，如因果的聯系一

樣。(列寧：「政論家的時評」，「列寧選集」卷七，四〇——四五頁)

如果托洛茨基和楊諾夫，現在企圖把黨與某些個人、團體和機關「調和起來」，那麼在我們看來，在一切護黨的布爾塞維克和護黨的孟塞維克看來，托洛茨基和楊諾夫簡直是黨的叛徒，再沒有別的了。(同上，五四頁)

……我斥責他(編者按：指托洛茨基)的地方在什麼地方呢？我斥責他的地方，在於他常常地在俄國是表現着「中間」的政策。以下就是一個事實。從一九一二年一月起，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分裂是表面的。我們底黨(團聚在中央周圍的一派)指責別一派，即O·K·和它最有名的領袖馬爾托夫和阿克雪洛德爲機會主義。托洛茨基參加馬爾托夫一派，而只是到了一九一四年的時候才脫離它。在這個時候，恰巧戰爭爆發了。我們這一派的五個國會黨團議員(慕拉諾夫、彼得洛夫斯基、夏考夫、巴達耶夫、沙莫伊洛夫)被充軍到西伯利亞了。我們彼得堡的工人們投票反對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這對於我們是最重要的實際的問題；對於俄國，其重要性儼若法國的參加政府問題)。但另外一派非常有名且非常有權威的文學家即O·K·一派的文學家們如波特列索夫、沙蘇里赤、列維茨基及其他等人，即主張「保護祖國」並參加軍事工業會議。馬爾托夫和阿克雪洛德，雖然抗議參加這個委員會，但卻沒有與他那一派斷絕關係，按該派當中，已經有一派成爲沙文主義者，而贊同參加這個委員會了。所以我們在金泰爾責備馬爾托夫一方面要做整個O·K·的代表，同時事實上他又只能夠做這種傾向中某一派的代表。這一派在國會中的代表(切哈茨、斯考伯列夫等)分裂了。這些代表們一部份贊成「保護祖國」，一部份則表示反對。他們統統主張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同時他們曖昧地說必須「拯救祖國」，所以本質上只是修飾庫姆與列諾德爾「保護祖國」二口號的另外一種表現。再

則，他們也決不反對波特列索夫的態度（實際上，他底態度，同普列哈諾夫底態度是一樣的，馬爾托夫公開地反對波特列索夫，同時拒絕與他底雜誌合作，因為該雜誌歡迎普列哈諾夫參加合作）。

但托洛茨基呢？他一方面與馬爾托夫脫離關係，但又繼續罵我們爲破壞黨的份子。他同先前一樣，提出左傾口號，甚至主張與俄國社會沙文主義的領袖斷絕關係，但是他卻沒有澈底地向我們說明他是否願意與切哈茨的小組織保持聯合抑或分裂。但這一點，却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在事實上，如果明天議和，後天我們便要來一個新的選舉與國會。同時，很快地要在我們面前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是否同切哈茨站在一道，抑或反對他呢？我們是反對和他聯合的。馬爾托夫是贊同的。但托洛茨基如何呢？誰也不曉得。「我們底話」在巴黎已出五百期了，但其中最主要的一個編者托洛茨基，却沒有說一句堅決的話。因此我們不贊同托洛茨基。

但問題還不但是我們，在齊美爾瓦爾德大會上，托洛茨基也不願意同「齊美爾瓦爾德左派」聯合。托洛茨基與G·洛蘭特——歌爾斯德自稱爲「中間派」。（下略）（列寧：「給蘇瓦林的一封信」，見焦敏之譯：「列寧戰爭論」，一四九——一五一頁）

誰贊成「不勝不敗」的口號，誰就是自覺或不自覺的國家主義者，最好也不過是調和的小資產者，但無論如何總是無產階級的政策底敵人，是現在的政府及現在的統治階級底擁護者。（列寧：「論本國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的失敗」，「列寧選集」，第九卷，四八頁）

（編者按：「不勝不敗」的口號，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一四年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提出的，以反對列寧「失敗主義」的口號，事實上，「不勝不敗」的口號，正如列寧所說：這只是把「保衛祖國」的口號換幾個字而已。）

在俄羅斯社會主義政府之前，發生了急待解決不容或緩的問題：接受這個割地的和平呢，還是立刻進行革命的戰爭？這上面再不能有折衷的解決辦法。再往下延宕，已經不能了，我們在勉強延宕談判上面，已經用盡一切力所能及的辦法了。（列寧：『和平提綱』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三〇九頁）

（編者按：列寧這裏是指『布列斯特和約』而言，當時托洛茨基主張『不戰不和』的折衷辦法，事實上是幫助德帝國主義者。）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崩得（編者按：崩得乃是立陶宛波蘭和俄羅斯猶太工人總同盟會的簡稱）的聯邦主義，那時俄國社會民主黨就要根據按民族標準劃分工人的原則來改組；或者是國際性的組織形式，那時，崩得就要根據地方自治原則，按照高加索的拉特維亞的和波蘭的社會民主黨之榜樣來改組，並因此而開闢道路來推進猶太工人與俄國其他各族工人直接聯合的事情。

中間道路是沒有的：原則是戰勝，而不是『調和』的。（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俄國境內的民族問題』，八三頁）

因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不是列寧主義的，那麼，當時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既然舉手贊成這個決議，自己就不是列寧主義者；或者這個決議是列寧主義的，那麼，加米涅夫與季諾維也夫既然離開了這個決議，那麼他們自己就不是列寧主義者了。（斯大林：『再論聯共黨內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斯大林選集』，第二卷，三三二頁）

你們可以問，結論怎樣呢？結論只有一個。反對派糊塗昏亂已經達到極點，已經走到一條沒有出路的路的死巷中去了。他們在兩條道路之前任選一條：或者是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或者是馬斯洛夫、費舍及祕密反黨印刷所裏面的叛徒。要永遠在這兩個營壘中間徘徊，是不能够的。現在是選擇的時候

了。或者是跟着共產國際同蘇聯共產黨，那麼，就應該反對馬斯洛夫、費舍，反對一切叛徒；或者是反對共產國際，反對聯共，那麼，就請跑到馬斯洛夫及費舍派，跑到一切叛徒及腐化份子，跑到謝爾巴可夫及一切其他廢物那裏去！（斯大林：「俄國反對派底政治面目」，「斯大林選集」，卷三，一〇〇頁）

兩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資本家階級與爭得了政權及建立了專政的工人階級之間有不可調和利益的矛盾；或者是沒有這種利益矛盾，那麼就只有一個辦法——宣佈階級利益底協和。

或者是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的理論，或者是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或者是階級利益底不可調和的矛盾，或者是階級利益的協和的理論。

兩者必居其一。（斯大林：「關於聯共（布）黨內的右傾」）

一〇 列寧、斯大林論共產黨員要成爲有頭腦的政治家

我們要有自己的頭腦，來分別考察問題。黨的組織和名實相符的黨的領袖之作用，除其他不計外，也就在於要使本階級一切能够運用思想的代表，在長期的、堅苦的、複雜的、多方面的工作中，培養出必要的知識、必要的經驗、必要的——除了知識及經驗之外——政治警覺，以便敏捷而正確地來解決複雜的政治問題。（列寧：「左派幼稚病」，「解放社」版，六四頁）

關於黨的宣傳事業，關於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來教育我們工作者的事業底最嚴重意義，是無須說及的。我在這裏不僅是指黨機關的工作者而言。我同時還是指青年團的、職工會的、商業合作

社的、經濟的、蘇維埃的、教育的、軍事的以及其他組織的工作者而言。儘管可以令人滿意的進行調節黨的成份並使領導機關更接近於下層工作；儘管可以令人滿意地進行提拔幹部、挑選幹部、佈置幹部；儘管可以做到這一切，但是，如果我們黨的宣傳工作，竟因某種原故而開始跛起腳來，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教育我們幹部的事業竟開始衰弱起來，如果我們提高這些幹部底政治水平和理論水平的工作竟削弱起來，而這些幹部自己又因此而不復注意我們向前進展底前途，不復了解我們事業的正確性，而變成茫無前途的、盲目式和機械式執行的事務主義者，——那麼，我們整個國家的和黨的工作，就一定會衰弱起來。總要把以下一點看作是一個定理，就是國家工作和黨工作任何一個部門中的工作者底政治水平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覺悟程度愈高，則工作本身也愈高和愈有成效，工作的結果也愈有效力；反之，工作者的政治水平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覺悟程度愈低，則在工作中也就愈會發生延誤和失敗，而工作者本身就愈會變為鼠目寸光的小人和墮落為只圖眼前利益的、事務主義者，則他們也就愈會蛻化變節。可以大膽說，如果我們已在思想上把我們所有各工作部門的幹部造就得這樣，在政治上把他們鍛鍊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於使他們能够在國內和國際環境中自由決定方向，如果我們已把他們變成完全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主義者，使他們能够解決國家領導問題而不犯什麼嚴重錯誤，——那麼，我們就會有一切根據來說，我們一切問題底十分之九，都已經解決了。而這個任務，我們毫無條件地是能够解決的。因為我們具有為解決這個任務所必要的一切辦法和可能性。

在我們這裏，年輕幹部之培養和形成，通常都是按個別科學部門和技術部門進行着，按各個專門職業進行着，這是必要和適當的。沒有什麼必要使醫學專家同時又是物理學專家或植物學專家，反

之，也沒有什麼必要使後者同時又是前者。可是有一個科學部門，則是所有一切科學部門的布爾塞維克所必須知悉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關於社會、關於社會發展規律、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發展規律、關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規律、關於共產主義勝利的科學。決不可把這樣一個人當作真正的列寧主義者，這個人雖以列寧主義者自命，而同時却以自己的專門知識爲限，譬如說以數學、植物學或化學爲限，而除了自己的專門知識外，再看不見其他什麼東西。列寧主義者不能只是他自己所喜愛的科學部門底專家，他同時還應當是政治家——社會活動家——要積極注意於本國底命運、要通曉社會發展的規律，要善於運用這些規律，並力圖成爲國家政治領導底積極參加者。當然，這將是對於布爾塞維克專家的一種附加的負擔。可是，這將是大有出息的負擔。

黨的宣傳工作的任務，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教育幹部的任務，就在於幫助我們一切工作部門中的幹部去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斯大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解放」第七十四期，二二——二三頁）

選舉人、人民，應當要求自己的代表們：要他們始終勝任自己的職務；要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中不致墮落爲政治上的庸人；要他們始終不愧爲列寧式的政治活動家；要他們成爲像列寧一樣光明正大和確定不移的人物；要他們像列寧一樣在戰鬥中是大無畏的和對人民公敵是毫不留情的；要他們在事情開始複雜化並當着在地平線上呈現某種危險的時候，不會發生任何張皇失措的心理，不會發生任何類似張皇失措的心理；要他們像列寧一樣，不發生任何類似張皇失措的心理；要他們在解決複雜問題、需要周密決定方向，周密估計正反各方面時，能够像列寧一樣明智與鎮定；要他們像列寧一樣正直與忠誠；要他們像列寧一樣鍾愛自己的人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斯大林在自己的選舉

區裏的演說」)

—— 列寧、季米特洛夫論必需終結書本與生活的脫離

如果研究共產主義，僅在於吸收共產主義書籍與小冊裏面所包含的東西，我們也許很容易就會成爲共產主義的書袋子或空談家，而這是常常有害於我們的，因爲這種人在生吞了共產主義書籍與小冊裏面包含的東西之後，便不能把這種知識融會貫通，也不能依着共產主義所要求的方法去行動。

舊的資本主義社會遺留給我們的最大的禍害之一，就是把書本與實際生活完全分離。因爲我們會有這樣一些書，在書裏面什麼都描寫得再好沒有，但這些書大半都是些最討厭最虛偽的說謊，它們對共產主義社會的描寫，乃是向壁虛構。所以，僅僅呆板地專心致志於論說共產主義的那些書籍所寫的東西，是極端錯誤的。在我們現在的演說和論文裏，我們並不僅僅重複前人說過的關於共產主義的話，就算了事，因爲我們的演說和論文是與日常的各方面的工作聯系起來的。沒有工作，沒有鬭爭，只有一點從共產主義小冊和書籍裏面所得的關於共產主義的呆板的知識，是一文錢也不值的，因爲它會繼續從前那種理論與實踐的分離，這種分離是舊的資產階級社會裏最令人討厭的一種表現。（列寧：

『論青年學習問題』，見中譯本，『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解放社』版，三二五頁）

現在我們要試答怎樣去學習這些的問題。我底回答是：只有把學校各種活動的每一步驟，把訓練培養與教育的每一步驟，都不可分離地與勞苦大眾反對剝削者的鬭爭聯系起來。（同上，第三三〇頁）

我認爲，我們黨校底基本任務，就在於：教導在校的黨員和團員，使他們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方法、應用到該國的具體環境中去，應用到具體條件中去，應用到反對當前的具體敵人而不是反對「一般的一敵人的鬭爭」上去。爲要達到這個目的，所必須研究的，並不是列寧主義的字母，而是列寧主義底生動的革命的精神。

在我們的黨校中，可以用兩種方法來培養幹部。

第一種方法就是：用抽象的理論來培養人材，給他們灌輸一大堆乾燥知識，教他們用美麗詞藻起草提綱和決議，只是順便涉及該國實際問題，該國工人運動，工人運動底歷史，工人運動底傳統以及該國共產黨底經驗。實在只是順便涉及！

第二種方法，就是要學生在學習理論時，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底根本原則時，必須實際研究本國無產階級鬭爭底具體問題，以便他們後來回去做實際工作的時候，能够獨立決定方向，能够成爲獨立的實際組織者、領導者，能够引導群眾去作反對階級敵人的鬭爭。

並不是所有在我們黨校畢業的學生都是有用的。很多空洞的詞句，很多抽象觀念，一肚子的書本氣味，滿口的皮毛學識。而我們所需要的，却是實在的眞正布爾塞維克的群眾組織者和領導者。我們在今天所迫切需要的，就是這一種人材。就算這種學生不能起草美麗的提綱（雖然我們也很需要能起草美麗提綱的人），但是應當會組織和領導，不怕困難，會剷除困難。

革命的理論，是革命運動之綜合起來的經驗。共產黨員在自己的國家中所應當精密利用的，不僅是國際工人運動其他隊伍之以往的經驗，而且是目前鬭爭的經驗。然而正確利用經驗，這不是機械地把現成的鬭爭形式和方法，由一種條件搬到另一種條件中去，由一個國家搬到另一個國家中去。而這一種機械搬運，在我們黨裏是數見不鮮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甚至於就是蘇聯共產黨底工作形式和

方法，也不可以機械模仿，因襲抄寫。如果你這樣模仿和抄寫，好像我們在實際中所時常看見過的一樣，那麼，就不管你主觀志願如何好，也只能有害於事，而不會有益於事。正是根據俄國布爾塞維克底經驗，我們應當學習怎樣靈活地和具體地在反對資本的鬥爭中來把唯一的國際路綫應用到每個國家的特別環境中去，我們應當學會毫不留情地排斥。鄙棄和號召全體民衆來譏笑各種惡習，例如：說空話，拘守成規，咬文嚼字以及信條主義等等。

同志們！應當學習，應當時刻學習，每一步，在鬥爭過程中，在自由時和在監獄裏，都要學習。學習和鬥爭——鬥爭和學習。應該領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底學說，同時還應當具備有斯大林做工作和做鬥爭時的堅忍精神，斯大林的毫不調和的反對階級敵人和反對離開布爾塞維克主義路綫的份子的原則精神，斯大林的毫不害怕困難的精神，斯大林的革命實際主義。（季米特洛夫：「反戰反法西斯鬥爭的當前問題」，「季米特洛夫文選」，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四三——一四五頁）

一二 恩格斯論單純的理論家不是現實理論家，而是反動的辯護者

一個人，只要他究問一下近十年間國際社會主義文獻的大發展，尤其是馬克思和我的前期著作的譯本種數的增加，他一定會和我一樣，認為這個事實——我只能極少數種文字上對於翻譯者有益，因此，我對於若干請我訂正譯文的人，不得不辭謝——是我自己的一種幸運。但文獻的增加，不過是

際勞動運動也相應發展的一個象徵罷了。這種運動，曾以一種新的責任加於我。自我們公開活動的第一天起，各國社會主義者運動和勞動運動，就有大部份的媒介工作，是落在馬克思和我身上。當這個運動全部益臻於健全時，這種工作是依比例增加起來了。在馬克思未死之前，這種工作的主要部份，是落在馬克思身上。但自他死後，這種益益增加的工作，不得不由我一人擔任。在這時，各國工黨相互間的直接的交際，已成常則；且這個傾向，現今是日加無已。為我的學說工作計，同人們要求我幫助的地方，確實是超過我的願望之上。但像我這樣說，既以五十餘年的精力在這個運動中奮鬥，自應把由此發生的種種工作，視為是應盡的義務，決不能畏避，必須立即實踐的。我們這個動盪的時代，是和十六世紀一樣；對於公共問題，我們決不能單作一個理論家。這種單純的理論家，只能在反動派方面發現，但也就因此，所以這輩先生不是現實的理論家，却只是反動的辯護者。（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恩格斯序言，郭、王譯本，第一頁至第二頁）

一三 斯大林論理論與實際一致的典型——列寧

在現今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政黨的每一個口號和領袖的每一句話，都是被人在事業中間審查的，在這個時期，無產階級要求自己的領袖帶有許多特別的品性。在歷史上，有過這樣一種無產階級的領袖，這種領袖是狂風時期的領袖，實行家式的領袖，這種領袖是不怕犧牲的，是很勇敢，可是，在理論上是很薄弱的。群眾們很不容易忘記這種領袖的名字。可是，整個運動，是不能專靠回憶往事來生存的：運動所需要的，是明顯的目的（綱領），鞏固的路綫策略。比方，德國的拉薩爾，法國的

布蘭克，就是這一類的領袖。還有另外一種領袖，這便是和平時期的領袖，這種領袖在理論上很有力量，可是在組織工作和實際工作方面，却很軟弱。這種領袖只是在無產階級的上層份子裏面才有名望，而且這種名望也不過是暫時的；一等到革命時代到來的時候，當群眾們要求領袖們提出實際革命口號的時候，這些理論家就會退出舞台，就會讓給新興的人物。比方俄國的普列哈諾夫，德國的考茨基，便是這一類領袖。

誰要始終保持無產階級革命的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領袖地位，誰就要同時具備有理論的力量和無產階級運動的實際工作的和組織工作的經驗。當阿克雪洛德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編者按：阿克雪洛德是俄國少數派首領之一，曾參加「勞動解放社」工作），他關於列寧會這樣寫道：「列寧真是幸福得很，他既具備有好的實際家的經驗，又具備有理論的知識和廣闊的政治眼界」（請看阿克雪洛德先給列寧底「社會民主黨的任務」這本小冊子做的序言）。「文明」資本主義底思想家，阿克雪洛德先生，現在又會怎樣批評列寧同志，這是不難猜到的。但是，在我們這些熟習列寧的和能够以客觀態度觀察事物的人們看來，列寧還完全保存着他的這個品性。這是毫無疑義的，列寧，正是列寧，現在是世界上最有力量和最有鍛鍊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這個事實的原因之一，也就在這裏。（斯大林：「列寧是俄國共產黨（布）底組織者和領袖」，「論馬恩列斯」，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六三——一六四頁）

一四 斯大林論黨的布爾塞維克化

爲着實行布爾塞維克化，至少必須努力做到若干基本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各國共產黨之布爾塞維克化，一般地是不可能的。

第一、必須使得黨不把自己看成爲國會選舉機構底附屬物——像社會民主黨在實際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樣，也不能看成爲職工會底不要錢的附加品——如同某些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份子有時對於這點所反覆說的那樣，而應看作是無產階級底階級聯合之最高形式，負着領導無產階級底其他一切形式的組織——自職工會到國會黨團——的使命。

第二、必須使得黨，特別是它的領導者，完全地精通與革命實踐不可分離地聯繫着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

第三、必須使得黨在製定各種口號和指示時，不是根據讀熟了的公式和歷史上的類比，而是根據對革命運動的具體條件——國內的和國際的具體條件周密分析的結果，同時必須顧計到各國革命的經驗。

第四、必須使得黨在群眾革命鬪爭底烈火中檢查這些口號和指示底正確性。

第五、必須使得黨底全部工作——特別若是黨裏的社會民主黨的傳統還未滅絕的話——改造過來，建築在新的、革命的步調上，它使得黨底每一步驟和每一行動自然而然地走向使群眾革命化，走向在革命的精神上培養和教育工人階級底廣大群眾。

第六、必須使得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善於把最高的原則性（不要把清與關門主義相混淆！）和與群眾的最大限度的聯繫及接觸（不要把這與尾巴主義相混淆！）相配合，不然，黨不僅不可能教導群眾，而且也不可能向群眾學習，不僅不可能引導群眾和把群眾提高到黨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傾聽群眾的呼聲，以及推知群眾的迫切需要。

第七、必須使得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善於把不可調和的革命性（不要把這與革命的冒險主義相混淆！）和最大限度的靈活性、機動性（不要把這與遷就行為相混淆！）相配合，不然，黨便不可能掌握各種鬥爭與組織形式，不可能把無產階級日常利益和無產階級革命底根本利益聯繫起來，並且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配合起來。

第八、必須使得黨不掩藏自己的錯誤，不怕批評，而要善於在自己的錯誤上改進和教育自己的幹部。

第九、必須使得黨善於把先進戰鬥員中底優秀份子選拔到基本的領導核心中去，這些優秀份子是十分忠實的，足以成爲革命無產階級之意向底真正的表達者，並且他們是十分有經驗的，足以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底真正領袖，善於運用列寧主義底策略和戰略的領袖。

第十、必須使得黨經常地改善自己組織底社會成份，清除那些腐化黨的機會主義份子，以便達到最高限度的一元性。

第十一、必須使得黨創立起鐵的無產階級的紀律，這種紀律是基於思想底一致性、運動底目的之明確性、實際行動底統一性及廣大黨內群眾對黨的任務之自覺態度而成長起來的。

第十二、必須使得黨有系統地檢查自己的決定和指示之執行，不然，這些決定和指示就有變成空

文的危險，這只能破壞廣大的無產階級群眾對於黨的信任。

沒有這些和類似這些的條件，布爾塞維克化便是空談。（斯大林：「論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塞維克化」，見「真理報」一九二五年二月三日）

第三章 歷史科學的創造

一 馬克思、列寧、斯大林論唯物辯證法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最注意的，他們對其有最重要的和最新的貢獻的，而且成爲他們在革命思想史中所造的重要的進步的，就是：應用唯物辯證法去研究一切政治經濟學，去創造政治經濟學，——去研究歷史、自然科學、哲學以及工人階級底政策和策略。（列寧：『馬克思與恩格斯通信集』，『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六四頁）

馬克思雖然沒有遺留下『論理學』，却留下了『資本論』的論理學。並且還可以充分利用它去應付當前發生的問題，在『資本論』中，論理學，辯證法及認識論（三種名詞是不必要的，三者都是同一的東西）是當做同一科學來應用的。唯物論的認識論吸收了黑格爾的一切貴重的東西，使這一貴重的東西前進不已。（列寧：哲學筆記）

這位作者，（指聖彼得堡「歐洲通訊」的作者——編者）從我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自序」（柏林，一八五九年版，序第六頁至第七頁）——在那裏，我說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論的基礎——中引用一段話之後，說：「在馬克思，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發現所研究的現象的法則。但他認為重要的法則，不僅是已在一定時期具有完備形態且保持相互聯系的現象之法則；他更着重的，是現象變化的法則，是現象發展的法則，是由一形態到他一形態，由一系列關係到他一系列關係的推移的法則。這種法則一經發現，他就進一步，詳細研究這個法則在社會生活上表現的種種結果。……所以，馬克思只關心一件事：那就是由嚴密的科學研究，證明社會關係的次序的必然性，並對於當作出發點和根據點的種種事實，儘可能予以完全的確認。為達到這個目的，他只須證明現在的秩序，有其必然性；同時又證明現在的秩序所必須推移進去的秩序，也有其必然性；至若人是否相信它，是否意識到它，那倒是一點不關緊要的。馬克思認為社會的運動，是一個自然史的過程；支配它的法則，不僅與人的意志意識意圖相對而言時，是獨立的，並且是人的意志意識意圖所由以決定的。……意識要素在文化史上的位置既然如此低，則以文化為對象的批判，自不能以意識的任何形態或結果為基礎。這就是說，能作這種批判的出發點的，不是觀念，只是外部的現象。批判的職務，不是拿事實和觀念來比較對照，却是拿事實和事實來比較對照。在這種批判上，最要緊的，是兩種事實必須儘可能的同受正確的研究；是這兩種事實必須在相互對待的限度內，成為同一發展過程上的相異的要素。但最重要的一點是，必須正確研究諸秩序的順序，研究諸發展階段的次序與聯絡。有人說，經濟生活的一般法則永久是相同的，適用於過去的法則，也必適用於現在。但這正是馬克思否定的事情。依他說，抽象的法則是不存在的。……依照他的意見，每一個歷史時期，皆有它特有的法則。……生命通過一定

的發展時期，由一階段向他一階段推移時，它就開始受別一些法則支配。經濟生活上呈現的現象，與生物學領域內的發展史，頗相類似。……舊經濟學家以經濟法則比於物理學法則或化學法則，他們是把經濟法則的性質誤解了。……更深刻的把現象分析一下，便知諸社會有機體間，和各種動植物有機體間一樣，是有根本的差別的。……且不只此。同一的現象，也因各種有機體的全部構造不相同，因它們的個別器官不相同，因這各種器官作用的條件不相同等等，而須受支配於完全不同的法則。例如，馬克思就否認人口法則是任何時任何地皆同的。他主張，各發展階段有各自的人口法則。……生產力的發展程度不同，社會關係與支配社會關係的法則也不同。馬克思的目標既然是從這個見地，研究說明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所以他所不得不做的，只是嚴密地、科學地，把經濟生活的正確研究所必須有的這個目標，樹立起來。這樣一種研究的科學價值，在闡明社會有機體的發生、生存、發展、死滅，以及由它進到高級社會有機體的演變，是受何種特殊的法則支配。馬克思這書，實際上也

有這種價值。——
 這位作者既如此正確地，敘述了我的真正研究方法，又如此好意地，敘述了這個方法在我手上的應用，他所描寫的，不是辯證法，還是什麼呢？

敘述的方法，當然須在形式上與研究的方法分別。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種種發展形態，並探究這種形態的內部關係。不先完成這種工作，則對於現實的運動，不能有適當的敘述。不過，敘述一經成功，材料的生命一經觀念地反映出來，那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

我的辯證法，不僅在根本上與黑格爾的辯證法不同，且正相反對。在黑格爾，思惟過程——他給它以一觀念一的名稱，把它轉化爲一個獨立的主體，——是現實之創造主，現實僅爲思惟過程的外部

現象。但在我，觀念界却不外是移植在並翻譯在人類頭腦中的物質界。

在黑格爾辯證法仍甚流行的將近三十年前，我已批評過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祕的姿容。但我著作「資本論」第一卷時，猖狂的、自負的、在今日德意志知識份子中頗爲人所信任的庸人，却已像勒新時代的摩塞·門德爾桑對待斯賓諾莎一樣，對待黑格爾，把他看作是一條「死狗」了。因此，我倒公然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門人。在論價值學說的那一章，我還間或採用黑格爾特有的方法來賣俏。辯證法雖在黑格爾手中神祕化了，但綜合地、意識地敘述辯證法一般運動形態的，仍須以他爲第一人。在他手上，辯證法是倒立着。必須順過來，然後才能在神祕的外殼中，發現合理的核。

辯證法，在其神祕姿態上，是德意志的流行品，因爲它使現存事態顯得光彩。但在其合理形態上，辯證法，却引起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的煩惱與恐怖。這是因爲，對於現存事態，它固然包含着肯定的理解，但在這種肯定的理解中，它還包含着它的否定的理解，即現存事態必然歸於消滅的理解。這是因爲，它認爲每一生長的形態是在運動的流中，是暫時經過的；因爲，它不甘受任何物的威壓，在本質上它便是批判的、革命的。（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郭、王譯本）

一、的分裂和它的充滿着矛盾的各部份的認識（可參看拉薩爾著「赫拉克里特」第三篇「認識論」的開始處，從菲倫引用來的關於赫拉克里特的文字），是辯證法的真髓（即使不是根本的特性或特徵，也是「本質」之一，根本特性之一）。黑格爾也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建立問題的（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學」裏，不斷的和這搏鬥着，和赫拉克里特以及赫拉克里特的思想實行競力）。

辯證法的内容的這一方面的正確性，必須要由科學的歷史來加以檢證。辯證法的這一方面，通常（例如在普列哈諾夫那裏）都沒有受到充分的注意，對立的同一性，被解釋做實例的總和（例如如種

子」，「例如原始共產主義」。恩格斯雖然也這樣做着，但這「是爲了通俗化」……，而沒有被看做認識的法則（和客觀世界的法則）。

在數學上：十和一，微分和積分。

在力學上：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學上：陽電和陰電。

在化學上：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會科學上：階級鬭爭。

所謂對立的同一性（也許說做對立的「統一」要更恰當一點吧？本來，同一性和統一，這用語上的差別，在這裏並不特別重要。在某種意味上，兩方同樣都是正確的），就是在自然（也包含着精神和社會）的一切現象和過程中間，認出（揭發出）互相矛盾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傾向。把世界的一切的過程，在它的「自己運動」上，在它的自己的發展上，在它的活生生的生命上來加以認識的條件，就是要把它作爲對立的統一來認識。發展就是對立的鬭爭。兩種根本的（或兩種可能的，或兩種在歷史上被看到的）發展（進化）觀，就是作爲減小和增大，作爲反復的發展觀，和對立的統一（向着互相排斥的對立走去的一個分裂，和這對立間的相互作用）。在第一種發展觀裏，自己運動，它的原動力，它的源泉等，都被拖到暗地裏去了（或者這源泉是被移到外部——神，主觀等等）。在第二種運動觀裏，主要的注意，恰恰就是向着「自己」運動的源泉的認識。第一種看法，是死的、貧弱的、乾燥的東西。第二種看法，是活着的。只有第二種看法，能夠將把握一切存在物的自己運動的鑰匙給予我們。只有它，能夠將理解「飛躍」，「連續性中斷」，「向對立的轉化」，「舊的東西的絕滅

和新的東西的發生的鑰匙給予我們。

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性、合一）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時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着的對立的鬭爭，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

注意——主觀主義（懷疑論及詭辯論等）和辯證法的差別，主要的就是：在（客觀的）辯證法裏，相對的東西和絕對的東西的差別，也正是相對的，在客觀的辯證法看來，相對的東西裏面，包含着絕對的東西。在主觀主義和詭辯論看來，相對的東西就只不過是相對的，而不能與絕對的東西相容。

馬克思在「資本論」裏，一開始就分析着資產階級（商品）社會的、最單純的、最普通的、最根本的、大量的、最日常的，能碰到幾十億次的關係——商品交換。這分析，在最單純的現象中間（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細胞中間），暴露出現代社會的一切的矛盾（或一切的矛盾的萌芽）。從這裏再進一步的敘述，就把這矛盾的發展（生長和運動），這社會的發展，在它的各個部份的總和上，從開始到終末都給我們指示出來。

這應該是辯證法一般（所以要這樣說，是因為資產階級社會的辯證法在馬克思只不過是辯證法的特殊的場合）的敘述（或研究）的方法。從最單純的東西，最普通的東西，大量的東西等等開始，任何一個命題都可以——從樹葉是綠的，伊凡是人，巧奇卡是狗，這一類的命題開始。在這裏（就如黑格爾天才地認出來的一樣）就有着個別的東西即是普遍的東西這樣的辯證法。（參看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西維格勒譯，第二卷二十頁，第三篇第四章八——九頁：「爲什麼，因爲在眼睛所看見的房屋之外，要設想房屋一般的存在，自然是不可能的。」）這樣，對立（個別的東西和普通的東

西是對立着的) 就是同一，個別的東西，不會存在在達到普遍的東西的關聯之外。普遍的東西，只有在個別的東西中間，只有通過個別的東西才能存在。一切個別的東西(總在某種情形上)是普遍的東西，一切普遍的東西，都是個別的東西的(一部份、一方面、或本質)，一切普遍的東西，只是近似的包括着一切的個別對象。一切個別的東西，都是不完全地參入到普遍的東西裏面，其他等等。一切個別的東西，藉着成千的過渡，而和其他種類的個別的東西(物、現象、過程、聯系着，等等。在這裏，已經有着自然的必然性、及客觀聯結等等的要素。萌芽、概念了。偶然的東西和必然的東西、現象和本質，已經在此地存在着了。因為說到伊凡是人，巧奇卡是狗，這是樹葉等時，我們就把一串的標幟當作偶然的東西而加以拋棄，把本質的東西從現象的東西分開，把一個和另一個對立起來。

這樣，我們在任意的命題裏，就像在「細胞」裏一樣，揭發出辯證法的一切的要素，這樣就可以指出(而且必須指出)，人類的一切認識裏，一般地都具有着辯證法。而自然科學也是在這同樣的諸性質上把客觀的自然指示給我們，指出個別的東西向普遍的東西的轉化，偶然的東西向必然的東西的轉化，對立的過渡推移，相互聯結(這也是要用任意的最簡單的實例來指示的)。辯證法正就是(黑格爾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對於事情的這「方面」(這不是事情的方面，而是事情的要點)不加注意的，正就是普列哈諾夫，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則更不用說了。

不論黑格爾，或是包爾·福格曼——自然科學的近代的「認識形而上學者」，折衷主義者，黑格爾主義(他對於這沒有理解!)的敵人——都把認識當做圓的聯系。

哲學的「圓」……「關於人物的年代排列是必要的嗎？否！」

古代……從德謨克里特到柏拉圖，又到赫拉克里特的辯證法

文藝復興期……笛卡兒對加山第（斯賓諾莎？）

現代化……多爾巴克——黑格爾（經過勃克萊，休謨，康德）

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思

與現實的一切處理、現實的一切接近的無數契機相伴隨着的（與那把各契機的每一個加以發展而達到一全體的哲學體系相伴隨着的）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有着無限地增加着的方面的）認識，作爲這樣的認識的辯證法，就在這裏，比起「形而上學」的唯物論來，有着難以計量的豐富的内容。而後者的根本缺陷，就在於不能够在反映論裏，在認識的過程及發展裏應用辯證法。

哲學的唯心論，在粗笨的、單純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看來，只不過是胡說。相反地，從辯證法唯物論的見地來說，哲學的唯心論，乃是把認識的諸特徵、諸方面、諸界限之一，從物質和自然隔離開來，使他片面地、誇張地、過度地（狄慈根）向着神化了的絕對發展下去的東西。唯心論是僧侶主義。這是對的！但哲學的唯心論（「更正確的說」，並且，「除此之外」）又是經過人類的無限地複雜的（辯證法的）認識的契機之一而達到僧侶主義的道路。

人類的認識不是直線（或者說，不是描畫着直線的東西），而是向着圓的聯系，向着螺旋線無限地接近着的曲線。這曲線的任意斷片，碎片和小片，都能轉化爲（純片面的轉化爲）獨立的完全的直線。這樣（如果只看見樹木而不看見森林時），這直線就會引導到泥沼裏，到僧侶主義裏（而支配階

級的階級利害又使這直線固定起來)。直線性和片面性，硬直和化石，主觀主義和主觀的盲目——這就是唯心論的認識論的根源。但在僧侶主義裏，是當然要有認識論的根源的，它不會是無根的東西。它無疑的是一朵虛花，但却是從活的、能結果實的、真的、肥壯的、全能的、客觀的、絕對的、人類認識裏開出來的虛花。(列寧：「關於辯證法的問題」，艾思奇譯，見「解放週報」第六十、六十一號合刊)

辯證法是這樣的學問：它研究對立怎樣能夠同一，怎樣是同一(怎樣成爲同一)——它們在什麼條件下是同一的；而且互相轉化——爲什麼人類的心不能把這對立當做死的、凝固的東西，而必須當做活的、有條件的、可動的、相互轉化的東西。(列寧：「關於黑格爾論理學的筆記」)

……這些辯證法的要素……還可以更詳細地這樣表示出來：

- (一) 觀察的客觀性(不是舉例，不是枝節言論，而是事物本身)。
- (二) 這些事物對於其他事物的多種多樣的關係的總體。
- (三) 這事物(以及現象)的發展，它的固有的運動，它的固有的生命。
- (四) 這事物裏的內在地矛盾着的諸傾向(及諸側面)。
- (五) 作爲對立的總和和統一的事物(現象等)。
- (六) 這些對立的鬭爭，以及展開，諸動向的矛盾等。
- (七) 分析和綜合的統一——各個部份的分解和總體，這些部份的總括。(註：辯證法可以簡單地規定作對立的統一的學說，這樣就可以把握辯證法的核心，但這仍需要說明和發展)
- (八) 各個事物(現象等)的關係，不單只是多樣的，也是一般的、普遍的。各個事物(現象，

過程等) 和各個事物結合着。

(九) 不單只對立的統一，還有各個規定、現象、質、特徵、側面、性質等向着其他各個事物的(向着它的對立的) 推移。

(一〇) 新的側面，關係等等的發見的無限過程。

(一一) 人類對於事物，現象，過程等的認識，是從現象到本質，從比較不深的本質到比較更深的本質深入進去的無限的過程。

(一二) 從並存到因果，從關聯和交互依屬的一形態到其他更深的更一般的形態。

(一三) 低級階段的一定特徵性質等在較高階段上的反復性。

(一四) 舊的東西的外表上的復歸(否定之否定)。

(一五) 內容和形式的，以及這相反的鬭爭，形式的放擲，內容的改造。

(一六) 量到質以及這相反的推移。

(一五和一六是九的實例)

(列寧：『關於黑格爾論理學的筆記』，艾思奇譯，見『解放』第六十一期)

在認識論上，也和在其它科學領域上一樣，應該用辯證去考察的。即：我們不應視我們的知識為已成的，不可變的；而應該研究如何由無知識到有知識，如何由不完全的、不正確的知識變成更完全的更正確的。(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譯本，第一〇一頁)

黑格爾：『某件事情的可能或不可能，是要看它的內容如何，也就是要依據於現實性(在發展中把自己表現為必然性的現實性)的諸要素的總體』。

列寧註：「注意：現實性的諸要素的總體的展開是辯證法的認識之本質。」（列寧：「關於黑格爾論理學的筆記」，艾思奇譯）

注意：認識是思惟對於客體的永遠的無限的接近，人類思想中的自然的反映，是不應該看做「死的東西」，「抽象的」，沒有運動的東西，沒有矛盾的東西，而應該看做運動的永遠的過程，矛盾的發生和它的解決的永遠的過程。（同上）

思想和客觀的一致，是一個過程。思想（人類）並不把眞理設想作死的靜止，設想作沒有衝動和運動的，僵固了的東西（無生氣的東西）的單純的姿影（像）。……

理念在自己的內部保有着極強力的矛盾，……在永遠把它（思想和客觀的這種矛盾）產生出來，永遠把它克服了的地方，在這樣的固定性和確實性中，才有着（人類的思想的）安靜。（同上）

現象，現實性，及其「交互」關係的一切側面的總體——這一切，就構成眞理。眞理（理念）是全面的。（同上）

黑格爾：「舊的論理學裏沒有推移，沒有一切部份的「內在的必然的聯系」之發展（概念及思惟的），沒有這些部份相互間的推移。」

列寧：在這裏：黑格爾有以下的兩個根本要求：1、聯系的必然性及2、差別的內在的發生。——這是非常重要的，這在我想來，是有着以下的意味：1、所與現象領域的一切側面，力，傾向等等必然的聯系，客觀的聯系；2、差別的內在的發生——兩極性的差別之開展和鬭爭的，內在客觀的論理。（同上）

黑格爾：不是僅僅抽象的一般，是把特殊者的豐富內容包含在自己內部的一般。

列寧：這是很高明的公式——「不是僅僅抽象的一般，而是把特殊的東西，個體的東西，個別的東西等等的豐富內容（特殊的東西及個別的東西的一切豐富的內容）體現在自己內部的一般」。妙！（同上）

關於根據和條件一節，列寧對黑格爾這樣批評：倘若我沒有錯誤的話，那麼，在這裏，在這些結論中，有着很多黑格爾的神祕主義和空洞的術學辭，但根本的思想是天才的。萬物和萬物的，全部的，全面地生動的聯系，以及這些聯系在人類的概念中的反映——要理解世界，人類的概念就也必須要被鑿磨，被雕琢，必須富於伸縮性，必須是可動的，相對的，相互關聯着，在對立上統一着的東西。（同上）

辯證法是導源於希臘文（*diaikos*）一字，其含義，就是進行談話，進行論戰。古代人所謂辯證法，就是藉助於揭露對方議論中的矛盾並克服這些矛盾來求得真理的方術。古代有些哲學家認為思惟中的矛盾之揭破以及對立意見之衝突，乃是發現真理的最好方法。這個辯證的思惟方式，後來推廣到自然界現象中去，就變為辯證的認識自然界的方法，這個方法，把自然界現象看作永恆運動着和永恆變化着的現象，而自然界之發展，乃是自然界中各種矛盾發展的結果，乃是自然界中各對立勢力相互影響的結果。

辯證法在自己的基本上，是與玄學正相反對的。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底基本特徵如下：

（一）辯證法與玄學相反，它把自然界不是看作什麼彼此隔離的、彼此孤立的、彼此不相依賴的各個對象，各個現象之偶然的積聚，而是看作聯系着的、統一的整體。在這裏，各個對象，各個現

象，是互相有機聯系着，互相依賴着，互相制約着。

因此，辯證方法認為：自然界中任何一個現象，如果把它孤獨拿來看，把它看作是與其周圍現象沒有聯系的，那它就不能被人瞭解。因為自然界任何一部份中的任何一個現象，如果把它看作是與其周圍條件沒有聯系的，是與它們隔離的，那它就會變成毫無意思的東西。反之，任何一個現象，如果把它看作是與其周圍現象密切聯系的，把它看作是受其周圍現象所制約的，那它就能被人瞭解和被人論證。

(二) 辯證法與玄學相反，它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靜止的和不動的形態，停頓的和不變的形態，而是看作不斷運動的和不斷變化的形態，不斷革新的和不斷發展的形態。在這裏，無論何時，都總有某種東西在產生着和發展着，都總有某種東西在破壞着和腐朽着。

因此，辯證方法要求人們在觀察現象時，不僅只是以各現象底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為觀點，而且以它們的運動，它們的變化，它們的發展為觀點，以它們的產生和死亡為觀點來加以觀察。

在辯證方法看來，最重要的，不是那在現時似乎堅固，但已經開始死亡的東西，而是那正在產生着和正在發展着的東西，即令它在現時還似乎是不堅固的。因為在辯證方法看來，只有正在產生着和正在發展着的東西，才是不可被戰勝的。

恩格斯說：

「整個自然界，由其最小單位到最大物體，由沙粒到太陽，由 *Protozoa* (原始的活細胞。

——編者) 到人，都是處在永恆的產生和消滅過程中，處在毫不間斷的流動中，處在始終不倦的運動和變化中。」(「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四八四頁)

因此，——恩格斯說，——辯證法之一觀察對象及其精神的反映，主要是在他們的相互聯系中，在它們的結合中，在它們的運動中，在它們的產生和消滅中，去觀察它們。」（同上，第二三頁）

（三）辯證法與玄學相反，它不是把發展過程看作簡單的增長過程，在這裏，數的變化，並不引起質的變化；——而是看作這樣的發展，這個發展是由不大的和不顯露的數的變化進到顯露的變化，根本的變化，質的變化，在這裏，質的變化之到來並不是逐漸的，而是迅速的，突然的，是表現於由一個形態之飛躍式地進到另一個形態；質的變化之到來，並不是偶然地，而是有規律地，是由於許多不明顯的逐漸的數的變化之積累起來的結果。

因此，辯證方法認為：發展過程，不應當瞭解為循環式的運動，不應當瞭解為過去事物之簡單的重複；而應當瞭解為前進的運動，上升的運動，由舊的質態進到新的質態，由簡單而發展到複雜，由低級而發展到高級。

恩格斯說：

「自然界乃是試驗辯證法的試金石，而現代的自然科學，既供給這個試驗以非常豐富的與日俱增的材料，於是它就證明了：在自然界中，歸根到底說來，一切都是辯證法式地進行的，而不是玄學式地進行的；自然界並不是在永遠一樣的、經常輾轉重複的循環週裏運動着，而是經歷着實在的歷史。在這裏，首先就應當指出達爾文，他給了玄學的自然觀以最有力的打擊，因為他證明了：整個現代有機界，植物和動物，因而也就是說人類，乃是那會延長到幾百萬年的發展過程底產物。」（同上，第二三頁）

恩格斯在說明辯證法發展過程乃是由數變進到質變的過程時說：

「在物理學中……每一個變化，都是由數進到質，即某個物體所固有的或某個物體所承受的某種運動底數量之數變的結果。例如，水之溫度，在最初時候，對於水之液體形態，是沒有絲毫意義的，然而，當液體的水之溫度，不斷增加或不斷減少時，那就會有這樣一個時機到來，那時，這個結合形態就要變化，於是水就會變為蒸汽或冰塊……例如，必須具有一定最低限度的電力時，白金絲才開始發光；例如每種金屬，都有其一定的熔點，例如，每種液體，都有其一定的——在相當氣壓之下——冰點和沸點，——既然我們能用我們所有的工具求得相當的溫度；最後，例如，每種氣體，都有其一定的臨界溫度，當它冷到臨界溫度時，只要施以相當的氣壓和壓力，就可把它變成液體了……。物理學中所謂 Constants（即由某一種形態到另一種形態的過渡點。——編者），大部份都不過是這樣一些交錯點底名稱，在這些交錯點上，運動之數的增減（變化）引起該物體形態之質的變化，——因而也就是說，在這些交錯點上，數轉變為質。」

（同上，第五二七——五二八頁）

其次，恩格斯就進而說到化學，他繼續說：

「化學可以稱為研究物體底質變的科學，這種質變是在數量成份變化之影響下發生的。黑格爾自己已經知道這一點。……譬如拿養氣來說：如果結合在一個分子中的，是有三個原子，而不是如普通那樣只有兩個原子，那我們就得到臭氣，就是說，得到一種按其氣味和作用都與普通養氣不同的物體。更不待說，如果把養氣與淡氣或硫磺按各種比例結合起來，那麼其中每一種比例的結合，都產出一種以其質別於其他一切物體的物體哩！」（「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五二八頁）

最後，恩格斯在批評杜林時，——而杜林曾大罵黑格爾，——但同時却又暗中顛覆黑格爾底著名原理：由無感覺世界進到感覺世界的過渡，由無機物世界進到有機生物世界的過渡，乃是進到新形態的飛躍；——恩格斯在批評杜林時說：

「這正是黑格爾式的數質關係交錯線，在這線上，純粹數的增減，到一定交錯點上就引起質的飛躍，例如，水液被燒煮或冰凍時，沸點或冰點就是這樣的交錯點，在這些交錯點上——在通常的氣壓之下——就發生舊的物態進到新的物態的飛躍，因而也就是說，在這裏，是數轉變爲質」。 (同上，第四五——四六頁)

(四) 辯證法與玄學相反，它是從以下一點出發，就是自然界的對象，自然界的現象，具有內在的矛盾，因爲所有這些對象、現象，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過去和將來，都有其腐朽着的東西和發展着的東西，這些對立方面之間的鬭爭，舊的與新的之間的鬭爭，衰亡着的和產生着的之間的鬭爭，腐朽着的和發展着的之間的鬭爭，就構成發展過程之內在的內容，由數變進到質變的過程之內在的內容。

因此，辯證方法認爲：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並不是經過各現象之協和的開展，而是經過各對象，各現象所固有的矛盾之揭露，經過那在這些矛盾基礎上動作的互相對立趨勢之「鬭爭」。

列寧說：

「辯證法，按其本意說來，就是研究對象自身本質內在的矛盾。」 (列寧：「哲學筆記」，

第二六三頁)

其次：

「發展就是各對立方面之間的「鬭爭」。(『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三〇一頁)

簡略說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底基本特徵，就是如此。

不難瞭解：把辯證方法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研究社會歷史，這是有如何巨大的意義；把這些原理應用到社會歷史上去，應用到無產階級黨底實際活動上去，這是有如何巨大的意義。

如果在世界上沒有孤立的現象，如果所有一切現象都是彼此聯系着並互相制約着，那麼很明顯的，在估計歷史上的每一個社會制度和每一個社會運動時，都不要以『永恆正義』或其他某種成見爲觀點，如歷史家時常所作的那樣，而是要以這個制度和這個社會運動所由產生並與之關聯的那些條件爲觀點。

奴隸佔有制度，就現代的條件看來，乃是荒謬的現象，反自然的蠢事。而奴隸佔有制度在瓦解着的原始公社制度條件之下，却是完全可以瞭解的並且合於規律的現象，因爲它和原始公社制度比較起來，乃是前進一步。

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要求，在沙皇制度存在和資產階級社會存在條件之下，譬如說，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國，會是完全可以瞭解的，是正確的革命的要求，因爲在當時，資產階級共和國，乃是前進一步。而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要求，就我們蘇聯現時的條件看來，却是荒謬的反革命的要求，因爲資產階級共和國與蘇維埃共和國比較起來，乃是後退一步。

一切都以條件、地方以及時間爲轉移。

顯而易見的，如果沒有這樣的歷史的觀察社會現象的態度，那麼歷史科學就沒有存在和發展，因爲只有這樣的態度，才能使歷史科學不致於變成種種偶然現象的糊塗賬，不致於變成荒謬絕倫的錯誤

堆。

其次。如果世界是處在不斷運動和不斷發展中，如果舊東西之死滅和新東西之生長，乃是發展之規律，那麼很明顯的，再也沒有什麼「不變不易的」社會秩序，沒有什麼私有制和剝削制的「永恆原則」，沒有什麼農民服從地主，工人服從資本家的「永恆觀念」了。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制度是可以由社會主義制度來代替的，正好似資本主義制度在當時替代了封建制度一樣。

由此可見，不是要指靠於社會裏那些已經不再發展的階層，即令這些階層在現時還是佔較大比的力量，而是要指靠於社會裏那些正在發展着，並且有遠大前程的階層，即令這些階層在現時還不是佔較大比重的力量。

在第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馬克思主義者和民粹派鬭爭的時代，無產階級在俄國與當時佔居民絕大多數的個體農民比較起來，還佔不大的少數。然而當時，無產階級之為階級，是發展着，而農民之為階級，則日趨瓦解。而正是因為無產階級之為階級是發展着，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就指靠於無產階級。而且他們並沒有弄錯，因為，大家知道，無產階級後來已由一個不大的力量發展成爲頭等的歷史的和政治的力量。

由此可見，爲着不致在政治上弄出錯誤，那就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

其次。如果由遲慢的數變進到迅速的突然的質變，乃是發展的規律，那麼很明顯的，由被壓迫階級所實行的革命大變革，就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現象。

由此可見，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工人階級之擺脫資本主義壓迫，決不能是經過緩慢的變

化，決不能是經過改良來實現，而只能是經過資本主義制度之質變，經過革命來實現。

由此可見，爲着不致在政治上弄出錯誤，那就要做革命家，而不是做改良主義者。

其次。如果發展之進行，是經過內在矛盾之揭露，經過基於這些矛盾的彼此對立勢力之衝突來克服這些矛盾，那麼很明顯的，無產階級的階級鬭爭，就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現象。

由此可見，不是要掩飾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各種矛盾，而是要暴露和揭開它們，不是要熄滅階級鬭爭，而是要把它進行到底。

由此可見，爲着不致在政治上弄出錯誤，就要進行不調和的階級的無產階級的政策，而不是進行調協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的改良主義政策，而不是進行讓資本主義一長成『社會主義的妥協主義政策。

如果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應用到社會生活上來，應用到社會歷史上來，那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就是如此。（『蘇聯共產黨（布）歷史』，中譯本，蘇聯版，第一二四——一三一頁）

二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

法則是從自然和歷史中找尋出來。

法則以合乎自然及歷史爲依歸

我們只曉得一種唯一的科學——就是歷史科學。歷史可以兩方面去看，也可以分作人類史與自然史。但是不能讓這兩者分離，人類存在一日，人類史與自然史的相互影響便延長一日。（馬克思：「德意志的思想」）

事情不是在於把辯證法的法則，臆想出來並任意輸入於自然界中，而是在於把這些法則從自然界中尋找出來、闡發出來。（恩格斯：「反杜林論」三版序言，中譯本、抗戰書店版，第一三頁）

人類的歷史，……成了人類本身發展的過程，現在思想家的任務，即在於從一切迷亂中，追蹤這一過程的依次發展的階段，並在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中證明出過程的內在的規律性。（同上，第三四頁）

原則並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終了的结果；這些原則不是用於自然界及人類歷史，而是從自然界及人類歷史中，被抽象化出來；並不是自然界與人類，適應於原則，而是原則的正確性，要以吻合自然及歷史與否爲依歸。（同上，第四八——四九頁）

政治經濟學……是一種歷史的科學。它要研究歷史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考察生產和交

換發展上每一個別階段的特殊法則，只在經過這種考察之後，它方才能够定出很少的最一般的可以用於一般生產和交換的那種法則。（同上，第一九四頁）

我決非用玫瑰的顏色來描寫資本家地主的姿態。在此，一切個人，都被視為經濟範疇之人格化，被視為特殊階級關係與利益之代表。經濟社會形態的發展，從我的立場看，乃是自然史上的一個過程。無論個人在主觀方面可以怎樣超出周圍的種種事情，他在社會方面總歸是周圍種種事情的產物。從我的立場看，他對於這種種事情的發生，是和別的人一樣不負責任的。

自由的科學的研究，在經濟學範圍內所遇到的敵，不僅和它在其他範圍內所遇到的相同。經濟學研究的材料，含有一種特殊的性質，那會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喚起，把代表私人利害的仇神召到戰場上來，成爲自由的研究之敵。例如對英國國教會。你在三十九個信條中攻擊了他三十八條倒不要緊，他也許還會原諒你，但若你在他的收入中，奪去了他的三十九分之一，他一定恨你入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初版序，郭、王譯本第三頁）

唯物論指「客體本身」或「心外的客體」的承認，觀念或感覺是那些客體的模寫或影像。反對的學說（唯心論）「主張心之外沒有客體存在着，客體是感覺的結合。（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譯本，第七頁。按：這裏所搜集的譯文，有許多是經搜集者改譯了的。）

唯物論者既認現實的世界，即我們知覺着的物質，爲客觀的實在，便有權推論：凡是在時間和空間的限界之外的任何人類的空想物，不論是從什麼目的上說，都是非現實的。（同上，第二〇三頁）

如果你很想對主觀主義和唯我論警戒着，那麼，你應防備着唯心論的根本前提，你應改變你的唯心論的方向，從外部世界走到感覺，不從感覺走到外部世界。（同上，第四四頁）

黑格爾：「既知的思惟諸形式」是屍骸的沒有生命的骨片」。

列寧解釋說：必要的不是生命的骨片，而是活的生命。（列寧：『關於黑格爾論理學的筆記』）人類在其實踐的活動中，有着與自己相對待的客觀世界，並依存於這客觀世界，根據着這客觀世界，來規定自己的活動。

實際上，人類的目的，乃是由客觀世界產生出來，以後者為前提，把後者看作所與的，現存的東西。但在人類看來，他們的目的，好像是從世界之外取出來的、離開世界而獨立的東西。（同上）

黑格爾：「真理的認識，在於不混雜着主觀的反省而去認識客觀。」

列寧註：客觀的認識。（同上）

離開了理解（認識，具體的研究等等）的過程，就不可能得到認識。要得到認識，就必須從經驗中來開始進行理解研究，再由經驗上昇到普遍。要學游泳，就必須跳進水中。（同上）

狄慈根在他的著作『哲學的果實』上說：『客觀的科學與主觀的理解相異，因為這樣的一種科學不以信仰或內省的思辯，只以經驗和歸納，不以「先驗的」，只以「後驗的」，透察它的對象的原因。自然科學不在自然現象外或在自然的現象背後，而在它們的內部或通過它們來尋求原因。……原因只是思惟能力的產物，但這並不是思惟能力的純粹的產物，而是由思惟能力與感性材料的結合上產生出來的東西。因此這感性材料，對於被產生出來的東西，就給與客觀的存在。恰如我們主張：真理應是關於幾種客觀的現象的真理一樣，我們也主張：原因應是實在的，應是幾種客觀的結果之原因。』（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第一七三頁）

費爾巴哈承認自然法則的客觀性，即秩序，法則，和其他的人類的表象，僅近似地模寫客觀的

因果性。……因果性問題上的主觀主義的方向——不從外部客觀世界，而從意識，理性，論理等等演繹出自然的秩序及法則來的方向，是不僅只把理性從自然隔離開，把前者和後者對立起來，而且是把自然看做理性的一小部份，而不把理性看做自然的一小部份。因果性問題上的主觀主義的方向，就是哲學的唯心論。（同上，一七〇頁）

這法則（編者按：指波義耳的氣壓法則）裏所含的「一粒真理」，只在特定的限度之內是絕對的真理。可以知道法則「僅僅近似地」是真的東西。（同上，一四一頁）

關於原因與結果的人類的見解，常是多少地把「自然」的現象之客觀的關聯單純化，它僅近似地反映自然，人為地把同一世界過程的這一面或那一面隔別起來。（同上，一七一頁）

恩格斯責難自然哲學把「觀念的，空想的關聯來代替」「未知的現實的關聯」。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上極明白地承認自然法則的客觀性，因果性和必然性，同時，也強調我們人類的各種概念對於這些法則所作的近似的反映，是有着相對的性質的。（同上，一七二頁）

唯物論一般地承認客觀地實在的存在物（物質）獨立於意識，感覺，經驗等等而存在着。史的唯物論承認社會的存在獨立於社會的意識之外。意識，在這裏和在唯物論的場合，都只不過是存在之反映，最多不過是存在之近似地真實的（適合的，觀念上正確的）反映。（同上，三九〇頁）

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的一切分歧交錯裏面，這些變化的總計，雖七十個馬克思也不能無餘蘊地理解。馬克思所能做到的，只是：發見這些變化的法則，大綱地表明這些變化的客觀的理論及其歷史的發展。（同上，三八八頁）

思想的範疇，不是人間的用具，而是自然及人間的規律性的表現。（列寧：「關於黑格爾論理學

的筆記」)

黑格爾：理論考察的「對象不是事物，而是事態，是事物的概念」。

列寧：「不是事物，而是事物的運動法則。」(同上)

法則是現象中的鞏固的東西，法則把握着靜止的東西——因此法則、一切法則、都是狹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現象比法則更豐富。(同上)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基本特徵如下：

(一) 馬克思的哲學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相反，唯心主義認為世界是「絕對觀念」，「宇宙精神」、「意識」之體現，——而馬克思底哲學唯物主義底出發點，則是認為：世界按其本質說來，是物質的；世界上的五光十色的現象，乃是運動着的物質底各項形式；各現象之由辯證方法所判定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乃是運動着的物質底發展規律；世界是按物質運動規律而發展着，它並不需要任何「宇宙精神」。

恩格斯說：

「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不過就是對自然界本來面目的瞭解，而不需要任何外來的附加。」

(「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六五一頁)

列寧談到古代哲學家赫拉克里特底唯物主義觀點時，而照這個觀點看來，「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體，它不是由任何一個神所造成，也不是由任何一個人所造成，而曾經是、現在是、將來也還是永恆生動的。按規律燃燒着的並按規律熄滅着的火」，——列寧論到這個觀點時說：「這是辯證唯物主義基礎之很好的敘述」。(列寧：「哲學筆記」，第三一八頁)

(二)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相反，唯心主義斷言，說只有我們的意識才是真實存在着，說物質世界、存在、自然界，只是在我們的意識中，只是在我們的感覺、觀念、概念中存在着，——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底出發點，則是認為：物質、自然界、存在，乃是在意識以外和不依賴於意識而存在的客觀現實；物質是第一性的現象，因為它是感覺、觀念、意識的來源；而意識則是第二性的現象，是從生的現象，因為它是物質的反映，是存在的反映；思維是發展到完善高度的物質的產物，就是說，是人腦的產物，而人腦則是思維的器官；因此，如果不願意大錯特錯，那就不可把思維和物質分開。

恩格斯說：

「整個哲學的最高問題，就是思維對於存在的關係，精神對於自然界的關係問題……。哲學家們之分成了兩大營壘，就是按他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為標準。凡斷定說精神先於自然界而存在着，……就組成唯心主義的營壘。而凡認為自然界是基本起源者，則屬於唯物主義底各個學派。」（『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三二九頁）

其次：

「物質的、可以感覺得到的世界，即我們自己也屬於它的世界，乃是唯一的真實的世界……我們的意識與思維，無論它是如何彷彿像是超感覺的東西，總是物質的。實體的器官底產物，即人腦底產物。物質不是精神底產物。而精神自己不過是物質底最高的產物。」（同上，第三三二頁）

馬克思談到物質與思維問題時說：

「決不可把思維與思維着的物質分開。物質是一切變化之主體。」(同上，第三〇二頁)
列寧在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底特徵時說道：

「一般唯物主義就是承認客觀現實的存在(物質)，這個存在是不依賴於意識的，是不依賴於感覺的，是不依賴於經驗的……意識……只是存在之反映，至多也不過是存在之近乎正確的(等量的理想地確切的)反映。」(『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六六至二六七頁)

其次：

(1) 「物質就是射着我們的感覺器官而引起感覺的東西；物質是我們可以感覺得到的客觀現實……。物質，自然界，存在，物理現象，乃是第一性的現象，而精神、意識、感覺、心理現象，則是第二性的現象。」(同上，第一一九至二〇頁)

(2) 「世界底情景，就是物質如何運動着和「物質如何思想着」的情景。」(同上，第二八八頁)

(3) 「人腦是思想底器官。」(同上，第二二五頁)

(三)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否認世界及其規律是可以認識的，不相信我們的知識是確實的，不承認有客觀真理，並且認為世界是充滿着那些為科學所永遠不能認識的「自在之物」，——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底出發點，則是認為：世界及其規律是完全可以認識的，我們關於自然界規律的知識，既然已為經驗、實踐所考驗，就是具有客觀真理意義的確實知識；世界上沒有不可認識之物，而只有尚未認識之物，這些尚未認識之物，將被科學和實踐力量所揭明和認識。

恩格斯在批評康德及其他唯心主義者關於世界不可認識和「自在之物」不可認識的原理，而堅持關於我們的知識底確實性的唯物主義著名原理時，寫道：

「而把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學遁辭駁斥得最澈底的，就是實踐，就正是實驗和工業。既然我們能够以這樣的方法來證明我們對於自然界某一現象的了解之正確，就是說，我們自己把它製造出來，依它的條件而把它產生出來，並強迫它服務於我們的目的，——既然如此，那麼，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要消滅了。在動植物身體上所形成的種種化學原素，當有機化學還未開始把它們一一製造出來時，會仍然是這類的「自在之物」；而當有機化學已開始把它們一一製造出來時，「自在之物」就變成了爲我之物了；例如拿亞里查林，即茜素顏料來說，我們現在並不是從拿生於田野的茜草根上取得它，而是更便宜得多地、更簡單得多地從煤焦油中取得它。哥白尼底太陽系學說，曾於三百年中被人視爲假設，固然是很可信的假設，但終究是一種假設。可是，當列月爾略根據這太陽系學說底論據，不僅已證明一定有一個前此所未知的行星存在，而且已用計算方法確定它在天空中所佔的地位，後來，當加列果然已發現這個行星時，哥白尼的太陽系學說，就被證明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三三〇頁）

列寧在責備波格達諾夫、巴查羅夫、尤史克維奇以及其他馬赫信徒爲崇神主義，而堅持唯物主義底著名原理，認爲我們的關於自然界規律的科學知識是確實的知識，認爲科學底定律乃是客觀的真理時，說道：

「現代的崇神主義並不否認科學；它只是否認科學底「過分欲求」，即科學想成爲客觀真理的欲求。既然有客觀真理存在（如唯物主義者所想的那樣），既然只有在人類「經驗」中反映着外

部世界的自然科學，才能給我們以客觀真理，那麼，任何崇神主義就毫無條件地被推翻了。」
（『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〇二頁）

簡略說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底顯著特徵，就是如此。

容易懂得：把哲學唯物主義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去研究社會歷史，這是有如何巨大的意義；把這些原理應用到社會歷史上去，應用到無產階級黨底實踐活動上去，這是有如何巨大的意義。

既然自然界中各現象之相互聯系以及其相互制約，乃是自然界發展的規律，那麼由此可見，社會生活中各現象底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就同樣也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會發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社會生活，社會歷史，就不復是一種種偶然現象之湊合，因為社會歷史已成爲社會之規律性的發展，而社會歷史之研究，則已變爲科學。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底實際活動，應當不是以「卓越人物」底善良願望爲基礎，不是以「理性」，「普遍道德」等等底要求爲基礎，而是以社會發展底規律爲基礎，而是以這些規律底研究爲基礎。

其次。既然世界是可以認識的，既然我們關於自然界發展規律的知識乃是具有客觀真理意義的確實知識，那麼由此可見，社會生活，社會發展，也同樣是可以認識的，而科學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論據，就是具有客觀真理意義的確實論據。

由此可見，社會歷史科學，不管社會生活中的現象如何複雜，總都能够成爲例如生物學一樣的實驗科學，它能够利用社會發展規律來供實際的應用。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在其實際活動中，應當不是以什麼偶然的動機爲準則，而是以社會發展規

律，以及由這些規律中所得出的實際結論爲準則。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就由關於人類美滿未來的空想變成爲科學。

由此可見，社會和實際活動間的聯系，理論和實踐間的聯系，它們的一致，就應當成爲無階級黨的指路明星。

其次，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質世界是第一性的現象，而意識。思惟是第二性的現象，是從生的現象；既然物質世界是不依賴於人們意識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意識則是這客觀現實之反映，那麼由此可見，社會底物質生活，社會底存在，也是第一性的現象，而社會底精神生活，則是第二性的現象，從生的現象；社會底物質生活，乃是不依賴於人們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社會底精神生活，則是這客觀現實之反映，存在之反映。

由此可見，社會的精神生活藉以形成的來源，社會觀念、社會理論、政治觀點、政治組織藉以產生的來源，不是要到觀念、理論、觀點、政治組織本身中去尋找，而是要到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中，社會存在中去尋找，因爲這些觀念、理論、觀點等等，乃是這社會存在之反映。

由此可見，如果在社會歷史各個不同的時期，我們可以看見各種不同的社會觀念、理論、觀點、政治組織，如果在奴隸制度之下，我們所遇見的，是一種社會觀念、理論、觀點、政治組織，在封建制度之下——却是另一種，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却是第三種，那麼這就不是由於觀念、理論、觀點、政治組織本身底「天性」和「屬性」，而是由於在社會發展底各個不同的時期，有各個不同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

社會底存在怎樣，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怎樣，——那麼，社會底觀念、理論、政治觀點、政治組

織也就是怎樣。

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說：

「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恰巧相反，而是人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人們底意識。」
（「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二六九頁）

由此可見，爲着不致在政治上弄出錯誤，爲着不致陷入空洞臆想家的地位，那麼無產階級黨在自已的活動中，就應當不是從抽象的一人類理性原則——出發，而是從社會底具體的物質生活條件，即社會發展底有決定作用的力量出發；不是從偉大人物底善良願望出發，而是從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之現實需要出發。

空想派——民粹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也包括在內——之所以陷於覆亡，其中也是因爲他們不承認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在社會底發展過程中的首要作用，而且他們既然陷入唯心主義，於是就把自己的實際活動不是建築在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之需要上面，而是——不依賴於這些需要並違反着這些需要——建築在那些脫離社會現實生活的「理想計劃」和「包羅萬象的草案」上面。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之所以強有力和生氣勃勃，就是因爲它在自己的實際活動中，正是憑藉於社會底物質活動發展之需要，而無論何時也不脫離社會底現實生活。

可是不應當從馬克思這段話裏面作出結論，說社會的觀念、理論、政治觀點、政治組織在社會底生活中沒有意義，說他們不反轉來影響到社會的存在，影響到社會生活物質條件之發展。我們在這裏暫且只說到關於社會的觀念、理論、觀點、政治組織之起源，關於它們之產生，關於社會底精神生活是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之反映。至於說到社會的觀念、理論、觀點、政治組織底意義，至於說到它們

在歷史上的作用，那麼，歷史唯物主義不僅不否認，而且恰巧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們在社會生活中，在社會歷史中的嚴重作用和意義。

有各種各樣的社會的觀念和理論。有舊的觀念和理論，這些觀念和理論，已經腐朽，而且是服務於社會裏正在腐朽着的勢力底利益。它們的意義，就在於他們是阻礙着社會之發展，阻礙着社會之前進。同時又有新的、先進的觀念和理論，這些觀念和理論是服務於社會裏先進勢力底利益。它們的意義，就在於它們是促進着社會之發展，促進着社會之前進，而且，它們愈是確切反映着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之需要，它們就獲到愈加巨大的意義。

新的社會的觀念和理論，只有當社會底物質生活之發展已在社會面前提出新的任務以後，才產生出來。然而，當它們已經產生出來以後，它們就成爲最嚴重的力量，能促進解決由社會底物質生活之發展過程所提出的新任務，能促進社會之向前發展。正是在這裏，就表現出新觀念、新理論、新政治觀點、新政治組織底最偉大的組織的、動員的以及改造的意義。新的社會觀念和理論之所以產生出來，就是因爲它們是爲社會所必需，因爲如果沒有它們的組織的、動員的以及改造的工作，就沒有可能來解決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過程中已經成熟的任務。新的社會觀念和理論，既然已在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過程所提出的那些新任務基礎上產生出來，它們就給自己開闢道路，而變爲民衆所享有的東西，動員民衆，組織民衆去反對社會裏正在腐朽的勢力，並因此而便利着推翻社會裏正在腐朽的，阻礙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勢力。

於是，社會的觀念、理論、政治組織既然已在社會底物質生活之發展過程、社會存在之發展過程中已經成熟的任務基礎上產生出來，——它們自己然後就影響到社會存在，影響到社會底物質生活，

並造成必要的條件，以便澈底解決社會底物質生活中之已經成熟的任務，並使這社會底物質生活之向前發展成爲可能。

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說：

「理論只要一掌握群眾，就立刻成爲物質的力量。」（「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四六〇頁）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爲要有可能去影響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並加速其發展，加速其改善，它就應當憑藉於這樣一個社會理論，憑藉於這樣一個社會觀念，這個理論和這個觀念，是正確反映出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之需要，並因此而能够發動廣大民衆，能够動員他們並把他們組織成無產階級黨底偉大軍隊，這個軍隊是決意打破社會裏的反動勢力並給社會裏的先進勢力打通道路的。

「經濟主義者」和孟塞維克們之所以陷於覆亡，就中也是因爲他們不承認先進理論，先進觀念底動員的、組織的、改造的作用，而他們既然落到庸俗唯物主義中去，於是就會去把先進理論、先進觀念底作用，幾乎化爲烏有——所以，他們就會去使黨陷於消極的地步，陷於苟延殘喘的地步。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之所以強有力和生氣勃勃，就是因爲它是憑藉於正確反映出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之需要的先進理論，把這理論提到它所應有的高度，並以澈底利用這理論底動員的、組織的、改造的力量爲己任。

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這樣來解決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之間的關係，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條件和社會底精神生活發展之間的關係問題的。（「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歷史」，莫斯科「外國文書藉出版局」版一三一——一四〇頁）。

三 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

論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內容

生產不論採取何種社會形態，勞動者與生產手段常爲其因素。但這兩種生產因素的任何一方面，都只能在可能性上分離開來。它們必須互相結合，才能有所生產。社會結構上各種不同的經濟時代，就是憑這種結合所成就的特殊方式，來區別的。（馬克思：『資本論』，郭、王譯本，第二卷，第一一頁）

工藝這件東西，可以啓示人類對於自然之能動的關係，啓示人類生活之直接的生產過程，從而，啓示人類的社會的生活關係，及以此爲基礎的精神的概念。若把這個物質基礎捨去，宗教史也將成爲非批判的。當然，依分析，以發現宗教幻想的現世的核心，是件更容易得多的工作；而由現實生活關係展開它的天國化的形態，却是件更難得多的工作。但後者是唯一的唯物論的方法，從而是唯一科學的方法。抽象的自然科學的唯物論之缺點是排斥歷史過程。要知道這一點，請注意，這種唯物論的發言人，一離開他們的專門領域，便會發出種種抽象的觀念學的概念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郭、王譯本，第二九八頁）

在不同的財產形式上，在社會底存在條件上，聳立着不同的和特有的感情、幻想、思考方法和人生觀的整個上層建築。所有這些，是由整個階級，從其物質的基礎並從其相應的社會關係來創造和形成的。（馬克思：『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五五頁）。

生產及生產之後的產物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的社會形態中，生產品的分配以及與之相伴的社會階級或等級的劃分，是依靠如何生產，生產之後如何交換的情形來決定的。根據這個觀點，一切社會變革及政治革命的基本原因，不應該求之於人的頭腦之中，也不是在於人們對於永恆真理及正義的往前增長的了解，而應該求之於生產方式及交換方式的變更；換句話說，這些原因，不應該求之於哲學，而應該求之於各該時代的經濟。（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七五頁）

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來，究竟應把『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這些終歸是決定着社會面貌，社會底觀念、觀點、政治組織等等的條件，瞭解爲什麼東西呢？

實在說來，——這一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究竟是什麼；它們的特徵，究竟是怎樣呢？毫無疑義的，『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這一個概念，首先就包含有環繞着社會的自然界，地理環境，這個環境是社會底物質生活所必要的和經常的條件之一，而且當然是影響到社會之發展。地理環境在社會中的作用如何呢？地理環境不就是決定着社會底面貌、人們社會制度底性質、以及由一個制度過渡到另一個制度的主要力量麼？

歷史唯物主義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乃是否定式的。

地理環境，當然是社會發展底經常的必要的條件之一，而且它當然影響到社會之發展，——它是加速或延緩社會發展底進程的。然而，它的影響，並不是有決定作用的影響，因爲社會之變更和發展，是比地理環境之變更和發展，迅速得不可比較的。在三千年中間，在歐洲，更換過三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隸佔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歐洲東部，在蘇聯，甚至於更換過四種社會

制度。可是，在這同一時期內，歐洲境內的地理條件，或者是完全沒有變更，或者是變更得如此小，甚至地理學都不肯提及。而這是不言而喻的，地理環境之稍許嚴重的變更，都需要幾百萬年，而人們社會制度之甚至最嚴重的變更，也只需要幾百年或一兩千年就够了。

而由此就要得出結論：地理環境決不能成爲社會發展底主要的原因，有決定作用的原因，因爲在數萬年間幾乎仍舊不變的現象，是不能成爲那在幾百年間就發生根本變更的現象之發展的主要原因的。其次毫無疑義的，人口之增長，居民密度之高低，也是包含於一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一概念之中，因爲人是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之必要因素，而如果沒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那麼任何社會底物質生活，都是不可能的。人口之增長，不就是決定着人們社會制度底性質的主要力量麼？

歷史唯物主義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也是肯定式的。

人口之增長，當然是影響到社會之發展，是促進或延緩社會之發展的。然而，它不能成爲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主要力量，它對於社會發展的影響，不能是具有決定作用的影响。因爲人口之增長本身，並不能給我們以關鍵來說明：爲什麼某個社會制度恰巧是要由一定的新制度來替代，而不是由其他某個制度來替代；爲什麼原始公社制度恰巧是由奴隸佔有制度所替代，奴隸佔有制度恰巧是由封建制度所替代；封建制度恰巧是由資產階級制度所替代，而不是由其他某個制度所替代。

如果人口之增長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有決定作用的力量，那麼較高的人口密度，就一定應當產生與之相當的較高式樣的社會制度。可是在事實上，却沒有這樣的情形。中國人口密度是高過美國四倍，可是美國按社會發展程度看來却比中國爲高，因爲在中國仍然是以半封建制度佔統治，而美國却早已達到資本主義發展底最高階段了。比利時人口密度是比美國高十九倍，比蘇聯高二十六倍，可是

美國按社會發展程度看來却高過比利時，而蘇聯則較比利時高出一整個歷史時代，因為在比利時是以資本主義制度佔統治，而在蘇聯，則已經消滅了資本主義，並在本國奠定了社會主義制度。

而由此就要得出結論：人口之增長，並不是而且不能是社會發展過程中能決定社會制度底性質，決定社會底面貌的主要力量。

既然如此，那麼，在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系統中，決定着社會底面貌，決定着社會制度底性質，決定着社會由這一制度發展爲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究竟何在呢？

這樣的力量，據歷史唯物主義看來，就是人們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底謀得方式，就是物質資料底生產方式——這些物質資料就是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生產工具以及其他各種爲社會能藉以生活和發展的必需資料。

爲要生活，就要有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等等；爲要有這些物質資料，就要生產它們；而爲要生產它們，就要具有那些被人們利用來生產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等等的生產工具，就要善於生產這些工具，就要善於使用這些工具。

被利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工具，以及因有相當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而發動着生產工具並實現着物質資料生產的人們，——所有這些因素總合起來，就構成社會底生產力。

然而，生產力還只是生產底一方面，生產方式底一方面，這個方面，乃是表明人們對於物件和自然界力量的關係，而這些物件和自然界力量是被利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底另一方面，生產方式底另一方面，則是人們彼此在生產過程中的關係，即人們底生產關係。人們之和自然界鬭爭以及利用自然界來生產物質資料，並不是彼此孤立着，並不是以彼此隔絕的單身資格，而是以團體爲單位，以

社會爲單位來共同進行的。因此，生產，在無論什麼時候以及在任何條件之下，都是社會的生產。人們在實現物質資料生產時，就建立彼此間在生產內部的某種相互關係，即某種生產關係。這些關係，可以是不受剝削的人們間的合作關係和互助關係；這些關係，可以是統治和服從的關係；最後，這些關係，也可以是由一個生產關係形式過渡到另一個生產關係形式的過渡關係。然而，不管生產關係帶着怎樣的性質，可是它們總是構成——在任何時候和在任何制度之下——生產底必要因素，正好似社會底生產力一樣。

馬克思說：

「在生產中，人們不僅是影響着自然界，而且還彼此互相影響着。他們如果不用相當形式結合起來以便共同活動和互交換其活動，那他們就不能生產。爲要生產，人們就彼此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係，而只是經過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係，才存在着人們對於自然界的關係，才有生產。」（『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四二九頁）

所以，生產，生產方式，是既包括着社會底生產力，又包括着人們底生產關係，因而就是它們兩者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統一之體現。

生產底特點之一，就是它永遠也不會長期內停留在一個地點，而是時時處在變更和發展情況中。而同時，生產方式中的變更，又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整個社會制度、社會觀念、政治觀點、政治組織之變更，——引起整個社會的和政治的結構之改造。在各個不同發展階段上，人們利用着各個不同的生產方式，或者，粗一點說，——人們過着各種不同樣式的生活。在原始的公社之下，有一種生產方式，在奴隸制度之下，有另一種生產方式，而在封建制度之下，有第三種生產方式，以及餘此類推。而與

此相適合的，就是人們底社會制度，他們的精神生活，他們的觀點，他們的政治組織，也各不相同。社會所有的生產方式怎樣，——那麼，社會本身在本上也就是怎樣，社會的觀念和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組織，也就是怎樣。

或者，粗一點說：人們底生活樣式怎樣，——那麼，人們底思想樣式也就是怎樣。

這就是說，社會發展史，首先就是生產發展史，就是在數千百年中新陳代謝的生產方式發展史，就是生產力和人們生產關係發展史。

由此可見，社會發展史，同時也就是物質資料生產者本身底歷史，就是勞動群眾——他們是生產過程之基本力量並實現着爲社會生存所必需的物質資料之生產——底歷史。

由此可見，歷史科學，如果它想成爲真正的科學，就不能再把社會發展史歸結爲帝王和將相底行動，歸結爲國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動，而是應當首先就研究物質資料生產者底歷史，勞動群眾底歷史，各國人民底歷史。

由此可見，研究社會歷史底規律的關鍵，不是要在人們底頭腦中，不是要在社會底觀點和觀念中去尋找，而是要在社會於每個一定歷史時期內所採取的生產方式中，——在社會底經濟中去尋找。

由此可見，歷史科學底首要的任務，就是要研究和揭明生產底規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展底規律，社會經濟發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如果它想成爲真正的黨，它應當首先就精通生產發展底規律，社會經濟發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爲着不致在政治上弄出錯誤，那麼無產階級黨，無論是在製定自己的黨時憲，無論是

在自己的實際活動中，都應當首先就以生產發展底規律，以社會經濟發展底規律爲出發點。

生產的第二個特點，就在於生產之變更和發展，無論何時都是從生產力之變更和發展，首先就是從生產工具之變更和發展而開始。所以，生產力乃是生產底最活動的最革命的因素。起初是社會底生產力變更和發展，而然後，依賴於這些變更並與之相適合的，就是人們底生產關係，人們底經濟關係也發生變更。可是，這並不是說，生產關係不影響到生產力之發展，生產力不依賴於生產關係。生產關係雖然是依賴於生產力之發展而發展，但同時，它們又反轉來影響到生產力，或加速其發展；或延緩其發展。而且必須指出，生產關係不能太長期落後於生產力底增長並和這增長相矛盾，因爲生產力，只有當生產關係適合於生產力底性質及情況並給生產力以發展餘地時，方能儘量地發展。因此，無論生產關係是怎樣落後於生產力之發展，但它們遲早總應當去與生產力發展底水平，去與生產力底性質相適合，而且一定會相適合。如果不然，那我們就會看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在生產系統中的統一之根本破壞，整個生產之破裂，生產危機，生產力之毀壞。

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性質不相適合的實例，它們兩者間衝突的實例，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對於生產資料的私人資本主義所有制，是和生產過程底社會公共性質，是和生產力底性質，處在極不相適合的地位。而這種不相適合的結果，就是使生產力陷於破壞的經濟危機。而同時，這種不相適合的情況本身，就是社會革命底經濟基礎。而這個社會革命底使命，就是要破壞現有的生產關係，並建立新的，適合於生產力性質的生產關係。

反之，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性質完全相適合的實例，就是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在蘇聯，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公共所有制是和生產過程底社會公共性質完全相適合的。因此，在蘇聯，既沒有經

濟危機，也沒有生產力破壞的現象。

所以，生產力，不僅是生產底最活動的和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同時又是生產發展過程底決定的因素。

生產力是怎樣——那麼生產關係也就應當是怎樣。

如果生產力底情況所回答的問題，是人們用怎樣的生產工具來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物质資料；那麼，生產關係底情況所回答的，則是另一個問題，就是：生產資料（土地、森林、水利、礦源、原料、生產工具、生產建築物、交通聯絡工具等等），是歸誰所有；生產資料是由誰所支配——是由全社會所支配呢？抑或是由單個人們、集團、階級所支配，並利用去剝削其他人們、集團、階級呢？

茲將生產力由古代到現代的發展情形，大略敘述如下：由粗笨的石頭工具過渡到弓箭，並因此而由狩獵式的生活過渡到馴養動物和原始畜牧業；由石頭工具過渡到金屬工具（鐵斧、鐵嘴木犁等等），並與此適應而過渡到種植物和從事農業；金屬製物工具之繼續改良，過渡到打鐵爐風箱，過渡到陶器生產，並與此相應而有手工業之發展，有手工業之離農業而分立，有獨立手工業生產以及後來的工場手工業生產之發展；由手工業生產工具過渡到機器，手工業——工場手工業生產轉變為機器工業；再進而過渡到機器系統，以及現代巨大機器化工業之出現，——這就是社會生產力在人類史上發展底一般的——遠不完全的——情形。同時，不言而喻的，生產工具之發展和改善，是由那些和生產有關係的人們所實現的，而並不是與人們無關，——所以，隨着生產工具之變更和發展，人們——即生產力最重要的因素——也變更和發展了，他們的生產經驗，他們的勞動技能，他們運用生產工具的本領，也變更和發展了。

隨着社會生產力在歷史上的變化和發展，於是人們底生產關係，人們底經濟關係，也與之適合而變化和發展了。

歷史所知道的，有五個基本式樣的生產關係：原始公社的，奴隸佔有制度的，封建制度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

在原始公社制度之下，生產關係底基礎，就是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公有制。這在基本上是適合於生產力在這時期內的性質的。石頭工具以及後來出現的弓箭，使人們絕對沒有可能單身去和自然界勢力及猛獸作鬪爭。人們當時爲要在森林中採集果實，在水裏捕獲魚類，建立某種住所，就不得不共同工作，否則就會餓死，被猛獸所吞食，或爲鄰近團體所犧牲。公共的勞動，就引起對於生產資料以及對於生產品的公共所有制。在這裏，並不知道生產資料私有制爲何物，而不過有些生產工具是個人所有的，而這些工具，同時又是用來防禦猛獸的。在這裏，並沒有剝削，並沒有階級。

在奴隸佔有制度之下，生產關係底基礎，就是奴隸主對於生產資料以及對於生產工作者的所有制，這生產工作者就是奴隸主所能當作牲畜一樣來買賣屠殺的奴隸。這樣的生產關係，在基本上是適合於生產力在這時期內的情況的。此時，人們所擁有的，已經不是石頭工具，而是金屬工具；此時已經不是貧乏的、原始的、既不知畜牧業爲何物，也不知農業爲何物的狩獵經濟，而是已經出現畜牧業、農業、手工業、以及在這些生產部門間的分工；此時，已經有可能在各個人間以及在各個團體間交換生產品，已經有可能把財富積聚於少數人手中，而且真正把生產資料積聚於少數人手中，已經有可能迫令大多數人服從少數人並把這大多數人變爲奴隸。在這裏，已經不是團體中一切組成員在生產過程中間共同地和自由地勞動了，——在這裏，已經是由奴隸們底強迫勞動佔統治地位，而這些奴隸

是由那些不勞而獲的奴隸主們所剝削的。因此，也就沒有對於生產資料以及對於生產產品的公共所有制。它已被私人所有制所替代了。在這裏，奴隸主乃是第一個基本的十足私有主。

富人和窮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享有完全權利者和毫無權利者，他們之間的殘酷階級鬥爭——這就是奴隸佔有制度底情景。

在封建制度之下，生產關係底基礎，就是封建主對於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以及對於生產工作者的不完全的所有制，這生產工作者就是封建主已經不能屠殺，但是可以買賣的農奴。與封建所有制並存的，還有農民和手工業者對於生產工具以及對於自己以本身勞動為基礎的私有的經濟的個人所有制。這樣的生產關係，在基本上是適合於生產力在這時期內的情況的。鑄鐵和鋼鐵工作之繼續改善；鐵犁和織布車之散佈；農業、園圃業、釀酒業、製油業之繼續發展；與手工作坊並存的工場手工企業之出現，——這就是當時生產力情況之顯著的特徵。

新的生產力，要求工作者具有某種在生產中的自動性，要求他具有從事於勞動的嗜好，要求他具有願意從事勞動的興趣。因此，封建主就把奴隸拋棄，因為奴隸是不願意從事勞動的和完全沒有自動性的工作者；而寧願利用農奴有自己的經濟，有自己的生產工具，並具有某些願意從事勞動的興趣，因為一定要有這種興趣，農奴才會耕種土地並能付給封建主以自己收成所得的自然品。

在這裏，私有制已經繼續發展了。剝削幾乎是和奴隸制下面的剝削一樣殘酷，而不過是稍許減輕一些罷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階級鬥爭，就是封建制度底基本的特徵。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生產關係的基礎，就是對於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同時在這裏，已經沒有對於生產工作者的所有制，這生產工作者，就是資本家既不能加以屠殺，也不能出賣的僱傭工

人，因為僱傭工人已免除人格上的依賴；可是，他們沒有生產資料，而為要不致餓死，他們就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並在自己的頸項上帶着剝削制的枷鎖。與對於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並存的，還存在有而且在第一個時期還廣闊流行的，就是已擺脫農奴制依賴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對於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這私有制，是以本身勞動為基礎的。起而代之手工坊和工場手工企業的，是以機器裝備的巨大工廠。起而代之那些用農民粗笨生產工具來耕作的貴族地產的，乃是根據農藝學來經營並具備有農業機器的巨大資本主義農場。

新的生產力，要求生產工作者是比閉塞無知的農奴們文化程度高些的，伶俐些的，能够懂得機器並正確使用機器的人們。因此，資本家寧願利用那些已免除農奴制羈絆的僱傭工人，這些僱傭工人是具有足夠的文化程度來正確使用機器的。

然而，資本主義既把生產力發展到巨大的程度，於是它就陷入它自己所不能解決的矛盾中。資本主義既然生產着日益增多的商品並減低着商品價格，於是它就使競爭趨於尖銳化，使大批小私有主和中等私有主陷於破產，把他們變成無產者，減低他們的購買能力，因而就使生產出來的商品無法銷售出去。資本主義既然擴大着生產並把千百萬工人集合在巨大工廠以內，於是它就賦與生產過程以社會公共的性質，並因此而被壞自己本身的基础；因為，生產過程底社會公共性質，是要求有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公共所有制的，可是同時，對於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却仍然還是私人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就是說，是與生產過程底社會公共性質勢不兩立的所有制。

生產力性質與生產關係間的這些不可調和的矛盾，就在定期發生的生產過剩危機當中明顯的暴露出來。此時，資本家們既然因他們已使大批居民遭受破產之故而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遂不得

不燒燬生產品，消滅已製成的商品，停止生產，毀壞生產力。此時，千百萬居民，却不得不忍受失業和飢餓的痛苦，而這並不是因為商品不夠，却是商品出產得太多。

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不復適合於社會生產力底情況，而是已經和社會生產力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

這就是說，資本主義懷妊着革命，這個革命的使命，就是要拿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來代替現存的對於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

這就是說，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的最尖銳的階級鬥爭，乃是資本主義制度底基本的特徵。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這個制度，此刻還只在蘇聯實現，——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公共所有制，乃是生產關係底基礎。在這裏，已經是既沒有剝削者，也沒有被剝削者。生產出來的物品，是根據「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而按勞動分配的。

在這裏，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係底特徵，就是已經擺脫剝削制的工作者們底同志的合作和社會主義的互助的關係。在這裏，生產關係乃是完全適合於生產力底情況的，因為生產過程底社會公共性質，是由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公共所有制所鞏固。

因此，在蘇聯的社會主義的生產，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定期的生產過剩危機以及與此危機相牽連的荒謬現象。

因此，在這裏，生產力就以加快的速度發展着，因為適合於生產力的生產關係，是給與生產力以這樣發展的完全廣闊的可能。

這就是人們生產關係在人類史上發展的情景。

這就是生產關係之發展，對於社會生產力之發展，而首先是對於生產工具之發展的依賴性。而因為有這種依賴性，所以生產力之變更和發展，就遲早要引起生產關係之與其適合的變更和發展。

馬克思說：

「勞動資料之使用和創造，雖然在某幾種動物中，發現其萌芽形式，然而却是人類勞動過程所獨具的顯著特徵。所以佛蘭克林給人類所下的定義是：製造工具的動物。勞動資料之遺骸，對於研究已經消亡的諸社會經濟形態，也正如動物骨骼之遺骸結構，對於研究已消亡的諸種動物之身體組織一樣，有同樣重要的意義。使各經濟時代彼此區別的，不是生產什麼，而是怎樣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之尺度，而且是這些社會關係之指標，在這些關係之下，就實現着勞動。」（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一二二頁，一九三五年版）

其次：

（一）「社會關係是和生產力密切聯系着。人們既獲得新的生產力，他們就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着生產方式之改變，即本身生活保證方式之改變，——他們就改變自己所有一切社會關係。手力的磨坊，就產生以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力的磨坊，就產生以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三六四頁）

（二）「生產力增長之運動，社會關係之毀壞，觀念之產生，——凡此，都是毫不間斷的發生着。而不動的，只是運動之抽象。」（同上，第三六四頁）

恩格斯當說明在「共產黨宣言」內規定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特徵時說：

「經濟生產及必然由它而生的每一歷史時代的社會結構，就構成這時代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之

基礎……。因此，自原始公社土地佔有制瓦解之時起，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鬭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階段上的被剝削階級與剝削階級，被征服階級與統治階級間階級鬭爭的歷史……。現在，這個鬭爭已達到這樣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上，被剝削的和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已經是除非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以及階級鬭爭，就不能擺脫那剝削它和壓迫它的階級（資產階級）了……」（恩格斯給「宣言」德文版所作「序言」）

生產之第三個特點，就是新的生產力以及與之相適合的生產關係之產生，並不是離開舊制度而單獨發生的，並不是在舊制度消滅以後發生的，而是在舊制度內部發生的；不是由於人們有意的自覺的活動之結果，而是自發的、不自覺的、不依賴於人們意志而發生的。其所以是自發而不依賴於人們意志而發生的，是因為有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是因為人們不能自由選定這種或那種生產方式。這是因為當每一新輩人開始生活時，他們是遇着已經現成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即前輩人所工作之結果，因此，這新輩人在最初一個時候，是應當接受他們在生產方面所遇到的一切現成東西，並應當遷就於這些東西，以便取得生產物質資料的可能。

第二，就是因為人們在改善這種或那種生產工具，這種或那種生產力要素時，他們並不覺悟到，不瞭解到，也不想到，這些改善將會引起怎樣的社會的結果，而只是想到自己的日常利益，只是想到要減輕自己的勞動和為自己謀得某種直接的感觸得到的益處。

當原始公社社會中某些社員們逐漸的和摸索式的由石頭工具過渡到鐵製工具時，他們當然沒有知道和沒有想到這種創新辦法會引起怎樣的社會的結果；他們沒有了解到和沒有意識到：由石頭工具過

渡到金屬工具，就是生產中的大變革；這個過渡終究會引導到奴隸佔有制度；——他們當時只是想要減輕自身的勞動和謀得眼前的和感觸得到的益處，——他們當時的自覺活動，只是限於這種日常個人益處的狹隘範圍。

當歐洲年輕資產階級在封建制度時期開始建造巨大工廠手工企業，以與細小行業作坊並列，並因此而推進社會生產力時，它當然沒有知道而且沒有想到它這種創新辦法會引起怎樣的社會的結果；它沒有意識到和沒有瞭解到：這種一細微的一創新辦法，會引起這樣一種社會力量的重新組合，這種重新組合將以革命來終結，而這個革命，既要反對它當時所十分推崇其恩德的王室政權，又要反對那爲它的優秀代表們所往往夢想側身其間的貴族；——它當時只是想要減低商品生產成本費，更多拿些商品到亞洲市場以及剛才發現的美洲市場上去銷售，並藉以取得更多的利潤，——它當時的自覺活動，只限於這種日常實踐的狹隘範圍。

當俄國資本家們協同外國資本家們來加緊在俄國培植現代巨大機器化工業，而又絲毫不觸動沙皇制度，同時却聽憑地主們隨便魚肉農民時，他們當然沒有知道和沒有想到生產力這種嚴重的增長會引起怎樣的社會的結果；他們沒有意識到和沒有了解到：這個在社會生產力方面發生的嚴重飛躍，將引起這樣一種社會力量的重新組合，這種重新組合，會給無產階級以可能把農民和自己結合起來並實現勝利的社會主義的革命；——他們當時只是想要極端擴大工業生產，掌握巨大的國內市場，變成壟斷家，並從國民經濟中吸取更多的利潤，——他們當時的自覺活動，未曾超過他們日常的狹隘實踐的利益。

馬克思因此就說：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就是說，在生產爲人們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資料中——編

者），彼此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爲轉移的關係。——即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是適合於他們的物質生產力之一定的發展階段的。」（「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二九六頁）

然而這並不是說，生產關係之變更以及由舊的生產關係過渡到新的生產關係，乃是一帆風順的進行，而不經過衝突，不經過震動。恰恰相反，這樣的過渡，通常都是經過用革命手段來推翻舊的生產關係而奠定新的生產關係。到一定時期爲止，生產力之發展以及生產關係方面之變更，是自發的，不依賴於人們意志而進行的。然而這只是到一定時候爲止，只是到那已經產生和正在發展的生產力尙未及充分成熟的時候爲止。而當新生產力已經成熟後，現存的生產關係及其體現者——統治階級，就變爲這樣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而爲要把這個障礙從程途上掃除，就只有經過新階級之自覺的行動，經過新階級之強力的行動，經過革命，才可做到。在這裏，新的社會觀念，新的政治組織，新的政權的偉大的作用，就特別明顯的表現出來，其使命就是要用強力來廢除舊的生產關係。在新的生產力與舊的生產關係互相衝突的基礎上，在社會的新的經濟需要的基礎上，就產生出新的社會觀念。這些新的社會觀念就組織着和動員着群眾。而群眾則團結爲新的政治大軍，建立新的革命政權並運用着這個政權，以便強力來廢除生產關係方面的舊秩序，而奠定新秩序。於是，發展的自發過程，就讓位於人們的自覺的活動，和平的發展就讓位於強力的大變革，進化就讓位於革命。

馬克思說：

「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鬭爭中，一定團結成爲階級……它以實現革命而把自己變爲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資格去用強力廢除舊的生產關係。」（「共產黨宣言」，一九三八年版，第五二頁）

其次：

(一)「無產階級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來一步一步奪取資產階級所有的全部資本，來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於國家之手，就是說，集中於已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之手，並儘可能更加迅速的增加全部生產力。」(同上，第五〇頁)

(二)「強力是任何一個舊社會——當它懷妊着新社會時——之接生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六〇三頁，一九三五年版)

馬克思於一八五九年在其給他那本名著「政治經濟學批評」所作的有歷史意義的「序言」中，會英明的把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質歸納如下：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彼此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爲轉移的關係——即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是適合於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的。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合，就組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現實的基礎，而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物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樹立起來的；同時，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是和這個基礎相適合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着一般社會生活的、政治生活的、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相反，正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就和現存生產關係、或者說，就和所有權關係——所有權關係不過是現存生產關係之法律上的表現而已——發生矛盾，而生產力在此以前是在這個關係內部發展了的。於是這些關係就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枷鎖。那時，社會革命時代就來到了。隨着經濟基礎之變更，在整個龐大的上層建築物中，也就或多或少迅速的發生大變革。在考察這些大變革時，必須時刻把在經濟生產條

件方面發生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精確眼光指明出來的——物質大變革，去與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術的或哲學的形式，——簡而言之，就是去與觀念形式，分別清楚，而人們就是在這些觀念形式中，認識這個衝突，並力求克服這個衝突的。正如我們不可根據一個人自己對於自己的揣度來判斷這個人一般，同樣也不可根據這樣的大變革時代底意識來判斷這樣的大變革時代，恰恰相反，這個意識，正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現存的衝突中來解釋。無論那一個社會形態，當它還給一切生產力以發展餘地而這一切生產力尚未展開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當其藉以存在的物質條件尚未在舊社會本身胎包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無論何時都只是給自己提出自己所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一看，那就總可看出：任務本身，只有當他能藉以得到解決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着或至少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出來。」（「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二六九至二七〇頁）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就其應用於社會生活，應用於社會歷史說來，就是如此。（「蘇聯共產黨（布）歷史」，蘇聯版一四〇——一五六頁）

四 列寧論歷史唯物論早已由假設變 成科學上被證明了的原理——唯 一的科學歷史觀

社會學中這個唯物主義思想本身，已經就是英明的思想。當然，這一暫時一還會是一個假設，但這會是這樣一個假設，這個假設最初第一次造成了以嚴格科學態度對待歷史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可能。在此以前，社會學家不善於向下探究最簡單的和這樣始初的關係，如生產關係，却竟直接着手來探考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而一碰到這些形式由於當時人類某種思想所產生的事實，就停留於此；結果，似乎社會關係是由人們自覺地建立起來的。可是，這個充分表現於「社會契約」思想（這思想的遺跡是在所有一切空想社會主義學說中都很顯然的）中的結論，是和所有一切歷史觀察完全矛盾的。從來未曾有過，而且現在也沒有這樣的事，說是社會組成員們竟把自己在其中生活的社會關係總和，看做是什麼一定的整個的由某種原則所貫徹的東西；反之，大眾是不自覺地遷就於這些關係的，而且如此不瞭解這些關係是特別歷史社會關係，以至於——例如——人們千百年來在其中生活的交換關係只在最後一個時期才得到自己的說明。唯物主義既繼續加深分析而發現人們這些社會思想本身底起源，就排除了這個矛盾；而只有它那關於思想行程依賴於物質行程的結論才是可與科學心理學相容的結論。其次，從另一方面說，這個假設也是最初第一次把社會學提到科學階段上來。在此以前，社會學家總是難於把社會現象這一複雜羅網中的主要現象和次要現象分別清楚（這就是社會學中的主觀主義的根

源)，不能找到這種劃分的客觀標準。唯物主義給了一個完全客觀的標準，因為它把「生產關係」劃分出來作為社會結構，並給了把主觀主義者所認為不可應用到社會學上來的一般科學的重複性標準應用到這些關係上來的可能。當他們還以思想社會關係（即在其形成以前經過人們意識的關係，——這裏當然始終都是說「社會關係」底意識，而不是其他任何關係的意識）為限的時候，他們是不能發現各國社會現象中的重複性和常規性的，而他們的科學至多也只是這些現象的記載。原始材料的搜集。分析物質社會關係（即不經過人們意識而形成的那種社會關係，人們在交換產品時彼此發生生產關係，而同時他們甚至於沒有意識到這裏有社會生產關係存在着）——立刻就使有可能發現重複性和常規性，並把各國制度總合為一個基本概念——「社會形態」。只有運用這樣的綜合方法，才使有可能由記載社會現象（和以理想為觀點來估計社會現象）而過渡到用嚴格科學觀點分析社會現象，劃分出那——譬如舉例來說——使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和另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區別的「東西」，研究那為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共同的「東西」。

最後第三，這個假設之所以最初第一次造成了「科學」社會學出現的可能，還因為只有把社會關係歸結於生產關係以及把生產關係歸結於生產力的高度，這才給了堅固根據來把社會形態發展過程看作自然歷史過程。而沒有這點，就當然不能有社會科學（例如，主觀主義者雖承認歷史現象的規律性，可是不能把這些現象的進化看作自然歷史過程，——而這正是因為他們以指出社會思想和人們目的為限，而不善於把這些思想和目的歸結於物質社會關係）。

而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提出這個假設以後，就着手按事實（這要 Non-halle（請注意））來研究材料。他從各個社會經濟形態中拿出一個——商品經濟制度——來研究，並根據非常浩繁的材

料（他會以不下二十五年的工夫來研究這些材料）給予這個形態的動作法則和發展法則以極詳盡的分析。這個分析是專以社會組成員間的生產關係爲限的；馬克思連一次也沒有借用什麼超出這些生產關係的因素來說明問題。同時却給我們以可能來看見商品生產制的社會經濟組織怎樣發展，這個組織怎樣變成爲資本主義組織而造就彼此對抗的（這已經是在生產關係範圍內）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個組織怎樣發展社會勞動生產率，並以此而產生那與這個資本主義組織本身基礎處於不可調和的矛盾中的因素。

「資本論」的「骨幹」就是如此。可是全部問題重心就在於馬克思不以這個骨幹爲滿足，不以通常意義的一個「經濟理論」爲限；他雖「專」以生產關係來「說明」該社會形態的結構和發展，但同時他還到處和經常考察那些適應於這些生產關係的上層建築物，以肉和血來把骨幹包裹起來。「資本論」所以如此廣闊流行，就正是因爲「德國經濟學家」底的這一部著作向讀者把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作爲活現的社會形態指明出來，將共風俗習慣，將共生產關係所固有的階級對抗的具體社會表現，將共保護資本家階級統治權的資產階級政治上層建築物，將共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以及其他等等觀念，將其資產階級的家庭關係，都全盤托出。而由此就顯而易見，以達爾文爲對象的比擬是完全確切的：「資本論」——這無非就是「幾個具有綜合性的、彼此極緊密聯系着的、把堆集成山的事實材料結合起來的思想」。而如果在閱讀「資本論」時，竟能看不見這些綜合性的思想，那就怪不得馬克思，因爲馬克思甚至在「序言」中——這是我們在上文中已經看見的——都會指出這些思想。不僅如此，這樣的比擬不僅從外表方面（不知道爲什麼這個外表方面竟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別發生興趣）看來是正確的，而且從內容方面看來也是正確的。正如達爾文推翻了那認爲動植物種類是彼此沒

有任何聯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變的東西的觀點，而最初第一次把生物學放置到完全科學的基礎上來，確定了各物種的變異性及其相互繼承性一樣。——馬克思也是推翻了那把社會看作是可按長官意志（或說按社會意志和政府意志，這橫直都是一樣）來隨便改變的，偶然產生和偶然變化的個人機械結合物的觀點，而最初第一次把社會學放置到科學基礎上來，確定了社會經濟形態是一定生產關係總合的概念，確定了這種形態發展過程是自然歷史過程。

現在——自從「資本論」出現時起——唯物史觀已經不是什麼假設，而是已用科學方法證明了的原理，而當我們還沒有看見其他某種企圖想用科學方法來說明某個社會形態——正是社會形態，而不是什麼國家或民族，或甚至於不是階級等等的風俗習慣——底動作和發展以前，當我們還沒有看見另一個企圖能如唯物主義這樣把「相當事實」排列得秩序井然，能這樣以嚴格科學說明來描出相當社會形態底活現情景以前，——在此以前，唯物史觀將是社會科學的別名，唯物主義並非「多半是科學的歷史觀」，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樣，而是唯一的科學歷史觀。（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中譯本，蘇聯版，第一六一——二〇頁）

五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歷史唯物論的應用

(一) 馬克思論由結論變成方法

我所得到的二般的結論，在已經得到之後便成爲我研究之南針。（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序，「政治經濟學論叢」，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五五頁）

(二)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歷史唯物論的應用不是依靠
固執的教義和抽象的格式，不是從「一般」的概念出發

我們不依固執的教義，以成見去觀察世界，我們只願從批評舊世界中找出新世界，這恰爲新潮流的長處。……

我們不是以固執的態度拿起一種新原則，出現於世界之前，說：真理在這裏，跪在這裏吧！……
(八四三年五月，馬克思給露格的信)

黑格爾的方法從純粹的思惟出發，而這裏，應從鐵一般的事實出發。那據它自己所承認「來自無，從無經過到無」的這樣形式的方法，在這裏是完全不適用的了。(恩格斯：「馬克思底「政治經濟學批判」」，「政治經濟學論叢」，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六七頁)

你嘗試用唯物論的觀點來分析問題，那我必得首先說明，不把唯物論當做研究歷史底指導的綫索，而把它用作現成的型版，杜撰剪裁歷史的事實以與它適合，那麼唯物論的方法就變成它的反面了。(恩格斯：「給恩史特的信」，「馬、恩、列論藝術」，「解放社」版，第一六頁)

同一的——就主要的經濟條件是同一的——經濟基礎，仍可由無數種互相不同的經驗上的事情，例如自然條件、種族條件、外來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差別來。不分析這各種經驗上給予的事情，是不能理解這一點的。(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郭、王譯

本，第六七六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稱爲是與形而上學方法相反的辯證方法的，無非就是社會學中的科學方法，其內容就是要把社會看作是活的處在經常發展過程中的機體（而不是什麼機械堆積起來，因而容許隨便把個別社會原素結合起來的東西）。爲要研究這個機體，就必須客觀分析那組成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研究該社會形態底動作法則和發展法則。（列寧：『什麼是一人民之友』，中譯本，蘇聯版，第四一頁）

看來是難說得比這更明白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絕對只從馬克思理論中借用其寶貴方法的，除非有這些方法就不能理解社會關係。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在估計這些社會關係時，完全不是以抽象格式等等謬論爲標準，而是以這估計底正確性和適合於實況的程度爲標準。（同上，第六八頁）

最可笑的，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責備馬克思，說他沒有『重新審查（留心呀！）所有一切關於歷史過程的著名理論』。這就是十足的笑柄了。而試問這些理論十分之九是些什麼東西呢？是一些純粹先驗論的獨斷的抽象的說明『什麼是社會，什麼是進步？』等等的議論（我故意舉出那些接近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心思的例子）。而這些理論，按其藉以存在的根據說來，已經是毫不中用的。按其基本方法說來，按其激頭激尾的黑暗無光的形而上學說來，亦是毫不中用的。而從『什麼是社會，什麼是進步？』的問題開始，——那就是從末尾開始。當你還沒有把其中任何一個社會形態研究好，甚至於還未能確定這個概念，甚至於還未能着手來認真按事實研究，以客觀態度來分析任何一種社會關係的時候，那麼試問你怎能得到關於一般社會和一般進步的觀念呢？這正是任何科學都會從此開始的形而上學底最明顯的標誌：人們還不善於着手來研究事實時，就總是『*Priori*』（先驗）杜撰一些始

終毫無結果的一般理論。形而上學派的化學家，還不善於按事實來研究化學作用時，就杜撰一種關於「什麼是化學親和力？」的理論。形而上學派的生物學家會談論「什麼是生命，什麼是生命力？」。形而上學派的心理學家會談論「什麼是靈魂？」。而這裏所用的方法，就是很荒謬的。不預先分別說明心理作用，就不能談論靈魂。爲要在這裏求得進步，就正要摒棄那些談論什麼是靈魂的一般理論和哲學議論，而善於把那些表明某種心理作用的事實的研究放置到科學基礎上來。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責備，恰巧是和一個畢生寫着關於「什麼是靈魂」問題的「研究作品」（而不確切知道任何一個——甚至於最簡單的——心理現象是什麼）的形而上學派的心理學家竟來責備科學心理學家，說他沒有重新審查所有一切關於靈魂的著名理論一樣。他，這個科學心理學家，摒棄了關於靈魂的哲學理論，而逕直來研究心理現象底物質本體——神經作用，而給了——譬如說——對於某個或某些心理作用的分析 and 說明。於是我們這位形而上學派的心理學家讀着這部著作，並稱讚着——說什麼作用是描寫得很好，事實是研究得很好的，——可是他終究感覺不滿。且慢吧，——他聽見四週都說這個學者持着完全新的心理學見解，特別的科學心理學方法時，就氣憤着說，——且慢吧，這位哲學家怒氣沖沖地說，——而究竟在那一部著作中敘述了這個方法呢？難道在這部著作中不是一僅僅只有一些事實「麼？難道在這中間不是絲毫沒有重新審查」所有一切關於靈魂的著名哲學理論」麼？這是完全不適當的著作呀！

同樣，資本論在形而上學派的社會學家看來，也當然是不適當的著作，這社會學家看不見那些關於「什麼是社會」的先驗議論毫不中用，他不懂得，用這種方法來代替研究和說明，就不過是把英吉利商賈底資產階級思想或俄羅斯民主派底市儉社會主義理想冒充爲社會概念而已。正因爲如此，所以

這一切哲學歷史理論就如蜉蝣一樣朝生暮死，至多也不過是當時社會思想和社會關係底徵兆，而絲毫也沒有推進人們對於某些即是個別的，但是真實的（而不是那些「適合於人類天性的」）社會關係的「瞭解」。馬克思在這方面所作成的一個偉大的進步，就在於他摒棄了所有這一切關於一般社會和一般進步的理論，而同時又給了對於「一個」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一種」進步（資本主義進步）的「科學」分析。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責備馬克思，說他竟從前頭開始，而不從末尾開始，竟從分析事實開始，而不從最終結論開始，竟從研究局部的歷史上一定的社會關係開始，而不從那關於「什麼是一般社會關係」的一般理論開始！於是他就發問道：「相當的著作究竟在那裏呢？」呵呀，多麼聰明的主觀社會學家呀！！（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中譯本，蘇聯版，第二〇——二二頁）

馬克思底理論是在於研究和說明各相當國家底經濟制度進化情形。而這個理論對於俄國的「應用」，只能是運用唯物主義方法和理論政治經濟學底已規定的手續，來研究俄國生產關係及其進化情形。（同上，第一三七頁）

沒有那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曾在何時何地這樣論證，說在俄國「應當有」資本主義，『因爲』在西方有過資本主義等等。沒有那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曾在何時把馬克思底理論看成是什麼必須普遍遵行的哲學歷史格式，看成是什麼比對於某種社會經濟形態的說明多些的東西。只有一個主觀哲學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異想天開地暴露自己如此不瞭解馬克思，以至於竟在馬克思那裏看見一種普遍哲學理論，而因此就從馬克思那裏得到一個完全肯定的解答，說他是把地址弄錯了。沒有那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曾在什麼時候不以這理論與實況以及與一定的——即俄國的——社會經濟關係歷史適合爲基礎，而

竟以其他什麼東西爲基礎，來論證過自己的社會民主主義觀點，而且根本就不能這樣來論證，因爲這個對於理論的要求，是已由「馬克思主義」底創始人馬克思自己所完全明白肯定提出並肯定爲他那全部學說基礎的。（同上，第六六——六七頁）

(三) 馬克思論解剖高級形態是解剖低級形態的關鍵

人體之解剖是猿猴解剖之一關鍵。下等動物中所含蓄着的向高等者之暗示，却是只有在高等動物闡明了之後才能認識。有產者的經濟，對於古代以還的，給與關鍵。（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譯本，『神州國光社』版）

關於人類生活形態的考察及科學分析，一般是與人類生活形態的現實發展，循由相反的道路。這種考察分析，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結果開始的。勞動生產物所依以成爲商品，和商品流通所依以發生的種種形態，在人開始說明其內容，不研究其歷史性質（因爲在他們看來，這種種形態乃是永劫不移的）時，已經取得了社會生活的自然形態的固定性了。因此，只有商品價格的分析，能引出價值量的決定，也只有一切商品共有的貨幣表現，引出商品價值性質的確定。（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郭、王譯本，第三六頁）

(四)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典型的研究

物理學者必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充實且最不受他物影響的地方，視察自然過程；如可能，還在過程確係正常進行的條件下，作種種實驗。我在本書討論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及與其相應的生產關

係和交換關係。直到現在，這種生產方法的故鄉還是英國。因此，在理論的說明上，我常常以英國爲主要的例解。(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郭、王譯本，『馬克思序言』，第二頁)

馬克思曾在七十年代，以全新的精深的方法，考究地租篇。俄國自一八六一年『改良』以後，關於地租，時有統計報告及其他各種刊物出版。他對於這些報告及刊物，曾就原版加以研究。他的俄國友人，把這種原版儘量供給於他，他會就此撰成拔萃，以便將來整理這篇時有所參攷。俄國的土地所有權及農業生產者的榨取方法，是有各式各樣的形態的，所以在第一卷我們研究產業工資勞動時，以英格蘭爲典型，在地租篇，則應以俄羅斯爲典型。但不幸，他不能把這個計劃實現。(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郭、王譯本，『恩格斯序言』，第五頁)

馬克思所以把中世紀經濟制底其他特徵除開不說，正是因爲這些特徵是屬於封建社會形態的，而馬克思所研究的，則只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中譯本，蘇聯版，第五四頁)

馬克思只說到一個『社會經濟形態』，即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換言之——馬克思說他所研究的，只是這個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底法則，而不是其他什麼社會經濟形態。這是第一。而第二，我們且指出馬克思用以擬定其結論的手續；這些手續——如我們剛才聽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說的那樣——就是『細心研究相當事實』。(同上，第一四頁)

(五) 馬克思、列寧論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材料、

把握事實的總和

在英國博物館中所累積着的關於政治經濟史之龐大的材料；在有產者的社會底觀察上倫敦所佔有的有利的地位；最後，隨着加里佛尼亞與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有產者的社會所顯示出的新的發展階段；這一切使我決心重新開始，並對這些新的材料加以批判地研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政治經濟學論叢』，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五七頁）

敘述的方法，當然須在形式上與研究的方法分別。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種種發展形態，並探究這種形態的內部關係。不先完成這種工作，則對於現實的運動，必不能有適當的敘述。不過，敘述一經成功，材料的生命一經觀念地反映出來，那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郭、王譯本，『馬克思序言』，第一一頁）

本書的基本任務，過去與現在都是這樣：根據無容爭辯的資產階級的統計和全世界資產階級學者底自供而來說明：在二十世紀初葉，在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底前夜，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究竟形成了何種總結的局面，其國際的相互關係，究竟是怎樣。（列寧：『帝國主義論』法文版和德文版底『序言』）

足以證明戰爭底真正社會本質的，或正確的說，足以證明戰爭底真正階級本質的，自然不是大戰過程裏底外交史，而是對於一切交戰國裏的統治階級底客觀形勢底分析。爲要說明這種客觀形勢，我們就不應該摘引單個的例子和單個的事實（在極複雜的社會生活現象中，我們隨時都可以找得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單個的事實以證實任何的論見），而一定要把所有關於一切交戰國和整個世界裏面經濟生活底基礎的事實總和列舉出來。（同上）

(六) 恩格斯、列寧論考察基本的歷史聯系

黑格爾是企圖說明歷史中的發展。歷史中之內在關聯的第一人；並且他的「歷史哲學」中在現在雖有許多顯得奇特的地方，但是，他的基本觀點之偉大，即在今日，——無論與其先驅者比較或與他以後研究一般過去歷史的任何人比較，亦深可敬服。在現象學、美學及哲學史中，到處都貫澈着這偉大的歷史觀，而這種材料在任何地方都是歷史地，在與歷史之一定的——即使是被抽象地歪曲了的——關聯上被研究了。 (恩格斯：「馬克思底一政治經濟學批判」，「政治經濟學論叢」，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六八頁)

科學進化中最完善的馬克思底辯證法所不允許的，正是對事物作孤立的，即偏面的畸形曲解的考察。(列寧：「第二國際底破產和爲第三國際而鬥爭」，「列寧選集」，第九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一四頁)

爲了以最科學的方法處理這個問題，應當對於國家曾經怎樣發生及它曾經怎樣發展起來一點，作一歷史的考察，即使是個粗略的考察也罷。爲了真正地獲得正確處理這個問題的習慣，不至在大量瑣事中有損失或被極端龐雜的相互鬭爭的意見所損失，在社會科學底問題上最可靠的和最必要的，爲了從科學的觀點上處理這個問題而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的聯系，從某一現象在歷史上曾經怎樣發生，這種現象在其發展中曾經過了怎樣的主要階段這種觀點，去考察每個問題，並且從它發展底這種觀點去考察現在所有的東西成了什麼。(列寧：「論國家」)

無論在自然界裏，無論在社會中，『純粹的』現象是沒有的，而且也不會有，——這正是馬克思底辯證法所教導我們的。它告訴我們說，純粹這個概念的本身，就表明人類認識含有幾許的狹隘性和片面性，而沒有澈底領會對象所有的複雜性。世界上沒有而且也不會有『純粹』的資本主義，而始終滲雜或者封建制度底，或者小資產制度底，或者其他某種制度底成份。因此，在講到帝國主義者可惡地欺騙『民衆』（帝國主義者故意用『民族的』辭句來掩飾其赤裸裸的掠奪目的）的問題時，而提起戰爭不是『純粹』帝國主義的，——這就是等於做個萬分愚昧的腐儒或狡猾的騙子。（列寧：『第二國際底破產和爲第三國際而鬭爭』，『列寧選集』，第九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一四——一一五頁）

俄羅斯現時的地主經濟，包含有資本主義和農奴制的特點。……但是如果企圖把一切單獨的情形都一一計算出來，把每個單獨的情形都權衡出來，用藥房的天秤絲毫不錯地決定：何處是農奴制的終點，何處是純粹資本主義的起點，這無異於把自己所有的學究氣概去譏諸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不能一下計算出，從小商人手裏買來的食物的價格中，那一部份是勞動價值所構成，那一部份是榨取所構成等等。先生們，這是否可以說，應當拋棄勞動價值論呢？（列寧：『小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列寧選集』，第五卷，第一六〇頁）

（七）恩格斯論歷史的方法與論理的方法之一致

他（肥爾曼）是立足在這種誤解之上的；那就是，他錯誤地，認馬克思不過要加說明的地方，爲

馬克思要加定義的地方，好像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我們應尋求固定的完成的普通適用的定義一樣。實則，當事物及其相互關係不被視為固定的，但視為變動之時，它們的心像、概念，也同樣須受變化與轉形的。它們不能被封入硬結的定義中，却寧可在歷史和論理的形成過程中被展開。由此，我們當可明白，爲什麼馬克思在第一卷的開端，會從他的歷史的前提（單純的商品生產）出發，然後從這個基礎進到資本；那就是，從單純商品出發，而不從在概念上歷史上的第二義的形態（已在資本主義下發生變更的商品）出發。這一點是肥爾曼絕不認識的。（『資本論』，第三卷，郭、王譯本，恩格斯序言，第十頁）

既然在歷史上猶如它在文獻的反映上一樣，整個的發展是從最簡單的關係向較複雜的關係進行，政治經濟學的文獻史的發展，即提供了一個自然的指南，藉此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也可聯系起來，而經濟範疇，這時整個地如同邏輯的發展一樣，也以同樣的順序而出現。這種形式，顯然地具有着更加明瞭的優點，因爲的確它是循着實際的發表的，但是事實上，這種形式至多只能更加通俗化而已。歷史當是突變地曲折地前進的，這樣，非到處探求這歷史的事實不可，——因此不但許多次要的材料不得不被採收進去，而且一定會因此引起思想徑路上的許多中斷之處；加之，經濟學的歷史，如果沒有有產者的社會之歷史，是不可能寫就的，而如果這樣，將使這事業無限地延長下去，因爲一切準備的工作都是缺乏的。因此，邏輯的運用方法乃是唯一合適的方法。但是這在事實上，也不外是歷史的方法，這只不過是被剝去了它的歷史的形式與紛亂的偶然性而已。歷史開始的地方，同樣的思想徑路也非開始不可，而其更進一步的進程，也不外是抽象的。理論上一致的形態之歷史進程的映像而已；它是一個被修正的之映像，但這是依據實際的歷史的進程所提供的法則而修正的，因爲每個因素都能在

其完全的成熟性，在其典型性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恩格斯：『馬克思底「政治經濟學批判」』，『政治經濟學論叢』，『解放社』版，第一六九頁）

（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細胞的分析。從最單純的、最大的、最直接的『存在』開始

在分析經濟形態時，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反應藥。那必須用抽象力。在資產階級社會內，勞動生產物的商品形態或商品的價值形態，是經濟的細胞形態。在淺薄的人看來，這種形態的分析，是斤斤於細故。其所以考究，誠為細故，但其所為，與顯微鏡下的解剖，正是一樣。（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郭、王譯本，『馬克思序言』，第二頁）

我們以這種方法，就從歷史的、而且在事實上擺在我們面前的最初與最簡單的關係開始；因此這裏，我們就從遇到的最初的經濟的關係開始，我們來分析這種關係。既然那是一個關係，就包含着那有互相關聯的兩個方面。這兩方面的每一個，都可以從其自身來考察；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這兩方面相互關係的樣式，它們的相互作用。需要解決的矛盾將要發生。但是既然我們不是觀察單獨在我們的頭腦中發生的一個抽象的思想過程，而是在某一個時間中曾經確實發生的或還正在發生的現實的事件，那麼，這些矛盾也將在實踐中發展，或者找到了它們的解決。我們来分析這個解決的樣式，而因此將發現，這種解決乃是由一種新關係的建立——這種新關係的兩個對立的方面，我們就要展開的——等等而達到的。

政治經濟學是從商品開始，是從生產品互相交換——無論是由個人或由原始的共同體——的瞬間

開始的。那種出現在交換中的生產品，就是商品。它是一種商品，只因爲在兩個人或兩個共同體之間的關係，在這裏不再結合爲同一個人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是附着於這物。這生產品之上的。在這裏，我們立刻就有一件特殊事實的例子，——這事實貫穿於全部的經濟學中，且曾經在有產者的經濟學家的頭腦中引起有害的混亂，即：經濟學不是研究物，而是研究人與人間的、最後是階級與階級間的關係的；可是這些關係，常是附着於物，而且是作爲物而表現的。馬克思首先發現了適用於全部經濟學的這種聯系——當然，在個別的地方，這種聯系會爲個別的經濟學家所發見——，以是，他使得最困難的問題變得簡單而明瞭，以致在目前，甚至於連有產者的經濟學家，也能够理解了。（恩格斯：『馬克思底「政治經濟學批判」』，『政治經濟學論叢』，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〇七頁）

開端——是最單純的，最普遍的，最大量的，最直接的『存在』，即各個的商品（經濟學上的『存在』）。作爲社會關係的商品的分析。二重的分析，演繹的分析和歸納的分析，論理的東西和歷史的東西（價值形態）。（列寧：『關於辯證法的筆記』，『解放』六〇、六一合刊，第三一四頁）

（九）馬克思論分析的方法——從單純到複雜的思維過程與歷史的真實過程相應

當我們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考察一特定的國度時，我們的考察，可以從該國度的人口開始，而後依照人口之劃分爲諸階級，及其在城市、農村、或海洋以及諸不同生產部門間的分佈，來對它加以分析；其次，我們研究其輸出與輸入，年生產與年消費，及商品價格等等。從此種真實的，具體的和實際的前提出發，例如，在經濟學中，從構成全社會的生產行爲之基礎及主體的人口出發，似乎是正

確的程序。然細加考察，這却是錯誤的。設若我們將構成人口之階級棄而不顧，則人口只是一個抽象。又若不了解階級以之作爲基礎的諸要素，如僱傭勞動、資本等，則階級只是一種空洞的詞句。而這些要素，又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爲前提。如沒有僱傭勞動，沒有價值、貨幣、價格等，就不會有資本。因此，假若我們從人口開始考察，則將得一全體的混亂的觀念，只有經過進一步的分析後，才能達到較爲單純的觀念。由是，我們將從虛構的具體而逐漸進入較爲不複雜的抽象，直至達到最單純的觀念爲止。當最單純的觀念一經獲得時，我們的思惟便會回過頭來，而最後復以人口爲其歸宿。不過這時人口將不復是一個全體的混亂的觀念，而是一個含有許多概念與關係之豐富的總體了。前一方法，在經濟學發生之初期，曾經採用過。例如，十七世紀的經濟學家，通常俱從這有生命的全體：人口、民族、國家、諸國家等出發；但他們的分析，最後常常達到一些特定的、抽象的、一般的原則，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當這些分離的要素多少被抽象的推理固定化之後，才開始有這種政治經濟學的體系，這種體系，是從單純的概念，如勞動、分工、需要、交換價值等出發，而以國家、國際貿易、世界市場爲其歸結的。後一種方法，顯然是一種科學的正確的方法。具體之所以爲具體，因爲它是諸規定之總結，從而，是多種事務之統一。所以，具體雖然是真實的出發點，從而，也是考察和概念的出發點，但在我們的思惟上，具體却出現爲分析總括的過程，出現爲結果，而非出現爲起點。前一方法，乃從圖圖的概念進至抽象的規定，而後一方法，則將抽象的規定引導到思惟徑路上的具體事物之再生產。因此，黑格爾正是陷於把實體當做自我總括、自我吸收和自我運動的思惟底結果來把握的錯誤之中。但是，由抽象進到具體的方法，却只是一種把具體當作我們精神上的具體來把握和再生產的思惟方法。然而，這絕不是具體自身的發生過程。例如，最單純的經濟範疇，比方說交換價值，是以

人口，在一定關係之下從事生產的人口的存在爲前提的；從而，是以某種家族，共同體，或國家等的存在爲前提的，交換價值，只作爲一個既定的、具體的、有生命的全體底一種抽象的、片面的關係，才能存在。

然若視爲一個範疇，則在洪水時期，已有交換價值了。所以，對於意識而言，——哲學上的意識就是這樣規定的——能有理解的思維的人，才是真實的人，而能被理解的世界，才是真實的世界——這樣，範疇的運動便出現爲真實的生產行爲——可惜（？）這種真實的生產行爲，只能從外面來接受刺激。而其結果則是世界。這種說法——但這還是一種同義語的反覆——在具體的總體是作爲思維的總體的限度內，在我們的思維的具體對象實際上是思維的產物，是理解的產物的限度內，才是正確的；當然，這絕不是立於直觀與表象之外，或超然於直觀與表象之上的自行發生的概念的產物，而是直觀和表象被加工而造成概念。當全體在我們的頭腦中出現爲思維的總體時，是有思考的頭腦底產物，而這有思考的頭腦之把握世界，只有一種唯一可能的方法，此法與藝術的、宗教的、或實際精神的把握世界所用之方法，截然不同。真實的主體，雖已被把握，但在頭腦只是思考地、理論地活動時，真實的主體將依然以獨立的資格存在於頭腦之外。因此，在理論方法的運用上（在政治經濟學上），必須常常記着把主體，即社會，作爲我們出發的前提。

但是，難道這些單純的範疇在未成爲更爲具體的主體之前，不能有歷史的或自然的獨立存在嗎？這就不能一概而論。例如，黑格爾在其法律哲學中，就正確地從成爲個人的最單純的法律關係之所有權，開始研究。然在家族或主奴關係之前，在這些遠爲具體的關係之前，並無所謂所有權的存在。在另一方面，我們倒可以說，在家族與氏族存在之時，只有所有權而無私有權。因此，這比較單純的範

疇，在私有財產的關係上，便出現為單純的家族共同體及氏族共同體的關係。在較初期底社會中，範疇出現為比較發展的有機體的一種單純關係，但所有關係所從而產生的具體基礎，則常為其前提。我們可以設想有一個孤獨的野人，他具有一切事物之所有權。然在此場合，所有權並非法律關係。認為家族是所有權之歷史的演進的產物，乃是錯誤之見。反之，所有權倒常常以這種「更具體的法律範疇」的存在為其前提。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單純的範疇乃是這樣一種關係的表現，在此種關係中，比較不發展的具體物，即使不進入由具體的範疇所意識地表現的更複雜的關係之中，亦能存在；不過當此具體物達到較完滿的發展時，它將把這一範疇作為一種附屬的關係而保留着。

在資本、銀行、僱傭勞動等存在之前，貨幣是能够存在，而且在歷史上是的確曾經存在了的。如注意及此，則可以說較單純的範疇，能表現一個不發展的全體之支配的關係，亦能表現一個較發展的全體之附屬的關係，這些關係當全體尙未在更具體的範疇上表現出來這方向發展之前，在歷史上即已存在。在這限度內，從較單純到複雜而發展的抽象思維之過程，是與歷史的真實過程相適應的。（摘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第三節，『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一〇) 恩格斯、列寧論分析與綜合

以分析為主要研究形式的化學，如果沒有分析的對立物——綜合——，就沒有一點價值。（恩格斯，譯文轉錄李達等譯『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第五四頁）

「哲學的方法，是綜合的，同時是分析的。但這句話的意思，決不是說，有限的（被限定了的）

形而上學的) 認識的這兩個方法，無關係的共同存在，或單純的交代；而是說，這兩個方法，在哲學的方法中，以被揚棄的姿態包含着。哲學的方法，在共每一步的運動上，同時是分析的、綜合的起作用。(列寧：引用黑格爾的話，譯文轉錄李達等譯「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第五六一頁)

應用分析的方法或綜合的方法，決不是「我們的恣意的工作」——這是要決定於被認識對象的本身的形式，也決定於對象。(列寧：「關於黑格爾論理學的筆記」)

(一一) 恩格斯論從不同的觀點觀察同一的對象

從不同的觀點觀察同一的對象，從而，把同一的思想複述幾遍，殆已成爲馬克思的習慣。(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郭、王譯本，「恩格斯序言」，第三頁)

(一二) 恩格斯論術語的革命

有些名詞的用法，不僅和該名詞日常生活上的用法相抵觸，且和它們在普通經濟學上的用法相抵觸。這是不能避免的。任何一種科學，每當有新解釋提出時，總不免要在這個科學的術語上，發生革命。在這裏，化學是最好的例證。在化學上面，全部術語，差不多二十年就要在根本上發生一次變化。在化學上面，幾乎沒有一種有機化合物，不曾通過一序列的不同名稱。經濟學一般是採用工商業生活上的用語，並且是用這種用語來進行研究的。它完全忽略了這裏的結果：這樣做，它一定會受這

些用語的束縛，以致不能超出它們所劃定的狹隘的範圍。所以，古典派經濟學家雖然完全明白，利潤和地租不過是生產物（勞動者必須給予僱主的生產物，僱主雖不是生產物最後的專屬的所有者，但是它的最初的所有者）中的部份，是當中無給的部份，但他們決不欲超脫利潤和地租的既成的概念，決不欲把生產物中這個無給的部份（馬克思名之為剩餘生產物），當作一個全體，並就其全體來考察。因此，對於這一部份生產物的起源，性質，及其價值再分配所依從的諸種法則，就不能有明白的理解了。又除農業或手工業外，一切產業，都不加區別，籠統地被包括在製造業這個名辭內；這樣，經濟史上兩個在本質上有別的大時代，就被混在一起了。這兩個時代，一個是以手工業分工為基礎的真正的製造業時代，一個是以機械為基礎的近代大工業時代。在這時候，別的著作家，莫不認為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是不可消滅的、最後的。這樣，就無怪這個近代資本主義生產為人類經濟史上一個過渡階段的理論，會使用一些名辭，和他們習常使用的名辭不同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郭、王譯本，『恩格斯序言』，第一九——二〇頁）

（一三）馬克思論從事物的表現形式到本質關係的發現

……像『勞動的價值和價格』或『工資』這樣的表現形式，是跟那在它們當中所表現的——與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不同——本質關係有區別的。關於任何一般表現形式及其隱藏在它們背後的基礎，亦可說是如此。前者是直接地自行複製一番，如像流行的思維形式一樣，後者只有用科學的研究才能發現。（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郭、王譯本，第四四五——四四六頁）

……但若把事物的現表象式和事物的本質直接混爲一談，一切科學都會成爲無用的了。（同上，第三卷，第七〇〇頁）

（一四）恩格斯論由假設到純粹法則的建立

在實際上，如恩格斯所說，「自然科學在運用思惟的範圍，其發展的形式是假設。新事實已經發見，關於同一部類的現象的舊說明方法，就沒有用處。從這一瞬間起，新說明方法成爲必要。——它最初只是根據於被限定了的數量的事實及觀察。還有在其以上的實驗材料，清除假設，除去其中的一部份，訂正其他部份，最後，就至於確立純粹的法則」。法則不是在學者的頭腦中完成了的姿態上表現的。它是從根據於「被限定了的數量之事實與觀察」的假設成長起來的。但這種假設，是到達於法則的必然的路程，如果沒有假設，就不會有法則即理論。「我們如果以爲要等待材料成熟到能夠確立法則，那麼，到那一瞬間爲止，將不能不延長理論的研究。正因爲這個原故，我們就決不會得到這個法則」。（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著：『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李達譯，『筆耕堂』版，第四〇三頁）

（一五）恩格斯論馬克思的抄引法

我必須一言馬克思的屢屢被人誤解的抄引法。在純事實的敘述與描寫上，引語（例如英國的藍皮書）本身就是單純的例證。但若抄引的話是別的經濟學者的理論的見解，却不是這樣。在這場合，抄

引的目的，祇在指明，在發展的進程中，一種特別的經濟思想，是最先在何處，最先在何時，最先由何人明白表示出來。馬克思所要說明的是，這種經濟思想，在經濟學史上是重要的，並且是當時經濟情形的適切的理論的表現。至若這種思想，從他的見地看，是否尚有絕對的或相對的妥當性，或已經成爲歷史上的遺跡，那倒是沒有關係。所以，這種抄引，不過是本文從經濟學史借來的註解，並從時代與人兩方面，說明經濟學說上各種重要的進步。這種工作在經濟學上是極重要的，因爲這種科學的歷史家，一向是以牽強附會爲特徵。讀者參照再版著者的跋，又一定很容易知道，爲什麼德國經濟學者的言論，馬克思很少抄引。（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郭、王譯本，『恩格斯序言』，第一六一—一七頁）

（一六）馬克思、恩格斯論科學上沒有平坦的道路

在科學上面是沒有平安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勞苦不畏險阻的人，有希望攀到光輝的頂點。（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郭、王譯本，『馬克思序言』，第十三頁）

即今是唯物的觀點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的發展，也是一種需要數年靜心研究的科學事業。因爲很明顯的，在這裏徒托空言是無益的。只有多數經過批判的選擇與全部精細研究過的歷史材料，才能解決這樣一個課題。（恩格斯：『馬克思底「政治經濟學批判」』，『政治經濟學論叢』，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六三頁）

六 列寧論辯證法與折衷主義

非從新提出這樣初步的，屬於ABC的問題不可，那是很奇特的事情。不幸得很，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却使人不得不這樣做。他們倆非難我，說我「更換」問題，或者說我是「從政治上」着眼，而他們却是「從經濟上」着眼。布哈林甚至把這一點提到他的提綱裏面去了，並企圖「抬高」自己，而凌駕於爭論雙方之上：好像我是把兩者結合起來似的。

這是一種極大的理論上的錯誤。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我在我的演講中曾經這樣地重複地說，因為我在事前就已經聽到這種完全不恰當的、在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口中完全不允許的、對我「從政治上」着眼的非難了。政治不能不具有超乎經濟的第一性。想用別的方法來看問題，這就說忘記了馬克思主義底ABC。

也許我的政治的估計是錯誤的估計？若是這樣，那麼，就請你說並證明這。可是，說（或者間接地容許這樣地想）：從政治上着眼與「從經濟上」着眼有同等的價值，二者都可以採用，這就叫做忘記馬克思主義底ABC。

換言之，從政治上着眼，這就是說：如果錯誤地處理職工會，那麼，這就會使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專政滅亡（在俄國這樣一個農業國度裏，黨與職工會之分裂，在黨做得不好的前提下，一定會使蘇維埃政權歸於消滅）。可以（而且應當）從本質上來檢驗這種估量，這就是說，研究、考慮、決定這裏所提出的處理問題的方式是對的呢，還是錯誤的？可是，說：我「尊重」你的政治的着眼點，

『但是』，這只是政治的着眼點，相反的，我們却也需要『經濟的』着眼點——這就完全等於說：我『尊重』你如下的估量：假如你採取某某辦法，你就要死於非命，但是，你却也要想一想，飽食和穿衣總比餓肚子和裸體要好些。

在宣傳把政治地處理問題和經濟地處理問題結合起來時，布哈林是在理論上墮落到折衷主義裏面去了。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這樣地看待問題：我們所關心的是提高生產，而你們所關心的却只是形式的民主。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因為問題只是（而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也只能是）在於：對事情沒有正確的政治的處理，則特定的階級，便不能保持他們的統治，因而，他不能解決他們的生產任務了。

（中略）

對我，托洛茨基同志也作了同樣的非難：關於那叫做職工會機器的槓桿起着怎樣的作用，和應當起怎樣的作用』，『列寧沒有隻字說到』（六六頁）。

對不起，托洛茨基同志：關於這，我既朗讀了魯佐塔克底全部提綱，並同意了他的提綱，我所說的，和一切你的提綱及你的整個的報告或副報告及你的結論比較起來，就更多、更完盡、更正確、更簡單、更明白了。因為，——我再說一遍——實物獎金和同志的紀律法庭，其對於控制經濟、管理工業、提高職工會生產作用之意義，和完全抽象的（並從而空洞的）『生產民主』、『混合生長』，諸如此類的名詞比較起來，要大數百倍了。

在強調『生產』觀點（托洛茨基）或克服從政治上着眼的片面性或把這種着眼點和經濟的着眼點結合起來（布哈林）的藉口之下，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

(一) 忘記馬克思主義，這表現於給政治和經濟之關係以一種理論上錯誤的、折衷主義的定義。

(二) 辯護和掩飾那表現在澈底更動政策上面的政治錯誤，這是貫穿着托洛茨基全部綱領式的小冊子的一種政策。可是，這種錯誤，假如不去意識它，不去改正它，那就會引導到無產階級專政之崩潰上去的。

(三) 在純粹生產問題、經濟問題領域內，在怎樣提高生產問題的領域上倒退了一步；即從那提出具體的、實踐的、極重要的和活生生的任務（展開生產宣傳，好好的學習分配實物獎金，並學習更正確地以同志紀律法庭的方式使用強力）的魯佐塔克底客觀的提綱，倒退到抽象的、空想的、『空談的』、理論上錯誤的、知識份子說法的、忘記了最切實和最實際的東西的一般的提綱去了。

實際上，這就是一方面季諾維也夫和我，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政治和經濟問題上的相互關係。（列寧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關於職工會、時局及托洛茨基錯誤的演說』，瀋蘇譯）

（上略）

布哈林同志在這裏所犯的錯誤底理論上的本質，在於他以折衷主義來代替政治和經濟間的辯證法的相互關係（馬克思主義所教導我們的）。『這個也好，那個也好』、『一方面——另一方面』——這是布哈林底理論的立場。這恰恰就是折衷主義。辯證法要求在具體的發展中全面地去估計相互關係，而不是從這邊摘取一點，從那邊摘取一點。關於這，我已經就政治和經濟的例子指出來了。

在『緩衝』的例子中，這也是毫無疑義的。如果黨這列車在險峻的軌道上頻於傾覆，那麼，緩衝是有益和必要的。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實。布哈林曾經折衷主義地提出『緩衝』問題，他從季諾維也夫

那兒摘取一點，從托洛茨基那兒摘取一點。作爲『緩衝者』，布哈林早就應當獨立地肯定：這個或那個，這邊的人或那邊的人，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什麼事情上犯了錯誤，是犯了理論上的錯誤，還是犯了政治上失策的錯誤，或犯了言論上的小組織性的錯誤，或犯了誇張的錯誤等等，然後應當用一切力量來抨擊這一切的錯誤。布哈林却沒有理解他的這種『緩衝』的任務。這裏一個顯明的證據是：運輸工人中央（鐵路工人和航業工人聯合會中央委員會）彼得格勒辦事處底共產黨團——同情托洛茨基的一個團體，他們明白聲言：據他們所見，『在關於職工會生產力作用的基本問題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兩位同志底立場，是同一觀點底兩亞種』——曾經在彼得格勒把布哈林同志於一九二一年一月三日在彼得格勒所作的副報告，印成小冊子（N·布哈林：『論職工會的任務』，彼得格勒，一九二一）。在這個副報告裏面，我們讀到：

『起初，托洛茨基曾經這樣地說：須要撤換職工會的領導人員，須要選擇適當的同志等等，更早一點，他甚至曾經主張，『徹底更動』底立場，現在，他却拋棄了這個立場，因此把『徹底更動』提出作爲反對托洛茨基同志的論據，那是絕對無意義的。』（五頁）

我不想詳細地說，這種敘述很多的地方實際上是不精確的（『徹底更動』這名詞，是托洛茨基在十一月二日至六日所舉行的第五次全俄職工會代表大會上使用的。關於『領導人物的選擇』，是托洛茨基在他十一月八日送達中央，並由托洛茨基的一位信徒印成傳單發表的提綱底第五節中說的。托洛茨基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整個『職工會的作用和任務』的小冊子，激頭激尾地爲同一的思想方式，爲同一的精神所貫徹，一如我在前面已經指出者，這種『拒絕』，表現在甚麼地方，在甚麼事情上，絲毫不知道）。現在，我的主題是另一個。如果『緩衝』是折衷主義的，那麼，這種『緩衝』就是迴避這一

個錯誤，而提出另一個錯誤，就是對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那在莫斯科在成千的來自全俄的俄共積極份子面前所犯的錯誤一字不提，而提出一九二一年一月三日在彼得格勒的錯誤來說。如果『綏衝』是辯證法的，那麼，這種『綏衝』就是以他的全部力量來抨擊他在雙方及在一切方面所感到的一切錯誤。布哈林並沒有如此作。他甚至不想從『澈底更動』政策的立場上去分析托洛茨基底小冊子。他簡單地對他保持緘默。在綏衝起着這樣的作用時，無論在甚麼人面前都會惹人取笑，那是不足怪的事情。

其次。在布哈林同一的彼得格勒的演說中，我們在第七頁上讀到：

『托洛茨基同志底錯誤，在於：他沒有充分地辯護共產主義學校底這個因素。』

在十二月三十日的辯論中，布哈林說道：

『季諾維也夫同志曾經說，職工會是共產主義的學校，可是托洛茨基同志却說，它是管理生產的行政的技術的機關。我看不出足以證明這個不正確和那個不正確的任何邏輯上的根據：這兩個命題，以及把這兩個命題結合起來，都是正確的。』（四八頁）

在布哈林及其『集團』或『小組織』底論綱六裏面，也包含着相同的思想：

『一方面，它（職工會）是「共產主義的學校」……；另一方面，它却是——並且越來越多地是——一般經濟機關和國家權力機關底一個構成部份。……』（一月十六日『真理報』）

布哈林同志底基本的理論上的錯誤，以折衷主義（在各種「時髦的」和反動的哲學體系作家當中特別流行）來代替馬克思主義底辯證法，恰恰就在這裏。

布哈林同志說到『邏輯上的』根據。他的全部的考察方式表明，他在這裏——也許是自覺地——正站在形式邏輯或煩瑣哲學邏輯底立場上面，而不是辯證法的或馬克思主義邏輯底立場上面。爲

着說明這一點，我擬以一非常簡單的，布哈林同志自己利用過的比喻開始。在十二月三十日的辯論中，他曾說道：

「同志們，在這裏所發生的爭論，也許要在你們很多人當中惹起這樣的印象：有兩個人跑來互相質問說，放在講台上的這個玻璃杯是甚麼東西。一位說：「是一個玻璃圓筒，誰說不是這樣，誰就應該挨罰。」第二個說：「玻璃杯是一個飲器，誰說不是，誰就應該挨罰。」（四六頁）

如讀者所知，布哈林欲以這個比喻通俗地來對我說明片面性底害處。我感謝地接受這個說明，並且爲着用行動來證明我這謝意起見，我以通俗地解釋何謂折衷主義及與辯證法之區別一點來答覆他。

不可爭辯的，玻璃杯是一玻璃圓筒，也是一個飲器。可是，一個玻璃杯不僅具有這兩種屬性或素質或方面，而且具有無數的其他的屬性、素質、方面，與其餘的整個世界的相互關係和「媒介」。玻璃杯是一個可以成爲投擲工具的沉重對象，玻璃杯也可以用來做壓紙的東西，可以用來做裝放被捉到的蝴蝶的器具，玻璃杯可以作爲有藝術的雕刻和圖畫的對象而有價值，這與杯子是否適宜於喝東西，是否由玻璃製成，它的形式是圓筒、抑或不是圓筒等等，都完全沒有關係。

其次，如果現在我把玻璃杯作爲飲器使用，那麼，對於它的形式是否完全爲圓筒，是否真正地由玻璃製成——這一類的知識，在我是絕對不重要的，相反，而重要的却是底面沒有孔隙，在使用這玻璃杯時，不會損傷自己的嘴唇等等。如果相反的，我用玻璃杯不是爲着喝東西，而是爲着使用任何玻璃圓筒都相宜的某種用途，那麼，底面有孔隙，或甚至完全無底等等的玻璃杯，在我也都是一樣的。

在小學校裏邊，人們所限制在裏面的形式邏輯（在低年級，人們必須——修正地——限制在形式邏輯裏面），採有着形式的定義，而以最普通的、眼睛最常見的東西爲指導，而且以此爲滿足。如果

在這場合取出兩個或數個不同的定義，把它完全偶然地混合起來（不管玻璃圓筒也好，飲具也好），那麼，我們所得到的，就是一種折衷的定義，它指示出對象底不同的方面，此外一無所有。

辯證法邏輯要求我們更進一層。爲着真正地認識對象，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媒介」。我們從不能完全做到這一點，可是，全面性的要求，將使我們防止錯誤，防止僵化。這是第一。第二，辯證法邏輯要求在對象的發展上，在它的「自己運動」（如黑格爾有時所說的）上，在它的變化上去把握它。在一個玻璃杯身上，這不能一下子看得明白的，可是，一個玻璃杯也並不是不變的，特別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使用，它和周圍世界的聯系却在變化着。第三，必須把全部的人的實踐——不管作爲真理底標準也好，作爲對象與人所使用的東西之聯系底實際決定者也好——加進對象底完全的「定義」裏面去。第四，辯證法邏輯教導我們，「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永遠是具體的」——如已經死去了的普列哈諾夫——追踪黑格爾——常常喜歡這樣說的（我認爲在括弧裏面，對年青的黨員指出：不研究——恰恰是研究——普列哈諾夫所寫的一切關於哲學的著作，就不能算做覺悟的、真正的共產黨員，這是很適宜的，因爲這些乃是整個國際的馬克思主義文獻中的最好的東西）。自然的，我並沒有把辯證法邏輯的概念全部說盡。然而，對目前的問題，這也許夠了。現在可以從杯子轉到職工會，轉到托洛茨基的綱領方面來了。

「一方面是學校，另一方面是機關」——布哈林這樣說，並在他的論綱上這樣寫着。托洛茨基的錯誤，在於「他沒有足夠地擁護學校的因素……」，而季諾維也夫的錯誤，則在於沒有充分估計到機關的「因素」。

爲什麼布哈林的這一觀察方法是僵死的與空洞的折衷主義？因爲在布哈林那兒，想獨立地、從自

己的觀點出發，去分析今日爭論之全部歷史（馬克思主義，就是說，辯證法邏輯，無條件地要求着這一點），去分析在一定的時間內，在一定的具體條件之下，對於問題的全部處理，對於問題的整個提法——或者如果你願意，也可以說，問題提法的整個方向——的企圖，連影子都找不到。在布哈林那兒，絲毫沒有去做這一種嘗試的影子！他不經過絲毫具體的研究，而只是用赤裸裸的抽象方法去看問題，從李諾維也夫處取一點，從托洛茨基處取一點。這就是折衷主義。

爲了更顯明地闡明這一點，我想舉一個例子。對於中國南部的起義者與革命者，我是毫無所知的（除了我多年前所讀過的孫逸仙的兩三篇論文和幾本書以及一些報章上的論文之外）。如果，那裏發生起義，那麼在中國人之間也可能發生爭論，某甲謂起義是蕩捲全民族的非常尖銳的階級鬭爭之產物，而某乙則謂起義是藝術。用不着知道更多的東西，我就可以寫出像布哈林底提綱那樣的提綱：『一方面……另一方面』。一個沒有足夠地注意到藝術的『因素』，另一個沒有足夠地注意到『尖銳化』之『因素』等等。這就是僵死的與無內容的折衷主義，因爲沒有具體地研究一定的爭論，一定的問題，一定的看問題的方法等等之故。

一方面職工會是學校，另一方面——是機關；第三方面——是勞動者的組織；第四方面——是幾乎只屬於產業工人的組織；第五方面——是依產業部門而分的組織等等，等等。關於證明爲什麼必須把握問題或對象之第一方面與第二方面，而不把握第三、第四、第五等方面所必須的任何說明，任何的獨立的分析，在布哈林那兒，連輕微的影子也沒有。因此，布哈林派的提綱，乃是澈頭澈尾的折衷主義的空談。布哈林關於『學校』與『機關』相互關係之間問題的提法是根本錯誤的，是折衷主義的。

而且還需要長期地學習，而大談其職工會在生產中的作用，對於生產的管理，那就犯了基本的錯誤。不是學校與管理，而是管理底學校。

當十二月三十日駁斥季諾維也夫，並且——沒有舉出任何證明和不正確地——責備他否認「指派方法」，即否認中央指派之權利和義務時，托洛茨基同志曾經無意地透露一極端重要的對照：

「……季諾維也夫——他說——太過於從宣傳的觀點去看待任何實踐的切實的問題，而忘記在這裏存在着，不僅是鼓勵的材料，而且還有必須在行政上去加以解決的問題。」（二七頁）現在我就來詳細地說明，對於該問題行政上的處理是怎樣一回事。可是，托洛茨基同志，如像行政員那樣，去處理（或者更正確地說，去魯莽從事於）他自己在他的綱領小冊上所提出的問題，而本來却可以而且應當完全以宣傳者的身份去處理這些問題的——托洛茨基底這種基本上的錯誤，却恰恰在這裏。

實際上，托洛茨基的好的東西是什麼？不是在他的提綱上，而是在他的演講上——特別是在他忘記了他與職工會中所謂「保守」派的失敗的論戰的時候——生產宣傳無疑義的是好的，有益的。在職工委員會底實事求是的「經濟」工作之下，在口頭的與文字的工作中作為全俄生產宣傳局底參加者與協作者的，托洛茨基同志無疑義地也許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並且無疑義地正在做着不少有益的事情）。錯誤是「綱領式的提綱」。關於在職工會組織裏面的「危機」，關於職工會裏面的兩種傾向，關於俄國共產黨黨綱之闡釋，關於「蘇維埃工聯主義」，關於「生產教育」，關於「混合生長」之一種行政員的看法，像一根紅線一樣，貫穿着這「綱領式的提綱」。

我把托洛茨基「綱領」中所有主要的問題都列舉出來了，恰恰是這些問題，連同托洛茨基現有的

材料，現在都完全可以宣傳的觀點來處理的。

國家，這是強制底領域。要放棄強制力，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階段上，那是喪心病狂。此處「行政化」與行政地去處理事情，是必須的。黨——這是無產階級直接掌權的先鋒隊——是領導者。影響先鋒隊的特殊的手段，清洗與鍛鍊先鋒隊的手段，是開除黨籍，而不是強制力。職工會是國家權力之後備軍，是共產主義底學校，是領導經濟的學校。在這一領域上，特殊的與最主要的不是管理，而是「中央的」（自然也還有地方的）「國家管理、國民經濟與廣大勞苦大眾之間」的「聯系」（如我們黨綱上討論職工會的那經濟部份上第五節所說的一樣）。

而整個問題提法之不正確性，對於這種關係之不理解，恰如同一根線紅絲似地貫穿着托洛茨基底整本綱領式的小冊子。

試假定，托洛茨基已經在他的綱領之其他問題的聯系上把這同一的受惡評的「混合生長」寫好了，並從另外一方面去看整個的問題。試假定，托洛茨基的小冊子是完全爲着這樣的任務的：例如說，要詳細地去研究那九百件中的九十件「混合生長」事件，即同時兼掌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中工業管理方面與職工會中的選任職務，同時兼掌職工會會員擔任的職務與職工運動固定工作人員擔任的職務的事件。試假定，把這九十件事件，跟精選的統計調查底材料，跟工農檢察院及相當的人民委員會的督察員和指導員底演說和報告一同加以分析，就是說，把它們根據行政機關之材料加以分析，從工作總結、工作效果、生產成績等等觀點加以分析。對於事情的這樣的一種處理，乃是一種正確的行政上的處理，並且它可以完全說明「更調」底路線的——就是說，注意誰應被撤職，誰應被調換，誰應被任命，對於「領導份子」應立刻提出那些要求。如果布哈林在他一月三日的彼得格勒演說（由運輸工人

中央委員會發表的)中，曾經說：以前托洛茨基曾立於「更調」底觀點上，而現在則已經放棄這種觀點了，那麼，在此處，布哈林也陷入一種實際上可笑的和理論上爲馬克思主義者所絕對不允許的折衷主義裏面去了。布哈林抽象地來看問題，而不會(或者是不願意)具體地來處理它。當我們，即黨的中央與全黨，執行政務，就是說，管理國家時，我們將永不，也永不能放棄「更調」，就是說，放棄撤職、調換、任命、開除等等。然而在托洛茨基的綱領式的小冊子中，却完全沒有使用那些材料，完全沒有提出「實際的實事求是的問題」。季諾維也夫與托洛茨基所爭論的，我們同布哈林所爭論的，全黨所爭論的，不是關於「實際的實事求是的問題」，而是關於「職工運動領域中的傾向」的問題(托洛茨基提綱第四條結論)。

就其本質說來，這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就事情——目前的具體的事情——的本質講，要像布哈林所想像的那樣——布哈林自然充滿着人道的感情和志願的——用折衷主義的小節的更改與補充方法去糾正托洛茨基的錯誤，那是不可能的。

此處，單單只能有一個，僅僅一個解決方法。

正確地去解決「職工運動領域中的傾向」，階級間的相互關係，政治與經濟間的相互關係，國家、黨、職工會——作爲「學校」與作爲機關——的特殊作用等政治問題。這是第一。

第二：在正確的政治的解決之基礎上，執行——更正確些說，進行——一種長期的、系統的、堅決的、忍耐的、多方面的、重複的生產宣傳，用國家機關的名義並在國家機關領導之下，在全國範圍內來進行它。

第三：不要把「實際的實事求是的問題」同關於傾向的那種爭論——這種爭論乃是「全黨的清談

論「與廣泛討論底正常權利——混爲一談，而要實事求是的，在實際的委員會中，以證人之對質，連同對於演講、報告、統計的研究，來提出上述的問題，並且在一切這些的基礎之上——只有在一切這些的基礎之上，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只有根據相當的蘇維埃機關與黨的機關或者兩方面的機關底決定去實行「澈底更動」。

可是，在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那裏，都露出了這樣的混合物：處理問題上的政治錯誤，對中間傳送聯系，機器輪帶之割裂，憑空地出其不意地喊「行政化」。錯誤之「理論」的根源——因爲布哈林曾一度以他的「玻璃杯」提出了理論根源的問題——是顯然的。布哈林同志之理論的——在當前場合是認識論上的——錯誤，就在於以折衷主義代替辯證法。由於折衷主義的提問題，布哈林完全迷了道路並陷入於工團主義底地步。托洛茨基的錯誤是：片面性、混亂、誇大、執拗。托洛茨基的綱領則是這樣的，即玻璃杯，是一種飲器，但是該玻璃杯却是沒有底的。（列寧：「再論職工會，時局及托洛茨基布哈林之錯誤」）

七 恩格斯論歷史唯物論與庸俗唯物論

……依據唯物論的歷史見解，在歷史過程中，在結局上決定着的契機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及再生產。馬克思和我的主張都不過如此而已。倘若有人把它這樣來曲解，說經濟的契機是唯一決定的東西，那他就會把這命題變成無價值的，抽象的、不合理的套語。經濟狀況是根底，但上層建築的各種各樣的契機——階級鬭爭的，政治上的諸形式和它的成果——勝利的階級在戰勝之後建立起來的憲法等

——法律形式，以及這一切鬭爭在鬭爭成員的頭腦裏的反映，如政治的、法律的、哲學的學說、宗教的觀點和這觀點向教條系統的進一步的發展等，在歷史鬭爭的過程中，都有着它們的作用，而且在許多場合還能有力地決定着它們的形式。這一切的契機有着一種交互作用，在這裏面，經濟的運動是通過了無限量的一切偶然性（也就是通過了這樣的事物和事件；它們相互間的內的關聯是那麼隔離，那麼難於指明，使得我們會把它忽視，把它看做並不存在的東西），而終於作為必然性貫徹着。要不是這樣，那麼，把理論應用到任一歷史時期的事，就會要比簡單的一次方程式的解決還更容易了。（恩格斯：『給布洛赫的信』，見『馬恩通信選集』，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七〇——七一頁）

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的發展，都建立在經濟上。但它們在自己互相間和在經濟基礎上又都有着反作用。並不能說，經濟狀況就是原因，是唯一能動的，而其他一切都只是被動的作用，而是在結局上常常把自己貫徹着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之上的交互作用，例如國家，就通過了保護關稅，自由貿易。好的或者壞的財政制度而發生作用，甚至於就是那德國資產階級俗物們底從一六四八到一八三〇年德國的經濟窮乏狀況中發源出來的致命的軟弱和無能（這在最初，是表現為虔敬主義，後來又成為感傷主義和爬行的。對王侯和貴族們的屈服）也未嘗沒有經濟上的作用。它曾經是復興的最大障礙，後來革命的和拿破崙的戰爭把慢性的窮乏變成了急性，才算是把它動搖了。因此，像人們那樣那樣地隨意想像着的那經濟狀態的自動作用，是沒有的，這裏有着的是人類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不過這創造是在一種所予的、有限的環境之內，是在現存的事實關係的基礎之上。在這些關係裏，經濟關係雖然會從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關係方面而受到影響，但在結局上，它是決定的東西，並且形成了貫串在它們中間的，唯一引導着人達到了解者的紅線。（恩格斯：『給斯他爾根堡的信』，

見「馬恩通信選集」，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八一——八二頁）

至於說到那浮懸在更高的空中的意識形態的領域，如宗教、哲學等，那麼，這些東西還有着一種史前的，從歷史的時代中出現和繼承下來的繼承儲藏，一種在今天的我們會要說它是愚想的儲藏。這各種各樣的關於自然，關於人類性質，關於精靈、魔力等等的虛偽的表象，大都是消極地有着經濟的基礎；史前時代的低度的經濟發展，把那關於自然的虛偽的表象當做了補充，有時也當做了條件甚至於原因。但是，雖然濟經的必要是前進着的自然認識的主要推動力，而且永遠也會如此，但如果有人想給這一切原始的愚想都歸到經濟的原因，那就未免迂陋了。科學的歷史，就是這種愚想被漸漸排除的歷史，是那新的比較不大荒誕的愚想，來把它代替了的歷史。在這上面工作的人們，又是屬於分工的特殊的方面，並且還自以為是開闢了一種獨立的領域。愈是讓他們在社會工分的內部形成了一種獨立的集團，那他們的產物，以及他們的誤謬，就愈是對於全社會的發展甚至於經濟的發展有着一種反作用的影響。但雖然如此，他們本身仍然是居於經濟發展的支配的影響之下的。例如在哲學裏，就資產階級的時代來說，這種情形最容易得到證明。霍布士是最初的近代唯物論者（指十八世紀而言），又是當時的絕對主義者，而當時正是絕對君主制在全歐洲全盛的時代，在英國正是與民衆進行鬥爭的時代。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一六八八年的階級調和的產兒。英國的無神論者，和他們的澈底的推進者，即法國唯物論者，都是資產階級的正派的哲學家，法國唯物論者甚至於還是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哲學家。在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哲學裏是貫串着德國資產階級俗物的性質——時而積極，時而又消極。但是，作為一定的分工的領域，每一時代的哲學都得以一定的思想材料作為前提，這材料是它從它的先行者繼承下來，而它就是從這裏出發的。於是就發生這樣的事：在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常

能够在哲學上起領導的作用：例如十八世紀法國對於英國（法國人就是立足在它的哲學上的），後來德國對於前兩者。但不論在法國和德國，哲學仍是像每一時代的一般著作的繁榮一樣，都是一種經濟上的飛躍的結果。經濟發展的最後的至上權，我認爲在這些領域上仍是確立着的，不過它要通過個別領域本身所規定的條件而表現出來：例如在哲學裏，就表現爲在先行者遺留下來的現有哲學材料上所發生的經濟影響（它多半又是首先在政治等等的外衣之下作用着的）。經濟不會直接從本身創造什麼，而只是決定着現存的思想材料的改變和補充的方式，而這種決定，當它是作爲政治、法律、道德的反射（這一切對於哲學有着重大的直接的作用）時，也幾乎全是間接。（恩格斯：『給史密特的信』，見『馬恩通信選集』，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七七——七八頁）

青年們所以常常會把經濟方面過分地着重了的原因，在馬克思和我也要負一部份責任。當時我們在論敵前面，必須要強調那被他們所攻擊着的主要原則，於是就沒有更多的時間，地方和機會，來使其餘的交互作用中的諸契機獲得它應得的地位。但因爲那是爲着要對一個歷史階段加以說明，也就是說爲着要實際的應用，那情形是不同的，而這裏就不能有什麼錯誤。遺憾的只是太常常地說有人以爲只要把主要命題抓住，而且還不一定是正確地抓住，就算是對於一種新理論完全得到了了解而且充分地能够運用了。在這方面，我不能不責備那些最新的『馬克思主義者』，許多古怪亂談都是從此產生的。（恩格斯：『給布洛赫的信』，見『馬恩通信選集』，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七二——七三頁）

編者按：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上有一段關於藝術的話，也是爲反對庸俗唯物論的參考，茲譯述如下：

「6、物質生產之發展例如對於藝術生產之不均衡的關係。一般說來，進步這個概念，

不應從通常的抽象上去把握。在藝術及其他問題上面，這一不均衡，還沒有像在這實際的社會諸關係範圍以內，例如，北美合衆國教育對歐洲之關係，那樣的重要而難於理解。但是老實地說，在這兒應當加以推闡的難題，是在於下述一點，即，作爲法律諸關係的生產諸關係何以進入不平等的發展？因而，例如羅馬私法（在刑法與公法上不如是之甚）對於近代生產之關係。

7. 這種見解是顯示爲必然的發展。但是有時法權之承認……（這裏原稿有一字不大清楚——譯者）（自由以及其他）。（交通關係之影響）。全世界史不必是常常存在的：作爲全世界史的歷史乃是一種成果。

8. 出發點當然應當起自自然的規定性：在主觀上與客觀上，部落，人種，等等。

關於藝術，大家都知道，它的幾個特定的繁榮時代都不是跟社會之一般發展完全相應的，因而也不是跟那似乎構成社會組織骨幹的社會底物質基礎相應的。例如，希臘人之與近代諸民族比較，乃至沙士比亞之與近代諸民族比較。關於藝術底某些形式，例如敘事詩，甚至都承認在藝術生產之所以作爲藝術生產剛開始的時候，它們在其於全世界歷史上構成一個時代的古典的形態上，是從不能夠被創造出來的。所以，在藝術本身的領域以內，有着巨大意義的某些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之比較低的階段上，才是能夠的。要是在藝術領域以內其各種部門間之關係是這樣的話，那麼，整個藝術領域對於一般社會發展之關係也有此種情形，這是更不足驚異的了。困難處只是在於對於這些矛盾之一的撮述。只要把它們當中的每個分別出來看，那它們就立地被明瞭了。我們試以希臘藝術，其次是以沙士比亞對

於現代之關係爲例吧。大家都知道，希臘神話，不僅是希臘藝術之寶庫，而且也是希臘藝術之園地。難道那作爲希臘人幻想，因而也就是作爲希臘人（藝術）基礎的自然界之見解以及社會關係之見解，在自動紡織機、鐵道、蒸氣機關、電報等存在之下有可能嗎？火神烏爾剛（Vulcan）怎能與洛特股份公司相比，至上神幽不特（Jupiter）怎能與避雷針相比，神界之宣傳使者赫爾麥司（Hermes）怎能與動產抵押借款相比呢！任何神話都是在想像之中並借想像之力以克服自然界之種種威力，屈服自然界之種種威力，把自然界之種種威力具象化的，因而，隨着對這些自然界之種種威力之有效的支配，而神話也就消滅了。在印字房街（倫敦，泰晤士報館所在地——譯者）的旁邊，那會還有甚麼風說之神華馬（Litho）呢？希臘神話，換言之，那在人民的幻想中已經用無意識地藝術的方法加過工的自然界和社會形態，乃是希臘藝術底前提。這是希臘藝術之資料。但是不是任一種的神話，亦即不是對自然界之任意一種無意識的藝術的加工（在這兒，所謂自然界是指一切的對象物而言，因而社會也包含在裏面）。埃及的神話決不能成爲希臘藝術之園地或母胎。然而反正（總是）一種神話。因之，決不是這樣一種社會之發展，這種社會之發展是排斥對於自然界之任何神話關係的，是排斥對於自然界作任何神話解釋的；因之，這種社會之發展要求藝術家沒有一種與神話不相關涉的幻想。

另一方面，在火藥和鉛彈底時代，英雄雅基烈斯（Achilles）是有可能嗎？或則一般地說，那一伊里雅德詩篇（Iliade）能和刊物與印機並存嗎？難道歌謠，傳說，妙絲之神因而乃至敘事詩之必要的前提，都要不可避免地隨着印刷機之出世而不熄跡嗎？

但是，困難處並不在於去了解希臘的藝術與敘事詩是跟社會發展之某些形態有聯系的。困難處是在於對下述一點之理解，即，希臘的藝術與敘事詩還在繼續着給我們供給以藝術的玩賞，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還保存着規範與不可企及的典型之意義。

一個大人是不能再變成爲一個孩子的，除非他變成一個傻子。但是難道孩子之純樸不能使他悅意嗎？難道他本身不應當力謀在最高的階段上去再造出自己的真誠嗎？難道在每個時代，其本來的性質，在兒童天性中，不是在其無藝術的真理中恢復着嗎？爲什麼在人類社會曾經最美好地發展的地方，人類社會底幼年期不應作爲一個永不重複的階段而在我們看來具有永恆的魅力呢？世間上有不良的兒童，也有早熟的兒童。有許多古代的民族是屬於這種範疇的。希臘人會是正規的兒童。希臘藝術所具有的那種魅力，在我們看來，是跟它生長於其上的那種不發展的社會階段不相矛盾的。反之，那魅力寧是這不發展的社會階段之成果，而跟下述的情形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的，即希臘藝術在其下所由發生而且只有在其下才能發生的那種種未成熟的社會諸關係，是永遠不能再重複了。」（原稿至此中輟）

八 恩格斯對於口頭「唯物論」者的指斥

……一般地，「唯物論」這字，在德國，在年青的文人們看來，只算是一個簡單的套語，無論什麼都被人不加研究地用這套語來標記着，也就是說，只要貼上了這個標記，就以爲事情解決了。其實，我們的歷史見解，主要地是研究的嚮導，而不是黑格爾派的構造的槓桿。在想要獲得政治上的、

私法上的、美學上的、哲學上的等等觀點之先，必須要把這些觀點所適應、所從出的全部歷史從新加以研究。必須要把各種各樣的社會形式的現存條件加以探討。在這方面現在所看見的還非常少，因為很少有人肯認真地這樣做。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大量的助力，它的領域是無限的大，誰只要肯認真地去做，就可以有很多成就，就能够出人頭地。但現在不是這樣，歷史唯物論的套語（其實一切都可以被人弄成套語）對於許多青年的德國人只有這樣的用處：加速地把他們自己比較貧乏的歷史知識（經濟的歷史都還只睡在搖籃裏！）系統地組成起來，這樣使自己大膽的前進……。

你是實際上有了成就的，你一定能够看出，青年作者們對於經濟、經濟的歷史、交易、工業、農業、社會形成的歷史等，能够用力研究的人多麼稀少。對於毛列爾，除了名字以外還知道多少！新聞記者式的自滿，似乎可以成就一切，而且看起來也好像如此。這些先生們常常以為所做的一切，對於勞動者已經够好了。倘若這些先生們知道，馬克思是怎樣常常覺得，就是他的最好的東西，對於勞動者也不會是够好的，他是怎樣地認為，如果有人不把最好的東西供獻給勞動者，那就是一種罪惡！……（恩格斯：『給史密得的信』，『馬恩通信選集』，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六八——六九頁）

九 馬克思對若干錯誤學說的批判——把外國現實之

理論的表現變成若干教義的集成，拋開事物內部的聯繫，抽去事物之一定的歷史內容，咀嚼早已過時了的見解，主觀主義的幻想，是庸俗經濟學及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特徵

直到現在，經濟學在德意志還是一種外來的科學。古斯達夫·馮·居利希在其所著工農商業之史的發展，尤其是在一八三〇年刊行的同書第一、第二冊中，曾詳細考察到：德國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從而，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樹立，曾受到那幾種歷史事情的阻礙。經濟學在德國發展的地盤，依然沒有。這種科學，依然是當作完成品，從英法二國輸進來。德國的經濟學教授都還是學生。外國現實之理論的表現，在他們手上，成了若干教義的集成。他們周圍的世界是小資產階級的世界，從這個世界的情形來解釋，這種種理論是被誤解了。他們覺得在科學上自己沒有多大的力量。他們還感覺不安地知道，自己所討論的問題，實際是自己所不熟悉的問題。他們大都憑藉學說史之博學的美裝，或雜湊各種無關係的材料——那是由所謂官房學借來的，那是一種知識的混合物；德意志官僚的失意的候補者，沒有一個不要通過這一個煉獄——來掩飾。

一八四八年以來，資本主義生產在德意志迅速發展了，現今還正好在迷人的開花時期。但我們的

專家，時運還是不佳。當他們能够公平研究經濟學時，近代的經濟關係在德意志還缺少現實性。而這種關係生出之後，在資產者視野之內，又不許再有公平的研究了。經濟學，在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限度內，換言之，即不把資本主義秩序視為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却把它視為社會生產之絕對的最後的形態的限度內，它只有在階級鬭爭仍在潛伏狀態中，或仍為間或發生的現象時，可仍為科學。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郭、王譯本，第六頁）

我所說的古典經濟學，是指配第以來的經濟學。他曾研究資產階級生產關係的內部的關聯，是與庸俗經濟學相對稱的。庸俗經濟學，却埋頭研究它的外部的關聯。他們為資產階級日常的需要，並且為要給最明白的現象以表面上也過得去的說明，是像反芻一樣，不絕咀嚼科學經濟學許久以前所供給的材料；而在其他各點上面，他們却像學究一樣，把資產階級生產當事人關於這個世界（他們認為最善的世界）所抱的最平凡最自大的見解，組織一下，稱其為永遠的真理。（同上，第四一——四二頁）

剩餘價值轉化為利潤，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這幾件事，已經說明。但要說明這幾件事，必須先說明資本的流通過程，因為在這個問題上面，資本的週轉是有作用的。所以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到第三冊才能說明（第二卷包括第二冊第三冊）那裏將會指出，這些俗物和庸俗經濟學家的說明方法，是立脚在何處。那就是，在他們腦中，只會反映關係的直接的形象形態，決不會反映它的內部關聯。如果是這樣，科學又有什麼必要呢？（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資本論通信集』，郭大力譯，『讀書生活社』一版，第五——六頁）

庸俗經濟學，本來不過把現實生產當事人的日常觀念，教訓式地甚至宣傳式地繙譯過來；並且把

此等觀念，依照某種可以理解的次序，排列起來。所以，這個三位一體（編者按：指庸俗經濟學所用的三位一體公式：土地——地租，資本——利息，勞動——工資或勞動價格。參考「資本論」第三卷，郭、王譯本，第七〇〇——七〇一頁），雖完全缺少內部的關聯，但在庸俗經濟學看來，這個三位一體却成爲自然的毫無疑問的基礎。他會由此建立他的淺薄的教義，這也是一件極其自然的事。同時，這個公式，還與支配階級的利害關係相一致。因爲這個公式宣稱，他們的所得源泉，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遠的合理性，並且把它們當作一個教義舉起來。（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郭、王譯本，第七一二頁）

資產階級經濟學所特有的拜物教——把一物在社會生產過程中取得的社會的經濟的性質，變爲該物由其物質本性發生的自然的性質——也由此完成了。視勞動手段爲固定資本，便是一例。這是一種經院主義式的定義方法，這只能引起矛盾和混亂。我們已在第一卷第五章討論勞動過程時講過，各種對象的成份，究竟是當作勞動手段，當作勞動材料，還是當作生產物，要看他在一定勞動過程上的任務或機能而定。同樣，勞動手段也僅在下述的限度內，是固定資本：第一，生產過程一般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生產手段一般是資本，並在經濟的意義上有資本之社會的性質。第二，其價值，依某特殊方法移入生產物。不然，它們便只是勞動手段，不是固定資本。同樣，肥料之類的補助材料，雖不是勞動手段，也因爲它像大部份勞動手段一樣移轉價值，故常說是固定資本。在這裏，決定一物之所屬的，不是定義。使它們歸入某種範疇的東西，乃是它們的機能。（同上，第二卷，郭、王譯本，第七一——七二頁）

……最近有些經濟學者如德爾、拔西之流，竟在古典派經濟學趨於衰絕的時候，甚至在它臨終的

時候，覆述這些原始的主張（關於剩餘勞動和剩餘價值一般的自然條件的主張），並在地租早已發展成爲剩餘價值一個特殊形態和一個特殊部份以後，自信他們對於地租，會有新的獨到的發現。關於這些人，我們將要說什麼呢？有一些見解，在一定的當初的發展階段上，原是新的，創造的，深刻的，正當的，但庸俗經濟學特徵，却是在這個見解已經成爲平凡無力而且變爲虛妄的時候，把它重重覆覆地覆述出來。他們自己也承認，古典派經濟學熱心要解決的問題，他們是絲毫不加顧慮的。他們把這些問題，和那些在資產階級社會發展的較低的觀點上方才成立的問題，混同了。他們還熱心地，自己滿足地，反覆細嚼重農主義派關於自由貿易的主張。這也是這樣的。這些命題，雖然還爲這個或那個國家所實際注意，但它們理論的旨趣，却是老早已經喪失掉了。（同上，第三卷，郭、王譯本，第六七一頁）

蒲魯東由那與商品生產相應的法律關係，創造他的正義（永遠的正義）的理想；由此，他由一種給一切小資產階級以無限寬慰的方法，確認商品生產的形態，和正義一樣，是永遠的。此後，就企圖依照這個理想，來改造現實的商品生產，並改造與其相應的現實的法律關係。假使有一個化學家，他不要研究物質變化的現實法則，不要解決與此有關的問題，却要由『自然性』與『親和力』，這兩個『永遠的觀念』，來改造物質的變化。我們對他將發生若何的感想呢？我們說，高利貸是與『永遠的正義』，『永遠的公道』，『永遠的互助』或其他『永遠的真理』相違背，正和教會的神父說，高利貸是與『永遠的恩寵』，『永遠的信仰』，『永遠的神意』相違背一樣。這種說法，並不能使我們對高利貸，多知道一些什麼的。（同上；第一卷，郭、王譯本，第四五——四六頁）

蒲魯東先生並沒有直接主張說，資產階級的生活，在他看來是永久的真實。但他是間接地這樣主

張了，因為他把那在思想的形式上來表現資產階級關係的範疇神化起來。……因此，蒲魯東先生必然地成了教條主義者。（馬克思：『給安能科夫的信』，『馬恩通信選集』，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六二頁）

我們可以判斷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是怎樣無意思了。這種社會主義，要使商品生產成爲永久的，但同時，又把『貨幣與商品的對立』廢除，從而，把貨幣本身廢除，因爲它只在這種對立中存在的。如果這種意見也可成立，我們也可廢除羅馬教皇而保持加特力教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郭、王譯本，第四七——四八頁）

編者按：關於資產階級經濟學，列寧有以下的意見：

『……在化學、歷史、物理學的專門領域有着最貴重的勞績的教授們，一旦讀到哲學的問題時，他們中的任何一人和任何一句話都不足信了。……在專門的研究領域上有着最貴重的勞績的任何一個經濟學教授，一旦讀到經濟學的一般的理論，他的任何一句話也不足信了。因爲在近代社會中，經濟學和認識論一樣，都是黨派的科學。大體說來，經濟學的教授，不過是資本家階級的學術買辦，哲學教授不過是神學的學術買辦。

在哲學和經濟學上，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就是要把這些買辦們的成績加以掌握和改造（例如，你們如不利用他們的著作，那麼？在你們對新經濟現象的研究方面，你們將不能夠踏進一步），同時排除了它們的反動的傾向，依着自己的方針，而與我們敵對的勢力和階級的全戰綫進行鬭爭。』（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譯本，『神州國光社』版，第四一二頁）

十 列寧論共產主義思想是人類知識積累的總匯。一 定的思想聯盟之必要。應該用唯物論的觀點研究 黑格爾的辯證法

舊的學校是一種鰓鴨式的學校，它強迫學生去吸收一大堆無用的，冗贅的，不能給社會一點益處的知識。這些知識，困累人的腦筋，把青年人都變成了放在模型裏鑄造出來的辦事員。但如果由此便想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說一個人可以不須獲取人類知識所積累的東西，就變成一個共產主義者，那便犯了很大的錯誤。如果以為學些共產主義的口號，共產主義科學的結論，就夠了，不須要獲取共產主義所產生的知識底總和，那就是錯誤的。

馬克思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怎樣從人類知識總和中產生出來的一個實例。

你們已經讀過和聽說過，共產主義理論——共產主義的科學，主要是由馬克思創造的，這種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已經不再是十九世紀一個社會主義者的創造品（雖然他是個天才），已經變成全世界千百萬無產階級的學說，這千百萬人，正在他們與資本主義鬭爭中，使用這一學說。

如果你要問：為什麼馬克思底學說會緊緊抓住最革命階級的千百萬人的心呢，那你就只能得到一個回答：因為馬克思是站在資本主義下人類所獲得的知識的堅固基礎之上。在研究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法則之後，馬克思認清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避免要走到共產主義。而且主要的是，他根據了對於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最精確、最詳細而且最深入的研究，他才證明這一點。而且他所以能夠如此，又

因為他對於一切從前科學所教授的東西都完全融會貫通了。

他把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事物，都批判地加以改造，一絲一毫不放鬆忽視。他把人類思想所創造的一切，都加以改造，加以批判，拿它到工人階級運動中去試驗，得出被資產階級底褊狹性所限制，或被資產階級底偏見所束縛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結論來。

例如說，當我們談到無產階級文化的時候，這是我們必須緊記在心裏的。除非我們清楚了解：只有運用對於全部人類進化所創造的文化之精確的知識，只有把這個文化重行加以改造，無產階級文化才能建立起來——除非了解這點，那我們就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無產階級文化不是一種誰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生出來的東西，它不是那些自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們發明出來的東西。這完全是胡說。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的壓迫之下所積累起來的知識總匯之自然發展的結果。

所有這些大路與小徑，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引向無產階級文化的，正像馬克思所改造的政治經濟學，指示我們，人類社會定要走向什麼道路，要轉到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開始一樣。

當我們屢次聽到，青年的代表和某些新教育制度的主張者攻擊舊的學校，說它是鵝鴨式學校的時候，我們就向他們說，我們必須從舊的學校中採取好的東西。

我們不可從舊的學校採取那種拿一大堆十分之九無用，十分之一歪曲的知識去填充青年人頭腦的制度。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限於共產主義結論，只去學些共產主義口號就夠了。像這樣做，你是不能建設共產主義的。只有用人類所創造的一切學識寶藏去豐富你底頭腦，你才能變成一個共產主義者。

我們不需要俄鴨，但我們真正需要用主要事實的知識去開發青年人的心智，使臻完善。如果一個共產主義者所獲得的一切知識不在他心裏融會過，那他不過只會成爲一個吹法螺的人，而共產主義也就成了空談，成了僅僅一塊招牌而已。你不僅需要融會這些知識，而且需要批判的融化它，以便不使無用的材料堵塞你底心智，而使一個現代有教養的人所不可少的實際學問去豐富你的心智。

如果一個共產主義者沒有經過很多認真艱苦的工作，也不了解那些必須批判地考察的事實，只學得了一些現成的共產主義結論，便把他底共產主義拿來誇耀，那麼，他就是一個可哀的共產主義者。這樣的淺薄是絕對可悲的。如果我明白我知道得少，我就會努力更多學一點；但如果一個人說他是共產主義者，而他却不需要把任何事物了解透澈，那你就永遠不會有一點共產主義的氣息。（列寧：『論青年的學習問題』，『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三一六——三一九頁）

共產黨員（如一般的在大革命的初期取得勝利的革命家）底最重大的和最危險的錯誤，就是這樣的一個觀念：單有革命家底努力，就能完成革命。恰恰相反，每一件認真的革命的工作，如果要成功，就一定要理解革命家所能發生的作用，只是做真正有活力的和進步的階級底先鋒隊。這個觀念，並把這個觀念變成行動。一個先鋒隊，只有當他能够避免與他所領導的群眾失却聯絡並能够真正領導全體群眾前進時，才得完成他當先鋒的任務。沒有在許多不同的活動範圍中與非共產黨員成立聯盟，任何共產主義的建設工作，都是不能成功的。（列寧：『論戰鬥的唯物論底意義』，同上，第三六一頁）

恩格斯老早就已勸告現代無產階級底領袖們，把十八世紀末葉底戰鬥的無神論的著作翻譯出來，

以傳播於民衆間。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做這工作；這是我們的羞恥（在革命的時期中奪得權力，比知道如何把這權力運用得當，是較爲容易；這就是其無數證據之一）。我們的冷淡，不活動與無能力，常以各色各樣的「高尙的」理由作辯護，例如說，十八世紀底無神論的舊著作是過時的、非科學的、幼稚等等。沒有比這種僞科學的詭辯還惡劣的；這些僞科學的詭辯，或被用以掩蔽其迂腐，或掩蔽其對馬克思主義之完全誤解。當然，在十八世紀的革命家底無神論的著作中，有許多地方是非科學的和幼稚的。但並沒有人阻止出版者把這些著作加以刪節，或附以簡短的跋文，指出自從十八世紀以來在宗教底科學的批判這個範圍中的各種進步，提及關於這個問題的最近的著作等等。一切現代社會，使廣大的人民（尤其是農民與手工業工人）陷於黑暗。無知識與偏見；如果馬克思主義者以爲這些人民只有循着純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這條直線，才能解脫他們的黑暗狀態，那是一個最大的最嚴重的錯誤。應該把各種各樣的無神論的宣傳材料供給這些人民，應該把各種各樣的生活的事實告訴他們，應該從各種各樣的途徑去接近他們，以引起他們的興味，使他們從宗教的迷夢覺醒起來，從各種各樣的方面，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去推動他們。

十八世紀的老無神論者底敏銳的、生氣活躍的、富有才能的著作，該諧地、公然地攻擊當時流行的僧侶主義。這些著作，用以喚醒人民的宗教迷夢，常由事實證明出是比較那些乾燥無味的對馬克思主義之解釋的著作——這種著作，在我們的出版物中是佔優勢的，他們差不多完全沒有以精選的事實作說明，而且常是把馬克思主義曲解了（這個事實是用不着掩蔽的）——適合得一千倍。馬克思和恩格斯底重要著作，我們已全部有譯本了。絕對無理由怕舊無神論與舊唯物論不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給予的補充和改正。最重要的事情——我們的自稱爲「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在事實上是

毀損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者）最常忽視此事——是如何使那些還很落後的群眾對宗教問題發生自覺的興味，如何使他們對宗教持自覺的批判態度。

在另一方面，我們看一看宗教底近代的科學的批判底代表者。這些有教育的資產階級底代表們，否定了宗教的偏見，但他們用以作『補充』的議論，差不多都立即暴露出他們是資產階級底思想奴隸，是『僧侶主義底得有學位的差役』。

舉兩個實例來說。維伯爾教授在一九一八年出版一本小冊子，書名叫做『基督教的起源』（莫斯科的『法洛斯出版社』印行）。他敘述近代科學底主要成果，但沒有對那些被政治組織的教會所用為武器的偏見與欺騙作鬭爭，不只是逃避這些問題，而且簡直是可笑地提出最反動的要求，說他是超越於唯心論與唯物論這兩個『極端』。這是諂媚統治的資產階級，——全世界的資產階級，把他們從勞苦群眾所榨取得來的利潤，拿出成千累萬的盧布，來維持宗教。

德國的有名科學家德留斯（A. Drews）在他所著的『基督神話』這本書中，否定了宗教的偏見與神話，而且證明了基督是沒存在的；在書底終末，却宣稱應有宗教，不過這個宗教是革新的。純化的和更精細的，而且抵抗得住『日益澎湃的自然主義的潮流』的（德文本，第四版，一九一〇年，第二三八頁）。德留斯是一個公然的和有意識的反動者，他公開幫助剝削者，以新的、更臭的和卑劣的偏見，去代替那些舊的和已經腐爛的宗教偏見。

這並不是說德留斯底著作就不應翻譯。這是說，共產黨員與一切澈底的唯物論者，雖然在某一程度中實行與資產階級底進步部份成立聯盟，但當它犯了反動的罪過時，就應毫不畏縮地暴露它。這是說，迴避與十八世紀——在那時期，資產階級是革命的——的資產階級底代表們成立聯盟，是背叛了

馬克思主義與唯物論。我們對統治的宗教的矇昧主義者作鬭爭時，用某種方式，在某種程度內，與德留斯成立「聯盟」，是必要的。（列寧：『論戰鬭的唯物論底意義』，同上，第三六三——三六六頁）

……『在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之下』底撰述者們，必須有組織地從唯物論的觀點來研究黑格爾底辯證法。這即是說，研究馬克思實際應用於他的『資本論』及其歷史的和政治的著作之辯證法。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把辯證法應用得這樣成功，使現在東方（日本、印度和中國）底新興階級——東方千萬萬的人，佔世界人口之大部份，他們底歷史的消極與歷史的迷夢，一直到現在成爲歐洲許多先進國陷於停頓與腐敗之條件——底覺醒與奮鬥，新人民與新階級底覺醒，每一天都成爲證實馬克思主義之新鮮的證據。

當然，黑格爾辯證法底這樣的研究，這樣的解釋，與這樣的宣傳，是極端困難的，在這一方向的初步的實驗，是免不了有錯誤的。但是，只有不幹什麼事的人，才永遠不會犯什麼錯誤。馬克思從唯物論的觀點去理解黑格爾辯證法而運用之，我們以馬克思之運用方法作爲我們的基礎，就能够而且也必須，從一切方面來對付這辯證法：在雜誌上登載黑格爾底主要著作底拔萃，從唯物論的觀點來解釋它們，並且以馬克思如何運用辯證法之實例，與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之領域內的辯證法底實例——近代的歷史，尤其是現代的帝國主義戰爭與革命，供給了許許多多這種實例——來做他們底註釋。（同上，第三六八——三六九頁）

十一 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論最偉大的科學家是 反對偏見打破傳統的創造家

每一種以科學批判為根據的判斷，我都歡迎。以所謂輿論為根據的偏見，却是我從來不讓步的。關於這種偏見，佛洛倫大詩人的格言，便是我的格言：

『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別人說的話。』（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初版序，郭、王譯本，第四頁）

正像達爾文發現生物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他發現了直到當時被意識形態的層蓋所隱蔽的這個簡單事實，就是，人類在能夠從事於政治、科學、宗教、藝術等等之前，首先必須吃、喝、穿、住；因此，直接的物質生活資料之生產，也就是說某一民族或某一時代所達到的經濟發展程度，形成了一種基礎，在這基礎上發展着這些人們的國家組織，法律觀點，文學藝術以及宗教思想；這些東西，必須由這一基礎來解釋，而不像以前一樣與此相反的來解釋。

不僅此也。馬克思更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此種生產方式所造成的資產階級社會之運動的特殊規律。剩餘價值的發現，使這上面豁然明朗起來，而過去這一切的研究——無論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或是社會主義批評家的，却都是黑暗中的摸索而已。

一人的一生能有這樣的兩種發現，可說是至矣盡矣。一個人能有這樣的一種發現，已經是幸福的了。可是馬克思却在他所研究的每一部門內，——甚至在數學上——都作了獨立的發現，而他所研究

的部門沒有一種研究是膚淺的。

這是科學家的馬克思。但馬克思主要的還不在於此。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歷史地運動的力量，一種革命的力量。不管任何理論科學之新發現（其實際應用，現在尚無從設想的），給他以如何的怡然的欣悅，可是當事情是關於對工業和一般歷史發展發生直接革命影響的那些發現時，他所感到的欣悅，便完全是另一種樣子了。例如，他周密地注意電學部門內許多發現之發展，最近，特別注意馬舍爾德卜利（首先試驗自遠處傳導電力的法國物理學家）的那些發現。

因為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他底一生之真正使命，乃是在於：用這種或那種方法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造成的政治制度之事業，參加解放現代無產階級的事業，這一階級，是他首先使之自覺到本身地位與需要，自覺到本身解放的條件。他底原則是鬭爭。他用一種很少人能與比擬的熱情與堅持性進行了鬭爭，他的成功，也很少人能比擬。第二次出版的『萊茵報』（一八四二年）、『巴黎前進報』（一八四四年）、『布魯塞爾德意志報』（一八四七年）、『新萊茵報』（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和『紐約論壇報』，以外，許多戰鬭的著作以及在巴黎、布魯塞爾和倫敦各革命組織中的工作，最後加上所有上述這些頂點偉大的國際工人聯合會（即第一國際）——這樣的事業。即使除此以外，再沒有做出什麼旁的東西，也足以使其創立者真正自豪的了。

這就是爲什麼馬克思成了那時代最遭嫉恨最受譏諷的人。專制政府與共和政府，都把他驅逐出境，資產階級，不管是保守的，或是極端民主的，都爭先恐後地把謾罵叢加於他身上。他把這一切，像蛛網一樣加以抹去，置之不理，只在迫不得已的時候，才加以答覆。現在他死了，被千百萬革命的工人戰友們所愛戴。崇敬和哀悼——自西伯利亞礦山以迄加利福尼亞，在整個歐洲以及美洲，——

而我大胆的說，雖然他有許多敵人，但個人的私敵他怕一個也沒有。（恩格斯：『馬克思墓前演說』，『論馬、恩、列、斯』，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七——一九頁）

馬克思於剩餘價值，究有何等新的發揮呢？爲什麼馬克思以前的一切社會主義者前輩（洛貝爾圖也包含在內）的學說，都沒有留下何等影響，而同時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則如晴天閃電一樣地，震爍於一切文明國家呢？

我們可以依據化學的歷史，來予以例解。

遲至十八世紀之末，燃素學說還支配着化學界。根據那種學說，在燃燒過程中，有某種假設的絕對的可燃物質，從燃燒體分離，那物質即所謂燃素。這種學說，誠不免有牽強附會之處，但已够說明當時所知道的大多數化學現象了。可是在一七七四年，普里斯提勒發現一種氣體；那氣體『這樣純粹，這樣不含燃素，普通空氣和它比較起來，都顯得不純的』。他稱此氣體爲無燃素氣體。此後不久，瑞典的希勒也發現這種氣體，並論證它存在於大氣中。此外，他更發現這種氣體，當物在它內部或在普通空氣中燃燒時，就消滅的。由是，他稱此氣體爲火氣體。『他由這種事實，得出以次的結論，即燃素與空氣成分之一相結合時（即燃燒時）所生的化合現象，不外是通過玻璃遁去的火或熱。』

普里斯提勒和希勒已經分出養氣了，但不知道它們所發現的是什麼。他們『局限在他們眼前的燃素範疇中』。本來可以顛覆全部燃素觀念並使化學革命化的元素，沒有在他們手中結下何等果實，便消亡了。不過，普里斯提勒不久就把他的發現，傳給巴黎的拉瓦節；拉瓦節更依據這新的事實，攻究整個燃素化學，而得出以次的發現，即前述的新條件，是一種新的化學元素；在燃燒的時候並不是那種神祕的燃素從燃燒體分離，却寧是這種新元素與燃燒體化合。由是，在燃素形態下倒立着的整個化

學，才漸漸正立起來了。照拉瓦節後來主張，他與其他兩位學者，是同時地，並獨立地，發現養氣。這雖非事實，但與其他兩位學者比較起來，他究不失為養氣的真正發現者，因為其他兩位始終不知道自己所發現的是什麼，不過分出了養氣罷了。

在剩餘價值學說上，馬克思對其先驅學者們的關係，正和拉瓦節對普里斯提勒及希勒的關係一樣。我們今日呼剩餘價值的那部份生產物價值的存在，早在馬克思以前，就確定了的。這種價值部份，由佔有者不支付任何等價的勞動生產物構成這事實，也同樣已經有了多少明確的敘述。但到這裏，經濟學者們就止步了。其中有些如像古典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至多不過研究了勞動生產物在勞動者與生產手段所有者間分配的分量比例。同時，其他學者，即社會主義者流，則認定這種分配不公平，並求訴於烏托邦的手段，冀圖把這種不公平廢除。他們都局限在他們當前的經濟範疇中。

在這裏，馬克思出現了。他所採的立場，和所有的先驅者直接相反。他們認為已經解決的地方，在他看來，不過是一個問題。他知道，在這場合所要討論的，不是無燃燒氣體，不是火氣體，而是養氣。他知道，在這場合成爲問題的，不僅是確立一種經濟上的事實，也不是指出這種事實與「永遠的正義和真正的道德」之間的衝突，而是解釋一種事實，這事實，對於全部經濟學，具有革命的使命，並對於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提供一個理解的鍵，給那些知道怎樣使用那種鍵的人去使用。他根據這種事實，來分析他所遇見的一切經濟範疇。這如拉瓦節以養氣爲基礎，來分析他所遇見的燃素化學上的諸種範疇，正好一樣。要理解什麼是剩餘價值，他須知道什麼是價值。因此，馬克思首先就不得不對李嘉圖的價值學說，加以批判。他更分析勞動，研究其構成價值的性質，他最先確定怎樣的勞動構成價值，爲什麼構成價值，並怎樣構成價值。他表明：價值不外就是這種凝結的勞動。這一點，洛貝爾

圖是到最後還不會理解的。馬克思在這樣分析價值之後，更進而探究商品與貨幣的關係；並論證商品及商品交換，是怎樣並且爲什麼會由它的內在的價值性質，必至於產出商品與貨幣的對立。他以此爲基礎所建立的貨幣學說，乃是對這個問題闡析無遺的最初的貨幣學說。到今日，這個學說已經不知不覺地，爲一般所採用了。他分析貨幣的資本化，且論證這種轉化，是以勞動力的買賣爲基礎。在這場合，他以具有價值創造性的勞動力以代替勞動，由是把那招至李嘉圖學派崩潰的難關之一，一下就解決了，那個難關是：資本與勞動的相互交換，和勞動決定價值的李嘉圖法則，無法調和。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區別，也是由馬克思確定的，正因爲它確定了這兩者間的區別，他才能把現實上剩餘價值的形成過程，詳加分析和闡明。他這種業績，他的任何先驅者都沒有做到。那就是說：他在資本本身的內部，找到了一種區別，這個區別，在洛貝爾圖或資產階級經濟學者，都不知道怎樣處理才好。但這個區別，對於極複雜的經濟學上諸問題，却可提供一個解決的要鍵，這事實，由這裏刊行的第二卷固可證明，但由第三卷，尤可證明。此外，他更進而分析剩餘價值本身，發現了他的兩個形態，即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他指示這兩種剩餘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發展上，演了相異的，然而都是決定的作用。他在剩餘價值的基礎上，展開了第一個合理的工資學說，他又是第一次，爲資本主義的蓄積史和資本主義的歷史傾向，提出一個概述。（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郭。王譯本，「恩格斯序言」，第十二——十四頁）

……這裏所指的科學，是從事科學的人們明瞭已規定出的科學傳統的力量與意義，善於爲科學的利益而利用這些傳統，同時却又不要做這些傳統的奴隸。這裏所指的科學，是當舊的傳統、標準與規定成爲陳舊，變爲前進的阻礙時，有勇氣地，有決心地來破除這些傳統，同時要懂得創造新的傳統，

新的標準與新的規定。(鼓掌)

科學在其發展中產生了不少英勇的人物，知道破壞舊的與創造新的，不管任何阻礙，不顧一切。這樣的科學英雄，如加列里，達爾文等人，都是舉世公認的。我在這裏要舉出這樣的科學偉人中的一個，也是現代最偉大的人物。我所指的就是我們的導師，我們的教育者——列寧。(鼓掌)想一想一九一七年吧，根據俄國社會發展的科學分析，根據國際形勢的科學分析，列寧當時得出一個結論，即是說：唯一的生路是俄國社會主義的勝利。這個結論對於當時許多科學界的人們，多少是出乎意外的。

普列哈諾夫是科學界的一個傑出人物，當時對列寧懷疑，說列寧『在睡夢中』。其他同樣出名的科學人物聲言『列寧發了瘋』，因此要把他藏匿到更遠的地方去。當時所有科學界人士們都在狂吠亂叫，把列寧當作一個科學的破壞者來反對，但列寧不怕逆流，反常而行，結果列寧勝利了。(鼓掌)

這就是科學英雄們的模範，他們勇敢地進行反對陳舊了的科學的鬭爭，並為新的科學開闢一條道路。(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招待高級學校工作人員宴會上的演說』，一九三八年五月，『斯大林選集』卷五，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三四九——三五〇頁)

第四章 國際經驗·民族特點·革命傳統

一 列寧論革命科學的兩個要求

第一，科學要求顧及到其他國家的經驗，尤其是，如果其他那些（也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正在經歷或不久以前已經經歷過十分類似我們底經驗；第二，科學要求顧及到一切活動於該國內部的力量。團體、政黨、階級、群眾，科學絕不要求僅僅根據一個團體或一個政黨底願望與見解，絕不要求僅僅根據一個團體或一個政黨底覺悟程度與鬭爭決心來決定政策。（列寧：『左派幼稚病』，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七九頁）

二 列寧論用批判的態度採取別國經驗

在後進國家內剛剛開始的運動，只有在它能夠利用別國的經驗的條件之下，才能得到勝利。但是要真能利用別國的經驗，則單單認識這些經驗或是單單把最近的決議抄襲一遍，是不够的。要真能利用別國的經驗，就必須要善於用批評的態度來考察這種經驗，而且要獨立地審查它。誰只要想一想，現代工人運動的發展是何等廣大，誰就會懂得，為要履行這個任務，須要多少的革命的力量和政

治的（及革命的）經驗。（列寧：『恩格斯理論論爭底重要性』，『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九五——九六頁）

德國實際的工人運動也永遠不應忘記，他是在英國和法國運動的肩膀之上發展起來的，他可以現成地利用英、法運動以高價買來的經驗：他現在可以避免當時他們在大多數情形之下所不能避免的錯誤。（列寧：同上，『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九七頁）

三 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論考察、研究民族的特點

在英國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就使我們有了從自己的生活條件所發展出來的最好的理論，要簡單地用抽象的教條式的方法，硬裝進一個大民族去，是不可能的。……和其他的任何人一樣，他們一定要由其自己的經驗以及自己的錯誤底結果去學習。（恩格斯：『致左爾格的信』，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七日）

美國工人已經趕上來了。但正如英國人一樣，他們跑的是自己的路。我們不能把理論事先硬注入他們，但他們的經驗，他們自己的錯誤及其惡果，不久就將使他們的鼻子碰到了理論——那時就好了。（恩格斯：『致Schiller的信』，一八九〇年一月十一日）

德國的哲學家、準哲學家與文藝家們熱狂地抓住這種文獻（法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文獻——編者），而只是忘記了，在這些著作從法國移入德國時，法國的生活條件並未同時被移過來。在德國

的狀況之下，法國的文獻便失掉了一切直接的實際的意義，而只是採取了純粹文獻的外表。（『共產黨宣言』，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四九頁）

……這些國度（編者按：指諸殖民地半殖民地）要先經過什麼社會階段和政治階段，然後才同樣達到社會主義的組織，我以為我們在今日只能提出空洞的臆說。（恩格斯：『致考茨基論殖民地的信』，『馬恩通信選集』，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〇四頁）

我們並不把馬克思主義當做是不能改動的和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確信它只奠下了科學底基石，社會主義者如果不願落在生命底進展之背後，就必須在一切方面來發展這個科學。我們認為馬克思學說底獨立的補充，對於俄國社會主義者是特別必要的。因為這個學說只供給我們一般的指導原則，而在細目上，應用於英國的與應用於法國的不同；應用於法國的與應用於德國的不同；應用於德國的又與應用於俄國的不同。我們很願意登載關於理論問題的文章，並且歡迎同志們對於爭論之點，公開來討論。（列寧：『馬克思主義底學說』，『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九一頁）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的時候，無條件地要求把問題放在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再則，如果是講到一國（例如，講到該國的民族綱領），則還要估計在同一歷史時代以內，該國與其他各國不同的具體的特點。（列寧：『論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二八九頁）

如果不估計到所有這些一般的歷史的條件和具體的國家的條件，那就根本談不到着手製定該國馬克思主義者底民族綱領了。（同上，第二九〇頁）

這位女作家既然如此高明地斥責玄學（在馬克思主義的意思上，即是反辯證學）及空洞的抽象，她自然就該給我們一個用具體的歷史的方法來研究問題的模範。問題是講到在一個一定的國家（俄國）與一定的時代（二十世紀之初）以內的馬克思主義者底民族綱領。盧森堡大概也提出這樣的問題。……可是盧森堡關於這一點，竟絲毫沒有說到。（同上，第二九〇——二九一頁）

這些意見與引證，固然沒有什麼新奇。可是，無論如何，讀者如果再三回想，馬克思、恩格斯與拉沙爾，曾經用什麼態度研究過個別國家具體歷史的問題，這却有些興味。你們熟讀這些從馬克思與恩格斯那裏摘來的教訓人們的引證，就能够更明顯地看到，盧森堡已使自己陷於何等可笑的地步。她用銳利的詞鋒，用憤激的情緒，宣傳必須要用具體歷史的方法，來分析各個時代各個國家的民族問題；同時，她又絲毫不打算決定：二十世紀初期的俄羅斯是處在資本主義發展底怎樣的歷史階段，這一國家庭族問題有怎樣的特點。盧森堡舉些例子，來說明別人怎樣用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來研究問題，這好像是故意指明，有些人如何往往用好意去鋪設地獄；用許多忠言去掩飾他們自己之不願或不會在實際上利用這些忠言。（同上，第二九一——二九二頁）

把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英、美和德國工人運動所發表的意見，加以比較，是很有教益的。德國在這一方面，英、美在另一方面，是代表着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同的階段。資產階級成一個階級而統治全國的政治生活，其統治底形式，在德國與在英、美也不相同。當我們記住這些地方時，上述的比較，就有更重大的意義。從科學的立場來說，我們在這裏看到了唯物辯證法底榜樣，看到了能够依照不同的政治經濟狀況底特性而提出和着重問題底不同的要點和不同的方面的這種能力底榜樣。從工黨底實際的政策和策略之立場來說，我們在這裏看到了共產黨宣言底作者如何依照各國的全國工人運動底不

同的階段而規定戰鬥的無產階級底任務。(列寧：『馬克思、恩格斯、狄慈根、柏克爾諸人致左爾格諸人的書信集』俄譯本，『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一三八——一三九頁) 完全無疑的，在匈牙利革命底特殊條件之下，無論巨細都簡單地模仿我們俄國的策略，是要犯錯誤的。(列寧：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給具拉貢的無綫電報』，『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八三頁)

我希望你懂得，格魯治亞的內部條件與國際條件，要求格魯治亞共產黨人不是應用俄羅斯的模型，而是巧妙地和靈活地創造特殊的策略，這個策略是建立於對所有小資產階級份子作大讓步之上的。(列寧：『給奧文卓尼啓澤的信』，『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八七——一八八頁)

要善於把共產主義總的根本的原則，應用到各階級和各政黨相互關係的特殊情形上去，應用到向着共產主義走的客觀發展中的特殊情形上去，而這些特殊情形，爲各個國家所固有，我們應該善於研究、探索和揣摩這種特殊情形。(列寧：『左派幼稚病』，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九十頁)

各國共產黨人，要十分自覺地認清同機會主義及『左派』教條主義作鬭爭的根本的。原則上的任務，同時要十分覺悟地估計到由於各個國家經濟、政治、文化、民族成份、殖民地、宗教派別種種特點的關係這場鬭爭所採取的而且必然應當採取的具體特點。現在到處都感覺到對於第二國際之不滿，而且這種不滿繼續擴大和增加，這是由於第三國際犯機會主義，也由於它不會或者不能創立真正集權的、真正起領導作用的、能够在革命無產階級爲建立全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而鬭爭中運用革命無產階級國際策略的中央機關。必須認識清楚，這樣的中央領導機關無論如何都不能建立在使鬭爭策略上的規律千篇一律、死板劃一、彼此雷同這種基礎上面。各民族間各國家間的民族的和國家的差別一日存在

(這些差別，甚至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以後還要很長期地存在)，則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底國際策略之統一，不在於消除特異之點，不在於取消民族差別(這在目前是癡人說夢)，而是要在正確應用共產主義底根本原則(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使這些原則得到正確的枝葉的形式上的變更，使這些原則正確地適應於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特殊情形。(同上，第九三頁)

……把具體的歷史條件當做出發點，把辯證的問題提法當做唯一正確的提法——這就是解決民族問題之關鍵。(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三三頁)

把關於一個民族自由分離權利的問題，跟關於一個民族隨時分離義務的問題，混為一談，那是不可以的。無產階級的政黨，於每一個別場合之下，應獨立地依着環境來解決這個問題。(斯大林：

『論民族問題』，『抗戰書店』版，第一〇頁)

黨對於這些民族的勞苦大眾的任務……就在於幫助他們消滅家長封建關係的殘餘，以勞苦農民的蘇維埃為基礎並用在這些民族中間創立堅強的共產主義組織的方法，與蘇維埃經濟的建設配合起來，這種共產主義組織能够利用俄羅斯工農從事蘇維埃經濟建設的經驗，同時在自己的建設工作中會考慮到每一民族的具體的經濟環境，階級構成，文化與生活的一切特質，不要把只是適用於別的，更高度的經濟發展階段的中央俄羅斯的經濟措施很機械的搬移過去。(斯大林：『論民族問題』，同上，第一五八——一五九頁)

共產主義組織在邊疆的發展，是在幾個特殊的條件下面進行的，這些條件阻止了黨在這些區域內的正常生長。一方面，在邊疆工作的大俄羅斯共產主義者，他們是在『強國』民族的生存條件之下長大的，不知有民族的壓迫，因之他們往往縮小了民族特點在黨的工作中的意義，或是完全沒有顧及到

這些特點，在自己的工作中未考慮到某一民族階級構成。文化、生活過去歷史的特點，使黨對於民族問題的政策庸俗化，因而加以曲解。這種情形，其結果，便弄成放棄共產主義，傾向於大國精神，殖民主義，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的方面。別方面，當地共產主義者，他們曾經過民族壓迫的困苦時期，還沒有完全解脫民族壓迫的夢幻，往往誇大了民族特點在黨的工作中的意義，放棄了勞苦者的階級利益，或是簡簡單單地把該民族勞動者的利益跟該民族的「全民」利益，混爲一談，不會把前者從後者之中分別出來，而根據勞動的利益去建立黨的工作。這種情形又弄成放棄共產主義而傾向於資產階級民主的民族主義的方面，這種民族主義有時採取了大回教主義，大土耳其主義（在東方）的方

式。（斯大林：『論民族問題』，中譯本，『抗戰書店』，版第一六一頁）

……顯然的，在實施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政策的時候，務須對於邊疆經濟狀態，階級構成，歷史過去的一切特點，加以注意。那荒謬之事，應當消滅，更不用說了，比方在吉爾吉斯、回教居民從不養豬，而食物人民委員會在徵集食物的辦法上，竟要求該地交豬，此種情形是應當消滅的。（斯大林：『論民族問題』，同上，第一七三頁）

……不過『左派』（編者按：指聯共邊疆黨內民族問題上的『左派』）的罪過，就在於他們對於居民當中的資產階級民主和簡單地實份子不會採取靈活的態度，他們不會也不願運用手腕去吸引這些份子，他們歪曲了黨把握全國大多數勞動人口的路綫。可是這種靈活性，和這種在反對民族主義的鬭爭與吸引略徵忠實的份子加入我們國家機關隊伍的鬭爭之間運用手腕的能力，却是必須要造成的，不論如何要鍛鍊出來的。要造成和鍛鍊出這種靈活性和能力，只有我們對於我們在各特別區和共和國所遇見的複雜和特殊情形加以注意；只有我們不是從事簡簡單單地搬移那在中央區域所造成而不能機

械地搬到邊疆去的標本；只有我們不把居民當中有民族主義情緒的份子，有民族主義情緒的小資產者揮之而去；只有我們學習吸引這些份子來參加一般的國家工作才行。『左派』謬誤的地方，就在於他們不明白黨的這些複雜任務的第一等重要性。

……而『左派』對於黨的威脅，則是他們困惑於他們單純而輕率的『共產主義』，可使我黨脫離農民和當地居民中的廣大層級。

……應當鞭策『左派』，教他們去學習靈活性，善於運用手腕，以便把握廣大的民衆。（斯大林：『論民族問題』，同上，第二九六——二九八頁）

總之，在解決無產階級統一戰綫和人民陣綫問題的時候，不能對於一切情況，一切國家和一切民族，都給一個萬應的藥方。老實不客氣的說，在這種事情方面來採用萬應的藥方，對於一切國家都採用同樣的藥方，就等於愚昧無知。甚至於當這種愚昧無知是用萬應公式掩飾着的時候，而且正是當它用這種公式掩飾着的時候，更應當給以無情的打擊。（『季米特洛夫文選』，第一一六——一一七頁）

……我們自己，應當用明顯而通俗的論據和正確而思索週到的態度去對待民衆底特殊的民族心理，在這個基礎上來進行廣大的思想鬭爭。（同上，第八三頁）

有些共產黨員認為所有這些事情都是與工人階級底事業沒有關係，寧願袖手旁觀，却不拿正確的歷史眼光，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來在勞動群眾面前，說明他們本民族底歷史；却不把共產黨員目前的鬭爭，與該民族過去的革命傳統聯系起來；這樣，就等於自願地把民族史上一切寶貴事蹟，奉送給法西斯蒂的歷史曲解家，讓他們愚弄民衆。

不是的！同志們！我們不僅與我們自己民族底現在和將來各種重要問題有關係，而且也與我們自己民族過去各種重要問題有關係。我們，共產黨員，並不進行工人行會利益的狹隘政策，我們並不是工聯會的眼界狹小的活動家，並不是中世紀手工業者和工匠行會底頭目。我們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最偉大的階級——工人階級——之階級利益底代表。工人階級擔負有把人類從資本主義制度底痛苦生活中解放出來的使命。這個工人階級已經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推翻了資本主義底壓迫而成爲統治階級。我們是擁護一切被剝削的勞動群眾，就是說，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絕大多數人民的切身利益。

我們共產黨員，是毫不調和的，根本反對各色各樣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可是我們並不是民族虛無主義者，而且無論何時都不應當做民族虛無主義者。用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工人和一切勞動者，是各國共產黨基本任務之一。可是如果誰認爲，因爲要這樣教育群眾，所以他就可以，而且甚至於不得不，唾棄廣大勞動民衆底一切民族觀念，那麼，他就與真正的布爾塞維主義相隔十萬八千里，他就絲毫不懂得列寧和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的學說。

列寧始終都是堅決澈底反對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但是他在一九一四年所寫的關於「大俄羅斯人底民族自誇心」一文內，却給我們一種正確對待民族觀念問題的例子。

列寧寫道：

「難道我們這些大俄民族的覺悟工人，沒有民族自誇心嗎？當然有！我們愛自己的語言，愛自己的祖國，我們所最努力工作的，就是要教育我們祖國的勞動群眾（即祖國十分之九的人民），使他們成爲覺悟的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我們所最目擊心傷的，就是暴虐無道的皇家

劊子手，貴族和資本家，公然摧殘、壓迫和侮辱我們的大好河山的祖國。我們引以自誇的，就是這種壓迫政策已經引起我們大俄人民底反抗；我們大俄人民已經推擁出拉季雪夫，十二月黨人，七八十年代的平民革命家，我們大俄民族的工人階級已經在一九〇五年造成强有力的群眾的革命黨。我們充滿着民族自誇心，因為大俄民族也造成了革命階級，也證明了：大俄民族能够給人類樹榜為自由為社會主義而鬪爭的偉大模範。而不只是大批蹂躪被壓迫的民衆，大鬧刑場監獄，大鬧飢荒，以及在神父、皇帝、地主和資本家面前大顯卑躬屈節的醜態。

我們充滿着民族自誇心，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特別憤恨自己的以往的奴隸生活……以及現在的奴隸狀況。現在的時候，又是那般地主，協同資本家，強迫我們東征西剿，去撲滅波蘭和烏克蘭，鎮壓波斯和中國的民主運動，使羅曼諾夫、包白林斯基、普利史克維赤這般沾污我們大俄民族名譽的孤群狗黨，更能作威作福」。 (請看俄文版『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八一頁) 你們看！列寧關於民族自誇心問題寫了什麼。

同志們！我認爲我在萊布齊法庭上，並沒有做得不對；當時法西斯蒂企圖污蔑保加利亞民族，認爲它是野蠻的民族，我立刻就來擁護保加利亞民族勞動群眾的民族榮譽，這些勞動群眾，奮不顧身地反對法西斯蒂強盜，反對這些十足的野人和蠻子(長時間的鼓掌)。當時我說：我絲毫不應當害羞我是一個保加利亞人，我反而因爲我是英勇的保加利亞工人階級底兒子，而感覺無限光榮哩。(鼓掌)

同志們！在某一個國家裏，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都應當「適應本地的氣候」，以便在本地種下自己的深根。個別國家裏，無產階級鬪爭和工人運動底民族形式，是不違反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恰恰相反，正是在這種形式裏，同時還可以勝利地擁護無產階級底國際的利益。(季米特洛夫：「反戰反

法西斯鬭爭的當前問題」，「季米特洛夫文選」，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八四——八七頁）

四 列寧論在一定條件下利用革命傳統

馬克思自己，對於革命的傳統，估價得極高，而且，對於叛徒或庸俗派對革命傳統所抱的態度，無情地斥責；馬克思同時，要求革命者要能够思索，要能够分析應用舊鬭爭方法之條件，而並不是單把某些口號重複說着。法國一七九二年的「民族的」傳統，或許會永遠成爲某些革命鬭爭方法底榜樣；但這並沒有阻止馬克思於一八七〇年時在有名的國際工人聯合會底宣言中警告法國無產階級不要犯這樣的錯誤，即：把那些傳統搬到一個不同時期底條件下來。【註：國際工人聯合總委員會爲「普法戰爭」——一八七〇年九月九日——宣言，會有下面一段話：「法蘭西的工人們應該完成他們的公民的義務，但不應該爲一七九二年民族的傳統所誘惑，如像法蘭西的農民爲第一帝國的民族的忠實所欺騙一樣。他們（指工人們）所需要的不是重複過去，而且是建設將來。」（馬克思著：「法蘭西內戰」）】

在俄國也是如此。我們必須研究應用抵制之條件；我們必須把這個思想灌輸於群眾，即：當革命高漲時（不管那些瀆襲馬克思之名的腐迂者說什麼），抵制是完全正當的而且有時是必須的方法。但革命是否真正在高漲着——這是宣佈抵制之根本條件——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能够獨立地提出，並根據對事實的認真的分析來解決它。我們的責任，就在於盡我們的能力準備革命的高漲，並且在適於應用抵制的時機不反對抵制；但如果把抵制這個口號，視爲對於每一個壞的或極壞的代議制度都是適

用的，那就定然是一個錯誤。（列寧：『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二一頁）

爲着製定我們黨的適當的組織與策略，我們所應當掌握的材料是：西歐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歷史，俄國革命運動的歷史，我們工人運動底經驗，可是應當獨立地『探討』這些材料，因爲現存的樣本是任何地方也找不到的。一方面，俄國工人運動與西歐的工人運動相較，是處在完全不同的條件之下，這一點上陷於任何幻想是很危險的。而另一方面，俄國社會民主黨和俄國以前的革命黨，有最根本的區別，所以有向舊時俄國革命的與祕密的能手學習之必要（我們毫不動搖地承認這個必要），絲毫沒有使我們脫離對他們取批判態度，而獨立地製定自己的組織。（列寧：『我們最迫切的任務』，『列寧全集』，第二卷，第四九七頁）

附 錄

一 論寫歷史

(一) 關於蘇聯各學校教授本國歷史問題——摘

自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底決議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六日)——

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認為蘇聯各學校中底歷史教授作得不能滿意。教科書及教授本身，都帶着抽象的和公式的性質，提供給學生們一些社會經濟形態的抽象定義，而不用生動有趣的方式和依照年代的次序，講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實，以及歷史人物的特點等以教授本國史；這樣就以抽象的社會學的規式，代替了本國歷史之有系統的講述。

按照歷史年代的次序講述歷史事件，且使學生必須牢固地記憶着一些重要的歷史現象。歷史人物和年代月日等，這是學生們能夠切實領悟歷史課程之決定的條件。只有這樣的歷史教程，才能保證學生們所必需的歷史教材之易於理解性、明確性和具體性。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正確的分析 and 正確的總結歷史事件(這都是使學生對歷史走向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才有可能。

(二) 錄自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

中央的決定

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認為蘇聯各學校裏本國歷史教學的適當方法，具有重要的意義。還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它們就通過和宣佈了著名的『關於蘇聯各學校中教授本國歷史』的決議。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在這個決議上，曾指出蘇聯各學校裏歷史教授的方法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認為歷史教程和教授本身底主要缺點，乃是他們的抽象的和死板的性質：

『提供給學生們一些社會經濟形態的抽象定義，而不用生動有趣的方式和按照年代的次序，講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實，以及歷史人物底特點等以教授本國史；這樣，就以抽象的社會學的規式，代替了本國歷史之有系統的講述』。

人民委員會及中央曾這樣指示：

『按照歷史年代的次序講述歷史事件，且使學生必須牢固的記憶着一些重要的歷史現象。歷史人物和年代月日等，這是學生們能够切實領悟歷史課程之決定的條件，只有這樣的歷史教程，才能保證學生們所必需的歷史教材之易於理解性、明確性和具體性。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正確的分析 and 正確的總結歷史事件（這都是使學生對歷史走向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才有可能。』

適應着這個決議，曾經決定要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以前，準備好歷史的新教程：

(一) 古代史；

(二) 中世紀史；

(三) 近代史；

(四) 蘇聯歷史；

(五) 附屬國和殖民地國度的近代史。

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決定組織五個小組並批准這些小組的人員成份。

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聯共(布)中央和蘇聯人民委員會，對於小學和初中教授蘇聯歷史的初步課程問題作了決定，並且組織了編著蘇聯歷史初步教科書的小組。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四日，聯共(布)中央和蘇聯人民委員會，接受了斯大林、基洛夫和日丹諾夫等同志關於蘇聯歷史和近代史等新教科書的兩個綱要所提出的意見。

在這些意見書裏，曾對該兩個綱要作了切實的分析 and 嚴格的批評，並同時指出蘇聯歷史綱要的編著特別不能令人滿意，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蘇聯歷史綱要充滿着大量非科學的、盲目的判斷；當編著教科書時，「應該是每一個字和每一個定義都不苟且的」，而該提綱却帶有特別不可容許的不整潔性。近代史教科書綱要，同樣也帶着重大的缺點，雖然是較少一些。

斯大林、基洛夫和日丹諾夫等同志的意見，澈底指出應在那個方面改造綱要和所準備的教科書。然而，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不得不認為現在提交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審查的歷史教科書，大部份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它們仍然是繼續犯了以上所指出的那些缺點。萬哪格教授領導的小組，所編著的蘇聯歷史教科書，是特別不能令人滿意，而敏茨和洛仁斯基領導的小組所編著的小學蘇聯歷

史初步教科書，也同樣不能令人滿意。以上所指的那些教科書底編著者，繼續堅持那已不止一次被黨所揭穿了，並且顯然並不可靠的歷史判斷和定則——在其基礎上都帶有相當的包克洛夫斯基的錯誤：由於這一事實，人民委員會和中央不能不估價到，這是我們的歷史家中，特別是蘇聯歷史家某部份中，根深蒂固之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而在實際上是對歷史科學的取消主義和反科學的觀點之明證。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着重指出這些取消歷史、即取消科學的有害傾向和企圖，首先就和我們的某些歷史家中間所傳播之錯誤的歷史觀點——即所謂「包克洛夫斯基的歷史學派」所屬有的觀點相聯系着。人民委員會和中央指出，克服這些有害觀點的任務，就是對於編製歷史教科書，同樣也是對於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科學和提高蘇聯的歷史教育之先決條件，這對於我們國家和我黨底事業，並對於教育那成長着的後輩，都有極重要的意義。

因此，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決定組織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的聯合委員會，來審查和根本改造，而必要時，並且改編已經寫起的歷史教科書。這個委員會有權利組織審查個別教科書的小組，有權利宣佈教科書的懸賞徵求，以資代替委員會所認為必須根本改編的那些教科書。

人民委員會和中央，並且決定在刊物上公佈斯大林、基洛夫和日丹諾夫等同志的意見及其他關於這一問題的材料。

（「真理報」，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三) 對於蘇聯歷史教科書提綱底一些意見

——斯大林、日丹諾夫、基洛夫——

萬哪格小組未完成任務，並且連任務之本身也未了解。它編著了俄羅斯歷史的綱要，而不是蘇聯歷史的綱要，即爲俄羅斯人歷史的綱要而不是加入蘇聯人民的歷史（未指出烏克蘭、白俄羅斯、芬蘭及其他波羅的海沿岸各民族的、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各民族的、中亞細亞和遠東各民族的以及伏爾加河流域和北部各民族的——韃靼人、巴斯基爾人、摩爾達維亞人、秋瓦式人及其他等民族的歷史材料）。

在綱要上未曾指出俄國沙皇主義協同俄國資產階級與地主去進行併吞和殖民地化的作用（『沙皇主義是各民族的監獄』）。

在綱要上未指出自葉茹吉林哪時代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及以後的俄國沙皇制度之反革命作用（『沙皇主義是國際憲兵』）。

在要綱上，把封建制度和封建制度前的時期（那時農民還未被變爲農奴），把國家的專制政體和封建政體（那時俄羅斯還是分裂爲許多獨立的半國家）都混淆起來。

在綱要上把反動和反革命，把『一般的』革命，資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都混爲一談。在綱要上未指出被沙皇主義所征服的俄國各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之條件和根源，於是乎，十月革命——把這些民族從民族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的革命，成爲未曾說明的了，同樣，蘇聯之建立，也成爲

未曾說明的了。

綱要裏充滿了各種陳腐的，五花八門的斷語，如像：「尼古拉第一的警察恐怖」，「拉尋黨徒」和「布加切夫黨徒」，「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時地主反革命之進攻」，「產業革命之初步」，「沙皇主義和資產階級向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作鬭爭的最初步驟」等等。綱要的作者盲目地照抄舊資產階級歷史家之陳腐了的和完全非科學的各種定義，同時他們忘記他們應該供獻我們的青年以馬克思主義的、有科學根據的判斷。

綱要未反映出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運動對於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運動的形成之作用和影響。綱要的作者顯然是忘記了，俄國革命家認為自己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著名鼻祖之學生和繼承者。

在綱要上未指出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根源，和沙皇主義——西歐帝國主義列強的後備軍——在這個戰爭中的作用，同樣也未指明俄國沙皇制度和俄國資本主義對於西歐資本之依賴作用，因此，十月革命之作爲俄羅斯解放者（把俄國從半殖民地狀況之下解放出來）的意義，成爲未曾說明的了。

在綱要上未講到在世界大戰前夜整個歐洲政治危機的存在（這危機表現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和國會制之沒落），因此，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來，蘇維埃是無產階級民主的擔負者和工農解放的機關底那種意義，就成爲未曾說明的了。

在綱要上未講到執政的蘇聯共產黨內之派別鬭爭，以及對於托洛茨基主義，即對於小資產階級反革命的表現之鬭爭。

諸如此類。

一般的應該說，綱要編得極端不整潔，並且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說，文字上也不甚通順。我們尚且不講綱要的體裁的不正確，也不講「字眼」的玩弄，例如，把假德米特里稱作「被稱的」德米特里，又如，「十八世紀老封建主之勝利」（可是，並不知道「新的」封建主到何處去了，而且又怎樣表現了自己，倘使他們在這個時期一般是存在過的話）等等。

我們認為，按照以上所指出的原則之精神去根本改編提綱，是必要的，同時應該估計到，所要編著的是教科書（在這裏，應該周密的考慮到每個字和每個斷語）；而不是不負責的雜誌的文章（在那裏可以隨便亂講一切，自己毫不感到責任心）。

我們需要這樣的蘇聯歷史教科書，在這本書裏，大俄羅斯人歷史不與蘇聯其他民族的歷史相分離，這是第一。在那裏蘇聯各民族歷史也不與整個歐洲歷史相分離，並且一般的也不與世界歷史相分離；這是第二。（一九三四年八月八日）

(四) 關於近代史教科書綱要的意見

——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諾夫——

由於近代史本身，是最富於內容的，充滿了事變的，並且由於在各資產階級國度的近代史中（如果說俄國十月革命以前的時期），最主要的，是法國革命之勝利以及資本主義在歐洲和美洲之確立，所以我們認為，如果近代史教科書從法國革命那章開始，是比較的好。爲着同以前的事件聯系起來，可以在前面放上一章不太長的引言，簡要地敘述荷蘭革命和英國革命的主要條件；而把荷蘭革命和英國革命事件的詳細講述，放在中期歷史教科書之末尾。

因而我們建議，把第一部份（共六章），即所謂第一篇的全部，從綱要中刪去，用簡要的引言來代替它。

我們認為，綱要之主要缺點，就是它不够尖銳地強調法國革命（資產階級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差別和相反的全部深刻性。近代史教科書的主要軸心，正應該是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相反底這一思想。應該指出法國的（以及一切其他的）資產階級革命，把人民從封建制度和絕對主義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但又給他們加上新的枷鎖——資本主義的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枷鎖，而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則粉碎了一切的和任何的枷鎖，並把人民從一切形式的剝削之下解放出來——近代史的主要綫索應在於此。

所以，不能容許把法國革命簡單地稱作『大革命』，而應該把它稱為和解釋為資產階級革命。同樣，也不可以把我們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簡短地稱為十月革命，而應該把它稱為和解釋為社會主義革命。蘇維埃革命。

應該適應於這點而改編近代史教科書的綱要，而且也要選擇一些適當的斷語和詞句。

我們認為，綱要上把近代史分為兩部份是沒有充分理由的和偶然的，是根據某種不可解的表誌而產生的，我們認為把近代史分成三部份，是適當的：

第一部份——自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到普法之戰和巴黎公社（不包括在內），這是資本主義在先進國度裏之權利和確立之時期。

第二部份——自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到俄國十月革命之勝利和帝國主義戰爭之結束（包括在內）。這是資本主義開始沒落的時期，是從巴黎公社方面給資本主義以第一個打擊，舊的『自由的』

資本主義轉變到帝國主義以及十月革命的力量在蘇聯推翻了資本主義的時期，而十月革命則在人類史開闢了新紀元。

第三部份——自一九一八年末（戰爭結束的年份）至一九三四年末。這是各資本主義國度之戰後帝國主義的時期，是這些國度的經濟和政治危機的時期。一方面是法西主義以及為殖民地 and 勢力範圍而加劇鬭爭的時期；另一方面是蘇聯國內戰爭和外國干涉的時期，是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始，是蘇聯社會主義勝利建設的時期，是根絕資本主義最後殘餘的時期，是蘇聯社會主義工業之勝利和高漲，社會主義在農村中之勝利，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之勝利的時期。我們認為綱要之著者把歷史在一九二三年中斷了乃是第一個大錯誤，應該改正這個錯誤，應該將歷史寫到一九三四年末。要適應着這點而進行材料、篇、章和節目之改編與從新分配。

最好是能够使綱要除去那些陳舊的腐朽的詞句，如『舊制度』，『新制度』等。較好地是使用『資本主義前的制度』一語去代替它，如使用『絕對主義封建主義的制度』則更好；再則要以『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制度』去代替『新制度』。在這樣變更時，所謂『新制度』，即資本主義制度，在與蘇聯的蘇維埃制度（它是人類社會制度的最高形式）比較之下，已將顯露出其為舊制度了。

使綱要不用從過多的『時代』那種字樣，就如『臨時執政府時代』，『拿破崙時代』，『執政府時代』——時代不也太多了麼？

我們認為，綱要中給予殖民地問題以極少的地位，也是不對的。至若對於喬治·贊德、世本格列爾、基普林等輩用了儘多的注意力，而對於殖民地問題的殖民地狀況，例如說，在這樣的國度，好像中國，注意的却太少了。

倘使把「德意志和意大利之統一」一語改用「德意志和意大利從新統一爲獨立國家」一語是好的。不然，可以得到這樣的印象：如像這上面所講的，不是把以前像德意志和意大利那樣分裂的國家從新統一起來並爲之而進行鬭爭的問題，而是關於這兩個國家統一爲一個國家的問題。

總之，近代史綱要，依我們的意見，是比蘇聯歷史提綱編製的較爲通順，但是在這個綱要中仍然有很多荒唐無稽之處。（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

(五) 蘇聯政府徵獎委員會關於爲中學三、四年級用的蘇聯歷史優等教科書評定的決議

爲中學三、四年級用的蘇聯歷史優等教科書徵獎評定委員會，認爲拿來應徵的四十六部教科書之中，許多課本已經擺脫了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關於「蘇聯各學校教授本國史」的決議中所斥責的歷史教科書的舊形式。在這些教科書裏，雖然還有其許多缺點，但在歷史事件的敘述中是遵守着年代的順序，作出最重要的歷史現象之描寫，作出主要的年代日期之列舉和指出歷史上顯著人物的鑑定，以代替了抽象的社會學的公式。

徵獎評定委員會指出這一事實，是歷史科學陣綫上的成績，同時委員會要使歷史科學人員注意在這些教科書上還存在有許多一般的缺點，這些缺點，無論在將來研究蘇聯歷史的工作上，無論在學校裏教授歷史方面，都是應該被除去的。

(一) 當在描寫蘇聯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時，許多教科書的編著者模糊了這一事實——即在取得

無產階級專政以後，政權轉於蘇維埃，蘇維埃政權是勝利了。編著者把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底歷史事件描寫成這樣，使得給與學生們的頭腦以不正確的思想，說蘇聯的國家政權好像是直接由共產黨實施的，成爲蘇聯政治基礎的蘇維埃的作用，被模糊起來。聯共黨（布）作爲勞動群眾的先鋒部隊和勞動群眾組織的領導中心底那種作用被歪曲了。由於推翻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權以及取得無產階級專政的結果，蘇維埃如何成長起來和鞏固起來，這點是沒有講到的。蘇維埃被編著者直然解釋爲與職工會、青年團和兒童團平列的許多組織之一。

(二) 著者用那在好些頁上充滿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之類的長冗空談（從這些空談裏，學生得不到一般地究竟什麼是憲法之任何概念）以代替對於憲法上某些要點之說明（這些要點學生們是應該知道的，並且蘇聯歷史的全部敘述是應使他們有準備去領悟這些要點的），這是完全不能容許的。

許多著者在敘述蘇聯憲法的時候，忘記提及勞動人民代表的蘇維埃，乃是蘇聯的政治基礎，或者竟不曾提到，根據憲法，蘇維埃選舉將不僅依據普選而舉行，並且是依據平等的和直接的選舉權，用祕密投票法來舉行的。

(三) 教科書許多著者不曾了解斯大林的提綱，說俄羅斯。由於軍事的落後，由於文化的落後，由於國家的落後，由於工業的落後，由於農業的落後，而挨了打，這個提綱指出了最近幾世紀俄國歷史之最重要的關鍵之一。特別是他們沒有指出，在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正是由於工業落後的結果，俄國士兵得不到彈藥，由於農業落後的結果，俄國工人沒有麵包吃，由於社會制度落後的結果，軍隊是由惡劣的軍官——地主的子弟——所領導的。著者沒有提出，在地主和資本家當權時代，俄羅斯之所以落後底顯明的、確切的，使兒童們容易理解的陳述，或者在這方面只以一般的語句爲限，這樣

便使得學生們難以了解蘇維埃政權在把俄國從貧困薄弱的國家轉爲富足強大的國家之事業上的偉大作用。

(四) 俄國沙皇制度以及俄國資本主義，對於西歐資本之依賴作用，是沒有在具體的歷史事實上說明的。未曾指出，俄羅斯對於西歐資本之依賴，乃是國家經濟和政治之落後的直接結果。著者沒有指出俄羅斯對於西歐資本的依賴之顯明的陳述，這便使得兒童們難以了解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把俄羅斯從其半殖民地狀況之下解放出來」(斯大林、日丹諾夫、基洛夫語)的意義。

(五) 著者在陳述革命前的政權或在階級敵人爲着與蘇維埃政權作鬭爭而組織的那些「政府」時，常常只說到資本家，可是應該說的，却是地主和資本家。大家都知道，在革命前的最後幾十年間，俄羅斯國家機構之發展，是按照俄羅斯帝制轉變爲資產階級帝制(但是這個過程，直到革命前還沒有完成)的方向走的——地主和資本家瓜分政權(然而這並不等於把政權完全讓給資本家)。在應該說「資本家和地主」的時候，著者只說「資本家」，這樣就忘記提到這樣的事：例如，德國的佔領者在烏克蘭的第一項事，便是強使農民把土地歸還地主，而其他的佔領者也是這樣做的。結果，可能造成對於歷史遠景歪曲並模糊工人階級把農民從地主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的那種作用。

(六) 教科書的著者，不會以精確的數目字說明地主和農民的土地佔有之對比。這樣，便模糊了工人階級在把地主土地轉交給農民的事業上之作用。事實上，沒有一部教科書會引用列寧的關於革命前的土地佔有之數目字：

「一千萬農戶佔有七千三百萬俄畝土地，二萬八千尊貴的和卑微的地主，却佔有六千二百萬俄畝。在這個情況的基礎上展開農民爭取土地的鬭爭。」(「列寧全集」第十一卷，第三三七

著者照例也未指出那個事實：就是由於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之結果，蘇聯農民得到了一萬萬五千萬俄畝以上過去地主的、公共的、寺院的土地。

著者的這個遺忘，使之得到這樣的結果，就是，在講述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事件時，常常不是工人聯合農民去對抗資本家和地主而只是工人對抗資本家。這樣，就違反著者的意志，而暴露出對於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反歷史和反馬克思主義觀點之不可容許的錯誤，這個觀點，把工人階級形容為不是全體勞動人民的領袖，而好像是僅僅只是爲着自己而完成革命的一個階級。

(七) 教科書的大多數的著者，不能指出：國內戰爭史，乃是俄國地主、資本家和他們的代理人（『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出來作爲外國資本主義的先頭部隊和僱傭人而行動的戰爭史，這件在蘇聯歷史上最重要的事實——俄國的資本家和地主，早在一九一七年末，差不多在蘇聯的全境內受到了失敗以後，就決心把自己的國度及其獨立出賣給德帝國主義者，其次又出賣給協約國的帝國主義者——這一事實，沒有得到明確的闡述。結果，蘇聯國內戰爭的意義被縮小到純屬俄國內事件的那種作用，而俄國革命的國際性質，便被模糊起來。在這個問題敘述上之不充分明確性，模糊了布爾塞維克黨和蘇維埃政權的作用，它們喚起了全體人民去保衛祖國，以反對各外國資本主義列強之侵襲（一九一八年德國的進軍，三次協約國的進軍），並把蘇聯從外國的束縛和帝國主義國家的奴役之下挽救出來，保證了國家的獨立性，保持了自己的領土（『海參崴雖然很遠，但這個城市仍然確實是我們』的。『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六二頁），並且創造了蘇聯各民族發展和繁榮的條件。

(八) 說明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歷史的那一章，照例犯了這樣的一個大缺點，就是它把這一

時期的歷史差不多完全放到國內戰爭上，而關於國家社會制度的改革（蘇維埃政權在這一時期所實施的改革）却不給予任何的說明。必須說明（即使是那些基本的）蘇維埃政權在這個時期所作的事業：

甲、消滅了工廠和製造廠（這以前都是屬於資本家的）的私有權，並且建立了對於工廠、製造廠、銀行等等的社會主義的、全民的、國家的所有制。

乙、把地主的、寺院的、公共的土地轉交農民，宣佈了蘇聯全部土地國有。

丙、給予全蘇聯各民族以與俄羅斯人平等的權利，着手建立各民族的獨立共和國或自治共和國。

丁、打破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國家機器，開始在蘇維埃的基礎上建設新的國家機器。

（九）大多數著者，對於蘇聯社會主義社會建成的時期，多是用驚歎號，狂歡的呼聲和各種各樣的動人的逸語。歌詞和一般的陳述再加上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三、四個最著名的優勝者的列舉來敘述，而不去確切地、顯著地、簡明地指出：由於兩個五年計劃的結果，如何建立了雄偉的工業，農民如何團結到集體農場去，農業如何轉到拖拉機技術的基礎上去，並且如何爲了保衛工農國家而建立了強大的、以豐富技術裝備起來的工農紅軍。

大多數著者也未能不離開一般的敘述，而描寫出蘇維埃政權和聯共（布）黨爲了保證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對於工農的敵人所進行的不斷的鬭爭（買糧時富農的怠工，沙赫亭份子的破壞，實業黨的破壞危害行爲，陰謀、偵探、法西斯主義的托匪奸細企圖把蘇聯出賣給外國帝國主義者等等）。

（一〇）徵獎評定委員會指出教科書編著者的巨大成績在於：他們的課本，已經不是僅僅大俄羅斯人民的歷史，可是把其他的民族（這些民族曾被沙皇制度所奴役，並被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從民族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也同樣當作歷史上主角底那種任務，却並未被教科書的任何一個編著者所解決。

(一一) 不以馬克思主義方法闡明歷史事件，而重犯煩瑣論方法，給各種社會經濟形態和事件貼上些花樣，——這樣的毛病是有了表現的；例如，不善於理解和估計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意義（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之解脫絕對主義和封建主義是任何其他資產階級革命所不及的），和不善於理解和估計甲可賓黨作為當代革命階級（資產階級）比較最堅決的代表底那種作用，教科書的一部份編著者把甲可賓黨描寫為僅僅是獨立工匠和小商人利益的代表者，而另外一些著者則把甲可賓黨的專政描寫為好像什麼也不能給予人民的專政，第三類著者則把它描寫為反對資產階級的政權。

著者未曾明確陳述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在反封建制度鬭爭的事業上的成績，同時也未說明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限制性，它用一種樣式（較為進步的）的階級統治和剝削，去代替另一種樣式的階級統治和剝削。

(一二) 應徵的教科書之著者，在描寫蘇維埃時期以前的蘇聯時，差不多每步都可看到有重犯歷史的、非馬克思主義之觀點：

甲、著者把基督教以前的原始宗教理想化了，在這點上他們不懂得那個簡單的事實，就是：基督教之採用比起原始宗教的野蠻時期是進步的，採用了基督教，斯拉夫人也就得到了文字和較高的拜贊廷文化的某些成份。

乙、著者抹殺了在最初幾世紀俄羅斯人受洗禮以後之寺院的進步作用（它們曾是發明文字的園地和殖民的策源地）。

丙、著者在第八世紀赫美爾尼茨基的行動中，在他反對地主的波蘭和蘇丹的土耳其佔領烏克蘭底鬭爭中，看不見任何的積極作用。再如說：在十八世紀末喬治亞轉到俄羅斯保護之下的事實，以及烏

克蘭轉到俄羅斯政權之下的事實，也都被著者認為是絕對的惡事，而不與當時的具體條件聯系起來看，著者看不見當時在喬治亞的面前，二者之中必擇其一；或者被王國的波斯和蘇丹的土耳其所併吞，或者轉到俄羅斯的保護之下；同樣，那時在烏克蘭的面前，也是二者之中必擇其一；或者被地主的波蘭和蘇丹的土耳其所併吞，或者轉到俄羅斯的政權之下。著者看不見，第二個前途終究會是較小的惡事。

丁、當闡釋二十世紀初期以前的農民起義時，誇大了這些起義的組織性和覺悟性。顯然，教科書的著者對於農民不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僅僅只能作些自發的和無組織的運動的這一點，是了解得不夠的。顯然，著者對於列寧所重複了數十遍的意思——說只有工人階級和布爾塞維克黨，當它們在反對地主和資本家的多年鬥爭中鞏固起來和成長起來時，才能給農民革命運動帶來組織性，——是了解得不夠的。對於歷史事件的馬克思主義認識之不夠，使得某些著者甚至把這樣的反動運動都理想化了，例如，斯特別勒茨基的叛亂，這叛亂是反對彼得第一要使當時俄羅斯文明化的企圖的。

戊、大多數著者，照例對於諾夫格拉得人反對德意志武士的秋得斯基湖上的戰鬪，未有正確的歷史估價，在那時，這個戰鬪曾制止了德意志佔領者（殘暴的條頓武士團——「警犬」——武士——馬克思是如此稱呼他們的）的東進，這些武士是以按戶按丁屠殺和劫掠被征服人民之方法來實行殖民的。恰恰對於蘇聯歷史上這一事件，缺乏馬克思主義的估價，是更其不可容許的，因為在這方面馬克思已有一定的評價：「一二四二年亞力山大·聶夫斯基出來反對德意志的武士，在秋得斯基湖底冰上把他們擊潰，這樣，惡漢們便最後地從俄羅斯的邊境上被驅逐出來了。」

政府評定委員會決定如下：

(一) 應徵的教科書的著者之中，無一人能被評得第一獎者。

(二) 評定莫斯科國家師範學院蘇聯歷史研究室所編的教科書(攝斯達柯夫教授主編)，得第二獎，七萬五千盧布。

(三) 認為攝斯達柯夫教授主編的「蘇聯歷史簡明教程」，已經國家委員會審查通過，並介紹為三、四年級用的教科書。

(四) 發給應徵教科書的下列著者各五千盧布：敏茨、聶契根娜、良根娜、班克拉托瓦、古道式尼柯夫和格列遂爾，以作鼓勵的獎金。

徵獎評定委員會。

刊載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號的「真理報」上。(師哲譯，見「解放」第一三四期)

二 聯共中央關於因「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出版而應如何進行黨的宣傳工作的決議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一)

「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歷史簡明教程」之出世，乃是布爾塞維克黨底思想生活中的最大的

事變，由於「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之出現，於是黨就得到了布爾塞維主義底新的強有力的思想武器，得到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基本知識的百科全書。黨史讀本，乃是布爾塞維主義底科學歷史。在這中間，敘述了和歸納了共產黨底偉大經驗，而這種經驗則是世界上任何其他一個黨所未曾有過，而且現在也是沒有的。

「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是在解決關於精通布爾塞維主義的任務，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就是說，用社會發展規律和政治鬭爭規律底知識來武裝黨員的事業中的最重要的工具，是提高黨員布爾塞維克和非黨員布爾塞維克底政治警覺性的工具，是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宣傳事業提到應有理論高度的工具。

在創作「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時，聯共（布）中央是以下列任務為出發點的：

（一）必須給黨以關於黨史的統一指南，這個指南是正式的，由聯共（布）中央審查過的。對聯共（布）歷史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基本問題的解釋，而不容許有任何隨意的解釋。由於聯共（布）中央所審定的「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之出版，於是就使在從前出版的許多黨史教科書中所含有的，在黨史敘述方面的隨意態度和紊亂現象，使對於黨理論和黨史最重要問題的龐雜的歧異觀點和隨意解釋，從此終止。

（二）在創作「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時，聯共（布）中央提出任務要消滅那在宣傳方面把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分離的有害現象，這種現象是在最近幾年內形成的，其結果，就是人們竟把列寧主義當作是脫離馬克思主義，脫離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脫離黨史而獨立的學說來講授，却竟然忘記：列寧主義是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長成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是列寧主義底基礎，而

不知道列寧主義底這個基礎，就不能了解列寧主義。

在創作「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時，聯共（布）中央提出任務要給予這樣一個關於聯共（布）理論和歷史的指南，在這個指南中，把統一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學說被人勉強分割的組成部份——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與列寧主義，重新統一成爲一個整體，而歷史唯物主義則應和黨的政策聯系起來，就是說，要給予這樣一個指南，在這個指南裏，應表明馬克思和列寧底學說之不可分離的統一性。完整性和繼承性，應表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一致，並敘述列寧及其門生以綜合無產階級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階級鬥爭新經驗爲基礎而添加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新成份。

（三）有些舊教科書，首先就在歷史人物周圍來敘述聯共（布）歷史，其目的是以人物及其履歷來教育幹部。而「簡明教程」則與此相反，它是以發揮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基本思想爲基礎來敘述黨史，其目的是首先就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思想來教育黨幹部。

在創作「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時，聯共（布）中央是以根據歷史事實來講授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學說的任務爲出發點的。聯共（布）中央認爲：這樣來敘述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是最適合於事業利益的，因爲根據歷史事實來說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基本思想，是要好些，自然些，使人容易了解些；因爲聯共（布）歷史本身，就是行動中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因爲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底正確性和生活力，是已被實踐考驗過，已在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經驗上考驗過的；而且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本身，就是在與實踐發生最密切聯系中，是以綜合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底實際經驗爲基礎而發展和豐富起來的。

(四) 在創作『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時，聯共(布)中央提出任務要使馬克思主義作品擺脫那在解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和黨史許多問題方面的膚淺化和庸俗化。

這種庸俗化和膚淺化，是表現在——例如——流行到最近時期的，顯然反馬克思主義的，而且早已被黨所斥責的關於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的觀點上，當時，關於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問題，曾被某些假理論家和宣傳員從『社會革命』黨人立場上來解釋。

對於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問題的不正確解釋，也是這樣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庸俗化和膚淺化的表現。

曲解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現代戰爭性質問題的观点，不了解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間的區別，把布爾塞維克看成是某種『和平主義者』的不正確觀點，——都得到了廣大的散佈。

直到最近期間，在歷史科學中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和庸俗化，是與所謂頗克羅夫斯基『學派』——聯系着的，這個『學派』歪曲地解釋歷史事實，它違反着歷史唯物主義，而以今天爲觀點，不是以歷史事實所處的條件爲觀點來分析歷史事實，因此也就曲解了真實歷史。

由於用反歷史觀點來偽造真實歷史的結果，由於用反歷史觀點來企圖點綴歷史以代替確實敘述歷史的結果，於是在我們的宣傳中，例如有時竟把黨史描寫成爲一帆風順的勝利道路，似乎沒有經過任何暫時的失敗和退却，——而這顯然是與歷史真理相矛盾，因此也就妨礙了正確教育幹部的事業。

反馬克思主義的庸俗化的錯亂見解，還表現在對於蘇維埃國家所抱的不正確觀點之流行，還表現在降低社會主義國家底作用和意義，而社會主義國家則是工農手中的主要武器。以便保證社會主義底勝利，以便保衛勞動者底社會主義勝利品不受資本主義包圍所侵犯。

「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就使這種以及與此類似的庸俗卑鄙曲解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現象，從此終止，而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觀點，恢復起來。

（五）在創作「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時，聯共（布）中央提出任務要具體表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底力量和意義，這個理論用科學方法來闡明社會發展底規律，這個理論教導我們運用這些規律來領導無產階級底革命活動，這個理論也如任何一種科學一樣，是不斷發展着和不斷完善着的，這個理論是不怕以合乎新歷史條件的新結論和新原理來代替個別陳舊原理和個別陳舊結論的。

聯共（布）中央所持的出發點，就是認為：我們的幹部，如果不知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不精通布爾塞維主義，不克服自己的理論落後性，那他們就會寸步難行，因為，為要執行正確領導社會主義建設所有各部門工作的任務，就要求實際工作者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底基礎，就要求在解決實際活動問題時善於以理論為指南。

如果以為精通理論只是一小部份工作人員所能勝任的任務，那就錯誤了。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乃是可以做到事情。正是在現時，在蘇維埃政權之下，當社會主義已在蘇聯勝利的時候，已造成了無限的可能性，使我們擔任領導工作的幹部能够順利地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研究黨史，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底著作。為着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只要有志願，有一定要達到這個目的的决心和堅毅品性就够了。如果——舉例來說——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這類的科學是可以順利精通的，那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科學之可以完全精通，就更加不容懷疑了。

（六）在創作「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時，聯共（布）中央提出任務要幫助那些從事理論和

宣傳工作的幹部來改造自己的工作，來改善工作底質量，來開始消滅自己的理論落後性，來消滅自己思想準備中的缺點和缺憾，並把宣傳工作提到應有的高度。

聯共（布）中央所提出的這一切任務，都在「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中解決了。

(11)

宣傳工作底基本缺點是什麼呢？

必須向着那個方向來改造黨底宣傳工作和理論工作呢？

(一) 黨宣傳工作方面的基本缺點，就是黨的宣傳工作尚缺乏必要的集中領導、並因此而在宣傳工作中，就有手工業方式與茫無組織狀態。

在黨宣傳工作方面的手工業方式和茫無組織狀態，首先就表現於：黨組織竟選定那經過小組進行的口頭宣傳為宣傳工作底基本形式，却竟然忘記：小組宣傳方法多半是黨在非法存在時期，因自己當時工作條件關係而不得不採用的；而在蘇維埃政權條件之下，當布爾塞維克黨握有如刊物這樣強有力的宣傳工具的時候，却已造成完全新的條件和可能性，來無限制地擴展宣傳工作底範圍和集中對於宣傳工作的領導。

黨組織竟不去利用這些可能性，却繼續拘守着舊的宣傳形式，而沒有顧及到以下一點：就是小組在現今條件之下，已不能成爲使我們的幹部學習布爾塞維主義的主要方法；應當作爲幹部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基本方法的，乃是由老輩布爾塞維克親身經驗所考驗過的方法，即獨立研究布爾塞維克黨底歷史和理論的方法，而黨則應當在這方面來幫助幹部，其幫助方法，就是利用刊物，利

用組織集中的聘請有高深研究的解答員來解答他們在研究過程中所發生問題的方法，利用講演，利用報告等等。

黨組織既選定那經過小組進行的口頭宣傳為宣傳工作底基本方法，於是就傾心於一種錯誤的圖謀——把一切共產黨員都合併到小組之中，專門注重在數量上擴張黨課小組網，貪求把一切而毫無例外的共產黨員都籠統地而且一定要『包括』在黨課小組之中。

在貪求小組數量時，黨組織竟把主要環節——宣傳工作質量——拋棄不顧了。

由於小組之繁多，既使黨組織沒有可能來切實監督宣傳工作，結果就使得黨組織拋棄了對於宣傳工作的領導，把自己的活動變成爲主要是搜集關於被黨課小組所『包括』的共產黨員，小組人數及到課情形的官樣文章的統計材料。其結果，使就小組變成了各自爲政的、不受監督的、聽憑己意來進行工作的組織。

其次，由於小組之繁多，結果就使宣傳員幹部充滿理論準備薄弱的人，而且往往是在政治上沒有常識的和未經考驗的人，這些人不僅不能幫助黨員和非黨員精通布爾塞維主義，而且只能以有害的簡易化來代替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底敘述，並淆亂自己聽衆底頭腦。

在貪求宣傳員數量時，黨組織竟拋棄了對於宣傳員幹部學習和補習工作的理論領導，並拋棄了對於宣傳員在小組中工作的監督。黨組織沒有去集中對於宣傳員工作的領導並藉以保證提高在宣傳員中工作底質量，却在這方面也採取了貪求數量的錯誤方針，以在企業中設立大批黨研究室，以設立宣傳員研究班，宣傳員短期講習班等等方法而分散了幫助宣傳員幹部的事業。既貪求這些機關底數量而不顧其質量，其結果就使黨研究室和宣傳員研究班得不到必要的黨的領導，而宣傳員研究班和黨研究室

之缺乏熟練的指導員幹部，又使它們的工作質量減低，使其中工作情形不能令宣傳員滿意，於是就把出席研究班和黨研究室的事情變成形式上的義務。

黨組織既把出席小組變成黨員所必盡的義務，又把黨員看成是不能獨立研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永久的初等小學生，於是就採取許多行政手腕來吸收黨員參加小組和把他們留在小組中，就以注重瑣細小節態度去監視和限制共產黨員在小組中的工作。

在小組工作中，流行着一種不正確的、阻礙黨員在思想上政治上發展的小學校式的方法，這種方法表現在爲一切小組規定「劃一的學習日」，爲小組工作規定「一條規」，把談話方法和活潑的同志辯論方法摒棄於小組以外。

除此而外，黨組織還傾心於一種官僚主義的有害的事情——「監督」每個閱讀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書籍的人並強迫他來報告他所讀過的東西。

由於在宣傳工作中有這些不正確立場的結果，於是那些在幾年當中都必須在同樣的小組中學習，而在自己家裏研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作品時又得不到應有幫助的共產黨員們，就失去其對理論準備的興趣，而出席小組上課，就往往變成繁重的負擔。

既然違背了自動加入小組的志願原則，既然用官僚主義行政手段而機械式強迫式地把黨員列入小組，既然不正確地把小組看成是黨教育底唯一形式，於是就破壞了黨員們對於自己能够用獨立讀書方法來順利研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信心。因此也就損害了共產黨員們深刻而獨立領會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基礎的事業，損害了黨幹部底思想發展。

必須恢復共產黨員們確信自己有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的力量和本事的信心。

必須打破那種有害的成見——以為只有在小組中才能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而其實，獨立讀書方法却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時的主要方法和基本方法。

(二) 過分誇張小組工作和一般口頭宣傳而使刊物宣傳受到損害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在刊物宣傳工作和口頭宣傳工作組織方面的有害的分離現象，其表現，就是無論在省委裏，在邊委裏，在各民族共產黨中央裏，無論在聯共(布)中央底機關裏，宣傳部和出版部都是各自獨立存在着。

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宣傳事業中，刊物——雜誌、報紙、小冊子，應當成爲主要的有決定意義的武器，而口頭宣傳則應當佔着輔助的協助的地位。刊物能够使此種或被眞理，一下子就成爲公衆底所有物，因此，它比口頭宣傳要有力得多。而把宣傳工作領導分裂於兩部之間，結果就減低刊物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宣傳中的作用，因此也就縮小布爾塞維克宣傳底規模，釀成手工業方式和茫無組織狀態。

黨宣傳鼓動部，既把自己的活動限制在口頭宣傳方面，既貪求小組數量，於是就沒有利用黨刊物來進行宣傳事業，而結果就使自己沒有切實領導宣傳工作的可能。

而同時，出版部既沒有必需數量的熟練宣傳員幹部——因爲他們差不多完全去作口頭宣傳了，——也就沒有能力經過刊物來進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宣傳。

(三) 在黨宣傳事業中最重要之缺點，就是黨組織對我們的幹部，對我們的蘇維埃的知識界底政治準備事業，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鍛鍊事業的輕視，而我們的蘇維埃的知識界，就是黨的、青年團的、蘇維埃的、經濟的、協作社的、商業的、職工會的、農業的、教育的、軍事的幹部，就是說，黨機關的、國家機關的、集體農莊機關的幹部，而工人階級和農民就是運用這些幹部來管理蘇維埃國

家的。我們的黨宣傳工作實踐，既主要是集中於包括生產中的工人，於是就忽略了那些擔任指揮工作的幹部——由昨天的工農所組成的我們的蘇維埃的，黨員和非黨員的知識界。

「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所提出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剷除對我們蘇維埃知識界以及對這知識界關於列寧主義政治教育的需要所抱的這種野蠻的反列寧主義的輕視態度。

「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首先就是為供給擔任領導工作的黨工作人員、青年團工作人員、經濟工作人員以及其他工作人員幹部，為供給整個我們的黨員的和非黨員的、城市的和鄉村的知識界而寫的。

我們忙於實際工作的黨的、蘇維埃的、經濟的以及其他的擔任領導工作的列寧主義幹部，在理論方面是很落後了。在創作黨史讀本時，聯共（布）中央是提出任務要開始剷除我們幹部底這種理論落後性和政治落後性。

「聯共（布）中央所持的出發點，就是認為……如果我們能够，如果我們善於把我們從下至上的一切黨幹部，在思想上準備得這樣，在政治上鍛鍊得這樣，以至於使他們能在國內國際環境中自由決定方向；如果我們善於把他們訓練為完全成熟的列寧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能解決國家領導問題而不犯嚴重錯誤的人，那麼，我們就因此而把我們一切任務解決十分之九了」（斯大林）。

「聯共（布）中央所持的出發點，就是認為：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藝術所要求的，是要知悉理論，就是說，要知悉社會發展底規律，工人運動發展，無產階級革命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發展底規律，要善於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工作中來運用這些規律。」

我們的一切幹部，就組成爲蘇維埃知識界巨大軍隊。蘇維埃知識界是與工人階級和農民有根深蒂

固的聯系的。這是完全新的知識界，而這樣的知識界，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裏所沒有的。

無論那一個國家，過去和現在都非有自己的知識界不可，至於工農社會主義國家，則更非有自己的知識界不可了。在蘇維埃政權存在以來諸年中所長成的知識界，是由國家機關底幹部所組成的，而工人階級就是運用這些幹部來進行自己的內外政策的。這是被提拔出來擔任指揮職務的昨天的工農和工農子弟。在我們國家這樣的國家裏，知識界是有特別意義的，因為在這裏，國家指導着一切經濟的和文化的部門——農業亦在其內，所以在這裏，每個國家工作人員，爲要自覺地和有成效地執行自己的工作，就應當了解國家底政策，了解國家在國內國外的任務。

因此，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來教育蘇維埃知識界的任務，乃是布爾塞維克黨最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聯共（布）中央指出：雖然知識界在蘇維埃國家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可是，那種對我們的知識界所抱的輕視態度，至今尚未被剷除，而這種態度乃是最有害地地在革命以前時期所流行的對待知識界的觀點和態度搬過來對待我們的蘇維埃的知識界，而在革命以前時期，知識界則是爲地主資本家服務的。

這種輕視知識界的態度，就表現於忽略了在思想上教育幹部的工作，忽略了在知識界——職員、教員、醫生、學生、集體農莊知識份子等等中所進行的政治工作，却以輕視倨傲態度對待黨員知識份子和非黨員知識份子，把知識份子看成爲第二等人，那怕這知識份子是因自己已有功勞而被提拔出來擔任蘇維埃國家領導職務的昨天的斯達哈諾夫工作者。

這種反布爾塞維主義的對待蘇維埃知識界的態度，乃是野蠻的、流氓式的、危害蘇維埃國家的態

度。必須了解：正因為忽略了在知識界中，在我們的幹部中的政治工作，所以在我們的幹部中，有一部份人既然落到黨底政治影響以外和沒有思想的銀鍊，就在政治上脫離正軌，誤入迷途，而成爲外國偵探機關及其托洛茨基份子——布哈林份子走狗以及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走狗們底俘虜。

聯共（布）中央認爲：必須剷除這種對知識界所抱的「馬哈葉夫」式的反列寧主義的態度。

必須教育蘇維埃知識界，使之具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精神。

蘇維埃國家政權，如果沒有這樣的知識界，就不能有成效地領導國家。

「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就是運用來這樣教育蘇維埃知識界的工具。

(三)

聯共（布）中央議決：

(一) 認爲貪求在數量上用黨教育小組網去包括共產黨員而損害宣傳工作質量的實踐，是不正確的實踐，因爲這種實踐結果是分散力量並降低宣傳工作的水平。

(二) 責成各級黨組織去消滅那種在黨宣傳工作方面的組織上的手工業方式，樹立在宣傳工作領導方面的必要的集中，並這樣來改造黨宣傳工作底組織事業，以便保證提高宣傳工作底質量，宣傳工作底思想永平。

(三) 把「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當作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宣傳底基礎。

按下列標準來分別研究聯共（布）歷史：

對於下層環節的幹部——其中有頗大一部份人是準備不充分的同志——，最好是按照黨史下列三

個基本階段，縮小範圍來研究黨史讀本：(1) 為建立布爾塞維克黨而鬥爭（由第一章至第四章）；(2) 布爾塞維克黨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由第五章至第七章）；(3) 布爾塞維克黨之當政（由第八章至第十二章）。

對於中層環節——這環節是由準備程度較高的同志所組成的，而且是我们幹部為數最多的環節，——聯共（布）中央則介紹研究「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全部，按照讀本所包含的十二章來分章研究。

對於上層環節，就是說，對於最有準備的同志，則最好是按照每章所有各節來分節研究「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同時並按原著來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底相當著作。

(四) 因為獨立研究法應當成為研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主要方法，所以責成各省委、邊委以及各民族共產黨中央要縮減黨教育小組的數量。

現時在每個大企業當中，機關中和高級學校中都有幾十個，有時甚至有幾百個小組，可是在處事得當的條件下，却原來以在每個大企業中，在每個大機關中，為下層幹部設立大約兩三個小組，為中等水平的人們設立兩三個小組，為最發展的和最有準備的人們設立一個高級小組，而在高級學校中則設立幾個中等小組和高級小組，較為適當。

在農村區域中，在有願意在小組中來研究「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的人，並有熟練的宣傳員時，可以為農村知識份子——黨積極份子和蘇維埃積極份子、教員、商業協作社工作人員、集體農莊積極份子等等，設立幾個小組。

在縮減小組數量時，必須根據這樣的任務為出發點，就是要以真正熟練宣傳員來保證這些小組工

作之進行。

(五) 消滅那種以強迫手段把共產黨員列入黨教育小組的行政式的官僚主義的實踐。向每個共產黨員解釋：參加小組，乃是完全出於志願的事情。

(六) 小組工作應當以活潑談話和同志辯論為基礎。應當將那種妨礙黨員布爾維克克底思想教育的、有害的小學校式的行政式的方法，官場習氣和公式主義，從小組中堅決摒除出去。宣傳員應當以同志態度來解釋組員所感覺興趣的問題。

必須消滅那種以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方式限制小組工作的辦法（劃一的黨課日，在工作完結後馬上舉行兩點鐘的功課，拒絕提出組員所感覺興趣的實際問題等等）。每小組底功課表應當由組員和宣傳員根據當地條件來共同規定之。每次上課時間之多少，應當以組員認為澈底討論所提出問題而需要的時間多少為轉移。

小組工作應當這樣來組織之，就是不要使上課時間延長得過久。必須避免現在小組所有的根本缺點之一：就是給黨史頭前幾個題目以無限數量的時間，而在黨史中有最重要意義的十月革命後的時期，則剩下沒有研究。

黨史研究小組，應當這樣來組成之，就是要保證小組各參加者底普通知識和政治準備程度，多少是相等的。按照準備程度，最好是以分別研究「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為標準而成立以下三種小組：

(甲) 為我們幹部中的下層環節而設立的小組，這種小組以縮小範圍來研究「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並以較通俗的形式來敘理論問題；

(乙) 為中層環節而設的小組，這種小組按每章為單位來完全研究「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

(丙) 爲最有準備的同志們而設的小組，這種小組按每章所有各節爲單位來研究「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並同時參讀原著。

(七) 採取舉行講演的方法，講演是宣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主要方法。準備充分的和內容豐富的講演，對於那些獨立研究「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典型著作的同志們，應當是嚴重的幫助。同樣，必須舉行關於國際形勢問題以及個別理論問題和政治問題的講演。最好是在講演後，講演者能答覆聽講者所提出的問題。應實行組織一種收取少許入場費的公開講演。

(八) 消滅那在領導宣傳員工作方面的手工業方式和無監督現象，這種現象之表現，就是貪求籠統設立黨研究室和宣傳員研究班。責成黨組織在兩個月以內研究和重新審查所有一切黨研究室，縮減其數量，通常只留下市委和區黨委所附設的黨研究室，以幫助宣傳員和爲那些從事政治自修者解答問題。企業中和機關中的那些沒有熟練解答員的黨研究室，應當縮減之，或者改爲供給自修者享用的讀書室和圖書館。責成黨組織縮減宣傳員研究班數量，把宣傳員研究班工作集中於聯共(布)各大城市區委、市委、省委和邊委之下。

在設立宣傳員研究班時，黨組織應當保證它們以具有馬克思主義素養的和在政治上經過考查的指導員。聯共(布)各市委、省委和邊委，應當經常監督宣傳員研究班底工作內容。

聯共(布)歷史宣傳員研究班底工作，應當以適應聯共(布)歷史三種基本研究形式爲基礎，同時，應當使宣傳員研究「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的進程，比小組研究進程早得多。

研究班不能是爲宣傳員施行「注入式教育」的地方。宣傳員研究班裏的功課，應當這樣來組織

之，就是要保證研究班每個參加者都能進行创造性的工作，要進行對於理論問題的活潑討論，要保證對於理論問題和方法問題進行同志的辯論。

(九)責成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去把我們黨最熟練的宣傳員、演講員、報告人、解答員們統一起來，這些人應當在理論雜誌上，在中央報紙上發表文章，應當在各地地方作講演和做報告，應當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宣傳方面給各地地方黨組織以切實幫助。

認為必須收集和有系統地在刊物篇幅上公佈那些最優秀宣傳員底經驗，他們的授課情形，他們的解答和講演。

責成各市委、各省委、各邊委和各民族共產黨中央實行定期召集宣傳員和出版工作人員會議，來討論宣傳工作底基本問題。

(一〇)剷除那種忽視刊物意義的態度，而刊物乃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最重要的工具和全蘇聯的宣傳講壇。

提高刊物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事業上的作用。為着這個目的而責成「真理報」、「紅星報」、「青年團真理報」編輯部以及各共和國的、各邊疆的、各省的黨報紙和青年團報紙編輯部，去有系統地在這些報紙篇幅上登載關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問題的文章，登載最優秀宣傳員底解答和講演，對於讀者「問題」的「回答」。在「真理報」、「紅星報」、「青年團真理報」以及各共和國的、各邊疆的、各省的黨報紙和青年團報紙編輯部內，設立宣傳科，而由有理論準備的同志主持之，並吸收最優秀宣傳員來參加編輯部宣傳科中的工作。

認為必須改造「布爾塞維克」雜誌，使它成為黨底理論機關雜誌和全蘇聯的對於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問題的解答處，它應當在自己篇幅上解答黨員和非黨員所感覺興趣的理論問題和政治問題。

責成聯共（布）中央底黨宣傳鼓動部和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來保證出版一些通俗小冊子，以幫助宣傳員，特別是幫助那些研究黨史的下層積極份子，並且要製定黨史參攷書出版計劃。

（一一）把那種輕視蘇維埃知識界的態度，那種輕視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精神來在思想政治上教育蘇維埃知識界的任務的態度，斥責為野蠻行為和流氓行為。責成黨組織去恢復正確的布爾塞維克的對待蘇維埃知識界的態度，並在知識界中，在職員、學生和集體農莊知識份子中，擴展思想政治的工作。認為黨組織在宣傳方面的首要和主要任務，就是要剷除黨員知識份子和非黨員知識份子幹部底理論政治落後性，要保證多方幫助蘇維埃知識界精通布爾塞維主義，研究聯共（布）歷史以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典型著作。

（一二）指出理論戰綫上的工作人員在理論上很落後的事實，其表現就是：他們在理論上薄弱無力；他們不敢大胆提出迫切的理論問題；讀死書和咬文嚼字習氣之流行；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個別原理庸俗化和鄙陋化；理論思想之落後；沒有充分從理論上來綜合黨在社會建設各部門中所積蓄起來的巨大實際經驗。號召理論戰綫上的一切工作人員去堅決而迅速地糾正理論戰綫上這種不可容忍的落後，去消滅這種不敢大胆提出能够推進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的理論問題的害怕心理，去消滅這種咬文嚼字態度，讀死書習氣，煩瑣觀點，以及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個別原理庸俗化和鄙陋化的現象。

（一三）要剷除思想事業方面的荒廢情況，這種情況特別是表現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工作之不能令人滿意，該研究院在「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譯成俄文時，犯了許多曲解原意和不正確

傳達原文的錯誤，並且在「列寧全集」幾卷底附錄，註釋和評註中，犯了暗害性的最粗暴的政治錯誤。

(一四) 責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在最短期間內糾正在「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譯本中所犯的曲解原意的地方，並且糾正在「弗·伊·列寧全集」——例如第十三卷——底附錄和註釋中所含有的最粗暴的政治錯誤。

責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加速「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和「弗·伊·列寧全集」再版的工作。

(一五) 指出我們的理論雜誌之與我們黨生活及鬭爭底迫切問題隔離的事實，指出它們那種閉門幽居習氣和學究主義趨向。

責成各理論雜誌編輯部去改造自己的工作，務須在自己篇幅上提出理論問題，綜合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供應我們幹部底理論需求，研究新的理論問題，進行關於理論問題的創造性的辯論。

(一六) 除了聯共(布)中央二三月全會所規定的關於黨內領導工作幹部底政治補習辦法以外，還實行下列各種關於黨的熟練宣傳員幹部補習和學習的辦法：

(甲) 在下列中心城市裏設立以一年為期的宣傳員和報紙工作人員補習班：(1) 莫斯科，(2) 列寧格勒，(3) 基也輔，(4) 明斯克，(5) 羅斯托夫，(6) 梯比里斯，(7) 巴庫，(8) 塔什干，(9) 啊爾馬——啊塔，(10) 諾沃西比爾斯克。在這些中心城市裏設立的以一年為期的宣傳員補習班，應當不只是供應本省和本邊疆，而且應當供應鄰近的省、邊疆和共和國。以一年為期的宣傳員補習班底課程大綱，應和「列寧講習班」底大綱相當，其功課內容，應當以發展宣傳工

作的技能和發展獨立深刻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的技能爲本旨。

所有宣傳員一年補習班學生名額總數規定爲一千五百人至兩千人，同時，須使在這個總數中，約有一半是報紙工作人員。

(乙) 在聯共(布)中央之下，附設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最高學校，學期三年，以造就黨底深造理論幹部爲目的。

(一七) 在一般高級學校中，應以深刻研究「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爲基礎來講授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因此之故：

(甲) 在高級學校中主要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基礎」這個統一科目來代替列寧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幾個獨立科目，而在教授計劃中原來用作研究社會經濟科目的鐘點總數，則仍然保存之。在高級學校中，講授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底基礎，應當從研究「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來開始，並應當同時研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原著。政治經濟講授工作，應當在研究聯共(布)歷史以後進行之。

(乙) 在高級學校中成立一個統一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教授團來代替現有的幾個獨立的教授團——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教授團，列寧主義教授團和聯共(布)歷史教授團。

(丙) 在那些有哲學系、歷史系、文學系的大學校和高等專門學校中，則保存該各系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科的講授。

(丁) 委託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和全蘇聯高級學校事務管理局到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學年開始時選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教授團底領導者並將其名單提交聯共(布)中央批准。責成各

民族共產黨中央，聯共（布）各邊委。省委和市委挑選在理論上有準備的和政治上經過考查的人員來充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基礎一科的教員。

（戊）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最高學校之下，附設半年補習班，以供一般高級學校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科教員補習。

（四）

為根本改善黨對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宣傳事業的領導起見，聯共（布）中央議決：

（一八）將聯共（布）中央裏的。各民族共產黨中央裏的。聯共（布）各邊委裏的。各省委裏的黨宣傳鼓動部和刊物出版部合併起來，而成立統一的宣傳鼓動部。

（一九）把全部為宣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而進行的刊物宣傳工作和口頭宣傳工作，以及全部群眾政治鼓動工作（黨報；宣傳品和鼓動品出版工作；組織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刊物宣傳和口頭宣傳；對於宣傳工作底思想內容的監督；挑選和分配宣傳員幹部，黨幹部底政治學習和補習工作；組織群眾政治鼓動），都集中於宣傳鼓動部之內。

宣傳鼓動部應以實際實現聯共（布）中央本決議為其工作基礎。

（二〇）為提高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宣傳底質量起見，認為必須使黨組織今後在宣傳事業上所依靠的幹部，通常都是已被解放其他任何工作的同志，這些同志將能以自己全部精力從事宣傳工作，並始終不倦地提高自己的理論的和宣傳的熟練程度。

因此，委託聯共（布）各省委和各邊委挑選最優秀宣傳員來擔任經常的宣傳工作。

(二一) 宣傳鼓動部工作人員，應由黨機關從最熟練的宣傳員、職業家和黨的著作家當中挑選出來。

在聯共(布)中央，各民族共產黨中央，聯共(布)各省委，各邊委和各市市委宣傳鼓動部中，應設立講演團。

(二二) 因為縮減小組數目，以及因為縮減企業中和機關中的黨研究室而曾在城市中解放一部份宣傳工作人員之故，特責成各省委，各邊委以及各民族共產黨中央把這些工作人員當中最有準備的同志調派到農村區域去加強宣傳工作。

(二三) 把市黨委和區黨委現有文化宣傳部改組為宣傳鼓動部。認為在現時沒有文化宣傳部的那些區委中也必須成立宣傳鼓動部。特規定：區黨委中的宣傳鼓動部之成立，應由聯共(布)中央根據熟練工作人員挑選情形，並根據省委、邊委、民族共產黨中央之請求，而為每區分別解決之。

把市黨研究室和區黨研究室歸併於市黨委和區黨委底宣傳鼓動部之內，以便使黨研究室主任同時又是宣傳鼓動部底副主任。

(二四) 特規定：省委、邊委、民族共產黨中央、州黨委、市黨委和區黨委底宣傳鼓動部主任，須由聯共(布)中央批准之，而這些委員會底宣傳鼓動部其餘負責工作人員，則由各該省委、各該邊委和各該民族共產黨中央常務局批准之。

責成各省委、各邊委以及各民族共產黨中央在兩個月以內，把宣傳鼓動部工作人員挑選完畢並批准之。

(二五) 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底工作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宣傳事業有密切聯

系，所以認為必須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移交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管轄之。

（二六）聯共（布）中央責成所有各級黨委來認真從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宣傳事業，因為這是布爾塞維克黨底切身事業。各級黨委務須切實領導宣傳事業，深悉其內容。省委、邊委和民族共產黨中央應當擔負起領導責任去根據本決議改造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宣傳工作底整個組織事業。

中央向所有各級黨組織指出：為要根據中央本決議精神來改造整個黨宣傳事業，就要求黨機關予以特別的注意和關心；中央警告各級黨組織：務須避免那種以機械形式主義態度處置宣傳工作改造事業的危險，務須避免任何籠統唾棄整個過去宣傳工作經驗的企圖。

為改善對於黨宣傳事業的領導起見，特規定：在每個市委裏，每個省委裏，每個邊委裏，每個民族共產黨中央裏，都應有一個專門從事於宣傳鼓動工作底組織和內容問題的專門書記。

×

×

×

聯共（布）中央責成各區委、各市委、各省委、各邊委以及各民族共產黨中央應向黨積極份子和全體黨員解釋本決議。

聯共（布）中央着重提出：『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之出世，應當成為我們的幹部——黨的、青年團的、蘇維埃的、職工會的、經濟的、文化的工作人員，即整個蘇維埃知識界幹部——為消滅自己的理論落後性而努力的轉變之起點。

『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在我們黨和蘇維埃人民生活中開始新的雄偉的思想政治高漲。

我們的幹部，既然精通這以社會發展規律知識武裝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就會成為真正不可被戰勝的，並更加有成效地在這個理論旗幟下，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下，引導整個蘇

維埃人民達到共產主義底勝利。

三 法、英、美、德、意五國共產黨論共產國際各支部內「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底傳佈與研究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底宣傳

（譯自八月二十四日德文「國際通訊」第八卷第四十五期）

（一）「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對於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國際無產階級及一切國家勞動者的意義

「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底出版，乃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世界工人運動及資本主義國家勞動者解放鬭爭中最偉大的事件之一。「簡明教程」在斯大林同志直接參與之下寫成，並經過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之審定。它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底古典文獻中佔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簡明教程」底使命，就是要在使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員勝利地掌握布爾塞維主義方面，在鞏固共產國際各支部及提高他們思想上，政治上的水平方面，起它偉大的作用——而它也將無疑地起這一偉大的作用。

「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底工人與勞動者的特殊意義，首先就在於下面的

一點：

『簡明教程』向他們指出了建設與鞏固新典型的黨，列寧——斯大林黨底道路，而這個黨是其他一切共產黨底模範。

在『簡明教程』一書內，革命的理論和革命的實踐在長期的原則的鬭爭經驗中，表現了密切的聯系，這種長期的原則的鬭爭，是列寧和斯大林在政治的、經濟的和理論的領域內，爲着反對資產階級、地主，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階級敵人底一切代理人，在工人運動內部以及在黨內所進行的。

『簡明教程』指出了布爾塞維克黨在解決一般的民主主義任務時，在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時所經過的鬭爭底道路；它指出了革命地推翻資產階級及地主政權的道路以及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

『簡明教程』寫出了在人類歷史上會開闢一個新時代的、世界上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大革命之極其豐富的經驗，它介紹了三次革命底經驗，在這三次革命底烽火中，列寧和斯大林曾把布爾塞維克的黨鍛鍊得如鋼似鐵。

它介紹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底理論與實踐，它介紹了社會主義在蘇聯取得世界歷史的勝利底理論與實踐。

『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以高度的原則性，布爾塞維克的不調和性和對於階級敵人的警覺性來教育共產黨員。在反對離開布爾塞維克路線的偏向的鬭爭中，在反對社會民主主義影響及其他非工人階級意識的傾向的鬭爭中，它武裝了各國共產黨；它是在反對法西斯主義托洛茨基派代理人的鬭爭中，在反對右的叛徒，反對陰謀危害者、奸細、凶手這一夥勞動者最凶惡的敵人的鬭爭中，一件不可

估價的武器。

『簡明教程』表示了布爾塞維克在行動中的戰略與策略；它表示了在階級鬭爭底具體條件下進攻和有組織的退却底模範。

它教育共產黨員，在每一個鬭爭階段上冷靜地估計階級力量底對比；它教育他們必須正確估計勞動者底力量與階級敵人底力量，並由此來保證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獲得最偉大的勝利。

它教育他們以革命的熱忱；它教育了，應當怎樣地以布爾塞維克的作風來佔領敵人底堡壘；它教育了，在克服困難中應有的頑強性和堅忍性。

它教育我們，應當如何地在無產階級及其領袖共產黨底領導之下，為工人階級底統一，為與工人階級底同盟者——農民、中等階層、被壓迫民族——建立聯盟而鬭爭。

經過『簡明教程』對於蘇聯共產黨（布）底歷史及俄國革命運動底歷史所做的天才的論述，它給其他各國共產黨人一個活的榜樣，告訴他們怎麼才是正確地運用辯證的方法來研究他們自己的黨和他們本國工人運動底歷史；怎樣才是正確地提出與解決擺在他們本國工人階級面前的任務。

『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是一個顯著的證明，它證明着工人階級底黨是如何地不可戰勝，假如它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為準繩而建立起來的黨。

『簡明教程』展開了光明的前途，鞏固了國際工人階級對於共產主義在全世界上的最後勝利的信心。

『簡明教程』和第二國際武斷割割的和偽造的馬克思主義相反，它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底一個模範的榜樣。『簡明教程』反映了列寧和斯大林貢獻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那些偉大的天才寶庫，它將

成爲全世界理論的馬克思主義思潮底一個新高漲底起點，它替整個勞動者底解放運動擴大了政治的水平綫，並由此而便利了和加速了工人階級底勝利。

「簡明教程」是一部簡短的科學的百科全書，它包括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底基本知識。

蘇聯共產黨（布）底歷史，乃是世界各國共產黨人、工人運動、勞動者底共同財產。它是這樣一個國家底布爾塞維克黨底歷史，這個國家成爲列寧主義底誕生地，它成爲列寧、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底故鄉，成爲勝利的工人階級專政底國家，社會主義底國家，全世界勞動者底祖國。

共產黨人因此永不忘記，蘇聯是世界工人運動最終目標底活的化身，它是世界無產階級統一的國際任務底代表者，蘇聯共產黨（布）底長年鬪爭經驗對於一切國家底勞動者有着決定的意義。但同時資本主義國家底共產黨人不應忽視，他們今天必須在與沙皇時代不同的歷史具體條件之下進行鬪爭；社會民主主義在他們本國工人運動中，比在俄國工人運動中有着更深的根基；最近幾十年來資產階級在反對革命運動的鬪爭中獲得了經驗；工人階級在他們國內和在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有着不同的比重；資本主義國家勞動者的階級覺悟性與組織性底水準大大地落後於蘇聯勞動者底覺悟性與組織性。但是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員首先應當估計這樣一點，就是蘇聯工人階級乃是勝利的階級，而他們本國底工人階級則尚在爲自己的勝利鬪爭中。因爲這個原故，所以資本主義國家底共產黨人在解決具體的政治上的、策略上的和組織上的任務時，不應當盲目地抄襲聯共（布）底經驗，不應當機械地把聯共（布）底經驗套在他們本國及本國工人運動底條件上去；他們應當在利用聯共（布）底寶貴經驗之下，仔細地全面地研究他們本國底特殊條件以及每一種具體形勢，並在參照這些條件之下，適應這些形勢來做他們自己的決定。共產黨人必須永遠牢記列寧和斯大林底屢次指示，就是必須善於把聯共（

布)底經驗運用到工人階級鬭爭底新的歷史條件上去。各國共產黨應當時刻記在心頭：

「……我們革命在幾個主要表徵，並非只有地方的、特殊民族的、單獨俄羅斯的，而的確含有國際的意義。」(中文本『左派幼稚病』)

可是每個國家底共產黨員應當：

「在各國解決統一的國際任務，戰勝工人運動中之機會主義與『左派』清談主義，推翻資產階級，建設蘇維埃共和國與無產階級專政等的具體過程中，考察、研究、探索、揣摩和熟知民族的特殊和固有之點。」(中文本『左派幼稚病』)

由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達到無產階級專政。達到蘇維埃政權的道路，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更有必要做到這一點。

聯共(布)底歷史教育了國際無產階級，怎樣才是把完成戰勝資本主義的基本任務的鬭爭，與保衛勞動者日常利益的鬭爭，以及解決在不同鬭爭階段上出現在無產階級面前的日常任務的鬭爭，勝利地配合一致。從對於蘇聯共產黨(布)歷史底研究與深刻的推論中，各國共產黨獲得了用以進行反對法西斯主義及法西斯主義的戰爭縱火者的鬭爭，用以進行爲建立與鞏固工人統一戰線和人民戰線的鬭爭，爲組織各國人民反對侵略者的國際統一戰線而鬭爭的一個有力的武器；它們獲得了將千百萬的勞動者團結在社會主義偉大國家底周圍的一件武器。

聯共(布)歷史的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掌握，就是一種保證，使得在目前國際形勢底困難條件下，能够最成功地。最正確地執行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根據列寧、斯大林底學說所規定的路線；而首先是國際工人運動隊伍中的分裂可以得到克服。

從共產黨人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之日益改善的掌握當中，他們在運用統一戰線底策略時，將能避免右傾機會主義的態度以及宗派主義底殘餘；他們將能孤立與打擊投降主義者以及工人運動內部的其他敵人；他們將能團結勞動者於工人階級領導之下，並克服這條道路上的困難。

「但是，」斯大林同志說：「假如理論是在和革命的實際密切聯系中形成的，那麼，它就能變成工人運動底極偉大的力量；因為理論，而且只有理論，才能給運動以確信力，給運動以確定方針的力量和對於四周事變底內部關係的了解；因為理論，而且只有理論，才能夠幫助實際不僅去了解目前各階級行動底道路和方向，而且去了解在最近的將來這些階級必然將行動的道路和方向。」（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德文本，莫斯科一九三八年版，第二十五頁，中文見『斯大林選集』，第一卷，第二十頁——譯者）

(二) 關於「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底傳佈

「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滿足了願意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群眾很久以來就感到的需要，而首先是滿足了共產主義者底需要。從來沒有一本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在勞動者當中曾獲得像「簡明教程」這樣巨大的反響，並且在這樣短的時間內達到這樣普遍的傳佈。在法國、美國和在一些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裏，關於「簡明教程」底傳佈方面，已經有了不容懷疑的成績。然而，這還不過是第一步。因此，如果對於已達到的成績表示滿意，那就很危險，尤其是因為在許多國家內（特別是在法西斯專政的國家內）這書底傳佈實際上還未開始，這就顯得愈加危險。

關於「簡明教程」底傳佈，如果拿過去出版的其他書籍普及的數目字來做比較，那是一個錯誤。關於「簡明教程」底傳佈，各國共產黨必須把這件事實計算在內，就是在每一個黨員身後有着十個到十五個同情者（譬如在共產主義運動可以公開存在的國家裏，在選舉中投票贊成共產黨的票數，正是說明着這一點），而這些同情者是準備擁護共產黨的。我們黨當從這樣的觀點出發，要使「簡明教程」成爲馬克思列寧主義文獻底傳佈中的一個轉變點，要使它成爲馬克思列寧主義深入廣大群眾中去的有力的槓桿。

爲保證這書得到廣泛的、正確的傳佈起見，下列辦法可以認爲是適當的：

- (一) 要達到每一個黨員有一本「簡明教程」，並研究它，使它成爲每個黨員底指南；
- (二) 要運用一切方法將「簡明教程」傳佈到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中去，傳佈到社會民主黨底幹部中去。
- (三) 要特別注意這書在職工會、工人群眾組織、民主主義組織（合作社、文化團體等）底會員中底傳佈，而尤其是這些團體的積極份子中的傳佈；要達到所有這些組織底圖書館一律備有「簡明教程」；

(四) 要組織這書在進步的知識份子中間的傳佈，其中也包括大學生底進步份子；

(五) 要以最大的注意致力於「簡明教程」在青年中間的傳佈；在這一方面直到現在還可以看到的不容忍的落後，必須消除（即如在法國，雖然在那裏一般地說來這書底傳佈進行得很有成績，但在這方面仍存在着落後的現象）；共產主義的青年應當成爲傳佈「簡明教程」的先鋒；

(六) 在農民意底進步份子中間，也應當組織這本書底傳佈，這樣來使某些共產黨員認爲「農民不

能學習和研究嚴肅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的成見告一結束；

(七) 在法西斯專政底國家和殖民地，共產黨底工作上存在着極大的困難，各合法的共產黨（法國、美國、英國、荷蘭及其他國家底共產黨）應當幫助秘密的和較弱的共產黨在那些地方傳佈「簡明教程」；

(八) 領導傳佈「簡明教程」的工作，無論如何不應當僅僅委託於印刷所，這一工作底領導必須由黨底中央委員會來執行。必須吸引所有黨底組織、宣傳員與鼓動員、報章雜誌等，以及同情黨的份子來參加傳佈的工作。最好在報章上發表讀者——共產黨員、無黨無派者、職工會積極份子、進步知識份子中有名望的代表等等——對於這本書的意見。關於傳佈的情況，必須有精確的報告（譬如在法國就已經做到這一點）。要隨時隨地檢查工作執行的情況，並同時矯正可能發生的錯誤和不充分處。要在報章上、集會上、議席上宣佈已經獲得的成績（按照法國和美國底榜樣），以便在「簡明教程」底傳佈上引起更大的光輝。在工人運動公開存在的國家裏，特別重要的是和這本書的買主保持經常的聯系，幫助他們研究並努力使他們成爲「簡明教程」一書底積極宣傳者和傳播者。

※ 這篇決議是在去年法國共產黨尚未遭反動政府解散時寫成的，故文中指「法共」爲合法的。

(三) 關於組織「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底研究

僅只保證「簡明教程」底廣泛傳佈，還遠不是我們所必須做的事情底全部。除了傳佈以外，還必須以適當的方式把「簡明教程」底研究組織起來。目前，在傳佈「簡明教程」的工作和組織「簡明教程」底研究的工作之間，有着一條鴻溝。這條鴻溝必須在最近期間內予以消滅，因為不然在傳佈方面的成績，將只是形式上的成績，而提高黨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修養底水平的基本目的，將不能達到。另一方面，這條鴻溝可能成爲這本書繼續傳佈中的嚴重障礙。

組織「簡明教程」底研究的工作，不應當帶一種臨時突擊運動底性質。它應當成爲一種有系統的、有計劃的活動，開班上課，要在各方面喚起共產黨員和勞動者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願望。興趣與熱情。

在組織「簡明教程」底研究時，應當把第一等的注意力先集中在使黨底幹部，共產黨底活動份子，共產主義青年團底活動份子，在職工會中以及其他群眾組織中工作的共產黨員研究「簡明教程」。應當造成這樣一種空氣，在這種空氣中每一個真正的布爾塞維克都要研究「簡明教程」，而且要不知疲倦地爲提高自己理論知識底水準而努力；這種現象要在黨內被看作是一種定律。

同時，黨底領導機關應當採取一切方法，吸引同情者、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職工會活動份子這些非共產主義者以及其他的人，也來參加「簡明教程」底研究，這也是必要的。

針：
顧慮到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底特點，最好在組織「簡明教程」底研究時，以下列各點作爲工作方針：

(一) 在共產主義運動公開的國家內

一、「簡明教程」底研究應當以支部爲單位來組織，而同時要收容所有的黨員來參加這一課程。要進行廣泛的政治上的解釋工作，並採取一切必要的組織上的辦法，以便使黨員真正參加「簡明教程」底研究，而不只是停留在領導機關之形式上的決定上面，空洞地說，共產黨員參加學習是必要的。

二、如政治上比較有修養的擔任負責工作的活動份子，爲黨底領導幹部，最好選擇國內中心地點組織幾個程度較高的特別小組，在那裏應當增加研究各種材料，而首先應當研究「簡明教程」援引的各種文獻。

三、除了在支部內和在小組內研究「簡明教程」以外，還應當從各方面獎勵與組織聯共(布)歷史底獨立研究，尤其是在政治修養比較好的黨底幹部當中尤應如此。

四、爲了在非黨人士及在反法西斯政黨黨員，及反法西斯組織會員當中進行「簡明教程」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底宣傳，應當在這些組織內舉行學術報告、討論會及公開講演；特別是關於有現實意義的理論問題。

政治上和理論上最有修養的共產黨員，最好在黨底組織領導之下到工廠和工人區去組織非黨份子，而首先是組織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研究「簡明教程」底小組。

(二) 在共產主義運動不合法的國家內

正確地組織「簡明教程」底研究，在法西斯專政底國家裏，是建立一個堅強的祕密的共產黨之最重要的槓桿；這樣的共產黨，雖然在瘋狂的恐怖之下，仍然能夠進行有系統的群眾政治工作，仍然能夠組織和領導工人階級和勞動者推翻法西斯專政的鬭爭。「簡明教程」底研究，應當成爲建立黨底新的下層組織，吸收新黨員，建設與鞏固祕密的共產黨之有效的因素。在這些國家中，必須採取各色各樣最有彈性的形式來研究「簡明教程」。

(三) 組織對研究「簡明教程」者的幫助

對於所有研究「簡明教程」的人，必須保證他們從各方面得到幫助，因此之故，下列各項辦法底採用，可以認爲是適當的：

一、應當最廣泛地利用各種定期報章來有系統地、深入地討論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底問題，尤其是「簡明教程」書上講到的那些有着特別現實意義的問題，例如下列各問題：正義的與非正義的戰爭與和平主義；布爾塞維克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關係；工人階級底統一；中等階層和列寧。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等等。在報章上應當發表質疑的文章以及對於研究「簡明教程」的讀者所提問題的解答。

二、應當組織公開的學術演講以及口頭上的和文字上的質疑，假如可能的話，應當利用無線電和電影。

三、黨底刊物應當轉變作風，它們應當一般地成爲研究聯共（布）歷史及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底助手，它們要喚起黨底幹部對於理論問題的興趣，它們要使共產黨人底策略態度具有深刻確實的理由與根據，它們要掀起嚴肅的鬭爭，來保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底純潔，來爭取工人運動中鬭鬥的馬克

思主義底勝利，來提高對於一切馬克思主義底敵人和偽造者的理論上的警覺性。

(四) 在黨校內「簡明教程」底學習

爲着更加速地、更加澈底地訓練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堅強幹部起見，必須擴大學校網，改變學校底教授計劃，並根據「簡明教程」所賦予的精神，來批判地檢查各學校採用的全部教材。

在學校這方面，最重要的辦法有以下各點：

一、在中央黨校，應當一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一課作爲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之統一的課程。「簡明教程」和斯大林同志底「列寧主義問題」，應當採用作教授程序的藍本。各該國工人運動史一課，應當包含在教育計劃之內，並作爲獨立的課程，而與聯共（布）歷史及「列寧主義問題」密切聯系起來。

二、應當爲黨底下級幹部與中級幹部廣泛地建立學習「簡明教程」的夜校，並開班講授（如果在當地法律關係允許的話）。

三、在短期學校內，應當把主要的努力方向放在使從學校中畢業出來的黨底幹部能够獨立地更深入地繼續研究「簡明教程」以及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

(四)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應當升到適當的高度

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全世界上的傳佈，起了偉大的作用；這一勝

利是由列寧和斯大林底工作準備下基礎，給以理論的根據並使之普遍化了的。同時，這一勝利對於各國共產黨底鞏固，對於二十年來各國共產黨爲共產主義事業不怕犧牲的鬪爭，也有着極大的貢獻。然而，所有各國共產黨在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這一方面仍然還是非常之落後，雖然它們都已經擴大了它們對群眾的影響，並且在組織上是健全的。在殖民地國家和附屬國，有馬克思主義素養的幹部，特別感覺缺乏（如在印度、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

這種在掌握理論方面的落後，妨害着共產黨底繼續發展，減低了它們在階級鬪爭底困難環境下獨立確定方向的能力，並使得理論基礎不夠的黨底幹部犯下嚴重的政治上的錯誤。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到適當的高度的必要性的問題，今天比任何時候都更尖銳地擺在各國共產黨底面前。

各國共產黨必須首先想到自從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以來，它們底黨員人數底顯著增加。目前，在各個最大的公開的共產黨內，以及甚至在許多秘密的共產黨內，絕對大多數的黨員，乃是由最近三四年內才加入黨的同志組成的，因此他們也就不能有任何嚴肅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修養。

除此以外，還有許多其他的理由，因而就給予共產黨以一種必要，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底宣傳作爲當前最重要的鬪爭任務之一。

第一，法西斯主義者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瘋狂進攻，不應當被忽視；他們在法西斯國家裏動員了整個龐大的國家機器，來進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鬪爭，並傳播最荒謬的法西斯「理論」。

第二，應當時刻想着，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工人運動是處在資產階級意識以及各國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派別底影響之下的（在法國是若列派※底思想和工團主義底思想；在英國是勞工組合主義底思想和費邊主義底思想；在西班牙是無政府主義底思想；在波蘭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底思想等等）；而

同時，各國共產黨反對這些思想而進行的意識上的鬭爭，還是不充分的。

第三，應當考慮到，社會民主主義底反動的投降派領袖們（斯巴克 *Spaak*、得·曼 *Do Man*、斯湯皮夫爾 *Stampfer*、保羅·佛萊 *Paul Faure* 及其他人），正在日益公開地走向法西斯的立場，他們和法西斯主義者一樣，把這種叛變行為隱藏在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十字軍後面，他們以這樣的方式來瓦解工人階級對於科學社會主義戰勝一切的力量有信心，並認為這樣可以破壞勞動者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鬭爭。

第四，法西斯主義底托洛茨基派代理人底卑鄙的暗害工作，也同樣不應當估計得過低；他們那些人正在製造一些最令人作嘔的有毒質的誹謗文字，來攻擊蘇聯底社會主義事業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底理論。

所有這些暗藏的和公開的勞動者底敵人所集中進行的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十字軍，都是爲着一個目的，這就是：在政治上解除工人階級底武裝和鞏固法西斯蒂資產階級底地位。

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說：

「世界各國資產階級及其改良主義走卒們所特別力求的主要點，——就是要在工人階級中間剷除工人階級對於自身力量有信心，對於自己有可能而且必然獲得最終勝利的信心，並因此而使資本主義奴隸制度永垂不朽。」

※ 若列（*Jaurès*）是法國社會黨機會主義者的領袖，他擁護密列蘭加入資產階級列的華爾德·蘆驥內閣（時在一八九一年）因而與華德派分裂，組織一個作爲資產階級尾巴的政黨。

因此，共產黨底任務就在於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底主張和宣傳，來粉碎敵人底計劃，提高工人階級對自身力量的信念，這樣來便利於加速工人階級底勝利。

爲了在共產國際各支部內，在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方面和在宣傳工作底情況方面掀起必要的變動起見，爲了建立廣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群眾宣傳起見，「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一書底傳佈與研究，應當成爲轉變底起點，但須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底原有著作底深刻研究聯系起來。

假如不能保證中央委員會在黨底工作底這一極端重要的領域上，有堅強的、經常的、深思熟慮的領導，要在共產國際各支部內，提高宣傳到共產主義運動決定任務底水平，是不可能的。這種領導目前在大多數的情形下還是非常之脆弱的。在許多共產黨裏面，在政治領導和宣傳工作底領導中間，存在着在政治上的鴻溝，宣傳工作時常被看作第二等的事務，並且時常被認爲是某些脫離黨底領導和政治活動的同志們底狹窄的專門工作。在許多黨內，對於在宣傳工作方面獲得的經驗缺乏研究，並且缺乏交換經驗底組織。

馬克思列寧主義底宣傳，必須有一番根本的改造。

爲了改造馬克思列寧主義底宣傳，最重要的辦法應當是：

(一) 應當造就能在口頭上、文字上進行宣傳的大批幹部。鑒於對這項工作的特別忽視，各祕密共產黨必須着手在國外亡命者中間以及在本國內培養宣傳幹部，在這項工作上應當吸收最有修養的同志以及那些由於暗害關係不能委託以其他工作的同志。

必須造成這樣一種情況，就是每一個黨底活動份子不僅自己研究聯共（布）歷史，努力於自己理

論水乎底提高，而且照例除了一般的黨底工作以外，還要進行一項一定的宣傳工作。

(二) 在大的公開黨底中央委員會裏面，應當有一批有資望的職業宣傳家，這些人能够保證宣傳工作底高等質量（即如演講、質疑、檢查各地宣傳工作，幫助各地黨底組織建立宣傳工作）。

(三) 在黨底領導機關底會議上，直到政治局和中央全體為止，都應當有關於宣傳工作經過的定期報告，並且應當決定改善這項工作的必要辦法，以及組織對於這些辦法執行情形的檢查。

(四) 應當召集宣傳員、黨底報紙和雜誌底編輯、黨校底教員等人會同黨底領導機關底代表，舉行定期討論，來研究宣傳工作方面的經驗，來分析最現實的理論問題，並由黨底領導機關將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中的現實問題，向宣傳員有系統地傳達。

(五) 在共產主義運動公開存在的國家內，組織「研究會」來討論研究過程中發生的最現實的和最重要的問題，應當認為是適當的。這種「研究會」應當在相當的黨委員會（區的、市的以及分區的黨委員會）領導之下進行，宣傳員以及在支部裏在小組裏或獨立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都應當參加這種會議。

(六) 鑒於共產主義青年團底幹部理論修養底水平過低，而組織共產主義青年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是不容延遲的任務，所以共產黨應當在這一方面表現出有效的幫助，尤其是，它應當以黨底堅強的宣傳幹部供給共產主義青年團，去組織共產主義青年團內部馬克思列寧主義底宣傳。

(七) 出版社底工作應當這樣來改變，就是它們應當除了現實的鼓動文字之外，不僅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底著作，而且要設法使這些著作得到普遍的傳佈。

要採取下列辦法保證中央委員會對出版社實際的領導：由中央選擇勝任的經過考驗的幹部；由中

中央委員會幫助建立每年的出版計劃；檢查計劃底執行；領導出版物底販賣；在書記處和政治局底會議上聽取關於出版工作狀況，關於出版物分佈狀況的定期報告。

最好根據這些提綱，按照各國共產黨底具體工作條件，規定關於傳佈和研究「簡明教程」的方針，以及關於轉變全盤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工作的方針。黨底領導機關（在法律關係允許的地方）應當召集宣傳員舉行討論，以便將與改造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工作有關的各問題，事先解釋明白；此外應當將這些提綱以及中央委員會對同問題的指示交給一切黨底支部去討論。

用來判斷各國共產黨及其中央委員會布爾塞維克化的成熟程度之最重要的標準，應當從下面幾件事實來看，就是要看它們對於大量傳佈「簡明教程」和組織「簡明教程」底研究的任務怎樣解決，對於正確地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底宣傳的任務怎樣解決，關於掌握工人運動底最進步理論的任務，怎樣解決。

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底歷史教訓我們說：

「工人階級底黨，如果它沒有精通工人運動底先進理論，如果它沒有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即它就不能實現其為本階級領導者底作用，就不能實現其為無產階級革命底組織者和領導者底作用……」

「只有已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底黨，才能够有信心地向前進展和引導工人階級前進。」（「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解放社版，下冊二七六頁）

只有這樣的黨，才能模仿偉大的列寧。斯大林黨底先例，把同盟者吸引到無產階級方面來。

只有這樣的黨，才能保衛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底利益，才能團結反法西斯戰線底力量，才能擊退

法西斯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戰爭縱火者，才能推翻萬惡的法西斯專政。只有這樣的黨，才能領導工人階級向資本主義進攻，才能站在勞動者為自身脫離資本主義奴隸制度而進行的解放鬭爭的最前線，才能領導他們爭取與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走向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社會光明燦爛的頂點。

法國共產黨

英國共產黨

美國共產黨

德國共產黨

意大利共產黨

四 蘇聯紅色教授學院支部局關於反德波林派的決議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關於哲學戰綫的狀況問題，支部會議聽了哲學與自然科學紅色教授學院支部局與斯大林同志討論的報告以後，發見了以下的事實：

一、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上的偉大成功，和向着社會主義時代，向着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建設的完成境地的邁進，是有着世界歷史的意義的最大變動。根據第十六次黨大會決議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攻勢的全綫的展開，國民經濟改造的成功，以全盤集體經營化為基礎的富農階級的清算，都是在頑強的階級鬭爭的情勢之中進行的。社會主義生產諸關係的活生生的現實的組織，日甚一日地把經濟和農村經

營中更多的人群包括進來，這是與階級關係的最後根據之絕滅。與將來的階級構成基礎之絕滅聯繫着，引起了爲歷史的命運所注定了的資本主義諸要素方面的頑強抵抗。階級鬭爭在政治和經濟上採取了極其各種各樣的形態及外形，在意識形態的一切領域裏，也明確地表現出來。尖銳化了的階級鬭爭的時期，在共產黨領導下無產階級所必須克服的困難，在對現在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左傾」歪曲，右派「左派」聯盟，兩面派等等的鬭爭中黨的一般方針的明快的、澈底的、布爾塞維克的貫徹，這不能不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引起與之相應的反響，這是理論戰綫上所產生的極重要的，有着大的歷史意義的過程。

社會主義建設的現在，對於我們理論戰綫上的一切參加者，是最好的試鍊。在尖銳化的階級鬭爭時代，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緊張活動的時代，基本的政治及理論的諸問題都排到日程上來了。黨在鬭爭的過程上，暴露了一切對於社會主義之展開的和勝利的攻勢之抵抗，不僅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如此，在鬭爭的全部理論分野上亦是如此。黨在理論上無情地暴露了一切腐敗的，機會主義的，一切非布爾塞維克的，反列寧主義的東西，無情地暴露了各種各樣形態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影響在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上的一切表現——不管它是怎樣小心地蒙着面幕，來掩蔽自己。

二、我國發展的復興時期，是隨伴着資本主義要素的若干的成長的，而這成長，是不可避免地要在許多理論領域裏把第二國際的孟塞維克理論（在一切可能的假面具之下來修正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表現的各種形態產生出來，並恢復起來。

這些在本質上孟塞維克的，修正主義的理論及「理論家」，由於許多的原因和情況，是在各個理論領域裏佈置着巢穴。魯賓派的孟塞維克的，反革命的意識形態，在其本質上，就是第二國際的經

濟理論，但雖然有黨中央委員會的直接指摘，而對於它的批評和暴露仍然是那麼不充分。政治經濟上布哈林及其他波格達諾夫的——機械論的理論，文藝理論上拍勒維爾雷夫派，瓦命斯基派等等的孟塞維克的——司徒魯威的見解，這一切的批判，到現在還沒有達到相當的理論高度。與唯物論辯證法和馬思克主義的公然孟塞維克化修正的聯盟，即實證論的——康德主義的修正（薩拉比雅諾夫。皮也羅夫。阿克雪洛德。契米里雅雪夫）的聯盟，以及德波林派方面（德波林。卡列夫。史登。盧波爾。費蘭克福特等等）的——哲學及自然科學等領域上的——馬思克主義——列寧主義的唯心論的修正，這一切，都是同一歷史鏈鎖的各個環節。

理論戰線上的這些內部相互聯系着的過程，是我國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利益的表現，同時也是國際孟塞維主義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條件之適應的種種形態。

三、爲着黨的方針而與一切反布爾塞維克的偏向及流派進行有成效的鬭爭，而把托洛茨基主義及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馬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本質暴露出來，這些乃是以列寧學說的活的研究爲基礎而產生的。列寧主義之作爲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思主義，是馬思主義理論的全領域上的決定的新的發展階段。在以前發展時期裏，我們曾把馬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滲透到無產階級及勞動者的幾萬群眾中間，同時使真正布爾塞維克的理論幹部顯著地成長起來，和被培養起來。

這一切情形，使得意識形態戰綫的最重要的佈置上有了很切實的理论鬭爭。這鬭爭的根本的意味和意義，就在於意識形態的一切分野上的馬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的攻勢的展開，就在於最後克服了一切反馬思主義的、反列寧的理論，克服了第二國際時代的假馬思主義在理論上的一切表現。

(不管它是在什麼言辭之下出現的)。我們的前面有着這最大的任務：把馬克思主義全領域上的列寧的遺產現實地加以研究和發展。

四、依照對理論戰線的狀況所給予的估計，我們提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哲學的爭論的總決算和當前的任務。

哲學與自然科學紅色教授學院支部局和黨組織，在哲學戰線的鬥爭上一般地是採取了而且採取着正確的方針。這方針的正當性，為黨的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布爾塞維克』）所強調着。

支部局所採取的方針的正確性，也可以從哲學爭論的全過程上得到證明，從（以一九三〇年十月十四日的哲學與自然科學紅色教授學院支部局決議為基礎的）哲學領域上的理論活動家的基本幹部的統一上得到證明。

哲學與自然科學紅色教授學院的黨組織，正確地理解了斯大林同志在馬克思主義者農業家會議上的指示，也就是正確地理解了，必須最迅速地清算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進步中理論上的不可容許的落後。並且正確地理論到由這指示所產生的一種必要性——即適應於哲學戰線上的事態而把這些問題在一切廣度和深度上提起來的必要性。哲學爭論過程上的分歧的線索也完全正確地被規定出來。這就是：哲學戰線上的轉向的必要和性質，哲學、自然科學及全理論一般的黨派性，哲學上的列寧主義，哲學及自然科學的兩條戰線鬥爭的開展之必要，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相關聯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任務，以及其他等等。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九日，斯大林同志與支部局討論哲學戰線狀況的問題時的意見，是以最完全的明白性把德波林派的見解規定為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的見解，並且明確地決定了在哲學戰線上掃除唯

心論碎屑的任務，決定了哲學上的兩條戰線鬭爭及研究列寧哲學遺產的任務，因此就有着最大的歷史意義，這是展開了新的一頁，將哲學爭論的過程提到最高的階段，打下了哲學領域上將來的理論活動的一切基礎。

五、哲學爭論的過程和總決算，再一度表明：哲學和政治、科學和階級鬭爭中間是有着最緊的聯繫，並且，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特別在階級鬭爭尖銳化、富農階級的清算、社會主義攻勢之全線展開的條件下，它們中間的分裂是不能容許的。這爭論再一度表明：即使是最抽象的理論問題上的最小的偏向（從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立場離開），在現在也有着重要的政治意義，並且表現着一定的階級的制約性；即歸根結底是有着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傾向的。

爭論證明了，支部局在批判所謂哲學指導部的立場時，所採取的基本原則是正確的。

六、支部局會議依據爭論的經驗和教訓，依據對於德波林派的政治上和哲學上的分歧的一切深度，依據它們的意味和意義——這在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中特別規定的明白——認為：本年十一月十四日支部局的決議裏把所謂哲學指導部的見解當作公式主義的偏向來看待，這還是學院式的，不十分明確的論斷，因此必須加以精密化，加以強化。因為唯物論辯證法的公式主義的曲解，在本身上，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唯心論的修正。

德波林派的理論和政治見解的全部總和，在事實上，本質上，正是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在它的基礎上，有着非馬克思主義的，非列寧主義的方法論，表現着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包圍無產階級的敵對階級勢力對無產階級的壓迫。它是馬克思主義的唯心論修正的極洗煉的形式——它以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的言辭極巧妙地遮着面目，隱蔽着，常常穿着馬克思主義的外裝，常常以非常尖銳的

形式，不僅反對羅雪夫型的明顯的、僧侶的、反革命的唯心論，而且還反對盧卡契型的黑格爾派唯心論者。

馬克思主義修正的這一種形態，本質上是唯心論者的，它的這種特質，是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條件相結合着（在這裏，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成了支配的理論，而直截的公然的修正之直接表白，是非常困難的）。

由於反對哲學上的列寧主義，並且反對哲學戰線上的轉變，德波林、卡列夫、史登及其一派，就走上了直接而且公然地對辯證法唯物論鬭爭的道路，走上了反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七、哲學與自然科學紅色教授學院的會議認為：在估計所謂哲學指導部的過去階段上的活動方針時所給予的如下的公式，即十月十四日支部局的決議，也是要加以改變的。

（一）「我國的直接哲學的活動，在許多領域上，直到現在，一般地都是向着列寧所指示的方向前進」，而（二）「過去的發展階段上哲學指導部的方針是基本上正確的」。——這對於事實並不符合，對於上述德波林派見解的本質特徵也是不符合的。

哲學領域的理論活動的基本任務，是在一九二二年列寧有名的論文「戰鬭的唯物論的意義」裏被規定了。這些任務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一）對一切種類的唯心論和一切色調和傾向的僧侶主義（不管它是在什麼旗幟的掩蔽下出現的）進行無情的鬭爭，正如對一切僧侶主義的從僕不屈不撓地去加以追究和暴露一樣；（二）為戰鬭的無神論而鬭爭；（三）「以黑格爾辯證法的唯物論的理解為依據」，「把馬克思應用辯證法的模範，把最近的歷史中，特別是帝國主義戰爭及革命中空前豐富地呈現着的、政治及經濟關係領域內的、辯證法的種種範例來註釋黑格爾辯證法」，這樣從各方面來展開

唯物論辯證法的研究；(四)實在與自然科學唯物論者的聯盟，同時在辯證法唯物論的基礎上來再建自然科學；(五)對於社會科學上的反動思想的一切表現進行不容情的鬭爭，對於隱蔽在科學性及民主主義等的外衣之下的一切，近代的封建主進行鬭爭。

德波林同志的孟塞維克傳統，列寧所批判過的普列哈諾夫在政治上、哲學上的錯誤見解的許多因素的強烈影響（德波林同志到現在還沒有從這些影響解放出來），再加以他周圍的一些幹部（卡列夫、史登等）都沒有受過布爾塞維克的鍛鍊——這一切，就在德波林派裏產生出容易在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作用之前屈服的元素，並且就在他們的理論活動上以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來。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及條件之下，在新經濟政策當初幾年的階級鬭爭情況之下，孟塞維主義採取各種各樣的形式再現出來，「化學地」製造成的小資產階級原始性的影響，產生了以下的結果——即，德波林派不僅不實現列寧的基本指示，而且相反的極顯著的程度這樣來歪曲了列寧的基本指示；即不是在澈底辯證法唯物論的精神上來進行自己的理論活動，而是在本質上在把辯證法唯物論加以唯心論修正的精神上。

不能忽視，我們的黨在過去的階段上曾進行過鬭爭，來對抗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機械論修正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論點。與機械論的鬭爭，在剝露布哈林的右翼機會主義的。波格達諾夫的折衷主義方法論上，同樣在剝露巴薩洛夫派。斯哈諾夫派等復活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及其一切同類的理論論點上是有幫助的。

與機械論者鬭爭時，德波林派是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的，但不能不考慮到的是，這一派並不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上來批判機械論者。德波林派在方法論的最重要的問題上所採取的基本上和本

質上屬於黑格爾派的唯心論辯證法的論點，在某種程度上批判了而且暴露了機械論者對於哲學一般、特別是辯證法本質之無理解，以及他們的一貫的形而上學的方法論，他們的粗糙的、樸素的唯物論，因為這樣，就能夠發揮一定的肯定的作用。列寧就在一個時候曾經非常正確地指出過：「黑格爾射中了辯證法唯物論以外的一切唯物論。」（「列寧資料集」，第十二卷，二三五頁）

但是，德波林派的批判，並不能保證對機械論方法論的澈底的、最後貫徹的暴露。相反地，這一派的唯心論的本質及折衷主義，使它的代表者們在全系列的問題上走向實際上與機械論者的一致（例如說普列哈諾夫關於象形文字的問題的錯誤僅只是用語的性質，以及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者的列寧與普列哈諾夫的關係的問題，這在德波林和盧波爾的見解和薩拉比雅諾夫是一致的，又如關於洛克的第一次屬性和第二次屬性的理論的問題，盧波爾和薩拉比雅諾夫也是一致的）。

八、德波林派的見解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表現在以下幾點。

(A) 理論與實踐的分離及哲學與政治的分離。由此而在實際上復活了「第二國際的最有害的特別性和獨斷之一。」

(B) 列寧主義的哲學黨派性原理的應用之完全拒絕和曲解。哲學的黨派性是以最準確的形態表現着我們的哲學的階級性質，因為勞動階級中最好的東西就是它的黨，同時也以最準確的形態表現着我們的哲學的行動性質，因為階級的最具有意識的行動部份就是它的前衛，即共產黨。德波林、卡列夫、史登一派都忽視了這一個列寧的原則，因為列寧的這個原則，必然地包含着這樣的要求，即黨的一般方針的擁護和對於一切離開黨的方針的偏向的鬭爭。

(C) 最後：對於列寧之作爲一般的理論家，特別是作爲馬克思主義哲學者之過低估計，以及對

於哲學上的列寧主義之作爲辯證法唯物論的新發展階段之不顧及和不承認，哲學及史的唯物論領域上的普列哈諾夫的許多錯誤之反復和深化。對於列寧的著作在哲學上和一般理論上的意義之過低估計，無疑地是與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中進行的科學研究活動中的論點相聯系着的。

九、這本質不僅表現在德波林派對於列寧主義的無理解中，也同樣表現在對於與這相聯系的。列寧主義一般的最重要問題之無理解中，並且表現在關於這問題所發生的最大的錯誤中。這包含着以下的一些事實，即：對帝國主義的考茨基式的錯誤看法，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以及民主主義與專政問題的完全抽象的提法（德波林：「作爲思想家的列寧」），在文化與文化革命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見解（盧波爾、卡列夫、波格洛夫斯基），個人主義及集團主義的抽象的對置，在舊的波格達諾夫、巴薩洛夫的「集團主義哲學」（這裏有着費爾巴哈主義、感性的集團化等的巨大混亂）的精神上的對共產主義社會的許多問題的提法（德波林，「社會主義的建設及我們在理論戰綫上的任務」——「馬克思主義旗下」一九三〇年第五號），對生產力及生產關係問題的孟塞維克的、斯哈諾夫式的看法（「生產力是能動的原體，生產關係是被動的結果」——哥尼克曼「馬克思主義旗下」一九三〇年二、三號），在道德問題上的考茨基式的錯誤（德波林），最後，關於過渡期的各階級的問題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不可能的問題，有卡列夫的托洛茨基式的，也即本質上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有左右派聯盟的「思想的」靈感授與者之一人即史登同志的半托洛茨基的錯誤，以及這一派的代表們接觸到階級及階級鬭爭的問題時在不同程度上所表現着的他們所共通的極度的抽象性。

十、德波林派的著作對唯物論辯證法的修正和歪曲，基本上，就其全部性質來說，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黑格爾化」的旗下進行的，不曾唯物論地改造過黑格爾的革命辯證法，沒有通過馬克

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的三稜鏡來加以研究，沒有應用到社會主義的實踐上，並且沒有和唯物論因素的全系列結合在一起，因此，這樣的黑格爾辯證法，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雜煩』（列寧對德波林的哲學論文的註譯），折衷主義，康德主義因素的全系列上去。在德波林派的哲學見解本身內部，我們看見，基本上是唯物論的諸要素，和黑格爾的唯心論辯證法以及費爾巴哈、康德式的錯誤等極其折衷地聯合在一起。

十一、不能在實際上克服黑格爾的唯心論，不能把他哲學的最重要的因素經過唯物論的改造而加以攝取。其表現在唯心論見解的全體系的姿態裏，從物質的一般的論點及規定起，到論理學的構造問題止的基本的哲學的問題裏，都可以看出來的。黑格爾辯證法的研究的必要性，曾被列寧非常強烈地強調過，但在德波林派的著作裏，這並沒有依據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唯物論辯證法及社會主義建設等等的實踐，因此就轉化爲它的對立物。不是加深辯證法唯物論的理解而使之發展，而是把黑格爾的這種研究引導到唯物論辯證法的唯心論曲解的方面去。對於黑格爾唯心論辯證法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曾有過完全確定的、明白的命題，而所謂哲學指導部的活動却與這相違反。在這裏，我們看見在本質上的黑格爾的復興，他的神聖化，他的偶像化，以及忘記了馬克思曾把黑格爾辯證法加以唯物論的改造，並因此而在實際上把它提到更高的階段。必須認識到，由於變成了黑格爾唯心論的一俘虜的緣故，德波林派在辯證唯物論哲學的最重要問題上造成了唯心論的歪曲。

十二、這歪曲表現於使物質的規定陷入唯心論去的錯誤之中。例如：把物質規定爲媒介、關係、聯系之無限的總合，認爲這關係的實在的擔當者就是從這種規定發生，因此把它看做時間和空間

的綜合——這樣一種完全唯心論的物質觀（格森），「生動的實在、現實，是只能在客觀與主觀的交互作用的過程上才能够獲得」（格森）——這樣一種馬赫主義的命題，在哲學的一切最重要問題上的唯心論的合理論（兌米夫斯基）——「辯證法唯物論入門」等等。

與物質的錯誤規定相關聯的，還有以下的事實：即對於唯物論辯證法本身的全然錯誤的理解：「把內在聯系，注入具體的內容去的普遍的方法論。」（德波林）。把辯證法理論理解作單單是「處理範疇的一般理論」，把範疇怎樣被應用於一定的個別場合的事完全「抽象地」抽象起來，把範疇在一般的理論上來加以分析（德波林）的誤謬。在黑格爾的唯心論的精神上保持着的對「辯證法的範疇」的閉鎖的體系」的必要性的要求（哥尼克曼）；「列寧的思想還包含着其他的內容，即，他曾說到辯證法的閉鎖的體系。辯證法必須從存在開始，同時它又必須以存在為終結。」等等。

十三、德波林派雖然與那否定理論一般，特別否定唯物論辯證法的馬赫主義的見解進行了鬭爭，雖然與這種跋行的、經驗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體系進行了鬭爭，但他們謬誤地把哲學解釋作「純粹」的方法論，解釋作與具體的知識、具體的科學及實踐隔離了的辯證法的、純粹「理論，因此就陷入了另一種片面性。在這樣的方法論化的基礎裏，就有一種理論被創造出來。依據這種理論說來，似乎現在的基本任務，僅只是為辯證法而鬭爭，同時，二十世紀初頭所課給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任務，又似乎只是為唯物論而鬭爭。在一定的具體條件之下，在特殊的歷史情況之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某些側面，當被提到前面來，這是沒有爭論餘地的，但是，為唯物論辯證法而鬭爭，却經常是哲學領域的根本任務。

德波林派著作裏的方法論化，在本質上，是表現為方法和世界觀，辯證法和唯物論，辯證法和認

論、辯證法和史的唯物論等等的唯心論的分離。

列寧在「論辯證法」這篇論文裏寫着說：「辯證法也就是（黑格爾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但是，對於問題的這一方面（這還不是問題的「方面」，而是問題的本質）普列哈諾夫卻沒有注意到，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更用不着說了。」而在德波林派的見解裏，却很奇怪地混合着這樣的兩種思想：一方面把認識論與辯證法對立起來（德波林「馬克思與黑格爾」），一方面却認為「認識論是被方法論吞併了」（德波林「馬克思與黑格爾」）。認識論為方法論所吞併，這樣的問題的提法，也不例外有着這樣一種意味：純粹「方法論，也即是從唯物論的離開來的辯證法之煩瑣學派的，唯心論的理論。

這些錯誤的基本特質是這樣的：即這一個集團，在他們的理論的著作裏，把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法則這一個學說曲解了，因此就不能正常地解決理論和實踐的相互關係的問題，不能在黑格爾關於一般、特殊和個別的統一的學說上作唯物論的改造，也即是不能處理唯物論辯證法的這一個最重要的課題。結果這些代表者們就把認識論中的經驗論的因素和合理論的因素，感覺和思維，歷史的東西和論理的東西，形式和內容等等隔離了，辯證法的範疇，表現為從具體的、特殊的、個別東西隔離了的抽象的「一般的」東西，表現為不包含任何一個經驗原素的思維的範疇，也即是把存在從歷史抽象出來，把人的意識從歷史抽象出來的純粹理論的範疇，這在實際上是達到了黑格爾的觀點。

十四、自然科學戰綫上的情況是和哲學戰綫上的情況有着緊密聯系的，自然科學領域上的一些指導的同志們，或者是完全支持德波林派的立場（阿果爾、列維脫、勒維因、格森），或者是對這一派採取調解的態度，本質上却是擁護它（史密特）。不僅如此，這一個自然科學者的集團還在自然科學

的專門的諸問題上採取了錯誤的，在本質上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非政治性，曲解斯大林同志的關於理論和實踐的相互關係之指示，理論和實踐的分離，對實行自我的批判的反抗，對列寧在自然科學上的作用之無理解，對自然科學上，特別是生物學上恩格斯的方法論的論點之修正，對恩格斯在近代科學上的著作的意味和意義之無理解，把理論的生物學之成就和馬克思主義同一看待，用遺傳學代替作為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唯物論辯證法，向着偶然發生的立場上去的轉向，在物理學及數學的立場上的馬赫主義的意見，德波林派代表者們所指導的大蘇聯百科辭典自然科學部的本質上反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對機械論者的鬭爭，是帶着全然不充分的、純粹形式的性質。而在各個分野上是本質地與機械論者相結合着（馬克思主義與自然科學的關係，內在的東西和外在的東西等等問題）。在醫學領域上的機械論見解（俄布尖派）却完全沒有被注意到。

與政治上及理論上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相並行，在組織的關係上，自然科學戰綫的現在的指導部也不會保證黨的方針的實際的實現。全然沒有一些設施，是爲着提拔和養成自然科學者中新的無產階級及黨的幹部的。把計劃性要素插入事業中去的嘗試一點沒有，關於改造資產階級科學的認真的企圖也毫不存在。在這個部門裏，也有着理論與社會主義建設之實踐的分離，並且還以自由主義態度的精神來庇護資產階級的、而且常常反動的學者。自然科學領域上的指導部的反馬克思主義立場，把科學上的黨派性的問題和加強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豐富遺產的必要性特別尖銳化了。

十五、由以上所述的一切，就生出這樣的任務：把德波林同志一派的代表者們關於哲學的全著作加以檢討、分析，並且對於他們文獻中的一切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東西施以最頑強的批判。這個檢討，其目的不僅不是要減弱對於辯證法唯物論之機械論修正的鬭爭，相反地却一定使得這

鬭爭強化，使得機械論者決定地被揭露出來。

機械論者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否定，在反對德波林派黑格爾主義的旗幟之下，對唯物論辯證法的鬭爭，對「近代自然科學的最近結論」（所謂能够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的尾巴主義態度，對社會科學不信任的「還元論」、對飛躍理論的孟塞維克的修正，對「象形文字」的「認識論和洛克的第—屬性爲第二屬性的理論之擁護，對列寧的關於客觀性即相對與絕對真理的學說之康德式的、不可知論的歪曲，孟塞維克的——康德式的無階級道德論等等——這一切證明了，在機械論者的無原則的集團中，很明顯地有着修正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潮流。

十六、哲學領域兩條戰綫上的決定的而且澈底的鬭爭，在現在獲得了特別重要的意義。辯證法唯物論之機械論的修正（布哈林、皮也洛夫、瓦里雅西、薩拉比雅諾夫、契米里雅雪夫、柯克雪洛德及其他）和史的唯物論之波格達諾夫的機械論的修正（布哈林等），仍然還是現在條件下的主要危險。因爲在根本上它明明是右傾機會主義偏向及黨內富農代理人的理論基礎。因爲它在我國處在改造期及社會主義攻勢全綫展開的條件下，是有着深刻的社會根源的。

與這同時，對於立在反馬克思主義程途上的唯物論辯證法之唯心論修正和德波林派的孟塞維克化唯心論（德波林、卡列夫、史登、波得沃洛茨基、列維脫、阿果爾等）必要採取最大的警戒和特別的注意。因爲這一危險，是被揭露得非常少，它所受到的理論上和政治上的批判，也是全然不充分的。因爲這樣所以它就孕育着極大的危險。

必須以決定的鬭爭來對付一切調解的傾向，不管它是對於機械論者（例如瓦西里也夫）的，或是對德波林派的馬克思主義之唯心論修正（例如史脫里雅洛夫）的。

揭露了德波林派之作爲孟塞維克化唯心論的見解的本質之後，再要對他們的見解採取公然的擁護或公然的調解態度，是極困難的。因此：對於這基本論點的形式上的承認，必須要受到特別的注意，必須要用決定的鬭爭，去對付那想迴避在一切理論的與實踐的活動上來實施這些基本論點的傾向——因爲這種形式上的承認，是調和主義的最壞一種。

與這同時，哲學與自然科學紅色教授學院支部局會議認爲必須指出：對孟塞維克化唯心論的單純化的理解也有着一種危險性，這種觀念，是把孟塞維克化唯心論的全部本質，單純地而且專門地歸結爲德波林之作爲孟塞維克的過去，依據這樣的事實，想對批判的工作加以本質上的限制。這樣就不能理解，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孟塞維克化唯心論所有着的社會的根據，這種觀念，在我們提起要檢討德波林及其戰友們關於哲學的、特別是十月革命以後的全部著作的任務時，客觀上是採取了反對的方向。

十七、哲學與自然科學紅色教授學院的黨會議，認爲必須指出：機械論者和馬克思主義之觀念論修正的代表者間有聯盟結合的企圖。例如在巴古關於哲學問題爭論時，半機械論者瓦西里也夫和鬭爭着的形式主義者之間，在紅色教授學院卡列夫、史登等左派的一事件關係者與加爾柏洛姆之間，都有着這種情形，這樣的聯盟企圖，今後會強化起來，是毫不容疑的。因爲，機械論者以及德波林派的許多錯誤的見解，都在普列哈諾夫的哲學錯誤之中有着共通的根源，而且是把這些錯誤畸形地深化了（例如阿克雪洛德、薩拉比雅諾夫、德波林），並且他的任何方面對於哲學上的列寧主義，都沒有任何程度的理解和接受。

十八、理論戰綫的活動家前面，有着這樣一種具備着特別重要性和複雜性的任務，根據列寧在唯

物辯證法領域裏最豐富的遺產之有效研究和鑽研，根據一方面對（包含着跋行的經驗論。對辯證法基本法則之無理解和庸俗化、實證論、還元論等的）深刻地俗流化的機械唯物論、他方面對抽象的——煩瑣的理論化、理論與實踐之分離，哲學向自我目的之轉化，思惟本質之煩瑣派的方向，特別是辯證法範疇之純論理學的分析等等的批判的克服，而把哲學上的一切理論著作提高到新的高度。

我們面對着唯物辯證法理論之實際研究的任務，而這任務是被引起來，是由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全行程與進步，以及我國在進行中的技術革命。並且我們還面對着這樣一種有着世界史的規模的任務，即在辯證法唯物論的基礎上來將全部科學加以改造。

十九、與哲學戰綫上所有着的最大任務相聯系，哲學與自然科學紅色教授學院支部會議要求支部局展開積極的活動，以便迅速地決定地實行十月十四日的基本決定以及現在的決議。活動速度的拖延，是完全不能容許的。必須把哲學與自然科學紅色教授學院的全部事業迅速地而且決定地加以改造和合理化，並且在履行這一切任務時，必須引導紅色教授學院的學生積極地來參加。會議指出、支部局直到現在還沒把科學的社會性在必要的程度上加以展開，沒有把哲學爭論過程¹所引起的最重要的問題提到廣泛的審議之上來。

會議認為，現在的計劃和綱領，不能充分反映哲學戰綫上所達到的轉向的全部性質和我們所面對着的任務，因此必須從速對於我們學院的研究計劃和綱領，從事更進一步的再檢查。

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以及黨爲着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建設的完成而進行的不屈不撓的鬭爭，在理論戰綫的全部參加者的前面提出了很大的要求，與這要求相聯系，必須把這些任務與共產主義研究院之間の間隙用最迅速的方法加以克服。

哲學與自然科學紅色教授學院支部會議認為：必須在中央委員會文化宣傳部之前，提出關於基本的哲學組織機構的最迅速的再建的必要性，和（爲了保證哲學戰綫上的轉變）之在布爾塞維克的遂行的）幹部之配備的必要性的問題。會議要在共產主義研究院之前，也在戰鬪唯物論者——辯證法論者協會總同盟協議會會部之前，提出哲學會議的日程之完全的再檢討的必要性問題以及保證在一九三一年後半年加以召集的必要性問題，提出（以保證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百科辭典之出現爲目的的）「哲學百科辭典」及大蘇聯百科辭典自然科學部的準備資料之完全的再檢討的必要性的問題。（艾思奇自日文重譯）

五 德波林的自我批評

諸位同志：我的課題是相當困難和複雜的，所說困難和複雜就是因爲一方面我不能不把我的演說用於澈底的自我批判，而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用於目前最切要的問題的說明，更具體點說，即對現狀及由現狀所產生的思想問題的說明，因爲我們關於國際範圍內的思想戰綫的狀況還說明的不充分，而且片面。因此我不能不同時談到這許多問題。而在這些問題的配列當中，保持各部份間的適當的勻稱，顯然是不容易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能不預先聲明：如果我用於自我批評的部份，在分量上，遠較其他的部份爲少時，也請諸位同志不要誤會作這是我對自己的「脫遁」的「脫遁」（譯者按：當時德波林的錯誤會被批判爲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脫遁）和對自己的錯誤所展開的批評的逃避。總之，重要的不在於所說的話之分量之多少，而在於其本質和比重。

其次，當說明現狀並闡明擺在哲學戰綫以及共產學院全體面前的各種課題的時候，當迎接這些問題的時候，不能不表明我關於我們理論爲現代（社會主義）之實踐的緊急問題間相互聯系的見解和積極的觀點。

現在我來回顧一下我以前的立場——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的立場。大家知道，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的用語，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的定義，和它的特徵都是斯大林同志所給的。這種完全正確的界說和規定表現在後來中央委員會關於「馬克思主義之旗幟」的方針之有名的決議中。這個決議對於我個人（我說的是我個人）不只是在形式上要服從的東西，它對於我，一個黨員，是糾正和克服過去的錯誤的南針。

應當承認中央委員會對於我國哲學戰綫上所表現的顯著的危險，在適當的時機發出了警號。如果我們是認真的獻身的黨員，如果我們不願意像有些同志們所常作的那樣，從事於決議的條文的解釋，我們這些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者，其中首先是我，不能不感謝中央委員會，尤其是我們黨的領導者斯大林同志。他們在適當的時機止住了我們，在適當的時機向我們提出了糾正並克服我們自己的錯誤以及重新檢查我們自己的全部行囊的課題。

在這裏，無論對決議，或對自己的錯誤，都不應當持不澈底的态度，或存一種心思，以爲自己雖不完全正確，但是還有幾分，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三十的正確。不，我們要無條件的解除武裝。我是這樣來看的，這樣來看是我的義務。爲什麼呢？因爲與後來的各種事件對照看起來，我非常明白：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實際上曾是，而且還是「左翼的」機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因此它是一種派別的偏向，在一定的條件下，如果以執迷的態度不對中央委員會的決定，無條件地，並且正直地。

良心地——不是兩面派地——服從的時候，就會成爲有害於我們的黨以及我們全部社會主義建設的派別。

孟塞維克化唯心論，在一定的條件下，會轉生爲孟塞維克的唯心論，並且那時，根據事物發展之不可抗的邏輯，它的信奉者們便會投入黨及黨的領導之直接對立陣營，投身於反革命的懷抱，事實上，有人走上了這條道路。

一個黨員的義務要求我們公開地、無條件地來表明這一切，並警告那些在某種程度上保持着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的殘餘的各位同志自動地爲完全克服自己以前的錯誤而努力。中央委員會指出了我們的錯誤何在，並如何糾正我們自己的錯誤，因而給了我們以克服錯誤的可能性。

我們的根本錯誤，如已被確認者，在於理論和實踐的分離。我必須承認，我在很長的期間，對這種非難未能理解。難道我不是時常說、實踐是理論的規準嗎？我這樣說過，而且這樣寫過。然而到後來，我才明白了、問題之核心並不在此。問題之核心在於我們未能把我們的理論的方法論的論點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的課題聯系起來，我們理論與活的生活脫了節，並且由於我們停留於純粹的邏輯的範圍之內的緣故，——有人較多、有人較少——而遠離了社會主義的建設，在二者之間築起了障壁。

這個問題不能機械地來解釋。就是說不能認爲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與「左翼的」機會主義中間有單純的直接的關係。不能認爲各樣的機械論者，或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者，就一定是政治意義上的機會主義者。——這樣的直接性和邏輯的繼起性是不存在的。好的（黨員）也有機械論者，好的（黨員）也有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者。雖然如此，但不能反駁下面的事實，即理論上有着偏向的人，會更容易地、更迅速地陷於（機會主義），並且機械的唯物論是右翼偏向的理論基礎，同樣地，孟塞維克

化的偏向是「左翼的一機會主義的理論基礎。」

與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的見解之根本的弱點——理論與實踐的分離——相聯系的，與之結合為最緊密的第二個錯誤，就是我們局限於邏輯的方法論的批判，在大多數的場合，忽視了被批判的派別或思想潮流的社會的（階級的意義）——這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是最大的錯誤，我們除了極少的例外，均只以邏輯領域界限內的批判為滿足。無疑地，這已經是唯心論的傾向，猶如理論與實踐的分離之為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同樣。

在現在各種條件下面，理論與實踐的分離，邏輯的觀念與社會根源的分離，局限於純粹的理論邏輯的領域，與實踐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脫離，是使得在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當中帶有直觀唯物論成份，和對費爾巴哈及普列哈諾夫估計過高的自然原因。在這一點上，我公開承認在我關於費爾巴哈和普列哈諾夫的著作中是有錯誤的。這些錯誤是應當糾正的，是與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不相同的。

我們舊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如像阿拿託里、瓦西里埃維契（大概即盧那查爾茨基——日譯者）向諸位所說的那樣——是在普列哈諾夫的強烈的影響之下的。我們的見解（笑聲）形成於九十年代及十九世紀之末，當時普列哈諾夫被視為黨的公認的哲學家，我們當時深受了他的錯誤的影響，並且在那時候反對他對費爾巴哈和斯賓諾莎的論點幾乎就等於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當時我們並未注意到他的哲學見解與孟塞維克的政治上的機會主義間的聯系。何況當時我也是孟塞維克之一員，自然更沒有想到這一層。當時，孟塞維克在普列哈諾夫的哲學的錯誤和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的聯系當中，自然只看到了普列哈諾夫的長處。

一九〇九年列寧的著作出版了。在這本書裏，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基本問題是用一種比起普

列哈諾夫來完全新異的方法來處理的。並且指出了普列哈諾夫的許多極嚴重的錯誤，這本書當時給了我以強烈的影響。然而我的最早的著作——「辯證法的唯物論哲學序論」——雖然出版很晚，可是寫得較早，所以在它裏面未能反映出列寧的影響來。

然而在許多問題上，例如關於象形文字的問題，我在這本著作中就已經離開了普列哈諾夫，雖然還沒有能完全克服其影響，所以我可以說：從全體看來，我完全站在反映（論）的觀點是以後的事，是在列寧的影響之下的事。可是同時我曾試圖為普列哈諾夫辯護，使他的觀點與列寧的觀點妥協，而掩蔽了普列哈諾夫的最大錯誤之一。

我絲毫也不想把自己的錯誤轉嫁普列哈諾夫，要普列哈諾夫來對這些錯誤負責。沒有隱罪的必要——普列哈諾夫的某些錯誤被我擴大了，加深了。例如在九十年代的時候，關於斯賓諾莎的問題與當時所發生的伯恩斯坦主義相聯帶着燃燒起來了。普列哈諾夫在當時斷言馬克思主義為「斯賓諾莎主義之一種」。我們要知道當時在許多人中間，存在着一種從我們今天的觀點看來，非常奇怪的理論——這種理論，我不知道叫它什麼才好。根據這種理論，能與斯賓諾莎、費爾巴哈那樣的人以及一般過去的大思想家有一近親關係，對於馬克思主義是一件榮幸的事。這種觀點本身還沒有包含什麼錯誤。然而過去的思想家，與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獨特的」「接近」的理論，自必有其否定的方面。我個人因為主要的努力於闡明爾費巴哈、黑格爾與馬克思主義的接近點，注意於其接近點，而忽略了其與馬克思主義尖銳地矛盾着的東西。因此不可避免地使我偏向於費爾巴哈及黑格爾，偏向於對費爾巴哈及黑格爾之過高的評價。

雖然我完全了解，並且明知道，辯證法唯物論的天才的理論是在馬克思根本克服並根本改造了舊

唯物論和黑格爾的概念論的辯證法的基礎上所產生的，並且是作爲『革命』運動的結果而產生的等等——而接近的理論在事實上在實際上仍舊帶來了下面的結果：即在我手裏，馬克思主義表現爲與費爾巴哈和黑格爾有太近的親屬關係了。

在這裏對於每一點都談到是不可能的。——因爲每一點都需要一個獨立的報告。我現在止於舉出一個最嚴重的錯誤來。這個錯誤在我有些著作當中和黑格爾關係的地方可以發現，雖然在另外有些著作中，我的處理是正確的。這裏所說的正是辯證法的根本問題，我所寫的對立物的和解一語是犯了極嚴重的錯誤，這是無待證明的，而黑格爾的（和解）一語把我陷入了錯誤。雖然我在其他一些地方處理得正確，然而在有些地方用了對立物之和解的用語。這不用說等於在政治上陷入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利害協調的理論。雖然我自己批判過黑格爾這個公式，但是在我手裏可以發見這同樣的公式。

我不能不承認對哲學以及一般馬克思主義之列寧的階段之理解的不充分和估計過低是我的一個嚴重的錯誤。我曾經說過並且寫過，列寧把馬克思主義推進到了新的最高的階段。然而非常顯然地這止是一句空話，因爲我並未從這個命題，得出任何具體的結論來。並且最重要的是並未打算把列寧所加於馬克思主義的寶庫中的新東西加以具體化。更糟糕的是關於這些，特別是關於哲學的部份，也都是由斯大林同志才說明了的。

此外我還要附帶說明，並且要強調指出，我們不單非常地忽略了列寧，並且也沒有理解斯大林同志在進一步發展全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工作中所作的重要的理論活動，忽略了他的勞績。

現在我個人完全覺悟到了產生這全部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的見解的這些嚴重的失策，兩條戰綫上

的鬭爭的必要，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建設以及「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和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鬭爭」之必要。

馬克思主義，必須，不斷地與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及一切偏向「進行鬭爭」，並從鬭爭中強固自己，更好地武裝自己，更加豐富自己。希望集中我們的一切力量爲「社會主義」的新階段中擺在我們面前的巨大的理論任務——當然應該服從「政治任務」——而進行共同的同志的努力，……（略一句）因此我再說一次，凡曾經是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者的各位同志，必須完全肅清自己的錯誤，澈底的解除武裝，因爲對黨來捉迷藏，耍手腕都是不行的。……（李又常自日文重譯）

註：此文是一九三三年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下」發表，全文分兩段，前半段是德波林的自我批評，此處只譯出前半段，係由日文重譯。日文中語氣不接，必須另加的字概用（ ），日文中被刪去的由譯者揣測添上的概加【 】。

六 中共六中全會論學習

一般地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與趨勢；並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特殊地說，幹部應該着重地研究這些東西，中央委員會與高級幹部尤其應該加緊研究。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使之向着勝利，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實際運動的了解，就不能有勝利。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是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而是當做行動的指南。不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字母，而是學習他們觀察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立場與方法。只有這個行動的指南，只有這個立場與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學，才是引導我們認識革命對象與指導革命運動的唯一正確的方針。中國黨的馬克思主義的修養，現已較前大有進步。但還說不到普遍與深入。在這方面，我們較之若干外國的兄弟黨，未免遜色。而我們的任務，是在領導一個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大民族，進行着空前的歷史鬭爭。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論的任務，對於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着重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我們努力吧，從我們這次擴大的六中全會之後，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得更多一點，更好一點。我們的工作做得還不錯，但如果不加深一步的學習理論，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而只有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才有我們的勝利。因此，學習理論是勝利的條件。在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中國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主義的同志，那將是等於打倒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同志們，我們一定要學習馬克思主義。

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大民族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發展法則，有它的民族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個，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之一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從孔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我們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承繼遺產，轉過來就變為方法，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着重要的幫助的。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

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爲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份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爲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爲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與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幹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着的一些嚴重的缺點，是應該認真除掉的。

當前運動的特點是什麼？它有什麼規律性，如何指導這個運動？這些都是最實際不過的問題。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懂得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也還沒有懂得中國的全部。運動在發展中，又有新的東西在後頭，新東西是層出不窮的。研究這個運動的全面及其發展，是我們要時刻光起眼睛注意的大課題。如果有人拒絕對於這些作認真的過細的研究，那他就不過是一個西班牙的唐·吉訶德，再加一個中國的阿Q，而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何研究？用馬克思主義的工具——唯物辯證法。向誰研究？我們的先生多得很——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資本家。地主。日本帝國主義，還有全世界，他們都是我們的研究對象，同時又都是我們的先生，我們應該向他們或多或少的學到一點東西。

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要認真學習一點東西，須從不自滿始。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我們應取這種態度。（毛澤東：「論新階段」一〇一——一〇三頁）

七 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一日)

(一)二十年來，我黨對於中國歷史中國社會與國際情況的研究，雖然是逐漸進步的，逐漸增加其知識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葉，不求甚解，自以為是，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仍然在黨內嚴重的存在着。抗戰以來，我黨在了解日本，了解國內經濟政治關係，了解社會情況諸方面，是大進一步了，主觀主義形式主義作風也減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屬粗枝大葉的，漫畫式的，缺乏系統的周密的了解。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的作風，並未澈底的消滅。對於二十年來由於若干同志思想方法上的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由於缺少各方面的豐富知識，使革命工作遭受損失的嚴重性，尚未被全黨領導機關及一切同志所澈底認識。若干負責地方工作的同志，對於他們自己從事工作區域的內外環境，不論在社會經濟政治方面，在敵偽方面，在工作方面，均尙缺乏系統的周密的了解。黨內許多同志，還不了解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真理。還不了解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還不知道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而情況如不了解，則政策勢必錯誤。還不知道日本帝國主義對於我國的調查研究是如何的無微不至。還不知道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系，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我黨現在已是一個擔負着偉大革命任務的大政黨，一言一動，關係於國家社會的前途，必須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採取具體辦法，由中央到每一黨員，加重對於歷史，

對於環境，對於國內外省外縣內外區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方能有效的團結全國各階級的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

(二) 關於調查研究的方法，舉例如下：第一，收集敵友我三方關於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係的各種報紙、刊物、書籍，加以採錄、編輯與研究。第二，邀集有經驗的人開調查會，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調查一鄉、一區、一縣、一城、一軍、一師、一工廠、一商店、一學校、一問題（例如土地問題、勞動問題、游民問題、會門問題）的典型。從典型着手，是最切實的辦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農村中應着重對於地主、富農、商人、中農、貧農、僱農、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階層生活情況，政治需要及其相互關係的詳細調查。在城市中，應着重對於買辦大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貧民群眾、游民群眾的生活情況、政治需要及其相互關係。第四，利用各種幹部會、代表會、收集材料。第五，寫名人列傳。估計到領導人物在中國社會中的重大作用，研究這些人物的各方面，寫成傳記，乃是研究整個中國的重要一環。在抗日陣綫之內，凡財產五萬元以上的資本家地主、團長以上的軍官、縣長以上的官長、各黨各派縣以上的負責人、名流學者、文化人、新聞記者、宗教家、社會活動家在一縣內外聞名者，以及在華外人活動份子，都替他們每人寫一數百字到數千字的傳記，以便了解他們的歷史與志趣，決定與他們合作抗日的適當步驟。對於素受社會歧視的會門首領、流氓頭、土匪頭、名優名娼，但有一長足錄，亦應加以了解，使能對人民解放事業有所貢獻。至於重要的敵寇漢奸與替他們作虎狼的重要份子，乃我們當前的鬭爭對象，更需有充分認識，以達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之目的。此種傳記，要責成地委及縣委同志分負責任。傳記內容務須切合實際，勿因一己之好惡而加以歪曲。第六，個別口頭詢問。或派人去問，或調人來問，問

幹部。問工人。問農民。問文化人。問同情者。問商人。問官吏。問流氓。問俘虜。均屬之。第七，收集縣誌。府誌。省誌。家譜。地圖等，加以研究。

(三) 向各級在職幹部與訓練幹部的學校，進行關於了解客觀情況（敵友我三方）的教育。鼓勵那些了解客觀情況較多較好的同志，批評那些尙空談不實際的同志。鼓勵那些既了解情況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評那些既不了解情況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那種了解情況注意政策的風氣與學習馬列主義的風氣密切聯系起來。在學習中，反對不管實際只記條文的風氣，反對將學習馬列主義原理原則與了解中國社會情況解決中國革命問題互相脫節的惡劣現象。要提倡幹部與學生看報，指導看報方法，指導他們分析時局的每一變動。要供給幹部與學生關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各種情況的實際材料，把講授與研究這些材料及其結論，當作正式課程，給與必要時間，並實行致績。

（民國三十年九月八日發表於『解放日報』）



思想方法論

一九四七年五月 東安 5000

定價 2.50 元